

清华  
传播  
译丛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维系民主? (修订版)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加) 罗伯特·哈克特 赵月枝 著

沈荟 周雨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  
传播  
译丛

# 维系民主？（修订版）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并不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客观公正，这几乎是西方传媒学者的共识，为何新闻客观性还能继续在北美传媒中成为“不死的上帝”？北美庞大的传媒机构如何运转？北美传媒与社会生活，尤其与政治之间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就是这样一部深刻反思北美传媒的历史与现状，从西方新闻体制、新闻哲学以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高度来探讨客观性并以此为基础剖析北美传媒的集大成之作。书中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闻现象——从主流到非主流，从19世纪初的便士新闻到目前流行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电报新闻到互联网新闻……在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而历史的评析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全新的新闻哲学和新闻改革的具体措施。

ISBN 978-7-302-23941-3



9 787302 239413 >

定价：32.00元

清华  
传播  
译丛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维系民主?(修订版)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此书以客观性为切入点和聚集点,从西方新闻体制、新闻哲学以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高度来探讨客观性的来龙去脉,并着重立足于美国、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和新闻现实。书中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闻现象,以大量而翔实的材料对北美新闻制度、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以及北美特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而历史的评析的同时,本书还提出了全新的新闻哲学和新闻改革的具体措施。

Robert A.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EISBN: 1-55193-013-7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Garamond Press Lt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204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加)哈克特(Hackett, R. A.), (加)赵月枝著; 沈荟, 周雨译. --修订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2

书名原文: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ISBN 978-7-302-23941-3

I. ①维… II. ①哈… ②赵… ③沈… ④周… III. ①新闻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7600 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责任校对: 宋玉莲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230 印 张: 16.75 字 数: 26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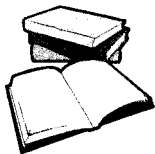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32.00 元

---

产品编号: 031446-01



## 清华传播译丛

主 编：熊澄宇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 鸿

张国良

明安香

胡正荣

胡苏薇

郭庆光

熊澄宇

# 序



传播学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1997年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

传播学素有“多学科的交叉路口”之称,构成其学术渊源的学科主要为行为科学群中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语言学、符号学和信息科学群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学、统计学等。

自传播学诞生以来,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传播实践活动密不可分。随着计算机、有线电视、光纤传输、卫星直播、数字电影、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等新传播形态的不断出现,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为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推动文理交叉的相关学科发展,清华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传播系。在传播系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与不同国家从事传播学教学、科研和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接触了许多国外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们也有选择地部分使用了国外的原版教材。

考虑到我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和社会需求,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愿望,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将选择一批国外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国际通行的传播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大致包括传播者研究、传播媒介研究、受众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过程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制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研究八个方面。清华传播译丛的选题

将主要围绕这八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媒体社会是继信息社会后的又一说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与信息传播活动在社会建构中的重要性。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希望我们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推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进程,也希望读者能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帮助我们完善这样一种努力。

熊澄宇

2001年10月

## 简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并不像它们所标榜的那样客观公正,这几乎是西方传媒学者的共识,为何新闻客观性还能继续在北美传媒中成为“不死的上帝”?北美庞大的传媒机构如何运转?北美传媒与社会生活,尤其与政治之间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由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西方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就是这样一部深刻反思北美传媒的历史与现状,以深厚的理论为基础剖析北美传媒的百科全书式的集大成之作。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客观性——它引入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知识/权力王朝的概念,把新闻客观性定义为包括4个层面的新闻/权力王朝。客观性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渗透到从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和编排各个领域的灵魂,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它跳出了一般关于新闻客观性分析只限于新闻能否达到客观的局限,而且以客观性为切入点和聚焦点,从西方新闻体制、新闻哲学以及新闻与民主的关系的高度来探讨客观性的来龙去脉,并着重立足于美国、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和新闻现实。本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闻现象——从主流到非主流,从19世纪初的便士新闻到目前流行于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电报新闻到互联网新闻……以大量而翔实材料对北美新闻制度、新闻思想、新闻实践以及北美特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而历史的评析的同时,本书还提出了全新的新闻哲学和新闻改革的具体措施。

本书从哲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社会学、新闻



史、新闻文本分析等各个角度来剖析客观性这一新闻现象，真正体现了传播学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本书追溯客观性在启蒙话语中的哲学渊源，分析客观性与党派新闻、劳工新闻和便士新闻的历史关系，以及客观性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定义和重新定义、被挑战和被重新肯定，以生动的事例揭示了新闻客观性的社会意义——新闻机构、新闻记者、新闻源、新闻受众、新闻管理机构如何以它为手段来控制 and 协调新闻生产制作过程和解读过程。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剖析了客观性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政治性。

本书的理论框架既吸取了西方的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精髓，又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新思潮十分敏感，极力跳出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定势和方法论。

本书渗透了民主意识和多元意识，它不仅批判了北美新闻客观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且在更深层面批评北美新闻传媒反民主话语霸权体系，以及新闻客观性所依附的自由意识形态在 20 世纪末所面临的危机。对充分认识北美的新闻制度和新闻实践的实质，了解北美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最新动态，评述目前西方传媒制度变革等最热门的话题都有积极意义。

## 中文修订版 序言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英文原著1998年在加拿大出版。中文第一版200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盛夏，我刚和我的合作者罗伯特·哈克特教授写完了此书的塞尔维亚语版序言，又有机会修订此书的中文版序言，自然非常高兴。如我在此序言的第一版中坦言，出版中文版这件事比当初此书英文原著的出版更令我欣喜。它使我实现了当年留学加拿大时的第一学术心愿：揭开“新闻客观性”这一新闻学中的“不死之神”的面纱，为国内新闻理论、新闻政策、新闻实践与新闻批评界有相同兴趣的同仁提供有关北美新闻制度的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独到分析。

在书中，我们超越了“新闻是否客观”和“新闻能否客观”这些新闻伦理与新闻实践领域的普遍命题，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新闻制度和新闻文化的形式来理解。我们采用跨学科的视角，以新闻传播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和传媒社会学为基础，引入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文化研究理论和话语分析方法，从新闻制度与北美民主政治制度的关系这一理论高度来分析与评价新闻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对新闻客观性的全面剖析，我们不但力图提供有关北美新闻传播业的主要理论、政策与实践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图景，而且就新闻传播在当代北美社会里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以及新闻与资本、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我们虽然立足于加拿大，但是我们的立论与分析，包括对一些具体事例的选取，都观照了整个英美传播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和现实。

虽然本书属于理论，但是读者不妨把它当作以新闻

客观性为主角的有关新闻与当今北美民主制度何去何从的一段叙事来阅读。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闻制度安排和新闻文化形式，新闻客观性与欧洲启蒙民主话语以及英、美、加的早期劳工新闻和商业新闻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与组织结构上的历史渊源。它的理论思想与实践形式在与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政治社会文化哲学思潮的互动中不断演变。它不仅植根于北美传媒制度中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而且作为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在规范与协调新闻与公众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客观性制度的哲学基础已被后现代主义和相关社会理论所动摇，但它不仅维护着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话语霸权，为主导的传媒制度和社会话语权力关系提供了合法性条件，而且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向右翼的市场自由主义转折提供了润滑剂。同时，它的普遍性、抽象性和规范性也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种社会力量争夺话语权、影响新闻议程和公共话语意识形态跨度的象征性资源。

在我们的叙述中，北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闻客观性制度面临着双重危机，而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传媒理论规范性的核心概念，如新闻自由、新闻对政治权力的监督、新闻媒介作为信息的提供者、新闻舆论市场上的“消费者至上”等，已无法为摆脱危机和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在书中关注在客观性的范式之外促进北美传媒民主化的技术资源和传媒业内外部的社会运动等因素，包括互联网、公共新闻改革、另类新闻媒体和媒体民主化运动。虽然最终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抛弃客观性制度，但我们呼唤新的公共传播哲学原则的出现。

自1998年出版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包括2001年的“9·11”。随后的“反恐战争”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事件，而书中关于北美传媒业所有者的某些具体细节也早已成为历史。例如，书中描述的加拿大报业独霸一方的媒介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不但在2000年把自己的报业王国在加拿大的部分出售给新崛起的多媒体公司加西全球传播集团(CanWest Global Communications)，而且因为把上市公司当作个人的钱袋而遭美国法院起诉，在2007年12月10日被判了6年半的监禁。更有戏剧性的是，20世纪末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新媒体融合浪潮中靠负债和兼并快速崛起的加西全球传播集团，最终成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牺牲品。2009年10月，负债40亿加元的加西全球传播集团宣布寻求破产法保护下的重组，这个红极一时的加拿大大型跨国传媒集团开始解体。2010年

6月,该集团把麾下包括 National Post, Ottawa Citizen, Vancouver Sun 和 Montreal Gazette 等主要报纸在内的报业以 11 亿加元正式出卖给由其债权人所有者组建的新公司 Postmedia Network。

然而,在后“9·11”和后金融危机的语境下,我们所揭示的新闻客观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变得更明显了。我们所描述的北美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闻客观性制度面临的双重危机在当下北美新闻和政治现实中也进一步加深了。比如,新闻评论家有关美国媒体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评论不断指责美国主流媒体的伪新闻客观性(Pseudo objectivity)实践,认为它使媒体被动接受官方信息,成为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的传声筒。如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年7~8月号上就发表了该刊编辑 Brent Cunningham 题为“反思客观性”(Re-thinking Objectivity)的长文,认为客观性新闻为懒惰和不深入调查提供借口,为“官方真理”的传播提供方便,使新闻界不敢与权力抗争,不敢把当权者不愿提及的问题——如伊拉克是否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到新闻议程上。套用美国政府有关颠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regime change)的政治术语,也仿佛是对我们书中把客观性定位为一种政治体制(regime)的回音,美国著名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也在2003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著文呼吁,“在国家首都出现的伪客观性……已到改朝换代的时候了”(Pseudo-objectivity in the nation's capital is now overripe for regime change)。在此文中,希钦斯检讨了美国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媒体奉行的“伪客观性”是如何为媒体不深入调查和传播“官方真理”(如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方便的。

与此同时,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所言,在经历了客观新闻和专业主义的高峰期后,美国主流新闻又大有回到党派新闻和鼓吹性新闻年代的迹象。赤裸裸的倾向性和表态性新闻俨然已成为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比如,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以在报道中公开表达右翼观点而取胜于市场,在“反恐战争”中以其鲜明的美国民族主义立场在收视率上明显超过了在新闻立场上坚持“中间路线”的CNN;为了迎合政府、广告商和传媒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客观性的核心——新闻的独立性原则——也不断遭到侵蚀。克雷尔频道(Clear Channel)广播公司下属的广播电台更是公开抛弃独立原则,组织起支持美国在海外发动战争的民众集会。在美国,客观性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从来没有像在后“9·11”时代那样

昭然若揭。在加拿大，商业利益对客观性的侵蚀，尤其是传媒业主对传媒话语权的支配，在新世纪更有了令公众瞠目结舌的发展。在购买了布莱克的报纸王国并成为加拿大高度集中的传媒业的主要传媒集团后，加西全球传播集团曾要求旗下的14份都市报纸无一例外地刊登公司总部撰写的有关重大时政问题的评论，并要求所拥有的报纸在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舆论一律，与公司所有者家族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保持一致。

总之，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话语权力的行使比以往更直接，加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旨主义化，使北美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许，新闻客观性体制所依附的政治、传媒经济、哲学、社会意识形态条件已全面瓦解？

令人深思的是，与美国首都盛行的被认为是服务于权力的“伪客观性”情况相反，在英国，英国广播公司(BBC)则正是以客观独立为原则和武器，在有关伊拉克是否真的“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问题上与政府和官方“真理”进行了抗争。在200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资深主持人丹·拉瑟则不得不为CBS在一则有关现任总统布什服役历史的调查性新闻中因调查不深入和用了第三者提供的假证据而公开道歉。而CBS新闻因为一则有意揭露布什的新闻而公开道歉这一事实，又为美国右翼新闻批评家们重申他们普遍信奉的美国主流媒体有左翼自由主义或反权威倾向的信条提供了佐证。

总之，有关新闻客观性的实践复杂多面，评论界对新闻客观性至今见仁见智：有人诅咒它的虚伪，有人悲叹它的式微，有人以捍卫它为借口来影响公共舆论，更有人在客观性的旗帜下与影响媒体的外部政治经济权力进行抗争。对于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者、从业者和普通受众来说，2008年春天西方媒体对中国奥运火炬接力和西藏“3·14事件”报道是认识西方新闻客观性某些特质的一个特定窗口。有感于当时的语境，尤其是国内媒体和网民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宣称的失望和对西方媒体的批评，我接受了当时新华社驻渥太华首席记者杨士龙先生的采访，并在此基础上应邀在2008年第2期的《新闻大学》上发表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一文。文章在对本书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概述的同时，也对西方新闻客观性的现状、客观性与西方对中国报道的相关性问题，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范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文的删改版作为附件随本书出版，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无须赘言，语境的不同决定了客观性与社会话语权力的关系在不同

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实践中会与我们所分析的北美情景有所不同。在国内,新闻传播业遵守的是公开的党性原则。在许多新闻传播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眼里,新闻客观性和以其为核心的专业主义可能还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注重“伪客观性”对权力关系的依附与掩盖,而更注重客观性精神与实践相对于现有新闻制度的解放性意义。然而,事实上,自从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闻理念与实践出现以来,国内新闻界对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话语的利用越来越自觉了,有关客观性的宣称在中国媒体中已不再陌生。比如,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的口号就是对客观性的某种宣称。这一宣称及其具体新闻实践正体现了在中国特定新闻体制下特定的新闻文化形式和话语权力关系。对这一宣称和这一宣称所指的具体新闻实践和在此宣称下播出的新闻文本及其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我们无法简单地贴上“开放与保守”、“解放与压制”、“真实与虚伪”等二元标签。实际上,如我在2008年在美国出版的英文专著 *Communication in China* 一书中所分析,国内被认为专业性程度比较高的《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在不同的报道中会调用不同的专业主义宣称:例如在某一报道中,专业主义被定义为倡导性新闻和张扬新闻事件的宏观社会政治意义;而在另一报道中,专业主义被定义为仅仅报道“客观事实”的就事论事和尽量不去描述与讨论事件的深层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因此,更有意义的是对这客观性宣称及其实践的多面性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分析,并进一步对相关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和意识形态批评,从中揭示一个转型社会已经或正在形成的话语权力关系。如果此书对国内同行认识北美的新闻与政治制度及其国际语境有所帮助,对发展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学有所启发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此书是在哈克特教授的一篇期刊论文和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在1990年代初、中期断断续续写作完成的。当时我还在读博士,记忆中有凌晨一点多钟抱着刚刚睡醒的几个月大的女儿在计算机前改书稿的片段。事过境迁,我和哈克特教授由当年的师生关系变成了现在的同事关系,而我的独生女明年就上大学了。我和哈克特教授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虽然合作编辑了有关国际传播民主化的论文集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但是基本上是各自在忙各自的研究。我致力于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而哈克特教授则在批判的基础上从事西方媒体改革运动和“再造媒体”的研究。不过,作为我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跨国新闻比较分析研究的延伸,我和哈克特教授已经计划写作《维

系民主》一书的国际版，在丰富与补充原著有关北美新闻客观性体制的分析的同时，着重分析这一体制的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当下全球新闻传播议题。

我非常感谢沈荟与周雨两位译者，她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为翻译此书做了各自的努力：周雨从曾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她的老师那里得到此书后，翻译了第一稿，并到加拿大与我探讨过翻译中的问题。沈荟在周雨初稿的基础上逐字逐句重新翻译、整理，输入文字，并就翻译中的一些具体疑点与我逐字逐句进行了商榷。她还就某些关键词语的翻译请教了国内传播学界的权威，然后把结果告诉我，使我学会了一些英语学术词汇的准确的中文表达方法。她对学术认真纯粹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此次再版，沈荟在百忙之中又对第一版中的个别表达作了修订，以求更准确和完美。作为懂中文的原著者，我可以这样说，此书翻译的质量是一流的。我也十分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此书两个版本的出版所做的一切努力。同时，我还要真诚感谢清华大学的郭镇之教授，她当年不仅在我、译者和编辑之间做了不倦的牵线搭桥工作，而且就我的这篇中文版序言的最初版本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中译本第一版的热心读者和书评作者，是他们的鼓励和积极评价，包括一些朋友在此书第一版早已脱销后向我个人的索求，使我相信，出版修订版应该是一件符合市场供求关系的事情。经作者同意，陈力丹和王亦高二位先生发表在《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上的书评作为附件之一在书后出版。

最后，此书的英文原著出版商，多伦多的加里蒙德出版社免费赠送了他们所拥有的中文出版版权，特此表示感谢。

赵月枝

2010年8月于北京

# 序言



## 新闻客观性与民主

新闻可以说是公众获取知识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公众领域中已占首要地位，而新闻则是大众传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公共领域就是“人们就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信息和观点，以便形成公众舆论的社会生活领域。”<sup>1</sup>

在北美，新闻实践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受我们称之为客观性体制的制约。我们称之为政体的客观性体制——一种理念、假设、实践和制度的集合体已变成固定的公共哲学和自我调节的一种假设形式。利益集团、社会活动家们及政客们运用客观标准就公众议题进行协商，新闻记者将之当作提高他们职业地位的资本，广告商和传媒公司则发现可以用客观标准这个有用的工具尽可能地提高其商品的市场到达率和可信度。客观性已成为一种有其自身生命力的文化形式。

反过来，客观性体制与民主、公共责任、公共生活及公共利益等重要问题有割舍不断的联系。正如加拿大皇家报业管理委员会在 1980—1981 年所说：“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相信，一般而言，报业乃至整个大众传媒对公众所负有的责任与其他行业不同。”<sup>2</sup> 换言之，加拿大人普遍相信新闻除了在市场上取得自身的经济效益外，还应有其他的追求。因此，作为对民主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构，人们普遍期望新闻媒介能在维护公众利益方面发挥作用。

在加拿大，新闻发挥功能的模式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的管理模式有着长远而紧密的联系，并且普遍而



言,北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其庞大的传媒集团,也同新闻业的社会实践与文化知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闻事业与大众传媒机构,因而也背上了维系它们所倡导的某种“民主”的重负。

然而,民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联邦主义或者分裂主义等政治概念不同,民主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被广泛接受。它简直就是一个令全世界都欢呼叫好的褒义词,而它的对立面则是诸如专政、法西斯主义之类令人厌恶反感的贬义词。但是真正引起争议的却是民主的本义,即它的确切含义。

政治学家认为有多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和制度都能称得上民主。C. B. 麦克福森(C. B. Macpherson)在1965年为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所作的精彩广播演讲中,概述了战后世界上存在着共产主义、不发达和自由主义三种民主形式。<sup>3</sup>在自由主义民主传统内,他后来为民主归纳了几种不同,甚至是对抗关系的阐述:保护公民不受他人和国家专制政府的残害,促进个人品格的完善及公民意识的发展,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保持政治稳定,促进广泛直接的政治参与。既将民主本身作为终极目标,又作为建设一个更加人道和平等社会的手段。<sup>4</sup>新闻的客观性体制与自由民主的平衡模式紧密相联(平衡模式即竞争的精英的统治论),从而,相对排斥了其他那些强调维系民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参与和社会平等的模式。<sup>5</sup>

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机构,人们希望新闻传媒按一定的标准来发挥其职能,例如,

- 出版自由:从历史上说,这个概念的最初意义是指不受政府的审查控制,但也指不受私人利益集团或过度集中的私人权力的不良影响。

- 平等和公正:社会上的各种声音都应有均等的,通过传媒系统向更多的公众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观点的机会。

- 社会秩序和团结:即使是最多元的民主也需要某种程度的意见与价值观的一致,公共传播对于建立和保持这种一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能明显地起到推动“公民”话语的特殊作用:人们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得到某种和解。<sup>6</sup>

人们虽然普遍接受这个价值,但是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和它们相互之间妥协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色情问题,社会保守人士认为它对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造成威胁,女权主义者认为色情会对男女平等的追求造成威胁,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政府的审查才是最大的威胁。至于如何阐释和实施这些标准,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人觉得平等

的基本含义就是每一个政党都应享有均等的传媒时间,而有些人却认为传媒时间应与某个政党目前在社会上所拥有的支持率成正比。

私营机构或公共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这些价值标准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新闻媒体为私人所拥有,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国家建立了公共广播系统,从事商业广播系统所无法达成的文化传播事业及其他目标,而这是商业广播公司无法做到的。由于长期面临美国的文化侵袭,加拿大创立了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其主旨是建立一个能与其疆土相匹配的公共领域。也正是由于新闻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连美国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也以广播频道资源有限等为理由,根据公众利益规范广播电视媒体。鉴于新闻媒体的公共职能,许多国家给予私人媒体许多优惠,如瑞典的新闻补助金政策、加拿大的免税政策、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律也破例让作为竞争对手的报纸共享资源。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些优惠政策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润之间起到了一种明显的平衡作用,同时也很好地协调了政治与媒体制度中的自由、平等和秩序这些价值关系。

当然这种表面上的平衡关系也常常遭到非议。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保守人士指责媒体有“左倾自由主义”倾向,而进步人士则认为媒体是主流企业和政治机体的组成部分。<sup>7</sup>近年来,新闻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在新闻独立和多元化,以及为了追求这种独立和多元化如何去维持公共政策和私营媒体之间合理的平衡关系等问题上的分歧。最显著的是在1995年和1996年期间,北美传媒业中出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亿万元巨头,在美国出现了疯狂的并购现象,包括迪斯尼公司吞并大都会/ABC公司,西屋兼并CBS以及时代华纳公司接手泰德·特纳的CNN王朝。美国四大电视新闻机构如今成了一个巨大的联合王国,其业务从有线电视、出版、电影、多媒体娱乐,扩展到金融、交通、核动力及军用产品的生产。本·巴格迪坎曾预言,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所有的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将被六大企业所独霸,此言一语中的。<sup>8</sup>

加拿大传媒公司亦追随美国的步调。罗杰斯电缆公司已吸收了麦克林·亨特(Mclean Huntel)出版业,报业大王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霍林格公司以惊人的速度购买报纸。以至于加拿大每天所出售的每百份报纸中,有43份是属于霍林格的。这种集中的程度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无与匹敌的。

传媒的集中并不囿于国界与市场。一个为少数纵向联合的多媒体公司所统治,拥有很高准入壁垒的全球性市场正在形成。<sup>9</sup>国际传媒的垄断

是全球政治、经济、技术转型的一个方面，这包括通过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样的方式实现国际资本流向的自由化，传播媒介的数字革命和技术融合以及公共财政危机。这场有时被称之为全球化的大变革给新闻和民主带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危机。

政府应从维护公众利益的角度对传媒巨鳄进行管理，但即使是极微薄的努力政府也普遍放弃了，这就助长了传媒权力的集中。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电信法更是加剧了这种听之任之的现象。尽管这个法令是当代最重要的联邦法律之一，但它们的通过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更谈不上辩论。它放宽了电视网规模的上限，基本上撤销了对同一市场不同类型的传媒所有权的限制。

加拿大最近的电信法规的改革为更进一步的国际传媒联合铺平了道路。同时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由于联邦政府大幅度削减经费，在10年的时间里丧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或许更令人吃惊的是缺乏有效的新闻出版政策。1996年霍林格公司接收了全国最大的连锁报业萨斯汉姆公司(Southam)，而联邦自由政府却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竞争法的监督者事前就同意了这次接收。这与1980年的情景大相径庭：那时候只有两家较小的报业公司涉嫌兼并，即便如此，也导致了联邦政府的调查与指控，尽管政府的法律诉讼最后没有成功。

这些传媒企业和公共政策的显著改变却被冠以消费者的选择、给受众以权力，需要更大的公司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竞争等美丽辞藻。这些声称一直被宣扬，其声调远远高于其他更为可能的潜在后果的表述：对公众的责任感的下降、独立的新闻与商业利益不断升级的冲突，更多的兼并，不断加剧的集中和规模扩大的同时伴随着裁员及缩减开支(downsize)。<sup>10</sup>有关新闻媒体的代表性、责任感、多样化，构建一个独立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等这些老问题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在过去，新闻确立已久的关于客观性、公正性和平衡性的标准起到了使新闻业的公司式所有权合法化的作用，或者至少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媒体组织结构转移到了新闻实践上。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的是，控制着公众议程并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巨大的潜在私人权力，正危害着政治民主。

传媒所有制和政策中的新变化也许可以被认为等同于一场非暴力的改变。这一比喻令人联想到传媒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联系——通过公共政策和市场关系而进行的公众想象力的控制(colonization of popular imagination)与社会资源的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如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言，这里的关键是对“意识的垄断”——国家象

征性资源和话语权越来越被意识领域里的“少数几个大商业公司所垄断”。<sup>11</sup>

但是把这种变化比作政变不仅在意义上有限,而且令人误解。政客们可能是害怕得罪传媒巨头而管制媒体,可也并未发生国家权力的正式变更,而且我们的政治领导们也还有被推向一个不同政策发展方向的潜在可能。更关键的是,传媒在公众议程上的权力也并非上面强加的。新闻和政治的社会实践、文化意义和公众政策的形成,会受到少数传媒巨头或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意图或操纵的限制,但不会沦落到完全体现这些意图或操纵的地步。如果没有观众和选民的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许的话,他们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

此外,激起新闻的危机感的并不仅仅是媒体的集中,也因其他的一些迹象。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传媒的尊重正在下降,这种状况在美国尤甚。市场调查显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分离正日益加剧,尤其是年轻人,对大众化的传统新闻媒介不屑一顾。当代传媒文化,尤其是电视及其娱乐需求占据主导地位,似乎正侵蚀着那些一度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多么不切实际)的分界线,传媒所创造的形象与社会现实、新闻与娱乐、事实与意见、新闻编辑室与一味牟利的统计专家,分界线正在逐渐消失。在政治中,我们看到公共领域的破碎、悲观怀疑的增多和对主流政治的参与意识的下降。有些人认为,北美公共民主生活能否生存已经成了问题。这些发展变化不仅与政治和文化,而且与经济和商业息息相关。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的“政权”(Regime: 政权、政体、体制、王朝)隐喻由来已久但说法不一。在日常用法中,也包括新闻报道中(并非巧合)，“政权”通常指一个特定的具镇压性的政府,政治学家们则更多将此术语中性化,并经常用它来指代各类政府。但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中亦被使用。20世纪70年代,已故法国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即在书中论述过“话语性体制”这一说法——指权力如何与知识叠盖,不是从外部直接地实行审查或高压统治,而是通过标准和实践间接地从内部来统治言论的形成。<sup>12</sup>在一个特定的组织环境中,不论是科学、医学、精神病学、法学还是新闻学,这些指导标准可以决定哪些描述是合情合理的,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真实的。

一个相关的用法是苏格特·拉西(Scott Lash)的“意义产生体制”概念。<sup>13</sup>拉西认为这个概念有两个组成部分:一种是“文化经济”,包括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所依赖的关系和机制;另一种是“意义的生产方式”,一个能使文化产品对其使用者具有意义的典型途径。拉西和其他理论家

还区别了这些看与知的方式，例如，话语的与形象的、现代主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认知的与审美的等。

我们自己使用“政权”隐喻，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上述的每一种用法。<sup>14</sup>通过使用这一术语我们想指出在新闻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联系。权利的确可以从“外部”强加到新闻中，来自所有者，广告商或者政府的直接、间接或可以预见到的压力会导致报道被弃置不用或是记者检查删改自己的报道。与此同时，权力关系并不总是很明显，也并非总是通过有意的操纵，甚至是蓄意的打算来表现的。它们可以通过职业准则和组织机构的实践表现出来，包括那些产生“客观”新闻报道的实践。作为一种被认可的有效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法，新闻客观性体制牢固地根植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则和标准中、新闻传媒经济和其他组织原则中，以及更广泛的文化认知和社会权力关系中。

把新闻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知识产生的话语体制，并不是我们想赶时髦，像福柯那样，让所有的真理宣称(truth-claims)都在权力、自身利益或特定话语内在的真实性原则中崩溃。天真的实证主义者声称事实会为自己辩解，与之相反的相对主义论者只是把真理或者事实作为语言游戏的产物。上述两种观点我们都需要质疑。我们对新闻所标榜的客观性主张提出批评，但并不完全摒弃客观性这一理念本身。

但是，认为新闻客观性是一种话语体制，确实意味着它有相对于外在力量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新闻是一种共享的文化形式，媒介所有者或实权人物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它。传媒形式和职业规范有其内在的法则；对媒体抱有某些期望的受众本身也是传媒系统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新闻客观性并不是一个自生的、完全自由的论说。它确实有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存在于我们需要探析的北美传媒体制和政治经济的环境中。不同的社会或政治秩序会产生不同的新闻。

关注新闻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总是坏事。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不仅具有约束性和排斥性，同时还具有创造性与许可性。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机构的混合体，客观性体制不仅促进，同时也管理、约束、控制着公众知识的产生。但权力并非无处不在地分散、扩散于整个社会，权力更多地是从社会关系和体制中获得，而不是个人特性，所以它是非人格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拥有大于他人的权力。坦率地说，那位经常被批评家们妖魔化的康拉德·布莱克便是一种体制的产物。即使是在代议民主制国家中，权力分配的集中与不公仍然是新闻传媒和公共政策运转的关键所在。

历史性是体制隐喻的另一个优势。任何一种体制都不可能是对事物自然规律的一种永恒的、超越历史的演绎,也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现象。它需要将一系列信仰、实践与制度结合在一起,并表现出来。体制暗指一套相对稳定的、连续存在数日、数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关系,但它也接受争议、变化,或许最终被颠覆或替换的可能。客观性体制并非昨天刚刚诞生,但它也不会持续到永远。

最后,隐喻终究是隐喻,体制不是实际存在的自在之物。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方法,突出强调与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实践与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之间的关系。

即使我们接受这个隐喻,为什么我们称之为客观性体制?对于某些学者和新闻记者而言,客观性是一个乏味过时的词汇,应连同流逝时光中的诸多现代主义文化包袱一起被丢弃。新闻记者们更倾向于强调公正、平衡、可信度。“客观性”似乎是陈腐古怪的字眼,就如同20世纪早期新闻编辑室里本地新闻编辑的威士忌酒瓶或被磨损的莱明顿打字机一样陈旧。

然而,正如我们在其他论述中所主张的,宣称客观性已经死亡是太过夸张了。<sup>15</sup>这一概念几十年来一直是北美新闻业的指导理念,并是其自我理解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闻业的手册和教科书,会议上和评论中的争论,有关新闻的学术性研究都证明了它是“不死之神”。<sup>16</sup>记者们仍旧不得不遵循客观性的规则,至少在公开情况下,其立场观点要与客观性保持一致。即使经常遭到讥讽冷嘲,客观性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一个基准尺度,以它为衡量新闻业其他方法的标准。它仍然是新闻记者专业主义意识和职业身份感的一个部分,是传媒受众的期望,而且部分地鉴于此原因,它还是传媒所有者获得社会合法性的依据。

此外,即使客观性在北美处于争论的边缘地位,客观性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新的关注与反响,在俄罗斯,西方式的客观性成了提供评价政治新闻的基准尺度。当然,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报道中,俄罗斯的新闻记者有意识地违背客观性的原则来拔高叶利钦,以此来贬低他的对手。新闻界极力忽略叶利钦的健康状况,他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和他在集会中面对诘难者的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西莱·加力保注意到俄罗斯传媒尽可能好地报道叶利钦的每一步行动。<sup>17</sup>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叶利钦一边倒的报道所诱发的讨论的根据恰恰是客观性。俄罗斯新闻记者不得不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话语来为他们的党派偏见辩护,声称这种暂时的偏离是为了避免新闻自由受共产主义者的威胁,以维护新闻自由的一

种权宜之计。

所以，新闻中确实有客观性这一体制，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们承认，历史的进程比书写的速度快得多。自从我们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以来，僵化的苏联体系已崩溃，声称有分权功能的互联网已经兴起，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开始改革新闻争论的一些特定术语，而且，我们意识到这本书和其他传媒学术专著，都可能被看作是门外汉的完全错误的评论而不予接受，因为它们缺乏经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多年来在新闻编辑室或驻外记者站从事新闻工作的资历。为了反驳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新闻记者自己所从事的正是对其他的公共机构和职业评头论足的事业。角色的转换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新闻传媒太多面，对于民主生活而言太重要，因而不能仅仅让内部的人来对它进行分析。无疑，优秀新闻记者的行文远比我们具体、明确、富有个性且别具风格，但我们所能做的是重新审视那些普遍的、程式化的，在新闻中被认为是规范的状况，使它们非自然化，并站在广为接受的范式之外予以不同的阐释。在这项工作中，通过与敏锐多思的新闻记者多年来的访谈，我们对传媒的理解变得深刻丰富起来。

最后，写此书有几个理由。首先，尽管其他一些学者们曾写过有关新闻客观性的书——我们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但还没有谁像我们这样把它上升到体制这一概念层次，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体制性问题来研究。这一概念使人想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思考一套适宜新闻业的民主公共哲学的新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对该体制的基本要素的确定，能对历史性的比较分析与新闻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政治策略大有裨益。

第二个理由：新闻客观性的整个构造为新闻学和大众文化提供了许多我们通常用来评价和批评新闻的范畴和概念，如倾向性、平衡和客观等。在人们普遍认可这些要素的同时，这些术语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这些术语的界定对新闻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仅仅质询新闻传媒是否有倾向性，亦或是客观。该询问回避了是否存在无倾向性传媒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实际上，分析客观、公正这些术语在公共议程的争议中是如何被理解、被利用更为重要。

第三个理由是决定性的。我们生存在一个经济及生态危机深重的时代，一个要求重新审视主流制度和信仰体系的时代。我们需要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受商业规则驱使的新闻传媒系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这一重新审视。新闻传媒系统正处在十字路口，尽管它不断努力，欲凭借客观性的

宣称使其自身合法化。渐渐地一批有思想的新闻记者对公众哲学和他们的职业前景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再以后,他们使用“危机”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状态。考虑到传媒日益增长的权力,结合媒体面对新技术和经济紧缩的脆弱性,以及20世纪90年代北美不尽如人意的公共生活,对传媒进行一些根本性的反思实在是理所当然。

本书试着为新闻公共哲学的讨论尽一分力。我们经常批评当前加拿大和美国新闻传媒的运作实践和机制。但如果你认为我们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攻击新闻从业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并不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曾经是我们的学生、朋友、同事。我们自然不能像康拉德·布莱克那样认为他们“无知、懒惰、固执己见、认知上不诚实、不宜被管理”而轻蔑地将他们扫地出门。<sup>18</sup>本书旨在对新闻作为一种民主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的潜力予以肯定,同时希望能对敬业而又忧国忧民的新闻工作者们自己引出的一些争论性议题有裨益。

最后,两位合作者本身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文化背景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却就有关民主与新闻的问题达成了相似的看法。作者之一——罗伯特·哈克特从八岁起就痴迷上了报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在理查蒙德《学生与年轻人》报工作过。他对新闻的学术兴趣来自他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在皇后大学,他对有关意识形态与政治变革的研究表明新闻是政治现实的仲裁者。另一个促使他写此书的因素是他于1984年发表的有关使用客观性和倾向性作为新闻评价标准的局限性的文章。<sup>19</sup>通过《新闻视野中的加拿大》这一研究新闻盲点的课题,他进一步强调了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新闻客观性实践与系统倾向性之间的共存状态。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赵月枝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大众传媒学者。她被新闻的神秘性,尤其是它所宣称的力求真实、寻找公正、让民众有发言权的理想主张所吸引。20世纪80年代初,时逢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她在中国接受了新闻教育。她开始思考新闻理论与实践,并对西方新闻模式及其适用性产生了兴趣。这就使她后来在西蒙·弗雷泽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期间,对独特的、自相矛盾的西方新闻客观性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仅注意到了过于集权的传媒体系的潜在危险,也看到极度商业化的北美传媒体系的局限性。在另一本专著中,她对东西方主流文化中都占统治地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的危害性有自己的认识,并力图在分析中超越二元论的思维定势。<sup>20</sup>我们这本著作也顺此思路,力求说明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商业运作的控制,市场不等于民主,客观



性与意识形态并非一定对立。

在探讨客观性体制这一议题时，我们侧重关注加拿大英语区新闻媒体，然而只要我们牢记传媒与政治文本中的民族差异，此分析从地理上而言在广泛的范围内都适用。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新闻沿着不同的轨道发展。在这里，倡导性与参与性新闻有很坚实的历史根基。然而，一位有25年丰富经验的魁北克广播新闻工作者阿曼德·圣-让(Armande Saint-Jean)争辩道，除了“一些自己的文化特征外”，魁北克新闻领域的模式与趋势，包括职业道德的演进，与加拿大其他地方，也包括整个北美并无二致。<sup>21</sup>

我们的分析与美国的新闻业息息相关，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大量地引用了美国的著作和事例，而且因为美国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而言都是客观性体制的堡垒。也许并非巧合，美国是一个市场力量和自由主义市场学说较之加拿大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部分出于此原因，美国的政治与传媒系统的隐忧也更多，但与此同时，它的另类新闻(即非主流新闻)传媒也更发达些，关于新闻的讨论、新兴的传媒民主化运动也走在前列。美国有关传媒改革运动和加拿大的公共广播传统，可以相互作用、共同激发两国人民寻找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有效办法，从而使传媒系统被集团支配的现状得以改观。

本书既不是充满轶事的记叙文，也没有为政治政策或传媒改革提供具体的蓝图，更确切地说，本书是一篇分析性的论文，是对规范性推理的一次运用，是对公共哲学的质询。我们发现一些长期存在的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有关新闻客观性的评论，隐瞒了那些渗透于新闻构建中的实际的社会与政治力量。掩盖了必然深植于新闻判断中的价值观，从而阻碍了有关新闻业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讨论。最终，新闻不愿或不能达到其准确报道事件的目标，并且新闻业普遍保守的后果作为“平衡”与“客观”的新闻实践的结果被自然化。

以上这些批评也质疑了北美自由民主的参与、操作及合法化。客观性体制能否为民主化新闻提供一个有用的模式已是个问题。除了理念上的局限外，客观性体制在实践上或许也开始动摇瓦解。然而这并不完全值得庆贺。如果说客观性曾经给新闻套上枷锁，那么这似乎又滋生了它的对立面：对自觉的主观主义的庆贺和对公众服务精神的抛弃。

与传统“严肃”新闻一成不变的客观性相比，“小报式”新闻和电视脱口秀(talk show)似乎更少关心事实证实过程，在公开支持一方观点上更少限制，尤其是在反对显而易见的道德偏差或者支持民粹派的“小人物”

上立场鲜明。严肃的新闻传媒正逐渐接受娱乐化价值观，以至于追随在小报《全国星探家》(*National Enquirer*)之后，报道前足球队员辛普森的谋杀案。哗众取宠、低劣污秽和耸人听闻的时尚逐渐取代了实际的调查研究。名人轶事和肤浅的说辞使根本性政治抉择的讨论黯然失色。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从未如客观性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可靠，在文献电视片、根据事实改编的描写犯罪的电视剧和其他种类的信息娱乐化节目中，这一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诱人且具腐蚀性的文化相对主义鼓励我们对所有的真理宣称持同样悲观怀疑的态度。这种自我放纵的主观主义(自身与商业规则相关)同对客观性的持续效忠一样是民主新闻危机的根源。<sup>22</sup>

大众媒体中这些“后现代主义”转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当前客观性危机的反映，是对传统“客观”新闻和北美政治体制的精英主义的一种反叛。客观性体制因此具有双重危机：它的僵化和它对另类的边缘化——作为一种非常保守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引发了新闻作为潜在民主传播形式的危机；近年来的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使作为制作新闻的框架的客观性理念本身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也许为探索出制作新闻的新方法提供了可能。我们不赞同抛弃那种追求客观的、以公共事务为主的新闻，也不欣赏那种卑劣低下、琐碎浅薄、极端相对主义的新闻。一些原则应予以保留，但根本性的变革——特别是从市场规则中解放出来——是要发展公众批判意识、讨论与参与意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当今世界正处在巨大的结构和文化转变的历史背景下。

19世纪，地位已相当牢固的劳工报刊——建立在启蒙运动中解放性的民主话语基础之上，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精英为中心的党派报刊的逻辑进行挑战并最终使这种逻辑为新的形式替代。在21世纪，如果当代新闻有助于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民主，那么今天我們也需要相同的范式转换。传媒民主化的第一步也许是使其非神秘化，开放对新闻实践和新闻制作原则的批评分析，尤其是有关客观性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此书能达到这一目的。

# 目录



- 1    **第一章 民主话语和新闻客观性的起源**
- 2    民主话语：启蒙运动的遗产
- 4    党派报刊：把民主话语边缘化
- 5    劳工报刊：为“人民”说话
- 9    通俗商业报纸：篡用民主话语
- 13   新闻客观性的模棱两可
  
- 17   **第二章 由实证主义到消极性新闻：客观性的演变**
- 17   朴素现实主义时期的事实观
- 20   吸纳主观性：作为一种“策略仪式”的客观性
- 21   解释性报道：超越了事实？
- 25   批判性新闻：一种反叛性文化
- 30   新闻记者与客观性的爱恨关系
- 34   客观性消亡了！客观性万岁！
  
- 37   **第三章 机制逻辑：为什么维系客观性还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 38   加拿大今日的报业集团
- 41   商业逻辑对新闻内容的影响
- 46   传媒技术和客观性

- 47 广播规则中的公平和平衡
- 50 新闻客观性和国家
- 54 第四章 不死之神：作为体制的新闻客观性**
- 59 众说纷纭：客观性作为协商新闻内容的一种资源
- 64 鸽子公园的恐慌：平衡中的不平衡
- 68 平衡与宗教广播
- 69 自由市场十字军与平衡的辞藻
- 73 不平等的协商
- 74 第五章 争议中的认识论：新闻客观性哲学**
- 75 客观性认识论：实证主义的遗产
- 81 因袭主义认识论
- 85 后现代主义和媒体：现实的海湾
- 90 走向第三种主张？批判现实主义
- 95 超越客观性和相对主义
- 97 第六章 客观新闻与政治**
- 99 反驳右翼的攻击
- 101 客观性的保守化后果
- 104 新闻客观性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
- 108 把向右转自然化：客观性新闻和市场自由主义
- 117 客观性的气氛
- 118 第七章 危机中的体制：质疑自由民主和客观新闻**
- 119 自由民主的危机
- 126 客观性体制的危机

133	消耗殆尽了的意识形态：传媒的自由主义理论依据
138	消费者至上的神话
<b>141</b>	<b>第八章 见微知著：客观性体制的替代？</b>
141	赛博空间和其他新媒体：是民主救世主还是数字噩梦？
150	内部革新：公共新闻及其局限性
155	另类媒体：在边缘发出呜呜之声
160	解放性的另类选择：正在形成的运动？
<b>169</b>	<b>结论 可持续民主中的公共传播</b>
170	公共传播？可持续性民主？
173	客观与否？
176	怎么办？
<b>180</b>	<b>注释</b>
<b>216</b>	<b>附文一 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b>
<b>222</b>	<b>附文二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b>

# 民主话语和新闻客观性的起源

在获得新闻自由之前的黑暗日子里，政府对印刷贸易以及早期报纸、杂志的出版控制得非常严格。如果印刷商/编辑批评当权者，他们就可能失去印刷许可证，面临被逮捕的危险，或者遭到其他形式的压迫。直到18、19世纪，新闻才真正从这样的政府压迫中解放出来。在加拿大，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是，1835年法庭无罪释放了新斯科舍省的编辑/政治家约瑟夫·豪(Joseph Howe)。这一判决有效废除了有关煽动性诽谤的法律，诸如此类的法律以前一直被用来惩罚任何公开出版的对当局的批评。<sup>1</sup>

翻开一部普通的加拿大、美国或英国的新闻史，你将可能发现类似这样的叙事：一个有关新闻如何走向一种或多或少是自由且负责的第四权力，并或多或少不断取得进步的故事。这一标准化的故事仍在继续着。

新闻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自由的新闻是党派和宗派的，不考虑准确与真实性，只是无耻地为特殊利益服务。各种各样的因素，从编辑们的个人野心到经济上的大棒与胡萝卜(如政党津贴)，使得大多数报纸与政党派别或其他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党派报纸最终被独立的便士报纸所推翻。之所以被称为便士报是因为这种报纸的价格大大低于党派报纸，一个便士一份。

便士报的出现有赖于诸多发展，即减少了出版上的障碍。这些发展有科技上的，还有法律和经济上限制的取消，因为大众渴求的是一种更为自由的报纸。便士报结束了党派新闻的黑暗岁月，开始了报纸的黄金时代，因为它逐步形成了今天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非党派性、为社会负责的商业化报纸。而商业报纸肆意表现偏见的诱惑、煽情主义、愤世嫉俗、过分敌视权威的自由，又受到类似新闻客观性这样的职业精神的约束。<sup>2</sup>

这种叙述不仅仅是神话。使新闻出版得以摆脱严酷压迫的斗

争,是结束专制殖民主义、君主特权的更为广泛的民主斗争中非常真实、有时又比较艰苦的一部分。不过,关于自由、独立报纸胜利的正统叙事是误导性的且不完整。它省略了党派报刊到商业报刊转变中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尤其是忽略了劳工运动和激进劳工报纸的重要作用。19世纪的不同时期,劳工运动和激进劳工报刊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有较大影响。只有通过考察19世纪新闻出版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商业报纸、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媒体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双重特性,以及新闻客观性理念。

## 民主话语：启蒙运动的遗产

伴随法、美的政治革命,18世纪一场在社会思想上的深刻变革出现了,这场变革的中心就是强调被看作是正确理解世界的工具的科学和理性。启蒙思想家,比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佩恩(Tom Paine,1737—1809)宣称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强调理性作为理解并控制自然世界的重要性。并且,启蒙思想家认为既然理性可以控制自然世界,它同样也能用于发现支配社会世界的规律。他们相信理性具有解放性——它能向当时非理性的宗教和社会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并创造出合理、自由的社会结构模式。

尽管这种归纳法似乎过于简单化了,但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启蒙运动理解为一种世俗的社会运动,它通过理性的运用和新的社会形式的构筑,使人类摆脱无知和神秘主义。既然科学方法能成功地解开物质世界的秘密,启蒙思想家们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来理解、改造和重新建构人类社会。

理论家逐渐看到民主是社会、政治组织最合理的形式。它建立在广泛的个人权利的原则之上,这种普遍性至少是针对国家中的每个男性公民而言的。换言之,就是所有男人生而平等,并在平等基础上享有一定的权利;民主政体将保护这种“自然”权利;而且这种普遍理性原则适用于全体社会。但在现存的(existing)国家(如庄园主、贵族、僧侣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君主政体),拥有丰厚财产的男人将公民权利集中于自身。因此,启蒙运动的中心就是政体的转换,并且通过国家政权,使市民社会也得以改革,使整个世界按理性的规则运转。首先,选举权应该扩展到每个人(所有自由的人,即所有不是奴隶的成年男子)。以便所有的男人都可以参与决定正确的国家行动方针。

为了使这种参与活动有效进行,无特权的大多数就必须通过教育了

解社会的运转机制。科学家发现社会规律以后,教师和新闻记者可以将这种知识传授给所有人。随着男性选举权的普及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国家干预可以纠正市民社会,也就是国家政权之外的人际关系领域的缺点。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仅要保护民众的天赋权利,使其免受贪婪的垄断者和犯罪分子的侵害,而且要提供维护公众利益的必要的社会服务。只要建立了民主政权,一个所有人和平共处,不会彼此侵犯天赋权利的公民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假如老板不为贪婪所驱使的话,尽管仍有雇主和受雇者,这些群体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内在的矛盾冲突。

这就是启蒙思想和民主话语的遗产。这种话语宣称是从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为其中一小部分特权阶层为出发点,但这种假设有明显的问题。首先,它所定义的国家是排除女性的,且纵容奴隶制。事实上,一些18世纪的启蒙民主的倡导者(如托马斯·杰斐逊)自己就是奴隶主。更重要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并不承认社会内部存在着诸如不同阶级之间根本的利益差别的可能性。它把社会冲突看成是贪婪、目光短浅、误会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结构本身的产物。

尽管如此,19世纪的劳工报刊还是吸纳了民主话语的只言片语。而这一话语后来又又被20世纪后期出现的商业报纸所篡用。从这种民主话语,大众化的通俗商业报纸初创了新闻客观性的最初版本——一种以独立、广泛的态度从理想公民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和政治事务的姿态。而这样的理想公民具有以下特征:谨慎、理智、公正,信奉个人权利、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和建立在科学和教育基础之上的社会进步。

当然,没有任何思想革命,更不消说像启蒙运动这样深刻的运动会在真空中产生。18世纪是社会阶级结构不断变化的时期。企业家、艺人、知识分子毫不例外地对垂死的封建社会中的世袭的特权、等级和地位持批判的态度。对理性社会制度安排的呼唤既是对贵族体制日益增长的抨击的原因,又是这种抨击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启蒙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自由民主话语的核心思想,诸如科学、理性、天赋人权、公众利益,都成为资产阶级在反对地主阶级的权利斗争中的政治武器。

这里所勾画的启蒙观念不仅有助于摧毁旧事物(它们所批判的贵族社会),也潜在地威胁着新事物的结构(在西欧与北美,它们帮助建立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启蒙观念成为大众的广泛政治话语的核心部分。19世纪统治和被统治团体之间的斗争都是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进行。然而,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贵族与新型商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业已建立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新兴的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 党派报刊：把民主话语边缘化

到19世纪，已建立的社会，包括工业家已经抛弃了许多新的民主话语，尤其是关于天赋人权和理性的哲学基础。虽然由多数人选举出的政府统治这样的理念在慢慢立足，连一些民主改革的支持者也避免使用天赋人权这样轻率而又使人兴奋的18世纪话语。相反，他们提出较为平和的实用主义原则，这一原则提倡把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目标。对于统治阶层成员，包括中产阶级的改革家，原有的民主话语似乎具有危险性、煽动性。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不是法律内的权利——法律是由政府权力制定并认可，这就为暴动与无政府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而保守势力并不追求民主，他们明确表明了对暴民统治的恐惧。

随着19世纪的推进，自然的概念——启蒙思想的基础开始逐渐变得模糊且相互矛盾。在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以及进化论者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中，自然不再是上帝的造化：理性、仁慈、内在和谐，就像卢梭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相反，匮乏和对有限资源无情竞争成了自然世界的法则。当19世纪晚期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达尔文主义里加入社会性时，一种重要的反民主哲学也就产生了。这预示了今天的全球化话语，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以其弱肉强食的血淋淋的自然观为残酷竞争和剥削式的、以广泛的贫困和不公平为特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找到了根据。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及其文化英雄，据说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实业巨头成为进步的主要推动者。

这种政治保守主义对于前联邦加拿大有直接影响。当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是帝国的、托利的、保守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殖民政府和加拿大商界、神职界、军事界、管理界精英们的权威。<sup>3</sup> 它的对立面则是由英国宪章运动、美法革命所激起的民主因素。民主改革家包括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商人、技术工人、专业人员、农民们及熟练半熟练工人，都希望有一个清廉的小规模的政府、普选权、废除没有经过选举而产生的管理机构、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管理财政、削弱教会、普及教育、自由贸易、地方政府、修路、结束继承封号、土地垄断、取消地主等，在这一改革运动中，加拿大的第一批政治力量用启蒙运动的民主话语作为自己的政治语言。<sup>4</sup>

在19世纪50年代，托利党与改革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的产生，所有主要政治党派，尽管表面上相互对立，但在诸如

政府在国家建设、资本积聚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尽管自由和保守传统都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但由此合成的政治理念基本上已是经过修改的托利文化。它吸收了一些改革者的自由思想,但仍拒绝民主而强调精英统治。<sup>5</sup>

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的加拿大党派报纸,反映了启蒙运动民主话语的退化。这些报纸往往为一群富裕的党派支持者所有,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政治党派的明确目的。它们在总体上倾向于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服务。正如一位评论家道·费瑟林(Doug Fetherling)所言:“在每个成功政客的背后有一份能满足他肮脏事业需要的报纸;在每一个投机商、编辑背后,有一个或一群政客正给予支持。”<sup>6</sup> 报纸的经济支柱来自政府资助或党派津贴。<sup>7</sup> 由于和党派的亲密从属关系,当时的新闻报纸不仅充满对经济上支持他们的政客的乞求,同时也充满对政治上的敌人的丑恶人身攻击。的确,报纸在19世纪中期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每个人口聚居地既需要一份托利党的报纸,也需要一份改革派的报纸,这样他们可以相互制衡彼此的极端言论和行为”。<sup>8</sup>

尽管存在偏见,党派报纸运行于19世纪50年代保守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报纸对代议民主均采取谨慎的态度。民主仍是被怀疑的词汇。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历史学家在比较多伦多最重要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喉舌时,着重强调了1850—1867年期间党派报纸舆论一律的一面:

《领袖》和《环球》在就民主问题发表的看法中均表达了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双方都宣称要求广泛、民众的选举,但仍要求选民的资格建立在一定的财力和智力基础上,以阻止无知和纯粹数量的统治。在19世纪中期加拿大报纸上很少有美国杰斐逊或杰克逊式民主精神以及他们对普通民众天赋人权的信任。<sup>9</sup>

## 劳工报刊:为“人民”说话

启蒙的激进民主话语残存在没有特权的大多数人的政治领导者中,尤其成了激进分子和工人运动用以挑战已建立的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党派报纸,争取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权益的思想武器。被商人用来对待贵族的政治和意识武器,现在成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斗争武器。从启蒙时代以来,社会场景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新兴的工人阶级与资本

家之间的矛盾已占主导地位。正如美国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劳工报刊所描绘的那样，冲突使富人与手工业者、技师和小店主对立，因为有钱人似乎拥有对财产、权力、知识、腐败的法律体系的垄断，而后的正义、公平、财产的天赋权力受到了践踏。

在 1850—1900 年之间加拿大经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工会运动。技术工人成了工会运动的先锋，他们极力维持行业的自主地位和生活标准，抵制资本使工人非技术化的效果。工会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加拿大一些城市建立，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发展并于 19 世纪 70 年代达到顶峰。19 世纪 80 年代成立于美国的劳工骑士团席卷加拿大，其目的是把所有的工人，不仅仅是熟练技师，也不论种族、性别都组织起来。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哈密尔顿、多伦多、蒙特利尔都成为这些组织活动的中心。

加拿大 19 世纪工人运动的思想还不统一，是不同传统、观点的混合物。更早的工会强调行业而不是阶级意识。一种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强调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相互利益。由于强调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利益和谐统一，行业工会只是想维持工会成员相对于雇主的利益。行业工会并不一定挑战保守主义的家长式管理。这种管理提供一种有机的、等级秩序的社会模式，使不公平合理化。但随着重商主义让位于 19 世纪晚期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失去魅力。激进民主思想逐渐开始主导工人运动。<sup>10</sup>

随着工会联盟的产生，宣称代表工人意愿的劳工报刊也随之出现，在加拿大英语区，《安大略工人报》在 1872 年成立，随后《工会倡导报》、《工人记录》、《加拿大工人改革报》、《工人联盟报》、《工人智慧报》以及《贸易杂志》等相继创立。这些报纸为工人和工会的利益而创立，它们的发行人依靠工会提供的财政支持以及订阅费，但不像今天的工会机关报，它们往往拥有独立出版及经营。<sup>11</sup>

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报纸中，正如在整个工人运动中，民主观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在解决不断升级的劳资纠纷时，它的应用性存在问题。劳工报刊向加拿大联邦时代的托利和改革派的意识形态综合体，以及地位稳固的党派定位的精英报纸发起挑战。他们把民主话语作为可以将主流话语取而代之的另类话语，强调其普遍性而非特殊性。劳工报刊记者强调通过知识和普及教育进行社会改革。《安大略工人报》在 1872 年 4 月 18 日的言论中表达了启蒙精神：“通过智力的培育，共同合作这一原则已照亮了全世界。毫无疑问，此原则会随着大众智力的发展

而逐渐发展。这一原则,或者在此原则上的一种体制将逐渐替代现行体制,正如现行体制代替了过去的农奴制。”

他们关注工人的紧迫要求,比如九小时工作制,但工人报不将自己仅仅限制于工会的议题上。而且,他们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一种建立在启蒙话语的理性、公众利益和天赋人权基础上的普遍的社会批评。建立在这一普遍的民主观念基础之上的加拿大工人报纸,像它的几十年前就已处于鼎盛时期的英美同行一样,批评现存社会的不平等,抨击作为社会特权利益团体的资本是与公正、权利相违背的。<sup>12</sup>这一点现在恐怕也很难被接受,因为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鼓励我们把工会看成仅仅是另一特殊利益集团。但是当时的工人们之所以能够将他们自己的事业表达为一种普遍的事业或权利,主要是因为私利被看作是最主要的弊病之源。<sup>13</sup>

而且,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的,“因为熟练工人的利益可以这样被普遍化,公众利益这一概念同样可以被注入新的活力”。<sup>14</sup>这个公众利益的概念可追溯到佩恩(Paine)的公民概念,即“公民是一个具有可界定的共同利益的同质性团体”。<sup>15</sup>劳工报刊就像之前的佩恩一样,批判政党,把他们看作是派别、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抨击政党体系,把现存政党看成是特权阶级的政党。他们鼓励读者远离党派政治,谴责现存党派报纸倾向于特权阶层,反对工人。比如《安大略工人报》就曾控诉道:“任何保证工人正当报酬的努力都被报界的嗥叫所掩盖。”<sup>16</sup>

在谴责现有报纸的政党倾向的同时,劳工报刊宣布自己的无党派性和无宗派性。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人报——《工人智慧报》,宣称它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它的使命是“传播光明,揭露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少数人的富裕的分配不公”。<sup>17</sup>骑士团在加拿大的第一份报纸《劳动者》,宣称它会“毫不畏惧、坚持独立、决不屈从于任何政党”。<sup>18</sup>对于劳工报刊来说,在宣称政治独立与倡导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的利益之间没有矛盾,因为他们的利益是普遍利益,是所有公民利益的表现。

由于它采纳了启蒙时代民主话语以及它的普遍化语言,工人报与当时各宗教、种族和党派的报纸截然不同。这一普遍化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新闻客观性的原初形式。在他们斥责业已建立的党派报纸的时候,劳工报刊坚持公正的理念,换言之,也就是客观的理念是社会改革唯一坚固的基础。劳工报刊赞同“政治变革只能在人们再也不能忍受财富与特权对权力的垄断之时,通过思想启蒙而进行这一普遍的激进信念”。<sup>19</sup>根据劳工报刊,报纸有巨大而潜在的理性力量,但它被私人利益所

腐蚀。《安大略工人》认为：“报纸同衣食一样是必需品，它能使一个人找到其在生活中的确切位置”，但一份腐朽的报纸能“使接触它的人受到毒害”。<sup>20</sup>劳工报刊的目的就是纠正这个问题，并向读者允诺将填补现存党派报刊造成的道德真空。他们赋予自己履行公众启蒙以及只提供对公共利益有益的信息的职能。比如《加拿大工人改革家》写道：“我们相信劳工报刊的目标应该是按照事实真相报道，暴露邪恶，铲除偏见，揭露谬误，倡导真正的改革，以此帮助劳苦大众取得较他们目前所能享受到的更高的智力、道德、社会发展程度。”<sup>21</sup>比它早半个世纪的《纽约技工报》同样允诺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观察周围发生的事件，并以公共新闻记者的身份冷静、不带偏见地发表观点”。<sup>22</sup>这样的承诺隐含着新闻客观的雏形——保证按世界真实情况报道，不受私人或局部利益的歪曲，只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工人利益与普遍的公民利益为主导。很明显，劳工报刊看不到公正记录社会现实与对正义和道德的倡导之间有任何矛盾。这时的客观性还不是20世纪的那种有意地试图将事实与价值观分开的范式。在20世纪之前，如传媒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得森(Michael Schudson)所言，“记者往往看不到事实与价值之间有明显的区分”。<sup>23</sup>然而劳工报刊给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加拿大新闻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报刊留下了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同时，我们没有必要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加拿大工人报刊神话化。其本身存在着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对女性工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是对中国移民工人的种族问题上表现明显。劳工报刊经常辱骂中国工人，而不是采取一种更宽广的政治态度，把他们同样看作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牺牲品。<sup>24</sup>而且，像主流工人运动以及启蒙话语本身一样，劳工报刊也缺乏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它看不到社会阶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的不平等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质，而认为这是一种特殊利益强加的结果。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做结构性的分析，它所提供的仅仅是对经济集中或垄断的道德批判，认为这些导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秩序的崩溃。按照劳工报刊的观点，垄断是一种道德问题，由于某些垄断资本家的贪婪所致，政治改革仍被看作是纠正市民社会不公平，以及达成一个每位身处其中的公民均能实践“天赋人权”的彻底的民主社会的最佳途径。比起激进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劳工报刊记者对社会进步和改良更感兴趣。而正是因为它缺乏阶级分析，在社会内否定阶级矛盾，使得它能熔倡导工人利益、宣扬普遍化的激进民主话语、标榜客观公正于一炉。

除了思想观念上的模糊之外,劳工报刊生存也很困难。经济上要么依靠独立订阅,要么依靠工会及主要来自手工业工人、技工的支持,劳工报刊发行量有限,这也反映出它的支持者脆弱的经济地位。由于广告不多,自费购买的读者有限,工人运动的不稳定性,很少有劳工报刊能维持一两年的。<sup>25</sup>它们的脆弱为另一种新型的大众化报纸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种报纸将民主话语重新推到中心地位。这种报纸就是迎合市民的大众化商业报纸。

## 通俗商业报纸：篡用民主话语

到19世纪晚期,加拿大不断工业化、城市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商业和零售业对于广告的需求。科技——电报、以蒸汽为动力的圆压印刷机、木浆造纸,使报纸成为现代最早的大众传媒。精明地利用各种机会,独立商业报很快将自己建立成大众话语的通俗讲坛。已经由劳工报刊培养起来的工人阶级读者群的存在,使商业日报极力篡用它的有效方法,它们发现存在于民主话语中的普遍意识能使它们同时面对资本家和工人讲话。通俗商业报纸将加拿大新闻业向20世纪客观性理念推进了一大步。

事实证明,通俗商业报纸是极为成功的。它们探索出了新闻制作、发行和消费的新方法和途径。与政党报刊和劳工报刊成对比,独立商业报通过街头零售而不是靠订阅到达读者手中。售价低廉,并依赖广告而不是党派、工会津贴作为主要的财政支撑。报纸第一次成为商业企业,通过将新闻出售给读者,然后将读者转卖给广告商的双重交易方式来获取利润。

美国企业家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通俗日报事业,在英国,由于受到印花税制度(也就是政府在报纸销售上征税)的限制,商人们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星期日报的形式进行大众新闻业的尝试。在加拿大,纽约便士报模仿版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但大众化商业报到19世纪70年代才日臻完善,并先在大城市兴起。<sup>26</sup>1870年,蒙特利尔的便士晚报《星报》的商业经理休·格雷厄姆(Hugh Graham),接管了该报纸并决定将目标转向下层民众,这样,格雷厄姆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民众新闻,一种嘲讽现有报纸传统的新型新闻形式。<sup>27</sup>其他有影响的民众报纸有《电讯报》(1876)、《世界报》(1880)、《新闻报》(1881,多伦多)、《杂志报》(1885,渥太华)、《先驱报》(1889,哈密尔顿)。

然而独立商业报纸并非自然而然地出现,也不是像新闻自由之类抽象原则的自然演绎的结果,劳工报刊的衰落也不能简单被认为是情理当

中的事。这一点在阶级矛盾比北美更紧张的英国尤其显著。在19世纪早期达到繁荣的激进的劳工报刊被认为对现存社会有极大威胁。反对者企图通过各种政治手腕来摧毁它。激进报的衰落、商业报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过放松政府对报纸在法律、经济方面的限制，有目的地使报纸出版发行自由化。历史上这些限制是报纸出版发行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们服务于重要的限制言论的政治目的。比如，直至1853年，印花税有效地限制了报纸的出版。它的目标就是阻止危险思想被公诸于众。如果这项限制不成功的话，在这一方法之外还有威力更大的煽动性诽谤法，这一法律适用于惩罚任何批评政府当局或机构的言论，不管这些言论是对是错。

正统的新闻史认为诸多限制的取消是渴望自由的人士为新闻自由而斗争的结果。但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的不同解释更有说服力。根据他的说法，至少在英国印花税的问题上，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击激进的工人新闻事业”。<sup>28</sup>英国议会关于新闻业以及印花税制的讨论是围绕这一具体目标展开的，即如何更有效地对付因逃避印花税而得以复兴的地下激进报纸。传统主义者希望政府通过提高出版成本和用印花税来限制发行以打击逃避印花税的和煽动性的报纸，使报纸出版掌握在财富所有者的手中。

有远见卓识的革新派认为只有自由市场能摧毁激进报纸并促进“负责任”的通俗新闻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印花税制度不仅没有压制，反而纵容了充满“最有害言论”的违禁地下报纸的兴起。这种报纸的售价不及那些被征税的、值得尊敬的竞争对手的售价的一半。革新派声称通过取消或减轻印花税，政府可以使广告费流向最好的报纸，鼓励资本拥有者投资开发广阔的市场。<sup>29</sup>

革新派在英国取得了胜利，印花税随之被取缔。随着科技发展，这种经过政治算计的自由化，通过增加出版具有竞争性的通俗报纸的成本，而逐渐排挤了英国的激进报纸并使之边缘化。

美国的情况相反，国家没有通过有意的策划去推翻劳工报刊。由于市场关系在法律方面的限制较少，大众化商业新闻业的出现不费周折，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美国的商业报纸“相对自由地与工人阶级同步发展”。

的确，英国工人阶级在这关键的二十年发现了报纸对促进阶级觉悟起到重要作用。在美国，商业报纸在工人阶级还未意识到报纸对其阶级意识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之时，就已开始吸引劳工们的兴趣与认同了。只

有在美国,大众传媒在阶级关系紧张到影响其所运用的观念的可信度之前,就被作为私人商业而放任自流地发展。<sup>30</sup>

加拿大的情况与美国相似,在商业报纸兴起时,加拿大的工人报刚刚立足,因此劳工报刊一开始就面临着商业报纸,尤其是以美国便士报为样板的通俗报刊竞争的局面。把它们自己看作是“客观新闻的提供者”,通俗报纸“突出反对政党报刊的陈腐方式及其政治倾向”。<sup>31</sup>它们以各种方式和姿态打入工人阶级市场,为争取劳动阶层的读者,它们宣称自己的新闻是为普通读者服务的,它们还时常刊登一些耸人听闻的、有时是调查性的社会问题报道。一些大众化的日报,比如《多伦多新闻》,甚至成为工人事业的支持者并反映工人的观点。

劳工报刊看到新型的通俗报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它们明确的民主信条及它们揭露违背公众利益的事情,他们似乎是公众教育的同盟。另一方面,正如一个工人记者警告他的读者,商业报纸除了着眼于工人读者的市场价值之外,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并不感兴趣。<sup>32</sup>随着商业报纸不断地抢走大量读者,劳工报刊记者的负疚感、挫败感进一步加深。汤姆森是加拿大最有名的劳工记者,面对大部分读者转而投入商业报刊的现实,被迫于1891年关闭了他的报纸,他留下一段多次被引用的痛苦而又尖刻的话,“真令人遗憾,工人们如此愚蠢地不关心自己的利益,看不到一个生动公开的报纸为他们的事业高声疾呼的好处”。<sup>33</sup>

的确,劳工报刊经常使用刺耳的话语刺激工人的头脑,这也导致了自身的厄运。<sup>34</sup>但更关键的是,劳工报刊每天不仅要与商业报纸争读者,还要争广告——结果当然是极不成功的。广告商在经济上支持处在上升状态中的商业日报,要么是想将有商标的大众化普通产品推销给大量的读者,要么是为了将奢侈品卖给富有的消费者,无论如何,劳工报刊的工人阶级读者不适应这种消费,因而不是理想的广告商追逐的读者对象。因此,劳工报刊无法吸引投资资本、获取广告收益以与不断增长的发行和报纸工业科技变化同步发展。正如罗恩·维尔祖(Ron Verzuh)总结的那样,“在影响工人以及他们家庭方面,新科技与新闻规范使商业报纸无可争辩地优越于财政困难的劳工报刊”。<sup>35</sup>

廉价的日报排挤了激进报,他们采纳了后者的语言,但减弱了后者在谈论“公平、启蒙和政治独立”时的激烈语气。<sup>36</sup>劳工报刊重要的民主话语被它曾反对的商业和资本主义所吸收并中和。为了能吸引到工人阶级读者群,通俗报刊公开抨击垄断和特权,甚至在报道中为民众的事业呼吁。它们的“俚语式风格、追求轰动效应、注重趣味性和娱乐性以及对琐事的



过分关注”，证明了它们在吸引读者方面很有一套。<sup>37</sup>这些东西是“这样地吸引人以至于劳工报刊在发表批评‘垄断’或‘资本主义’报刊的尖锐言辞的同时，还经常要转载商业报纸的这些内容”。<sup>38</sup>正如保罗·拉瑟福特（Paul Rutherford）所言，美国的便士报和多伦多、蒙特利尔的通俗报刊首先是“商业企业，投资商们希望通过它们得到可观的广告收入。因此，报纸必须不仅能吸引专业人士和商人，而且能吸引职员、工人、妇女和青年”。<sup>39</sup>正如《蒙特利尔星报》就曾宣称自己的抱负是“要成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其中的工人阶级的喉舌”。<sup>40</sup>

通俗报纸成为一种综合性报纸，极力为每一类型的读者群提供相应的内容，不论阶层、性别、政治、宗教背景。它们为争取工人的权利、男性的普选权而奋斗，它们谴责大型企业对社会的控制，支持国家干预的改革社会运动，通过报道 19 世纪末期民众憎恶的社会性的欺下媚上及经济特权来探寻社会紧张状况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大众化报纸把自己表现为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战士和公众利益的捍卫者。典型的新闻报道就是揭露违反公众利益的事件，尤其是滥用国家权力，犯罪行为以及大型企业对公民权力的侵犯事件。

通过创造一个专业新闻的信条，大众化商业日报预示了现代新闻客观性体制的形成。报纸必须独立于纷争与党派之外，它的任务就是成为大众教育者以及公众的论坛。<sup>41</sup>如席勒所言，“保护天赋人权和公众利益的先发制人的声明，是新闻客观性结构的永久基石”。<sup>42</sup>

新的商业日报对客观性的关注，表现在他们声称要提供独立公正的信息，使读者在此基础上对重大的、当地的、国内的、国际的事件得出自己的观点。社论栏的重要性在典型报纸中有所减弱。<sup>43</sup>报纸开始强调消息，而不是言论。《多伦多新闻报》在 1883 年 12 月 8 日写道：“在新闻与社论的斗争中，新闻每次都占上风，因为每个读者读到消息时会形成自己的看法。”独立新闻业将大众心目中的新闻革命与相对于党派的独立性联系在一起，这种独立性具有一种冷静的、思维性的教化政治的色彩。<sup>44</sup>

19 世纪新闻客观性版本不同于以后产生于 20 世纪的版本。新闻与观点之间的区别并不严格，无论如何，特定的意识形态观点在新闻报道及社论文章中仍清晰地表达出来。19 世纪后期的新闻工作者还未取得 20 世纪隐瞒作者臆断的叙事技巧。当通俗报纸鼓吹它们公正且独立于政党之外时，它们并不是暗示它们提供的事实没有道德说教的功能。事实上，倡导性正是这些报纸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它们所标榜的是，它们所倡导的不是某一阶级的偏见，而是从普遍的理性的视角出发。19 世纪晚

期的新闻工作者们所持的是当时的“天真的经验主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会影响对事实的报道，而且，如舒得森(Schudson)所言，“他们所理解的事实就是要提供自己的道德方向，并为自己的道德箴言自然而然地产生于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而自豪”。他们的道德宣言似乎“同他们所揭露的事实一样无可辩驳”。<sup>45</sup>因此，他们看不到倡导性与客观性之间有什么不一致。

同样，19世纪新闻不偏不倚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完全与政治无关，传统的党派影响仍残留在许多加拿大报纸中，并与作为新闻专业化标记的客观性并存，虽然客观性不断被重申但实践中并未被一直采纳。<sup>46</sup>尽管最初它们也攻击党派新闻，但许多大众化日报例如《蒙特利尔星报》、《多伦多电讯报》、《多伦多星报》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因为它们公开的编辑倾向性，偏向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两大政党中的一个而闻名。甚至当报纸对创造利润比制造宣传更感兴趣时，它们仍然忠诚于一种新型的政治——只是它们所忠诚的不是特定的党派，而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或意识形态。加拿大报纸的政治独立很少延伸到在社论中支持带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共同合作联邦联盟或它的更务实的继承者新民主党。

大众读者定位的报纸永久地改变了政党与日报之间的关系。根据它们的模式，商业性成为报纸的第一特性，报纸不再与政党产生直接的经济以及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这种独立能使他们与较受青睐的党派保持一定距离，并根据具体事件改变其对政党的忠诚。由于经济拮据或编辑方针的改变，纯政党喉舌在19世纪晚期已永久地被作为商业企业的报纸所取代。

## 新闻客观性的模棱两可

19世纪的新闻客观性版本比今天所理解的策略仪式化了的客观性更具有进步性、全面性和深远影响。它对新闻而不是对言论的注重，直接来源于政治活动中受过教育的人的启蒙思想：报纸必须提供事实性的信息，人们由此可得到关于公众生活的独立判断。<sup>47</sup>

在商业报纸中民主观念不仅为新闻客观性概念提供了基础，而且还提供了讲新闻故事的意识形态框架。作为一种组织性原则，一种叙事框架，它声称争取普遍而不是特殊的视角。19世纪商业报纸的典型民主叙事方式，通过以下四个信条赋予社会事件以意义：个体天赋人权、和谐的

市场经济、一个能够代表大众意愿并能纠正公民社会缺陷的政府，以及通过提高民众的知识而取得进步的概念。在 20 世纪这些原则成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取得合法性的重要根据。

这种特殊的民主话语使得通俗商业报纸以同等的方式对商人、平民、公务员、与工人报刊的言辞能产生共鸣的新的劳工阶层读者，以及它们自己的广告商讲话。它们宣称自己是采纳理性视角的公共事务专家。它们关心公众利益，看到了自身的双重角色，在谴责公民社会和政府时是人民的代言人，又是人民的教育者。在反映社会冲突时，商业报纸作为理性的声音立足于发生争执的各方之上，有时举止像个公正的观察家，有时像代表民主的希腊合唱队。<sup>48</sup>就这样，这种报纸成功地代表了意大利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称的“公众意志”，它有助于促进不同读者群之间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融合。

19 世纪独立商业报的确有进步的一面。在扩大选举权及推翻在加拿大早期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的托利主义问题上，它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劳工报刊一起，独立商业报纸改变了公共话语的辩论层次。到 1890 年民主意识已成为公众接受的信仰之一，无论党派报还是独立报的编辑都认同这些信仰。1890 年 6 月 19 日的维多利亚的《时代报》声称“民主时代已经到来，我们不能离开民主，因此我们只有充分利用民主”。普选权（男性）在联邦或各省基本上实施。正如一位传媒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普通人的时代已经开始。这要求宣传者，尤其是希望能增加读者的编辑们要把平等的梦想挂在嘴上”。<sup>49</sup>简言之，19 世纪晚期的商业报有助于普及民主自由主义，并使之成为共识。

通俗商业报也将新闻业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机构民主化，不再是特殊党派的传声筒。报纸通过降价而广开销路，同时通俗商业报极力增加报道内容，他们关心本地、世俗社会，报道来自警方、法院、街道，甚至私人家庭，在这个意义上报纸反映的不仅仅是商业、政治生活，还有社会生活。<sup>50</sup>

的确，通俗报纸发誓要将有关世界的信息民主地转达给每个人，绝不带赘述及个人色彩地记录下有关公众生活各个领域的事实。这种客观性观念，它的普遍性以及建立在事实公平占有的基础上对公众理性的关照，确实包含了对民主的强烈的许诺。<sup>51</sup>

通俗报刊促进了新的职业团体的形成，使他们将自己看作是这一许诺的承担者。在过去的年代里，报纸的雏形是印刷商敛财的副业，以不定期的方式发行，然后由有政治背景的编辑来组织形成它们的材料。但 19 世纪后期报业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电报的产生以及速记技术的较

早发展使快速准确地记录当天信息成为可能,并成为一种要求。<sup>52</sup>新型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出现,这些人以此为生,在文化上确立了新闻是对事实的正确、非党派性的记录这一概念。通俗报刊不强调观点,而强调信息,尤其是轰动的信息。<sup>53</sup>它们逐渐将新闻与评论分开,并且随着发行规模的扩张和资本投资数额的增长,报纸内的员工开始有劳动分工,从而有了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对客观消息的追逐因新闻记者的角色而加强,他们把客观性看作是正在形成的专业主义概念的组成部分。

面向市场、自由民主的商业报刊的兴起也有其阴暗面。因为它们巨大的成功导致激进的劳工报纸的衰落与边缘化(其他方面我们将在以后陈述)。这种胜利既有意识形态上,也有结构上的后果。于意识形态而言,商业报纸将劳工们(必须承认相当含糊)对重大社会变革的激进呼唤转化成了一种温和的通俗话语,这种通俗话语对现存社会体制含有较少的敌意。尽管它们为推进社会改革而努力,并表示了对工人事业的同情,新型的通俗日报逐渐开始商业冒险。它们追逐的是利润而不是成为激进情感的中心。它们的初衷绝不仅仅是为表达工人阶级的意志,而是为拓展大众市场进行的精明的算计。民主话语和煽情主义商业地联姻为一体,这就使报纸操纵了传统上的激进新闻,对社会弊病在结构上的寻根探源因而也被忽略了。在谈到英国的通俗星期日报的意识形态意义时,维吉尼亚·贝里奇(Virginia Berridge)解释道:“商业报纸的普遍发行有助于维持并不比表面文章更甚的激进分析。”激进主义本身变成了“招徕顾客的商品”,而正因为是一种商品,当它不再能吸引到有利可图的顾客时就可能被丢弃。<sup>54</sup>

商业报纸,不是被社会解放的目标所指导,而是被赚钱的逻辑所驱使。它运用民主话语是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在激进报和工人报的话语中,卢梭和佩恩的话语伸展为一种解释并挑战工业资本主义阶级不公平的框架。但在商业报纸里这种话语成了空洞的辞令和毫无意义的姿态。启蒙主义的普遍性观点,被这些报纸用来建筑新的公众:出身低微、义愤于社会不公、抱怨特权、对贵族与罪犯的私生活的兴趣有着一种病态的渴望,有雄心但不擅长记忆或理解,并容易因任何一种娱乐分心。在这些报纸里,激进话语仍在耳边回响,普通人逐渐变得很像统治阶层心目中一个受人蔑视的卡通化形象。或许这并不令人惊奇:毕竟,当人们幡然醒悟时,正是这一统治阶层已拥有并经营着商业新闻。

民主话语,对于工人报刊而言是对社会行动的集体呼吁,而对于商业报而言仅是一种用来增加发行量和利润的语言工具,这种说法可能过于

尖刻了。毕竟，自由、民主原则以及与这些原则相符的公共利益的概念，一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加拿大新闻文化中已被真诚接受并根深蒂固，不能被降低为一种市场策略。然而，除了对个人垄断者的暴露之外，商业报刊接受市场关系和财产权力的态度比不断壮大的工会运动更加毫不含糊。而工人运动在 20 世纪早期已转向社会主义。商业报纸的民主话语，在运用一种普遍化的意识形态框架（天赋人权、理性、国家改革）来解释社会冲突的同时，对社会阶级在结构上的不平等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全盘接受。在这一点上，加拿大新闻既体现了自由民主的成就，也暴露出它的盲点。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19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商业报刊与刚开始发展的工人运动在思想观念上的距离事实上并不是很大。的确，我们不想夸大工人的激进思想。一些劳工出身的新闻记者最初把新型的、大众化的报纸看成是他们自己在公众教育中的同盟者。然而，很明显新型报纸的商业逻辑，包括他们为吸引广告商、商人、工人所做的努力，制约着新闻报道。它们使用民主话语，但它们对民主化的社会变革的呼吁是以有利可图和方便为前提的。新型的商业化新闻系统允许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多伦多保守的《电讯报》与有改革倾向的《星报》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决斗中得到集中体现。但即使是最自由的日报也不会接受激进的、平等主义的对经济体系的批判，没有任何报纸会随工人运动最终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商业报纸的发展也意味着来自下面的不同声音再也不能进入公共论坛。从此以后，不管是工人运动还是其他倡导社会变革的运动都得依靠商业化的大众媒体，而这种媒体与以倡导性为宗旨的劳工报刊有不同的目标。劳工报刊恰恰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工业资本主义明确提出批评时，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

而且通俗商业报刊为政治传媒渠道最终集中掌握在大型的多媒体集团手中铺平了道路。通俗报纸宣称要将信息提供给所有人之时，也正是他们阻止大众普遍参与信息生产或为自己的事业而呼号之日。确实，新闻宣称提供事实，偶尔为民众的正义事业而斗争。然而不是由民众自己，而是特权集团，也就是，主流媒体和它们的消息来源者们最终界定公共话语的准则并成为“事实的主人”。<sup>55</sup>

伴随着新闻被转化成一种随时可售的消费品，公众也被转化成为明显被“平衡”过的评论与“客观”信息的消费者。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客观性将得到的用途、效果与它在劳工报刊的民主话语中所得到的完全不同。

## 由实证主义到消极性新闻： 客观性的演变

“现在，我需要的是，事实……唯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所需要的，根除一切无中生有的东西。只有依靠事实，才能形成理性动物所拥有的思维见解：别的任何东西对此无所帮助……坚持事实吧，先生！”

这番话出自查尔斯·狄更斯 1854 年所写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托马斯·格雷硬之口，它抓住了 19 世纪晚期北美人文文化的某些精神实质。这一时期标志着文学与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社会领域的经验性探索、科学在流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对新闻的真实性追求均达到了顶峰时期。<sup>1</sup>

到了世纪更替之时，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客观性概念已牢固地定位。19 世纪 30 年代的便士小报的发行人兼编辑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 (James Gordon Bennett) 曾许诺说，他的《纽约先驱报》将不带任何冗词和华丽辞藻地记录下事实，他的话已经变成了一条新闻准则，并通过编辑室的等级制结构、精细的分工而得以严格地执行。事实观追求和尊崇不加修饰地描述世界事实。它采纳了启蒙运动时代理性和民主的前提：“事实是众人可知的，报纸的工作就是不计个人的好恶去收集事实，并使它们为大家所用，以便人们能够形成自己的意见。”<sup>2</sup>

### 朴素现实主义时期的事实观

对新闻记者自己来说，事实观是一条严格的戒律，常常与他们发展独特叙事风格的期望相悖。19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记者们，会颇为嘲讽地回忆他们是如何学会新闻编辑室里的规则的。一名记者在回忆录中写道：“事实，事实，还是事实。如此多的禁忌，禁止

使用的词语名单长长一串。如果误用了它们，而又逃过了校对敏锐的目光后交付印刷，你就会尝到责罚，要么被扣一个星期薪水，要么立即被解雇。这是个苛刻的制度，苛刻地执行着。”<sup>3</sup>

另一名记者也有类似描述：“记者们必须按事情的原样如实报道，像机器，不允许有偏见、不允许有润饰、不允许有风格，千篇一律。报道中幽默或显示个性的词句，被一一挑选出来，诘问一番，剔除掉。”<sup>4</sup>

报刊产业中新技术的引入，如电报、通讯社、摄影和照相刻板技术，都增强了以未经润饰的事实作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脱离狭隘宗派利益的着迷程度，不过最重要的进展是新的新闻写作形式——“倒金字塔”结构的发明。

正如一名著名新闻史学家所言，以往新闻写作的主要类型不能很好地表现“尊重事实”，文章中对个人观点的偏重掩盖了基本事实，可是一旦记者们开始通过价格昂贵又不可靠的电报来传送新闻稿件，他们就学会了把“最关键的事实浓缩成简短的电讯稿”，<sup>5</sup>不再受时序、论点的展开或者是论述的推进的限制。确切地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事实，是按新闻价值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的事实。因此，一种引人注目的、人为的（remarkably artificial）新闻写作形式——“倒金字塔”结构产生了。它不同于日常讲话。一个世纪后，它还是日报的主要形式。

可以肯定，即使在它的黄金时代，追求事实——新闻的信息功能——从来就没能完全压制住新闻创作的愉悦感和它的说教功能。在报道中，新闻没有放弃使用绚丽多彩的描写，想象丰富的润色，甚至是观点的影射。而且，在一战后的美国新闻业中，事实是对世界的文字摄影这一信条已动摇。

虽然对纯而又纯的事实的信念不一定总是占上风，真实性的形式还是在新闻报道中留存了下来。实际上，总是滞后于美国的加拿大政治新闻一直到二战后，对不掺杂评论或解说的事实的强调才达到顶峰时期。荒谬的是，那正是一段最需要信奉明确的价值观念，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公共舆论并为抵御外敌不惜流血的历史时期。不过与此相悖的是：英国公共广播正因为报道中做到了表面上的公正、权威、准确而成了国际标准。英国广播公司（BBC）为此获得了全球可信用度，成为盟国政治军火库中的有效武器。当然，在后方，BBC的战时表现，包括它独立于政治机构和不卷入政治的姿态巩固了它作为全国文化机构的地位。<sup>6</sup>

加拿大的国营电台（CBC）亦步其后尘。CBC 新闻节目在前多伦多报纸记者丹·麦克阿瑟的领导下于 1941 年元旦设立了《全国新闻简报》节

目。<sup>7</sup> 由于当时缺少来自前线准确而又及时的报道，这个节目很受人们欢迎。新闻播音员洛恩·格林(Lorne Greene)的声音立即家喻户晓，成为可信度的象征和电视新闻的先驱人物。<sup>8</sup> 后来，他因在西部系列剧《博朗扎》(Bonanza)中扮演帕·卡特莱特而成为一代电视明星。

不同于CBC其他为战争服务的节目(包括政府资助的专题)的主管们，以及渥太华的那些希望新闻成为经官方认可的信息和通告的传送工具的官员们，麦克阿瑟坚持把正直和客观性当作是新闻台的基石。但是麦克阿瑟保持了半个世纪前美国新闻业的一些观点，他狭隘地认为客观性就是“准确严格地遵循事实”，赞成不带偏颇的报道并且把任何形式的解说、分析、评论从《全国新闻简报》节目中剔除出来。<sup>9</sup> 如罗伯特·艾尔伯塔(Robert Albota)所说，“麦克阿瑟认为，如果写简报的编辑偏离了新闻报道直接、真实的内容”，或者“CBC的新闻广播企图对有政治性或有争议的问题加以分析解说的话，新闻台将更易受到指责，说它存有偏见”。根据艾尔伯塔所说，在麦克阿瑟看来，“写出事实让听众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才是更重要的”。<sup>10</sup>

麦克阿瑟显然认为，坚持采用由加拿大通讯社或不列颠联合通讯社提供的直接、真实的报道，客观性才能得到保证。<sup>11</sup> 这种观点的幼稚性在事后看来也许更清楚。而且，它也阻碍了CBC的新闻节目最终扩展至新闻采访，而不仅仅是选择、编辑外面的新闻通讯社的稿件。<sup>12</sup> 大战结束前，像马修·霍尔顿(Matthew Halton)这样的CBC驻海外记者就拥有了一大批听众迷。

与其他任何一种新闻媒体相比，公共广播无论是出于对建立自己的机构可信度，还是出于独立于执政党之外的目的都不得不更注重保持新闻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们要把评论仅限于新闻中经过精心平衡处理的、对别人说法的引用或是特别策划的时事节目中，使其安全地处于新闻广播的界限之外。CBC的一名后来就职于皮埃尔·特鲁多内阁的法语记者就抱怨说，直至1960年，CBC的报道“客观得像处女般贞洁”。<sup>13</sup>

但是，加拿大报纸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也采纳了“只讲事实”的伦理标准。乔治·贝恩根据长期从事印刷新闻业的经验，把二战及其后的时间看成是“客观性时期”。到那时候，由某个编辑或出版商经营的充满个人意见且态度鲜明的党派报纸，已经被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所取代：

社论撰写人与新闻编辑室之间形成了“政教式”分离，虽然报道中固有的倾向性从未消失过，但是现在，“倾向性”至少已成为一个不好的字眼了。报纸在政治方面的观点将限制在社论版，记者的个人意见不复存在



了。记者记录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他们不再介入其中。报纸和迅速成长的电视将成为管道,一头吸入信息,另一头将未经掺杂的信息传送出来。<sup>14</sup>

传媒学者大卫·塔拉斯(David Taras)同样认为,“客观新闻文化”在一战后的加拿大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二战后,当新闻学院建立起来之时则更甚之,使得政党报纸消失了。<sup>15</sup>

## 吸纳主观性：作为一种“策略仪式”的客观性

尽管客观性的意义与实际应用早已牢固地确立了,但是它也并非坚如磐石。它们是灵活的,有弹性并且可协商的。而且,新闻写作中的客观性的主导地位从来就不是完全不可战胜的。

当20世纪在血雨腥风中前进时,在北美新闻业中,人们已开始怀疑,直接的事实报道是否能够充分准确地记载世界?事实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再为自己辩护,它们也不再自动地提供道德导向。在他那部引人深思美国报业社会历史著作中,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对近一战后期“民主的市场社会”的可行性所产生的悲观情绪导致了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迸发,进行了探究。<sup>16</sup>

一战的大屠杀、战争时期明显而有力的宣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欧洲史无前例的集权主义的法西斯政权、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事实、公民理性以及民主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必然性和可行性的信心缺失。据推测来看,我们认为广播、电影,包括新闻纪录片,这些新媒介都为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模式去呈现这个世界提供了可能。这些媒介似乎给无中介、纯事实描述的积极乐观的理想以新的生命。然而,让人焦虑的是,这些新媒介也可以被利用,作为宣传工具,并且因为它的表面的现实主义,宣传会显得更加有效。例如,在其权利巩固过程中,纳粹分子就充分利用了广播和电影。雷里·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颂扬纳粹政体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至今仍被视为一部典型的宣传片。

随着文化变得更为开放,新闻业的自我理解在一战后也处在一个转变期。社会科学第一次提供了新闻记者自身主观性的系统证明。1920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查尔斯·默兹(Charles Merz)揭开了遮盖在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纽约时报》上的客观性面纱。他们总结道:“该报有关俄罗斯革命的报道并非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希望看

到的东西。”<sup>17</sup>

新闻业也不得不去适应公共关系业的出现,而该行业的产生是出于精英们在大众有普选权和大众媒体时代,尤其是在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或至少政府管理市场较多的时期,控制公共舆论的需要。

新闻从业者发觉他们得到了公共关系业的垂青,尽管他们藐视、厌恶公关这个有选择地兜售适合一时需要的事实的新职业,但他们并不能逃脱对公共关系产业(PR)准备好了的稿件的物质依赖。<sup>18</sup>因此,19世纪的新闻客观性观点在一战后有了重大改变。通过事实体现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说法和新闻记者自身的公正性不再轻易地被臆断了。<sup>19</sup>新闻从普遍理性的角度发言的权威受到了质疑。然而,非党派偏见的商业逻辑以及对世界客观描述而非恶意宣传的诉求仍在起作用。

在新的情况下,新闻客观性通过一系列“组织机制”和“战略仪式”的形式被表达出来。通过这种形式,记者可以确立所陈述的事实的真假值(truth-value),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这样的危险,还可以使他们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或后果负责任。根据舒得森的观点,这是一个有关“专门为连事实都不可信的世界所设计的方法的主张”。<sup>20</sup>

这些准则包括:使用引号标示出特定概念;对观点追根溯源;以恰当的顺序和格式(新闻报道)构建信息;表达出双方或所有主要方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以及遵循通行的有关体面和良好品位的标准。<sup>21</sup>通过这套方法,客观性就成为一种有着独特技术准则及实践规则的“文化形式”。新闻产业建立了道德规范,并将客观性的要求奉为神祇。例如,1935年,美国报业协会的道德规范正式认定了客观性理念,它规定:“报社从业人员的首要职责是向大众提供准确、无偏见的新闻报道。”<sup>22</sup>

当客观性越来越技术地定义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话语时,它变得更加严密了。由于记者们都不再相信事实本身含有道德训诫,倡导性也就成为客观性的对立面了。客观性逐渐定义为直接、真实的报道,并且它实际上进一步转变为报道由受到认可的信息来源所做的真实描述和陈述。

## 解释性报道:超越了事实?

除了客观性的程式化及典范化之外,对新闻中主观性的认识在20世纪也有了改变。最重要的变化是客观性范围的扩大,将解释性新闻

(interpretative journalism)与“直接报道”同样纳入其中。<sup>23</sup>作为新闻的一个类型,解释性报道的出现是对新闻来源渐渐操纵新闻以及不满于只“让事实说话”的新闻做出的反应。处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痛苦中,对于那些受到美国梦和新教伦理熏陶的人来说,高级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难以理解。黑暗的、威胁性的势力在欧洲酝酿着,即使在仅存的自由民主国家中,虽然公民权普及到几乎所有成年公民,权力却越来越集中,越来越远离平民百姓。世界不仅是复杂的,而且这种复杂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存在问题。<sup>24</sup>正如新闻自身的口号所言,受众不仅想知道什么人(who),什么事(what),什么时间(when)和什么地点(where),还想知道什么原因(why)。

对它的支持者来说,解释性报道是将新闻置于一个适当的环境中,并用另外相关的背景材料装备起来。它意味着为读者解释、详述并分清形势。<sup>25</sup>如颇具影响的哈钦斯委员会(Hatchins Commission)1947年所做的有关美国新闻的报告中指出,记者不应仅仅如实地报道事实,还应报道出事实背后的真相。<sup>26</sup>解释性报道暗示了外部或表面现象与隐含的现实之间的一个必须昭示于众的差别。解释性报道抛弃了实证主义者认为的“事实能为自己说话”的假象,但它接受了“万事终有真理”的现实主义主张。

从直接新闻中脱离出来的一个表现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报业中政论专栏“作家辛迪加”的诞生。<sup>27</sup>加拿大的许多报纸,通讯社及私人电台到40年代早期开始推崇建立在解释性报道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客观性概念。但是,直到60年代,CBC才开始稍稍改变早期认为客观性就是直接真实报道的观点。<sup>28</sup>与美国类似,加拿大的驻外记者特别渴望能从表面真实的约束中解脱出来。例如,记者大卫·列维后来证实,60年代中期他供职于CBC莫斯科记者站时,如果丹·麦克阿瑟的客观性概念还没有被显著扩大,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记者。也就是说,旧的客观性概念使得他不仅要为政治做传声筒,而且还不能向加拿大受众解释他们所不熟悉的苏联政治文化。即便是到了60年代,列维的任命还是遭到了一位顽固保守的编辑的抵制,该编辑不信任列维的评论员和学者背景,并且认为列维缺乏“客观”写作的严格训练。<sup>29</sup>

1967年,一部引起争议的纪录片——“死亡空气”,是CBC超越电视新闻局限性的标志。它反映了尼亚加拉半岛上的一家化肥厂造成空气污染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节目是在时事栏目而不是在新闻栏目,这一现实使其相对大胆,却未能逃脱厂主对其倾向性的指责及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

信委员会(CRTC: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的查询。不过,CRTC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总结,广播电视记者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不妨展现“诚实的偏见”,只要它们不是“恶意的、歪曲的,以至于带有宣传味的”。<sup>30</sup>

可是,解释性报道仍从属并受制于客观性。这在它的概念表述和新闻实践中都是如此。首先,“客观性”这个概念的内涵在重新定义后包含了解释。把直接报道当作客观性的实践是过时的,是浅显、幼稚又狭隘的,是误导。解释性报道使客观性的形式更全面、更深刻。1950年,一本专业刊物《耐曼报道》(*Nieman Reports*)中有篇题为《报道背景材料——你可以解释但仍保持客观》的文章指出,“这不是在原则上诋毁客观性,但如果新闻界想要起到在一个最终由民众决定的民主政体中所应起到的作用的话,读者有权看到以他能够理解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性(报道)”。<sup>31</sup>

还有其他许多新闻从业者和教育者的例证。1951年,权威性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篇有关解释性的头版连载中告诉读者,“解释必须正直、博识、明了、平衡、独立,这些只有在严格的新闻客观性中才得以保证”。1943年,美联社总经理肯特·库柏在对职员的一次讲话中呼吁要深入挖掘,揭示真相的直接、真实而又完全客观的新闻报道。<sup>32</sup>

CBC接受广义的客观性概念是以承认新闻无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倾向性或主观判断为前提的。然而,在艾尔伯塔看来,基本原则就是,作为公正无私的观察者,记者或通讯员应当承担任务并不计后果地坚持到底。如果他们进行着一项能发现真相的调查,他们可以认为他们的报道是客观的。根据这个理论基础,艾尔伯塔指出,CBC的记者可以陈述自己的解说、推断和见解,只要报道准确、公正、平衡,它仍可看成是客观的。<sup>33</sup>

上述这些政策和建议允许尽职的记者们在客观性的规则下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这也清楚地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协调(假定的)中立的、对事实的镜像式呈现与记者的主动性解说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上,提倡这个方法必须要把诚实、合理的解说一方面和歪曲事实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要与“掺杂作者自身偏见和倾向性”的主观性插入意见或“讹用解说”相区别。<sup>34</sup>加拿大1980—1981年的皇家报业委员会指出,报纸“除了原有的准确、公平、平衡报道之外”,还应“深入事实内在意蕴”,通过不歪曲的解说道出真相。<sup>35</sup>新闻学教授伯纳德·罗施科(Bernard Roshco)说,既然解释性与客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并非不相容,只要记者避免“主观性插入意见”(subjective editorializing),在逻辑上,二者在新闻学中也是可

以和谐一致的。<sup>36</sup>

但是，“客观性解释”与“主观性插入意见”之间的界限通常很难分清。在这个概念下，从受到新闻文化的偏见或价值观歪曲的解释中把客观性解释区分出来是困难的。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没有过多顾虑这些概念性问题，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把解释性报道与客观性新闻结合在一起，途径之一就是“归属解释”，记者把对某一事件的见解或评价以出自一个相关来源的引语形式放在报道中。由此，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专家”作为权威解释者和公共事实的定义者，加入到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发言人行列。

通常，这样解释的客观性是通过平衡来自专家或拥护者的对某一事件的两个（或者更多）截然不同的解释，且不采取偏袒任何一方的姿态来达成的。这种新闻报道中陈述的平衡程序排斥了其他建构知识的途径，如使用文件证明等。里查德·埃里克森(Richard Ericson)和他的同事例举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多伦多电视新闻记者对当地某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报道。以一份内部的警察备忘录作为证明，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谴责当局打算禁止一个参加拉斯特法里会议的代表团进入加拿大。记者通过采访当地警察局长，引用该局长对该备忘录的解释来平衡这一声称。新闻工作者在报道这样两种冲突性的说法时，并没有亲自查阅该备忘录，即使这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资料。获得这一文件将迫使记者作出一定的判断，而这可能会导致其赞同某一观点，从而“违反有关平衡、中立和客观的记者准则”。<sup>37</sup>

虽然解释性报道从概念上及实践上重新修正了旧式客观性理念，但有几个考虑提醒我们不要夸大这一程度，以为旧式报道传统已被彻底改变了。解释性报道一直作为一种哲学被倡导，但它的问题和方法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sup>38</sup>在实践中，只有较高级别和经验丰富的记者才有发表明晰的评价性内容的资格，并且它也经常以一种特定的风格出现——说明背景情况的新闻背景、分析性专栏、电视杂志节目，很谨慎地与观点（来信、专栏、社论）及直接的新闻报道区别开来。

当然，解释的堂皇词语不一定总能让记者逃脱为权威人士做速记员的命运，而这也是直接报道易犯的主要错误之一。20世纪50年代，国会议员乔治·麦卡锡利用客观性规则对美国公共生活中并不大量存在的共产党人士进行持久而又庸俗的讨伐，这迫使记者们虽然明知这些指控有误，但还得报道传播。1969年1月，全美媒体聚集在圣巴巴拉的一处海滩，尼克松总统宣称已经清理干净了因大面积油泄而造成的污染，媒体对

此进行了报道。所有的人都忽略掉了距此一百码之远的一处真正的油污废墟。<sup>39</sup> 80年代,许多评论家认为,里根总统可以利用直接报道的规则,避免在公众面前暴露出他受欢迎的形象和他的实际政策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电视屏幕上。<sup>40</sup>

解释性报道以及它与新闻客观性传统结合的出现表明了在这个传统内部的一次有节制的改革,而不是对它的根本性反叛。解释性报道对旧式的直接报道提出了挑战,为进一步提供背景材料开辟了道路。在客观性传统力量以及新闻制品的结构没有重大变化(包括制作费用最小化和受众最大化的商业规则)的情况下,解释性报道的潜能受到很大限制。

## 批判性新闻：一种反叛性文化

地下小报充满了污言秽语、性自由咨询专栏、无政府主义政治等内容;报纸的导语是战争伤亡、种族暴力、政府欺骗;图片则是一名东南亚女孩恐怖地尖叫,痛苦地从一片火海中跑出来;一名学生痛苦地跪在被枪杀的同学尸体旁;警棍在抗议者人群中飞舞;一名越南军官向被捆绑着的犯人脑袋上开枪。至今,20世纪60年代媒介中的一些形象仍经久不衰,那个10年是一个拒绝倒下、拒绝死亡的年代。<sup>41</sup>

至少在表面上,60年代确实开创了新闻业的新纪元。凭借着大量的观众和引人注目的图像,电视第一次超过报纸成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首要新闻来源。在一些评论员,特别是思想保守的年长的新闻从业者眼中,新闻媒体已经偏离,甚至丢弃了客观性原则而青睐于批判性或反叛性了。这个看法也是一种谴责:它认为反叛性新闻(adversarial journalism)应对以下诸问题负责任:削弱政治领导;把公众话题转变为肥皂剧、激情剧的形式,使之庸俗化;使得行之有效的政府更加困难;阻挠精英人士进入政界,而且,在加拿大,它还取代了议会反对党的作用。<sup>42</sup>

有些观察者把电视看作是“批判性”新闻,而非“客观性”新闻的催化剂。他们认为电视媒体最显著的娱乐定位——它的信息娱乐化议题推动电视新闻朝着讲述带有强烈的、戏剧性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并且个性化主题的报道方向发展,而不是向解释观点或强调事实的细节的方向发展。<sup>43</sup>据说,由于电视的“流动”逻辑——它需要在一段时期内吸引大量观众的注意力,围绕“简短、简单而又连续”的叙述方式,电视新闻报道被紧凑地组织在一起,这与报纸的“倒金字塔”结构迥异。<sup>44</sup>

这些观点值得探讨。但是,电视与事实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关系比较

微妙复杂,在某些方面电视新闻加强了新闻客观性。在政治性报道中它被要求做到公正、平衡,凭借这一点,电视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印刷媒体中旧式党派偏见的余痕。此外,电视镜头的“现实效果”意味着透明度,即不经媒介地对外部事件进行观察。这种印象当然是一种幻觉,一个自然主义的谬误。<sup>45</sup>因为就连一个最简单的镜头都可根据地点、角度和滤光器的不同选择而使人产生不同印象。电视新闻是一件经过构筑而成的作品,通过技术和观念准则成形,然而通过不断提及“目击新闻”和“使人身临其境”,电视新闻努力使它的规则自然化,不为人觉察。<sup>46</sup>在50年代出现新闻萌生期及此后的岁月中,电视新闻的“现实效果”可能给公众期望注入了新的生机,即新闻传媒可以是中立的,是观望世界的客观窗口。

除了电视和印刷媒体各自因技术原因而形成的倾向性之外,其他因素也对“批判性新闻”的出现产生过影响,新闻不能不对它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环境作出回应。由于在越战期间美国领导者们不断吹嘘美军的胜利,而尽量掩盖它的失败和暴行,造成政府与传媒之间的“可信度差距”。这个“差距”又因“水门事件”而加深。当时,总统尼克松下令让人偷偷进入民主党总部,而后又尽量掩盖犯罪证据。美国记者,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不得不面临神话破灭的可能:他们的总统不仅是个骗子,而且还是个窃贼。

除了美国政治和传媒对加拿大的巨大影响之外,加拿大观察者们自家也发现了批判性新闻的催化剂,一个就是50年代以后,政客们与迅速扩大的渥太华议会记者团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加大,从而破坏了它们之间原有的亲密关系;另一个标志是CBC电视播出的有争议性时事节目《七日尽在一小时》。尽管这个节目以针对性采访和耸人听闻的曝光吸引了大批观众,CBC管理层却在1966年取消了它。在魁北克省,客观性观点从未受到英语区所拥有的重视。记者们积极参与该省的“温和现代化革命”。<sup>47</sup>随着新闻工作者与雇主之间尖锐争执的加深(普遍而言,魁北克劳工的总体斗争意识较强)和不断增长的独立运动,魁北克省的新闻政治化程度也逐步升级。1970年,特鲁多政府强行推出《战时条例法》作为对政治绑架活动的回应,当年的“十月危机”就是真相暴露时刻,它表明了魁北克和英语区的政治文化与传媒文化的巨大裂痕。<sup>48</sup>

有些观察者对加拿大反政府政治新闻的起源做了更深入的研究,追溯到了1956年著名的议会“管道辩论”,大卫·塔拉(David Taras)对那次具分水岭性质的事件做了总结:

在提出一项颇有争议的议案——为修建横跨全加拿大的管道向政府

提供经济资助后,圣劳伦政府为了避免在议案通过的每个阶段引起争论,行使了中止辩论的权力。事实上,在C. D. 豪提出议案之初就立即终止了辩论,议院各方群情激奋,记者也陷入了纷争和党派偏见的旋涡之中。议会记者团觉得自身陷入了一种特有的道德困境中,鉴于反对派的呼声遭到压制,许多报纸都感到它们有义务承担反对派的角色,批评政府的政策。<sup>49</sup>

乔治·贝恩以他当时在渥太华做专栏作家兼记者卷入其中的亲身经历,把这场辩论看成是对记者的自我意识的直接暗示:“当时的戒律认为记者是观察者,他们看,他们听,他们作记录,然后写。但是这是一场重要而刺激的游戏,不仅有观察的快感,还有参与的快感。而且,在议会一片“喧闹声中,在午夜写着新导语,身兼报道和评论二职,实属不易。”<sup>50</sup>

姑且不论报道是否能够避开主观性判断的原则问题,贝恩总结说,辩论有助于使记者的判断合法地“侵入”事件报道中,这种侵入在电视时代发展到“新闻与评论实在无法分辨的地步了”。<sup>51</sup>

自60年代起,所有这些发展变化无疑影响了新闻业。从明确的反对派观点报道事件的批判性新闻在60年代获得新生,最明显的是朝气蓬勃的“反文化”地下报纸的激增以及新兴的另类杂志,比如《加拿大面面观》(*Canadian Dimensions*)和《这本杂志》(*This Magazine*)的兴起。在美国,一个被称为“新新闻”的运动开始强调以小说性技巧以及第一人称的经历,对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进行主观性解说。<sup>52</sup>“新记者”拒绝客观性目标,而是成为新闻报道中“活生生的一部分”,寻求“隐藏在人们意识与记忆之中的真相”。<sup>53</sup>

在主流报纸中,“水门事件”和随后尼克松于1974年的辞职引发了以后几年中一股追踪丑闻的调查性新闻的浪潮。政治新闻似乎对政客们及其动机采取了一种普遍的嘲讽腔调,使之降低到追求选举优势或是更糟糕的,赤裸裸的权力、性或金钱行为的层次。在有关政府政策的报道中,报纸几乎不报道政策的基本内容而经常只注重报道对政策的敌对反应。最近的一个有关例子是《温哥华太阳报》1995年3月29日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执政的新民主党的财政预算的头版头条报道,因最重要的部分在预算公布的前一天被神秘地泄露给了维多利亚的《时代殖民者》,大字标题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财政预算中的烟幕与实情预报》,并配以自由反对派领袖戈登·坎贝尔充满怀疑的言论。在预算公布当天,《太阳报》以《外泄的财政预算“站不住脚”》为总标题,发表了两篇报道以飨读者。一篇对“泄露事件”进行了报道;另一篇以《真实但微小的盈余遭得



冷淡回应》为题，报道了商界对预算的有关反应。读者如果欲看到财政预算的具体内容的马马虎虎报道就不得不把报纸里页的内容完完全全地搜寻一遍。

虽然有关反叛性新闻的认识并非毫无根据，但是要认识到，主流媒体中批判性新闻并不总是完全对权威方抱有敌意；况且，无论如何，批判性新闻实践都不是新闻媒体日常行为的典型活动。其中的许多实践要么已衰落，要么一直被限制在边缘地带。揭露个别掌权者所犯错误的调查性新闻自70年代后期日渐式微。政治气候变得更保守，对正统的甚至是神话化了的机构，譬如对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揭露会引起观众的不快。媒介所有者本身也不愿投资于冒法律之险、耗时且报偿未卜的调查。<sup>54</sup> 商务记者大卫·海怡斯就职于《环球邮报》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调查性新闻被批判性较少的新闻形式迅速取代的情况：“水门事件”后的日子里，耗资大又冒险的搜集名人丑闻的热潮减退了……相反，电视以其时效性取代了北美报纸，并夺取了它们的年轻读者的时候，许多报纸，包括《环球邮报》，增加了对社会时尚以及休闲消遣的报道。<sup>55</sup>

因此，那些在主流媒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批判性新闻不应被看作是背离了客观性，而应是对客观性的特定方面的发展。它的否定语调及对政客表面上的敌意可追溯到19世纪对党派报纸的群情激愤。今天的反叛性政治新闻可以宣称（尽管十分值得怀疑），在它的否定性中不再有党派偏见了，它代表公众说话，代表普通大众，代表超越了政党和特殊社会利益集团的普遍观点。

同样，70年代的调查性新闻也可追寻至世纪之交美国进步运动时代专门揭露黑暗的“掏粪者”的新闻传统，以及通俗商业报纸的民主叙事。虽然它具有批判性的目的和争议性的特点，但仍保持了客观性的特征。<sup>56</sup> 人们依然期望它能遵从诸如真实、均衡、中立的要求。据温哥华的一名报纸记者说，为了保证遵从客观性规则，并且使它们看起来完全是客观的，调查性报道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极其仔细的检查。<sup>57</sup>

批判性新闻中那些实在有违客观性精神的方面被边缘化了。政治性宣传几乎完全被限定在另类期刊和执著的小出版商发行的书籍中。只有琳达·麦奎格(Linda McQuaig)这样的个别天才能跻身于主流大媒介之列，而且传媒大亨布莱克宣称她应该因她的言论而被马鞭抽打，即便如此，她对政治经济所做的尖锐批评只能在书评版，而不能在新闻版出现。<sup>58</sup>

对比之下，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更容易进入媒体。它们与精英利益

团体的密切关系使其很容易吸引到投资者和广告商,而且它们已经捕捉了大众思想中的向右转的趋势。但是,即使在一个拥有成群右翼专栏作家的报纸中,明显的宣传仍不会出现在新闻版上。无论它们结合得有多明显与紧密,保守的期刊仍有别于主流“客观性新闻媒体”。例如,加拿大西部的新闻杂志《B. C. 报道》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保守的经济思想融入新闻报道中,它就根本没想以其客观性示人。

除了批判性新闻之外,其他一些运动也纷纷兴起以图改变或修正北美新闻业的缺陷。美国一名资深记者兼学者 J. 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把近几十年中的这类运动划分为 9 种。对这些运动的粗略观察表明,任何一种运动都没有罢黜客观性体制的权威地位。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反叛/批判性新闻(adversarial/critical journalism),还有与它们类似的追踪式新闻(enterprising journalism)都是它的几个方面。为了揭开事实背后的真相,追踪式新闻的记者对新闻来源提供的事实深入挖掘,但是他(她)“隐藏了自己的个人意见”,保持了一个客观记者的形象。<sup>59</sup>

精确性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是解说性新闻与追踪式新闻的一个讲究实际的亲戚,它完全强调方法和技术。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推动下,记者在采写新闻时,并不是靠简单的随意采访而是依据官方和公开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计算机辅助分析。他不是反对而是强化了盛行的客观性理念,“他的准则就是科学式的中立,采纳了客观性的衡量标准”。<sup>60</sup>

名流新闻(celebrity journalism)与其说是一种原则,倒不如说是因北美新闻业中商业电视占优势而形成的一个发展。“小报式”电视脱口秀的主持人近来从新闻业的边缘地带加入到早已名声显赫的新闻主播的行列,成了名流。可以认为他们背离了甚至是威胁到了客观性理念:“名流新闻的记者不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一名教师或向导。他解说着,但他也表达自己的见解;他独自高高在上,也许甚至是站在他所写的、所讲的人物之上。”<sup>61</sup>

但“独自高高在上”确实是客观性的标志之一。新闻主播可以成为知名人士,但这是靠其自身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换来的,他们的地位得自他们声称的没有站在任何狭隘的党派的偏见之上,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的品质。劳埃德·罗伯特森(Lloyd Robertson)在 CTV《全国新闻》谢幕时说:“今天就是这样。”这与他的前辈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对观众所作的真理许诺的仪式化语言“就是这么回事”,仅仅谦虚了一点点。相信他们的话语是以真实性为诉求的。

阿特休尔所划分的9种新闻改革中，只有3种明确地反对客观性理念。这3种全都受到限制或遭到排斥。明确倡导某一种事业的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被与主流媒体的专业化报道分开。许多60年代反文化时期的地下报纸或消亡，或转入“地上”，成为较传统的新闻。生命力旺盛的另类媒体仍活跃在整个北美，其中有60年代的幸存者，有些产生较晚，但它们有意识地反对客观性或其他因素，使它们与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媒体区分开来。

至于强调主观性的新新闻(new journalism)，虽然它对周末版有影响，但它主要出现在主流新闻媒体之外——比如，《滚石》之类的杂志或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作家的书中。<sup>62</sup> 尽管新新闻工作者最终可以取得声望，但他们以“新新闻记者”而出名，但不会在主流新闻范围内占有任何地位。尽管新新闻的记者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对新新闻这个名称提出质疑，认为新新闻有很大的历史渊源，但他们仍只能被称作是“新记者”。“实际上，新新闻并不新鲜。倡导性新闻比美联社的五个W要早好几个世纪。汤姆·佩恩和伏尔泰都是‘新’记者。当弥尔顿在17世纪为反对政府新闻审查制度而发表檄文时，他就成为了‘新’记者”。<sup>63</sup>

因此，有历史传统的倡导性新闻被冠以“新”和极端之名，而同样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客观性新闻却被看成是自然的、恰当的、无可争议的合法新闻形式。

## 新闻记者与客观性的爱恨关系

按舒得森的观点，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我们对客观性报道有诸多不满”，但北美新闻业中还没有新的理念能成功地对它提出挑战。<sup>64</sup> 除了新闻机构的逻辑所迫之外，记者本人与客观性观点也有重要的利害关系。可以肯定，客观性规则限制并束缚了记者，抑制了他们对工作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它削弱了记者们对新闻工作过程和结果的控制感。

例如，除了恶意的闲言碎语，绝大多数人通常都不会热衷于传播明知是谎言的话。然而，当有权势的政客们做出错误的指控时，“直接”报道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价值的传统标准似乎要求记者就得这么做。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时期，记者们尝到了这种做法的犯罪感和失意感。<sup>65</sup> 客观性规则为有意操纵新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有权势的新闻来源者提供了操纵通途，使记者们无法公开揭露这种操纵。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寻找愿意公

开站出来说话的反对声音,最好是政府或其他权威。<sup>66</sup>

记者们如果严格地按照旧式客观性游戏规则去做,他们的敏锐观察就得不到发挥。他们被鼓励着去依赖公认的权威获得对现实的描述,他们不得发挥质疑来自官方信源的自利性观点的习惯和技巧。他们被迫相信“接受矛盾就是客观,提出质疑就是主观”。<sup>67</sup>为了体现客观性,记者们有时要做出让步,写出与本人观点相违背的报道。有时候,记者们会通过选择并引述与自己观点近似的新闻来源的话,来引入自己的解释和分析。这种看似奇怪的方法是对客观性桎梏的一个回应。

客观性的要求甚至侵犯了记者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加拿大报刊的编辑们普遍认为,“如果记者们参加政治活动,报纸客观公正的声誉将会受到破坏。”<sup>68</sup>有些较大媒体的负责人以订合同的明确方式禁止记者公开表达政治观点或参加政治活动,即使是在私人时间。<sup>69</sup>(有意思的是,媒体所有者自身与政治、经济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媒体管理层却并未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样子。)多伦多一家新闻机构的一名记者说,尽管他本人非常忠诚于某个党派,但如果他的政治倾向公开的话,他的工作前程也就“完了”。<sup>70</sup>记者们有时不得不在工作与个人的政治活动之间做出选择。

简单地说,客观性使记者“置身事外”,成为政治生活的观望者,记者们不可以提出主张,参与争论,不能在争论双方之间做出判断。客观性观点被发展至极端时,它否认了记者发挥独立判断才智和行使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权利。客观性表现了新闻创作商业化之下记者脑力劳动的异化。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职业群体,记者与客观性理念也有重要的利益关系。大量证据(包括以观察、采访、记者调查为基础的学术研究)都表明了记者们仍赞同客观性。1974年,美国一项调查发现,接受测试的记者编辑中,有98%的人“实际上把新闻定义为对客观性标准的尊崇。”<sup>71</sup>他们如此强调这一点,以至于他们的思维、态度、个性都依赖并围绕着客观报道的思想而构筑。作者经多方研究得出结论“客观性准则构成了新闻产生的定义逻辑和职责的核心。”1982年一项对153名记者进行的调查同样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把新闻等同于“客观性”报道。<sup>72</sup>最近,一名新闻学教授把客观性描述为“点燃新闻业发动机的燃料,是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记者接近他的来源、他的素材和他的大众的方法;它是美国新闻业赖以存在的一个隐藏的参考框架;它是一本未形成文字的指南,代

代相传。有人奉之为神明，有人则视之为魔鬼。有的记者信奉它，有的却诅咒它。<sup>73</sup>

新闻学院，新闻伦理教材和现有的伦理准则仍旧推崇客观性的思想。在美国，职业记者协会的伦理准则突出了客观性，认为它是“资深职业记者的标志和我们奋斗的方向性的行动标准”。这一准则强调准确地报道，强调新闻与个人意见和倡导性意见的分离，强调无党派偏见，强调运用合格的新闻来源，所有这些都是客观性的组成部分。<sup>74</sup>

记者们之所以为客观性观点所吸引，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一种职业责任感和一种有关新闻报道的影响的意识。正如一项在加拿大进行的有关新闻制作的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所表明的：

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项创造性的、重要而冒险的事业，记者们认识到必须对他们的工作可能造成的影响保持敏感。如果你在讲述真实人物的故事，你就必须考虑到给他们带来的后果。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新闻大多涉及异常的人（或事），它自身又有社会控制效力。新闻业尝试着用客观、公正、平衡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由于记者是他人生活和社会组织机构的解说者，他们必须做到公平地对待它们，并以客观、平衡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生活。<sup>75</sup>

虽然这种职业伦理毋庸置疑是很重要、很诚恳的，客观性却为记者们提供了一条可以解决他们的社会形象问题，并增强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合法性的途径。这是他们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根本所在。记者和其他白领阶层如教授、医生、科学家及律师一样，凭着有道德地、客观地运用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技能，建立自己的职业工作者的地位。格雷厄姆·奈特（Graham Knight）指出，新闻客观性和专业主义的培养与新兴的工薪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出现密切相关。相对于以往独立的商业生产者中产阶级而言，这个阶级受雇于官僚式的大机构，它的工作方向和事业是建立在客观性和合乎它的事业道德规范的中立思想的基础之上的。<sup>76</sup>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说，“在现代客观新闻及它所需的甘愿献身于挖掘真理的记者被成功创造出来之前”，报道还不能称为是一种职业。<sup>77</sup>

现代商业媒体既是商业性机构，又好似政治性机构。因此记者们为两个雇主服务——商业利益和真理。追求专业主义和客观性使记者能够突出强调他们工作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作为第四权力，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同时还可以淡化和隐藏记者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的雇员的身

份。它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心理安慰、社会合法性,以及为新闻与商业利益之间不可避免的妥协建立起某种绝缘机制。<sup>78</sup>

因此,客观性增强了记者独立寻求真理的职业形象,这是符合记者的社会和心理需求的。这种看法绝不是对他们的正直和诚恳抱有怀疑,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同样适合于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和严谨的学术规范。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职业心理学可以解释客观性理念长盛不衰的原因。我们重申,客观性理念要在一个组织性环境中培养出来。拥有复杂的所有权结构和控制结构的大型传媒公司已经取代了以往家族所有的小型公司。直到最近,所有权形式集中和市场垄断的形式才相对稳定下来。这种稳定性意味着鲜有发生财产权交易,以及产业所有者直接(有别于潜在方式)干预编辑日常决定的行为。而这些均增强了记者与雇主之间的隔绝感。这种“隔绝感”几乎使得人们真的相信新闻是对真理无私的追求。当产权的影响因关闭和所有者粗暴干预等行为变得明显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又有看破红尘之感。<sup>79</sup>

所以,新型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和康拉德·布莱克因干涉主义作风而触怒了许多新闻编辑室的事情一点不令人吃惊。<sup>80</sup>这些人轻易获得媒体,他们生硬地行使所有权,他们干预编辑室的行为,他们对所拥有财产的经济指标的兴趣和他们对严谨的新闻思想所表露出的不尊重,所有这些都深刻地暴露了隐藏在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记者们)之下的经济力量和权力关系。举例说明,罗伊·麦加里(Roy Megarry)于1989年对《环球邮报》所做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新闻界的严厉批评和反对。<sup>81</sup>作为对新兴的《金融邮报》竞争的回应,这种改变被批评家认为是“糟践报纸”。加强商业报道,抛弃劳工口,强化管理层的报道,以及任命唯麦加里马首是瞻的商业报道的高级编辑,这些措施都被看成是以牺牲《环球邮报》的客观性和全国性报纸的地位为代价去迎合商业团体的行为。大卫·海斯(David Hayse)虽然对麦加里的管理成就表示肯定,但还是提到了那些视《环球邮报》为文化机构的批评者在麦加里做出减少低回报的农村地区的发行决定之后的反应:

这就是麦加里崇尚理念的一部分吗?牺牲那些不属于广告社会的理想消费者的明智读者,而使《环球邮报》迎合富有的城市精英们?《编辑与发行人》4月号上引用了他的话:“到1990年,大量发行的日报出版商们将最终停止说他们从事的是报纸生意这样的自欺欺人的话,而不得不承认他们主要是在从事登载广告信息的生意。”<sup>82</sup>

在记者们听来，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是指甲刮在黑板上一样刺耳。“《环球邮报》要变成加拿大的《华尔街日报》了，”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哀叹道，“这是一份专为这个社会一小部分广告消费者设计的通俗又肤浅的杂志。”<sup>83</sup> 这声哀叹似乎在暗示：在自治的职业记者手中并声称为整个大众服务的《环球邮报》，从前表达的是一个真正广泛而客观的观点。

## 客观性消亡了！客观性万岁！

我们不能同意那些认为客观性陈腐、过时的记者和学者的话。加拿大一名颇受人尊敬的新闻工作者兼教育家曾指出，新闻业在它的全部历史中曾经历过一次世界观上的根本变革。“近几十年，它经历了一次革命性过程，就像相对论给物理学带来的影响一样。”彼得·戴斯巴拉茨(Peter Desbarats)写道：“如同科学家丢弃了绝对时间的观点，记者也失去了对客观性价值这个新闻业中的恒定值之一的信任。”<sup>84</sup>

仔细分析，这个论断未免缺乏说服力。首先，戴斯巴拉茨把客观性定义得很狭窄——即一架“中立的照相机式”的新闻姿态，一部“五个W”的机器，一名记录下新闻人物讲话且不掺杂任何主观偏见的速记员。<sup>85</sup> 他很怀疑，这样的工作是否能产生出真相。而且他也没指明客观性是被什么东西所代替。他的话确实反映了记者中广泛流传的对客观报道可能性的不信任态度。但是，我们必须在新闻工作者的个人疑虑和信仰与机构性程序和规则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因为程序和规则会严重影响新闻实践及其产品。记者们可以否认客观性存在的可能，甚至可以避而不谈，但是作为新闻业的一条常规性原理，他们不能简单地将它抛弃。1992年版的蒙特利尔《公报》(Gazette)手册的序言中阐述道：

“如果你想展现你的创造力，你的深奥微妙，或是你的渊博常识——又或者你期望将人类引向世界和平，全球仁爱——那么你就选错了工作……保持缄默与冷淡，避免过分熟悉……避免使用能表明你态度的词语。只告诉读者你所知的。让他们去体验。他们有权得出自己的结论。你的工作就是决定要说什么，仅此而已。”<sup>86</sup>

而且，戴斯巴拉茨本人的一些观点表明，在新闻编辑室内，即使客观性行同行尸走肉一般，它仍令人敬畏、令人服从。他承认：“如果记者们更善于辩明他们自身的偏激意见，这种行为只限于私人场合。在公众场

合,新闻必须保持中立态度。”但是如果客观性确实消亡的话,那么为什么倾向性仍必须被看成是见不得人的事,被隐藏起来,只能泛泛而谈,而不能详细说明?戴斯巴拉茨坦承:“报刊读者和电视观众……仍旧期盼着客观真相,或至少是为接近事实所做的努力。”<sup>87</sup>这是个重要的观点,因为商业媒体如果要吸收有利可图的观众就必须尽量满足(至少避免违背)观众的期望。

在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中,客观性是行将就木,即使在新闻学领域,它也病入膏肓。<sup>88</sup>许多记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记者,是以嘲讽的眼光看待客观性的:它不是个人所能接受的理想模式,而是一套让人遵循的机构规则和条例。不过事情确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一名杰出的传媒社会学家会把新闻机构称为美国最强大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后堡垒,为什么戴斯巴拉茨的一位书评家会因为客观性仍在迫使着记者遵循它的规则而把客观性称为“不死之神”的原因。<sup>89</sup>

我们还要对另外一些给客观性理念过早贴上讣告的人提出异议。记者们已发现客观性是一个过于广博、过于不凡并且不可达到的理想境界。相反,他们喜欢追求公正、平衡、可信这样比较朴实的目标。1980年,资深记者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声明:“公正,要;平衡,要;但客观性,不要。”这个声明已经真正成为了职业宣言。诺尔顿·纳什(Knowlton Nash),CBC全国电视新闻的老牌主播,亦言道:“客观性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观点和倾向性,但是我们尽力做到公正、平衡。”皇家报业委员会也认为:“由于麦卡锡主义的糟践和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者们揭露客观性是媒体与当权者的同谋关系的虚假中立的遮羞布,客观性已名声扫地被公正性所取代。”<sup>90</sup>

在某种程度上,“公正性”确实意味着,新闻实践在微妙中开始对新闻判断中的主观性产生了更多的认同,因为总要有人来决定什么才是公正的报道,什么人才应受到公正的报道。作为前提,这种报道方法先假定“记者是有偏见的,当他们在追求新闻报道的准确与公正时,就不得不辨明并考虑到这些倾向性”。<sup>91</sup>实际上,解说性新闻,调查性新闻以及伪叛逆性新闻,使新闻实践从不加批判地报道官方言论的形式中脱离了出来,而那种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报道被一些评论家相当狭义地等同于“客观新闻”。但总体说来,正如一位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富有说服力的争辩所揭示的,“公正性”像是新瓶装旧酒。<sup>92</sup>它基本上没有改变新闻工作的实践内容,也没有解决批评家们有关感知存在于客观性中的问题。公正性仍然暗示了同样的旧论断——新闻基本上说是公平的,独立于特殊利益集团



的。公正性在实践中常被定义为使复杂事物一分为二,并给予它们大致相等的机会,其实公正性可以概括为客观性的抽象理念的组成部分,而非客观性的替代品。它与最新流行词“可信度”很雷同。为了让观众认为可信,并进而接受新闻报道,那么报道本身就必须切实体现准确、公正、公平的特点。

新闻文化中针对客观性理念的无休止的争论表明,记者的认可不能看成是客观性观点存在的唯一原因。在下一章里,我们认为社会关系和结构“逻辑”,使得客观性不仅成为一种职业理念,而且形成一种机构化的体制。

# 机制逻辑：为什么维系客观性 还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1900年前后，日报作为世界上最初的大众传媒业已成型，报业已成为一项产业，新闻成为一种产品，它的生产者是被商业逻辑所主导的传媒系统。这种商业逻辑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维多利亚时代通俗报纸开始扩大它的发行量以吸引广告商，它就演化成为大规模的以增长为动因的整合性组织，以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为主导的“消费新闻业”在20世纪初成为主流。<sup>1</sup>与此同时，技术发展和日益增长的发行量，使得新闻出版业变成资金密集型和高成本型产业。

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代，随着广告收入萎缩和登广告者被更大的，甚至是大一点发行量的报纸所吸引，一些报纸无力支付日益增长的成本。那些拥有众多广告客户的报纸把赚来的更多的钱用于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广告客户。于是，小鱼要么死掉，要么被大鱼吃掉，而报业又面临新的来自广播和电视的竞争。

20世纪20年代以后，广播技术使北美包括新闻在内的传媒业产生了变化。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方式，广播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加拿大，广播业的发展最先是被私人或美国公司所控制。

但从1932年开始，公营的加拿大广播委员会开始主导广播业的发展。在1932年，CBC代替了加拿大广播委员会。作为一种新闻媒介，广播业一直处在印刷业的阴影之下。但在二战的时候，广播的时效性吸引了大量的听众。至今，CBC广播仍然是重要的全国性新闻媒介，但总的来说，70年代以后，新闻报道在私营广播电台中走下坡路。<sup>2</sup>而且，全国广播新闻网（CBC除外）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网所替代。电视在50年代成为大众媒介，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它已成为北美观众的主要新闻来源。

由于时效性和显而易见的真实性,广播和电视极大地影响了大众对新闻的期望值。同时,广播和电视在全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有限的频率资源,使它们更多地受到政府法规 and 政策的管制,而且 CBC 还是在法律规定的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前提下由政府资助和拥有的。尽管 CBC 和影响更小的美国公共广播系统(PBS)是个例外,北美广播电视业也是被与报业相似的商业逻辑所主宰。它的目的在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后把这些注意力只卖给广告商。

## ◆ 加拿大今日的报业集团

尽管观众认为电视是他们主要的新闻来源,一些“精英”日报和建立在报业基础上的新闻通讯社,如加拿大通讯社,仍然影响着整个传媒系统的议程。这种影响在全国内尤其明显。

在 20 世纪,加拿大日报业发展了其显著的结构特色。这其中包括它更多地依赖来自广告商而非读者提供的资金,以及它在地方市场的垄断倾向。大部分城市没有相互竞争的日报,所有权是集成的。即报业由在不同城市拥有报纸的连锁公司控制。并且,报纸更多地由大企业集团,即经营着不同产业的集团公司所拥有。这些特色不是恶意阴谋的产物,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运作的商业逻辑的副产品,它也是把新闻自由定义为不受政府干预的法律构架的副产品。

连锁报业公司在 20 世纪初的加拿大出现。早在 1912 年,萨斯姆集团已经控制了哈密尔顿、渥太华、卡尔加里和爱明顿的重要日报,从那以后,报业的集中从未停止过。在 90 年代中期集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许多年里,萨斯姆和汤姆逊两大集团一直控制着加拿大报业。直到 1996 年夏天,政治上极端保守的康拉德·布莱克,在买了一打汤姆逊报纸和在萨斯喀彻温的一家报纸连锁公司后,吞掉了加拿大最大的萨斯姆报业集团。而那时萨斯姆正在咀嚼着自己刚于 1996 年 2 月买下的一个南安大略的报业集团。到了当年年底,布莱克的公司霍林格在加拿大 104 家日报中占有 58 家,加上它在美国、英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拥有的报纸,成了世界上第三大报业王国。

加拿大三个头号报业集团控制全国报纸的 72% 的发行量。<sup>3</sup> 不拥有其他日报的公司出版的“独立”报纸少到几乎没有。英语加拿大最重要的独立日报,《多伦多星报》也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它的母公司,多士达集团是一个拥有 27 家多伦多社区报纸和其他产业的多媒体的大企业

集团。

报业的集中在特定的地区更为显著。除了著名的《责任》(*Le Devoir*)，魁北克的所有日报都保罗·德马雷、康拉德·布莱克和皮尔·皮拉多三分天下。而拥有 300 多家公司的庞大企业集团——欧文家族，完全控制了新不伦瑞克的 4 家英文报纸。

连锁报业集团的诞生有多种原因。与独立报纸相比，集团化经营更容易获得资本和现代报纸所要求的行政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集团还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更容易吸引全国性的广告商或批量买进新闻纸以减少成本。它们雄厚的资金使它们能对亏损的报纸进行改造，使其扭亏为盈。雄厚的资金还能保证工人罢工期间报纸的生存，并通过减价击垮与之竞争的独立报纸。<sup>4</sup>

当报业集团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时，地方报业市场中的竞争开始减少。拥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有 5 到 6 种互相竞争的日报的黄金时代，如同无声电影和 T 型福特轿车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加拿大日报的数量在 1913 年达到最高峰，有 138 家。1914—1922 年间，其中 40 家被追求更高市场利润的竞争者吞掉。到 20 世纪，大都市的报纸已被认为是一种连锁性私有商业实体。它不受政府管制和限制，如果管理得当，效益极好。<sup>5</sup>

今天大多数加拿大城市仅保留了一种日报。在一些市场中仍有两种以上的日报，其中一家是典型的萨斯姆报纸——一种希望得到尽可能广阔市场的综合报，另一种是小报（主要属多伦多太阳报集团），读者多是工薪阶层和一代倾向于电视传媒的消费者。这一市场格局的另一端是《环球邮报》全国发行版，它拥有可靠的国际和商业信息，适合高层读者。尽管报纸为了广告资金而与其他传媒竞争，与 20 世纪上半期相比，在本产业内部却较少直接对读者和新闻内容竞争。

一旦一家报纸打败了一个竞争者，取得了垄断地位后就很难垮掉。典型的情况是由于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它会取得较高的利润。因为接收了以往竞争者的读者层，获取的报纸可获得更多的读者，收取更多的广告费用，而不用大量增加生产和发行的费用。并且，由于新开办报纸成本很高，而且很难把读者和广告商从现有的报纸中吸引过来，垄断性的报纸在市场的地位很难被动摇。

从垄断市场中获得的高额利润经常成为报业集团扩张的资本。从经济理性来看，一个公司调动垄断利润的最好办法不是对现有的报纸追加投资，而是开始购买其他报纸。这样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发挥现有的技能、资源和规模经济的作用。<sup>6</sup> 报业的高额利润对那些利用报纸作为赚钱机

器来扩张企业规模的大集团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

相反,连锁经营有时直接加快垄断的进程。这是由于互相竞争的报业连锁同意,互换它们在不同市场中的股份。加拿大新闻业的“黑色星期二”提供了一个这种交易的极富戏剧性的例子。1980年8月27日,萨斯姆关掉《论坛》以保证汤姆逊所有的《自由报》在温尼伯的垄断地位,而在同一天,汤姆逊关掉《渥太华杂志》(*Ottawa Journal*)让汤姆逊所有的《公民》(*Citizen*)独自在全国的首都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因此,无束缚的商业逻辑导致了以所有权集中和市场垄断为特征的报业结构。并且广播电视传媒也没有提供与报业的垄断逻辑和商业定义不同的另类选择。报业以赢利为目的,以靠吸引读者来吸引广告商的商业逻辑在广播事业中占主导地位。加拿大广播电视和通讯委员会的法规和公有的CBC的存在仅轻微地调整了这一制度的商业逻辑。私有的广播电台拥有雄厚的资本和观众。它们比印刷媒体更多地依靠广告收入。例如97%的加拿大英语区的商业广播电台的收入来源于广告费。

而且,虽然按照规定CBC得提供非商业性节目并且这一类节目在广播网中收效颇佳,它还得迎合一种由北美商业媒体建立的大众交流方式。CBC还必须争取更多的受众以赢得每年议会的财政拨款。它的电视网络部分依靠广告收入,为了使部分观众更能收看到它的节目,它还得依靠私营电视台来传播节目。CBC的商业压力还在加剧。由于1996年冬天最近的一次削减计划,广告被引入了CBC全国电视新闻节目。随着一系列的资金缩减使其运转陷入困境,甚至危及它的生存,CBC提供非商业性节目的有效能力正在受到挑战。

付费电视服务的出现是对商业逻辑的另一个潜在的限制。根据它的支持者的不同,付费电视通过媒体节目给予它的用户以更直接的权力,特别是在节目点播中。观众能选择各自的节目,不是随便看任何一个频道都可以,但这些机制并不能完全避免商业化的倾向性。富有的用户拥有更多的权力。但即使他们的金钱也不能改变电视节目的单调性。因为高额生产费用必须通过一个广阔的市场来进行补偿。虽然加拿大的观众能收看到以亚特兰大为基地的有线新闻网络(CNN),但像传统的电视网一样,CNN的新闻还是以吸引最大的观众群为目标。

因此,尽管公共广播的地位得以维持——加拿大占主导的体制形式是私有的、集团化的、建立在广告之上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但总的来说是赚钱的传媒组织。虽然像康拉德·布莱克和美国的鲁珀特·默多克这样的所有者或许会部分地回到明确的党派新闻的时代,多数传媒组织由大

企业集团或股东拥有。他们更多地关心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新闻或政治——除非这些与他们自身的商业利益紧密相关。换言之，新闻媒介的集团拥有者对时局有一定政治兴趣，但已不像党派新闻时代那样对新闻造成那么直接的影响。市场结构和商业逻辑，而不是党派新闻性，成为新闻制作的首要环境。

## 商业逻辑对新闻内容的影响

不论是在广告市场上的吸引受众还是新闻编辑室里制作新闻，新闻媒体的政治经济与客观性精神指导有着重要的联系。在概念上有所区别但相互作用的主导商业逻辑，即成本最优性、非党派性、非政治性、消费主义、进步的另类选择的边缘化、专业化和合法化，促进了客观体制的形成。

从主宰报纸生产的企业集团的角度来看，新闻是从市场获取利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和政治形式。任其所好，这一系统的逻辑是将新闻便宜快速地卖给消费者，然后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只是一种用来吸引消费者的副产品。从一个严格的商业观点来看，报纸是被向广告商提供尽可能多的版面而驱动的。相反，虽然新闻是一种把读者吸引到广告那里的必需品，但它是一种尽可能经济地产生的商业成本，而不是直接的主要收入来源。报业上有一个叫做“新闻洞”的术语，意指把新闻版面看作是未被广告填满的空间，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反应。<sup>7</sup>

垄断的报纸虽然大都效益很好，却仍然特别注意削减编辑花费，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动力使它不这样做。如果你已占领了整个市场，而且没有对手与你抗衡竞争，为什么还要多花钱雇更多的记者，或对事件进行更精细的调查？

那些更多地花钱，在吸引读者的所有者最容易被不太慷慨但赢利性更强的竞争者吞并。以他们的新闻特征为标准而自豪的家族所有的公司被股份制驱动寻找最大短期利润的公司所兼并。加拿大曾经威赫一时的萨斯姆因其慷慨的编辑花费而受到1980年皇家新闻委员会的表扬。现在到了精于计算的康拉德·布莱克手上后，这一公司似乎在走另一条路了。布莱克和他的同伙大卫·拉德由于大量裁员从报纸中榨取的高额利润而在该产业中成为传奇人物。具有征兆意味的是，他们在1996年接管萨斯喀彻温和里加那日报以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解雇182名员工。<sup>8</sup>

这种削减对新闻编辑的普遍质量有着明显的影响。根据成本最优化

这一主要原则，新闻取向更多地建立在一个狭义的客观性基础之上，即直接的事实报道。直接事实报道一般是被动的，通常来自于具有合法地位的新闻源的声明。这样的直接新闻比调查性新闻在制作上更便宜，在法律上更安全，因为调查新闻要花费更多的编辑记者的人力和物力，并要冒更大的被起诉的风险。

当然，连锁集团也对新闻的质量和多样性进行资金投入。凭着它们的资金和实力，它们有时将周报改成日报，改进过时的报纸技术，或者建立独立报纸力所不能及的新闻通讯社如萨斯姆新闻社。但连锁集团也因趋同威胁到新闻多样性。趋同不仅仅是风格问题，而且也是新闻内容和编辑立场问题。连锁报业把某一编辑立场强加于所有的报纸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虽然他们没有经常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出于更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连锁集团通常用集团自己的专栏作家取代本地作者。甚至在报业连锁集团化年代以前，加拿大新闻通讯社就致力于帮助规范新闻报道。

广告对新闻报道的雷同也有微妙的但很重要的影响。由于日报对同样的读者进行竞争，它们通过追求最大公约数的办法来使新闻迎合核心读者群。商业报纸对忠诚的专门读者层并不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对广泛的读者群感兴趣。这正如一名学者所说：“因为报纸主要被当作一种商业经营，很少将重点放在它们理应包容的‘别的东西’(something else)上，寻找读者群中的中间观点就成了一种趋势。自从大众报业来临之后，一直有报纸内容雷同的内在趋势，正如政党只有转向中间派以尽可能地扩大其支持者范围的趋势一样。因此，经济效益原则取代了多元化的政治原则。”<sup>9</sup>

为了争取更广泛的受众，使内容雷同的经济驱动力在商业电台和电视网络中表现更甚。其理由包括电视节目的高额制作成本，电视在面对大众而不是精英或特殊群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流动”的传播逻辑。电视的“流动”逻辑把它置于在任何时候都得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合适受众群的严酷压力之下。相反，报纸至少能设置专栏以满足不同读者群的需要。

与趋同相反，经济压力也助长了新闻非党派性和非政治化。首先，正如在第一章所看到的，在报纸上公开表明减少政治倾向是与报纸转化为政治上独立的商业实体紧密相关联的。19世纪客观性观念既是一个政治姿态，也是一种商业逻辑驱动。为获得更多的读者，报纸很难继续首要地成为政党的喉舌。为了获得大量潜在的读者群，新闻得被认为是公正的才行。<sup>10</sup>

同时，拥有经济头脑的报业老板意识到一份报纸应该面面俱到，仅有

偏执的政治内容是不够的。在便士新闻的领导下,主流报纸减少了政治含量,而将注意力投向对犯罪的报道,及有关上流社会和有人情味的故事。这不是说新闻不再有政治的价值取向,例如像犯罪这类题材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这只是说,表现在商业媒体中的政治价值取向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具有霸权性(主导且一致),它不再是明确昭示的、刺激性的和具有党派性的。

伴随着这种相对的“非政治化”的是对“事实”报道的强化。这种做法与那个时代的经验主义相关联。当《纽约时报》声称它只发表“事实,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和语调来使各党派的人士都依靠它的陈述”时,它不仅是在对民主理念进行承诺,即为公众启蒙而提供广泛的可获得的事实。<sup>11</sup>它同时也在陈述一个明智的商业举措——向广大读者出售一种叫做“新闻”的特殊产品。在这种情形下,事实成为新闻的代名词。就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其他商品一样,它们摒弃了产品来源和特殊性。它们逐渐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对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普通的吸引力,是各党派人士都会掏钱来买的东西,它们被自然化,成为一种超越人工雕琢,不再被人怀疑的东西。

与这种“非政治化”相对应的是消费主义。德拉斯·史迈斯(Dallas Smythe)认为娱乐和信息,我们通常认为是媒体的主要内容,仅仅是把读者引向更重要的内容——广告的“免费午餐”(在西方的一些酒吧里,老板用小点心来吸引顾客只是为了销售更多的酒)。<sup>12</sup>这种免费午餐不仅要吸引到适量的具有一定人口特征的受众,还得使受众得到涵化,使它们具有能适合接受广告信息的心态。

这一商业逻辑对新闻的影响虽然微妙但却十分深渊。要清晰地讲述故事,讲述人必须对听众进行假定预测——他们知道些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有什么价值取向。这对新闻和其他话语同样适用。商业新闻不再假定它的读者是某个政党或派别的追随者,或甚至是政治生活中的积极参与者,相反地,它们更倾向于将受众定位于整个国家的公民,把他们当作是政治的旁观者,或许首先看作是消费者。在加拿大日报中,“新闻”与广告在服装、生活、家居、旅游、运动和休闲等版面中相互融合,这就使消费者的定位和叙事倾向表现尤其明显。甚至可以说,硬新闻也与广告有互补性。在对新闻的选择和协作中,迎合核心市场的商业报纸倾向于从假定的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出发,比如,在报道劳资事件,劳工报纸也许会把侧重点放在罢工对劳动阶层的影响上(如增加工资,改进工作条件等),而立场明确的商界报纸会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也许会把侧重点放在



罢工对投资机会或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因此,追逐大众市场的新闻的非党派性和非政治化不能与绝对的政治中立和不带任何政治观念混为一谈(虽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实际上,商业逻辑的一个相关的结果是新闻中进步的另类观点的边缘化。19世纪的新闻向以广告为基础的商业实体的转型,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新闻控制形式,广告商成了“事实上有颁发新闻执照职能的权威机构”。<sup>13</sup>

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削弱了激进新闻业,助长了一种为更保守的客观性版本,使新闻内容偏离激进的民主启蒙话语,而倾向于平庸的、淡化政治的非党派状态。首先因为,大广告商不喜欢自由的激进的“左派”观点,怕它们会挑起对大商业集团的质问。<sup>14</sup>报纸通过在社论、新闻删选和新闻调查中减弱自由派或激进派的声音达到吸引观念保守的广告商的目的。例如当蒙特利尔《广告商日报》在1838年那样的政治比较两极化的环境中表达自由派观点时,该报由于丧失广告来源而倒闭。<sup>15</sup>

除了自身政治利益之外,广告商青睐于那种最有效地促销其产品的报纸。譬如,家用产品的广告商想吸引的是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广大消费者,尽管后者购买能力较弱,但他们为数众多,在数量上适度地弥补了不足。那些减少政治言论,强调人情味的报纸往往更容易吸引到大量读者。

其他广告商追逐的不是通俗报纸的大众市场,而是那些拥有政治上较保守,但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的“高档”报纸所提供的市场。这些“高档”报纸是倾向于反映其商业和职业读者的保守立场。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报纸放弃了客观性信条。由于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它们包含了它。实际上,客观性仍是它们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而且它们往往被看成是卓越而客观的新闻标准的确定者。尽管像《环球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倾向于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中最有既得利益的富有的读者群的报纸,新闻似乎仍是客观的,尽量避免持续青睐于某一个政党或利益集团,报道双方的观点并声称代表公众的利益。由于客观,一份精英报纸的声望就得到了提高。这样,19世纪激进的工人报刊被驱赶到市场的边缘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皇家报业委员会所说,“当商业主义在强化时,左翼观点容易被弱化”。<sup>16</sup>

受产业逻辑的驱使,新闻规模的增大,从业人员的专业化进一步减少新闻报导中的党派性。在复杂的新闻组织中,新闻不再是个人生产的产品。业主、经理、编辑、记者、专栏作家之间的劳动分工,意味着“维持一种

政治口径，成为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sup>17</sup>并且，职业准则，例如客观和新闻价值的标准为新闻从业者抵制业主的党派性提供了某种保护。当然，商业报社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组织，从业记者的独立性没有法律或职业的保证，并且当与野心勃勃的乐于干涉的老板发生冲突时，他们的独立性也不被承认。不过，公认的标准仍保存着，部分原因是它们使新闻组织能有效地运作，在截稿期持续的压力下，新闻从业人员不可能经常质疑或修改一些基本准则。

除了经济驱动外，20 世纪的报业集中和垄断的加剧，使得客观性成为政治合法化的手段。集中和垄断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越来越少的新闻公司来获取对日常事务的详细报道。这一现实使原有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关于通过丰富多元的党派报纸集团来提供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意见市场的观点过时了。

因此，报业老板有时害怕政府或许会干涉以恢复竞争或规范报纸，正如政府在其他领域所做的那样。在加拿大，新闻业 1980 年的“黑色星期二”和之后的皇家报业委员会报告的发表使这种威胁变得相当现实。虽然政治家们最终没有按该委员会的报告去做。这个报告中的调查结果确实在短期内将公众主要注意力聚焦在新闻垄断和集中上。这凸现了新闻机构同时作为政治民主的公共信息重要提供者和私有的谋求利润的商业实体潜在的利益冲突。客观性原则有助于商业新闻媒体从这种两难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对它们作为重要的非官方的政治机构提供了合法性。媒体可争辩说，新闻是由独立自主的新闻从业人员创造的，他们是摒弃了个人偏见的。如果他们的新闻被认为是客观的，只从每位民众而不是特殊个体的视角来说话，传媒集团的私有性和商业性将不再值得公众的关注并不再成为问题。至少，媒体业主是这样希望的。

因此，对新闻客观性的标榜，使新闻业主对公共领域的寡头式政治控制合法化，有效地防止了政府的干预，以及来自激进的“另类选择”媒体的有效竞争。当然，客观性原则也不仅仅是狭隘的政治经济自我利益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某种特定的新闻模式之间，没有必要非得有什么联系。例如，对新闻客观性的承诺在北美比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更甚。西欧的报业市场结构，加上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新闻政策，为公开的党派报纸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同时，媒体组织的政治经济本身也能导致新闻话语形式的政策和不同媒介之间的变异，从而形成客观的不同表达形式。新闻的“新闻特性”和“娱乐特性”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虽然质报和公共广播为新闻历史性

地设置下理想的标准，而且加拿大也没有在 20 世纪初尾随英国和美国发展起通俗小报，娱乐式新闻还是找到它应有的位置。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像《多伦多太阳报》这样的小报在加拿大市场中就挤掉了中档报纸的一部分市场，有了一席之地。这些报纸不是通过不带感情的信息、事实和平衡来赢得读者，而是以一种为大众说话，从被认为是“常识”的角度来讲话的方式来吸引读者。这种报纸所体现的客观性是 19 世纪通俗新闻的客观性版本的一种继承。

除了商业报纸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之外，技术发展和国家的广播以及新闻政策也强化了客观性。客观不只表达媒体集团的利益，它已成为传媒技术和法规的一部分。

## ◆ 传媒技术和客观性

电报作为一种传播新闻的方式，以及随后产生的建立在电报上的新闻机构，对客观性的形成至关重要。电报在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加拿大新闻系统中被广泛使用。电报的成本以及偶尔的不可靠性促使记者将他们的报道简化成提纲式的电报稿，去掉了描述性的修饰词汇和评论。并且，正如在第二章所见，电报是一种新型的新闻写作形式——“倒金字塔”结构的助产士。

随着 1866 年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电报成为洲际的通讯方式。新闻传播新的飞速发展促成了全国性和国际性通讯社的建设，而它们将新闻分送给不同的客户，与其他新闻机构相比，新闻通讯社经常被当作是北美新闻业直接的、忠于事实报道的标准树立者。通讯社成了一个新闻商品的批发商，为不同党派的报纸提供新闻。为满足它们，通讯社提供半成品式的中性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直接报道风格，这非常适应新闻通讯社的政治经济。

一些媒体学者将客观新闻的出现归功于电报和新闻通讯社。但对历史的这种解读过多地将重心放在电报技术之上了。<sup>18</sup>毫无疑问，新闻通讯社进一步瓦解了党派报刊体系，促进了商业报刊的全面发展。但那些将客观性的产生归功于电报的人，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即电报开始投入使用是在美国便士报声明它的非党派立场之后。<sup>19</sup>新闻通讯社是一个强加在本身就已注重对事实的直接报道的新闻采集系统之上的技术形体。<sup>20</sup>随着对新闻采写速度、时效的加快，新闻通讯社是商业新闻媒体的政治经济的一个符合逻辑的产物。

另一技术——广播的引入，也对客观性有着重要的意义。1938年，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对H. G. 奥尔士的《星球大战》的戏剧化改编产生了传奇式的效果，无线电广播的真实性和现实性也因之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广播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相信火星人马上就要侵入地球了。电视尤其给客观性准则带来新的层面。确实，电视新闻通过与印刷媒体不同的方法来构建客观性。在电视新闻中，关于世界的现实报道被视觉材料以及知名的主持人和记者的吸引力所渲染。传统的关于“平衡”的策略被个人化和视觉化，即通过观点不同的采访对象、戏剧性冲突场面中的双方、政府或反对派政客在议会上的相互责难、警察逮捕示威者等屏幕画面来表现。在印刷新闻中，陈述者通过尽量排除自己的主观性来尽可能准确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表现外部世界。<sup>21</sup>在电视新闻中，表现现实世界的“透明性效果”不是通过对陈述者的角色的排除，而是通过电视技术创造的错觉来实现。这种技术好像能使观众看到不经过媒介中介的“自在世界”。

电视新闻也强化了非党派性。尽管是个错觉，视觉的真实却给了观众以可信性，加强了使其他媒体在表面上避免偏见的压力。电视在表达人物、形象方面有优势，而在表现复杂的思想、社会机构方面则不那么得心应手。在一种商业化的媒体文化里，它使政治竞选成了对领导人形象的竞争而不是对现有的政治忠诚的动员。最后，电视新闻是在主要由娱乐节目组成的节目流中被消费的。因此，电视吸引的观众往往对娱乐而不是信息更感兴趣。在最近20年里，电视娱乐逐渐采取了一种嘲讽式的看透了一切的姿态。深夜“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也许最好地体现了这一定位。这种“态度”使任何政治承诺贬值和失色，更不要说鲜明的党性倾向了。

由于这些原因，一些观察者甚至将电视新闻传媒中的主导地位和作为政治机构的政党的影响力的衰退直接联系起来。<sup>22</sup>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电视加快了党派新闻的没落。它在更广泛的公众中将党派推向守势，推向对政党的合法性的谨慎和怀疑的态势。<sup>23</sup>

## 广播规则中的公平和平衡

除广播自身的技术逻辑之外，国家对广播的法规管理进一步加强了新闻的客观性准则。最明显的是，客观性尤其是其有限的平衡原则已成为传播媒体中新闻运作的明晰的法规性要求。报纸在成为大众媒体实业

之前就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广电媒体却是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管制。由于广播频道有限，它在法律上被认为是一种公共财产，广播运作受到政府法规的管制，并且在世界上有时部分或全部地被政府所拥有。在西方一些国家，典型的广播管理是由一个国家机构来执行的。以公共利益为原则，并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机制可以避免广播执照颁发中的政府的直接干预。

即使是在把自由资本主义几乎当成一种民族宗教的美国，广播执照从1927年就由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以“满足公众方便、利益与需要”为原则来颁发的。<sup>24</sup>商业新闻媒体声称的客观性和公众利益成为分配广播频道资源的标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广播管理机构就已经官方认同了商业广播对客观性的承诺，并将它们的视角看成是“中立”、“普遍”的视角。商业广播被看作是普遍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广播者。那些不为利润操作，不靠出售广告获取收入的电台，被当作是“宣传”电台，它们更感兴趣于散布独特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公共的信息。这种假设成为FCC在无线电频道的分配中倾向于商业广播的依据。<sup>25</sup>在私有商业广播系统正式成立之后，客观性精神以1949年FCC的“公正法则”的具体形式成为法庭判决和政府管制的官方标准。为了达到公正与平衡，此准则要求广播电视经营者就重要的公众关心的问题给不同的观点提供合理的讨论机会。<sup>26</sup>

这一《公正法则》没有在所有方面都平等地开通电波：广播电视机构在决定使这一法则运用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并且FCC自己否认有为共产党人或共产党言论提供时间的任何动机。<sup>27</sup>甚至在这些维持现状的保护性措施的伴随下，里根政府在1987年还是取消了《公正法则》，但这一具体的行动并没有在广播电视法规管理的指导思想领域里从根本上动摇客观性准则。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长时间并存竞争，这些曾以法规的形式对广播电视新闻所作的要求，又影响了印刷媒体新闻中客观性的理念。

相类似的是，平衡的概念在加拿大广播中也被当作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原则，并且影响久远。<sup>28</sup>例如，1968年《广播法案》要求广播从业者提供合理的、平衡的机会以便在公众关心的事情上各抒己见。<sup>29</sup>1991年《广播法案》保持了这种要求。并在保证男女平等，维护加拿大的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及土著民族的特殊地位等方面对电视节目以及广播业中的雇用情况提出了具体要求。<sup>30</sup>原则上讲，CRTC是在根据这些要求来评审电视机构的具体表现。

自 1986 年以来，许多 CRTC 声明，研讨会和听证会都赞同将平衡和客观性作为评价新闻工作的标准。这意味着承认职业记者是公众辩论的唯一代言人。<sup>31</sup> 像这样的官方性认可，进一步强化了客观性和以它为标榜的国有和私有传媒集团的合法性。诚然，CRTC 有时确实给媒体施加压力，同时它也维护了传媒集团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的合法化。这些集团无论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都有必要保持客观和对社会负责的表象。实际上，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法规的作用就不是很大了。电台也许偶尔会因违背平衡原则而受责备，但很少有哪个电台因没有遵守《广播法案》条令而被吊销执照。一些观察者认为，虽然无线电波段在法律上还保持着公共资源的名义，在实际的法规管理中它已基本被当作一种私有财产。<sup>32</sup>

实际上，与废除《公正准则》之前的美国相比，加拿大在广播电视法规管理中更强调平衡与公正的准则。首先，CRTC 倾向于将平衡原则用于每一个广播电视机构，而不是仅仅在整个广播电视系统中追求平衡。例如，在美国，不同的教派都能取得单独广播权，尤其是通过有线频道。<sup>33</sup> CRTC 否定了这种做法，它使加拿大的宗教广播节目包容多教派，这点在宗教方面的专业频道远见电视 (Vision TV) 上尤其明显。公营的 CBC 的边缘化程度远没有处于被商业逻辑统治的美国的 PBS 和全国公共电台 (NPR) 那样厉害。在广播事业发展的早期，加拿大政治、文化精英害怕一个像美国那样严重商业化的系统会有不太好的影响——太多的广告娱乐节目，不顾及教育，太多的来自加拿大以外的节目，加拿大各地区间节目交流太少，太多电台拥挤在利润丰厚的城区，而其他地方则没什么服务，以及如果任其自由发展，私营商业电台会有加盟美国广播网的可能性。<sup>34</sup> 出于这些顾虑，保守的本利特政府，在 1932 年创立公共广播。如今，CBC 被明令要在全国以两种官方语言提供不同特色的加拿大节目，为不同地区间的交流和共有的民族意识的培育作贡献。<sup>35</sup>

CBC 并不是生存在商业逻辑之外。如前所言，这一逻辑使节目内容趋同和相对的非政治化。但仅有商业逻辑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 1983 年的《新闻政策》手册中，CBC 明文规定客观与平衡必须贯穿于它的信息节目。<sup>36</sup> 对 CBC 来说，非党派性和明显的不依附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建立它自己持久的可信度和政治上的合法性。正如 CBC 一位前任记者所言，作为一家公营公司，“CBC 不能在政治上偏向哪一边，它不能被看作是倾向于自由党或保守党，否则它的生存就会濒临危险”。<sup>37</sup>

简而言之，正如杰伊·布拉姆勒 (Jay Blumler) 和迈克尔·加瑞维奇 (Michael Gurevitch) 所说，广播电视机构“被赋予了遵守非党派性，或许

甚至是反党派性的标准,诸如公平、公正、中立及客观性,而这是以放弃了其他诸如承诺、长期忠诚、立场坚定之类的价值为代价的”。<sup>38</sup>

## 新闻客观性和国家

尽管加拿大对印刷媒体没有明确的与《广播法案》相似的新闻政策,但一系列的法律确实影响了报纸的操作。原则上讲,一些法律使媒体采写新闻,自己决定新闻内容不受法律干涉成为可能。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保证言论和传媒自由的《人权宪章》以及联邦和各省有关获得信息的法律。相反,其他法律在某些范围内有限制新闻采写及传播的可能性:禁止仇恨文字及煽动犯罪、官方秘密、战争期间或国家紧急情况下的审查权、藐视法庭、报道立法程序、著作权、保护隐私及私人财产、国会特权,而最重要的“诽谤法令”使个人能起诉媒体(由于发表不属实的声明,这使她或她的名誉受到损害)。<sup>39</sup>并且其他一些规则也影响新闻媒体作为商业的操作。这其中有一些法律,包括加拿大所有权和在广播电视中有关加拿大内容的规定,以及反垄断的措施,都有限制媒体业主的权利和利润的潜在可能。其他一些法律,例如所得税法中用以鼓励兼并或禁止国外竞争的条款,可被看作是对加拿大媒体事实上的财政补贴。

不论它们是否支持或限制新闻自由,这样的法律都在自由主义中有明确的理论基础。原则上讲,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传媒的言论自由权和业主的自由经营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就像在被认为是对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的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之间,也需要达到一种平衡。这些重要的权利包括法庭有权不受干扰进行办案,保护市场的不受垄断行为威胁的公平竞争,国家有权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封锁或扣压信息。总而言之,这些法律加上政府想操纵新闻的非正式的公关措施,构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新闻或报业政策体系,它对媒体进行限制和施压,但也体现了客观性准则。

总的来说,以上的情形为媒体保证了正式的、法定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由。这样的表面上的独立性是客观性准则的关键,也是新闻的社会合法性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独立性基础上,人们普遍在自由民主社会的自由新闻制度和集权或极权新闻制度之间作了根本的区分。这种自由是以高昂的代价,通过斗争而得到的。

与此同时,客观性准则又非正式地将媒体推向国家的轨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客观性在处理新闻媒体和政客之间所起的作用来实现

的。政治家和官方人士需要接近媒体的受众,新闻组织需要一个稳定的、合法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接近高层官员和政治家的有效捷径(因他们提供被定义成新闻的东西)。反过来,由于遵守这些客观性准则,新闻媒体就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和保证了接近官方信息源而不必牺牲政治独立和中立的公众形象。<sup>40</sup>

新闻的客观性准则与惯例同时也给政客们好处,通常保证让他们频繁地接近媒体,取得在公众面前塑造政治形象和定义政治问题的机会。他们每次虽然不一定都能如愿,但是起码存在着机会。新闻业的新闻价值、真实性的标准同它的那些依附于有指定发言人和例会的官方机构的新闻采写惯例是互为条件的。<sup>41</sup>这些标准与惯例保证了官僚机构和官方人士有接近媒体的惯例与特权,因为他们提供的是客观报道所依靠的硬“事实”,可信的声明及背景材料。相反,来自非官方机构的材料被认为是软数据,没被证实的报告,或是不继续调查就不能当作严肃新闻发表的推测。<sup>42</sup>因为实行客观性就得阻止记者在严肃新闻中表明自己的偏好,其结果经常是记者传播的是新闻制造者(他们一般是政府官员)想传播的内容。新闻越是“客观”,它成为官方机构纯粹的传声筒的可能性越大。记者们经常把政治指责、树立形象的声明以及政治“试探气球”当作新闻“客观地”加以报道,也就是说,不加个人偏好。于是官员们通常将他们自己的看法和定义当作客观消息加以发表,而同时记者们也保证了有人向他们源源不断地供应经过精心加工的、适合他们的故事内容和新闻形式的“事实”和观点。当这发展之时,正如兰斯·贝内特(W. Lance Bennett)所表明的,客观性和政治就合二为一了。<sup>43</sup>

当然,这种关系并不总是得以顺利进行。客观的新闻并不绝对对保证政治权威在新闻话语中占上风,尤其在一些分歧很大的事情上,或者当自由民主模式的基本原则被践踏的时候。记者们也许会怀疑政客们的动机或把他们的举措放在负面语境里。由于想当然或忽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政客和记者们常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对立关系。在这一点上,客观性准则又为政客们提供了灵活且特定的辨认和抨击在他们眼里的记者们的过失行为的标准。带讽刺意味的是,自从党派新闻垮台后,政客们对媒体偏见的控诉,在北美公众生活中差不多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的攻击使一个独立和对立的新闻业的大众神话得以持久。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可以给媒体传播设置圈套;如果记者不顾这些限制他们就将冒失去关键新闻源的危险。因此,客观性使权威的信息得到可信地传播。并且,当这不起作用时,他们就打着客观性的名义,并想方设法地向给记者施压,从



而使他们就范。

而国家与存在于主流政治文化之外的异见新闻机构(非客观新闻)关系则又是另一种情形。在20世纪的加拿大,对媒体的合法镇压已基本不存在。可一旦被使用,它总是更多地涉及位于客观定义边缘之外的媒体。有时,极右派会面对犯法指控。例如,极端种族主义者厄恩斯特·曾德尔(Ernst Zundel)在20世纪80年代被指控(最后没成功),就是因为发行否认纳粹大量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实的小册子。更典型的是国家对付左翼媒体的行动。<sup>44</sup>加拿大共产党以及它的出版物多次被取缔。在专权的总理莫里斯·迪普莱西(Maurice Duplessis)的领导下,魁北克政府用《1937年帕得罗克法案》查封了它认为是“带布尔什维克或共产主义的性质”的出版物。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57年推翻了该法案。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的“地下报纸”经常被合法地骚扰。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左翼分子和期刊进行监视。当然,商业上的成功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这些都市小报不像当年敢刊登基督耶稣手淫的卡通那样咄咄逼人了。然而在90年代,警方因多伦多周报《现在》刊登分类性广告而指控它提供卖淫信息。但问题是主流日报中类似的广告却没有受到类似的指责。一些观察者注意到,多伦多警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这份报纸对他们的批评怨恨不已。<sup>45</sup>虽然最终指控被撤回,但警方的这种干扰对另类新闻有威慑的负面影响。

加拿大1970年“十月危机”提供了一个国家压制异见新闻的绝好例子。一名英国外交官和一位魁北克政客被一小股暴力分裂主义分子绑架。对此,皮埃尔·特鲁多政府宣布实施《战时动员法案》,并在全国实行新闻审查,不管有没有分裂主义的倾向,魁北克的政治活动分子、记者、作家都被置于这些压制之下。大约有450人,大多数既非恐怖分子也非恐怖分子的支持者,被逮捕拘留在魁北克监狱中约一星期或更长时间。<sup>46</sup>多数人没有被起诉,最终被释放了。对媒体的威胁不仅仅在魁北克,甚至涉及魁北克以外的校园报刊,因为它们那时正在考虑是否登分裂主义组织的宣言。

接受主流文化和政治规范的主流新闻更愿意声称它们是客观的,并被认为是客观的,所以它们很少受到法律的干扰也就不足为奇了。主流媒体和政府虽然经常在对法庭审判的报道限制问题上有争执,但它们很少在其他方面越轨招致国家来惩罚它们。

国家与新闻之间关系的另一层面涉及国家怎样使主流媒体取得社会合法化。通过法律条款和实践,国家接受媒体对客观性的声明并把“新闻

自由”定义为媒体业主的财产所有权。自从1982年以来,《加拿大权利和自由法案》将思想信仰、观点、言论自由及新闻和其他通讯媒体自由推上宝座,并规定这种自由必须在与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相适应的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行使。在这一法案被采用几年之后,法学家哈里·格拉斯比克(Harry Glasbeek)预言:现存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新闻,而不是勇于实践的另类新闻的特殊需要将成为实施新闻自由的准绳。格拉斯比克指出,这一《法案》关于言论自由的语句可被用于保护个人尤其是保护媒体不受国家控制,却不是保护个人或作为个人的保护者的国家不受私人利益侵犯。进而这种自由保护了私有新闻业作为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的特权。<sup>47</sup>实际上,言论自由被理解成新闻集团的财产所有权,而不是公民个人的人权。

随后的法庭判决证实了这一预言。因为新闻自由包括带偏见的自由,印刷媒体(与广播相反)并没有从法律上被要求做到客观或平衡。然而,这些概念经常被当作是公认的新闻职业标准而成为法庭判决的法律根据。比如,当加拿大或美国公民向法庭寻求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意见或反驳的机会时,法庭以记者们有制作“平衡”和“客观”报道的责任作为理由给予否定。<sup>48</sup>因此,即使没有明确的国家法令,客观标准仍与印刷媒体有法律上的关联。

当国家默认新闻机构的客观性声称时,它并没认可或是保护记者们相对于媒体所有者的客观与独立。除了一些魁北克劳动合同中的条款之外,很少有保护或支持记者不被解雇和相对于他们的新闻业主的独立。加拿大法律并不将新闻看作一项真正自由的职业,记者们享受不到类似医生或律师的自律的权利。

总之,无论是在加拿大成文的广播法规和不成文的新闻政策中,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传媒机构,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一种标榜,都被授予了合法的地位。负责传媒资源的分配的法院和政府管理机构或明或暗地把它们的条令、决定和指导性规则建立在客观平衡这些概念上。从劳工报刊的民主话语中诞生的客观性在美国和加拿大英语区已成为新闻知识产生的话语体制,而这一体制已融入主流媒体制度中,根植于它的技术机构、它的政府管理、政治及法律体系之中。<sup>49</sup>

## 不死之神：作为体制的新闻客观性

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对事实的客观反映以及观察者超然于被观察对象的信念已面临危机。<sup>1</sup> 新闻业也一样，不再如 20 世纪 60 年代巨变之前那么自信。现在，质朴的现实主义少了，对事实的不言而喻性的认可少了，更多的是怀疑感和讽刺感，更多的是对形式多样的新闻报道方法的容忍，更多的让记者有说话的余地。

新闻写作更为明显的解释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商业电视的娱乐需求和受众对简明易懂的定论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对争论双方的平衡描述，因为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人们试图克服自身的移置感和迷惑感。加拿大电视台(CTV)的《全国新闻》和温哥华的 BCTV 电视新闻的广告口号承诺：“让你理解你的世界。”在加拿大 1988 年自由贸易讨论期间，CBC 电视新闻接到收视者电话，要求电视网不要光是提供大量客观呈现的信息，而是一个确切的论断，即自由贸易是不是一件好事。正统的新闻支持者正感受着批评和不满的热浪，最近大量题为“捍卫客观性”的文章即是证明。<sup>2</sup>

客观性，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是一个极有争论性的概念，它有大量不同且有争议的定义。作为一种体制(如绪论所述)，它是一个多面体。一个研究小组已认定客观性有四种可能的含义：对记者主观性的否定；对争论中每一方的公正陈述；对争辩中每一方均等的怀疑；寻找能为某一争论提供背景的确凿的事实。每一种含义在记者中都有支持者。<sup>3</sup> 像众所周知的盲人摸象的故事，客观性的评论家和辩论者也一样对新闻客观性“真正的”或“本质上”是什么有多种定义——一套规则或固定的程序；一种态度或思想状况；一种用于回避批评的便利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值得追求

的或值得争辩的理想的东西。

我们认为它是所有这些东西。首先,它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一套新闻写作应瞄准的目标,即便这些目标永远也不能完全实现。这些理想不仅指导记者们采写新闻报道时采用的态度和方法,而且指导新闻报道内容本身。这些目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与新闻的认知层面有关,即它如实报道世界的的能力。在此,客观性精神要求记者遵循一定的标准,比如:

真实性——把观点、解释或评论与事实明确分开,报道中要引用有名有姓的资料来源,避免模棱两可和累赘冗长;

准确性——使报道忠于现实,或忠于其他可靠的对现实的说法,尤其在具体的事实上。

完整性——叙述的完整,提供理解新闻所需最起码的相关信息。<sup>4</sup>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应尽量讲出与报道相关的事实的真相。

其次,客观性要求记者们去追求另一套与新闻评价有关的规范化的目标,传播有价值的意义和解释世界的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记者应持一种超然、中立、公平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党派性、带个人偏见的、隐秘的动机和受外部利益的不恰当的影响。在再现一桩有争议的事件的各方面时,客观的新闻描述是公正、无私和平衡的。<sup>5</sup>

通过把这些标准与它们的对立面相比较,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些标准的规范化或评估性特征:谁会努力去做到不准确、不公正、有偏见或不平衡(或更糟糕,不可靠)呢?但是除了客观性的指导方针外,衡量媒体的表现还有其他标准,包括独立性、接近性、多样性、一致性及文化条件。这些准则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秩序——同样运用于媒体。<sup>6</sup>媒体客观性得到这三个核心价值观的关照。它和自由原则相关,也就是说,媒体的独立性是“不偏不倚和真实的一个必需条件”。同样,客观是与平等相关的——在对事实有争议时,对所有新闻来源,报道对象和观点持公平和不歧视的态度。<sup>7</sup>客观性也与社会秩序相关,因为带极明显的偏见的媒体制度可能在那些不满和受排挤的人群中激起政治骚乱。<sup>8</sup>相反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包括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力量)极大地影响着新闻报道中媒体应怎样做到客观、公正、合理。客观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标准。而总是与它的文化政治背景相关。<sup>9</sup>在战时,比如说,政府和受众对给敌国以平衡而客观的描述的新闻会表示痛恨,而记者也会对这种新闻感到不安(有矛盾心态)。

客观性体制的第一层面——其规范性，隐含着第二个层面——一种认识论，即一套对知识和现实世界的假定。客观性理念基于不同的、互不相容的认识论观点，一方面与事实的准确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平衡、中立有关。若新闻客观性被真正当作可实现的理想东西，它就意味着事实与价值，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的相隔离是可能的。原则上说，“反映世界”或“全真地捕获世界”也是有可能的。<sup>10</sup>客观性的这一层面意味着记者可独立于事件之外而不对其产生影响，并通过中性和适当的报道技能来向受众传递事实或事件本身的意义。这一层面同样意味着新闻可从一个普遍的角度，从“任何一个人”的视角来报道。

再次，客观性体制也包含一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这些具体的实践标准赋予了客观性精神的具体内容。<sup>11</sup>这些实践或操作程序随着时间的演变和转换，在不同的媒体间又有所区别。目前的惯用实践首先包括“报道性实践”。报道性实践规定了记者如何构建新闻。比如说，在选择对某一报道信息的提供者和评论者时，记者要寻找适当的线索：被认可的了解事实的人，也就是相关机构的公认的代表，或者是直接参与事件的人。客观的记者强调“新闻源的认识性，而非情感化的反应”，避免煽情主义。<sup>12</sup>他们注重普遍的体面和品味标准，采用纪录片式方法，以便“向大众转播他们能观察到或有事实作依据的东西”，以及“只有经可信的来源证实了的事实”。<sup>13</sup>客观新闻注意把可直接观察到的事实和言论或评价分开，后者局限于特殊的体裁，如专栏、特写、纪录片等。正如理查德·埃里克森(Richard Ericson)、帕特里夏·巴拉内克(Patricia Baranek)和珍妮特·陈(Janet Chan)提出的，那些明确显示一种解释性基础的历史性或说明性框架被排除在外。<sup>14</sup>

客观的记者淡化他们自己作为新闻叙述者的角色，这是包装新闻的标准模式。<sup>15</sup>印刷新闻是通过强调使用“透明的”或“中性的”语言来完成这种非个人化和常规化的模式的。据弗朗西斯·布拉(Frances Bula)所说，“明显的词组、形容词、副词，稍许的新异描写——任何能唤起对作者的注意或暗含某种主观评价的东西在硬新闻中均被去除”。<sup>16</sup>

这些“报道性实践”可与“编辑性实践”区别开来。后者包括对新闻中不同体裁的区分，为了严格将事实与观点隔开，观点被隔离到言论栏中并通过署名来表现。贯穿于客观性报道方法和编辑方法之中的是第三种客观性方法，即一种中立性的方法或普遍姿态，这部分是通过使用被动语态来体现的。通过这种方式，记者和编辑们将他们自身独立于情景之外，采用不偏不倚的观点，政治上作为中立的观察者，批判性地审查问题的各个

方面,并把他们同被报道的有争议的事实隔离开。这意味着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独立,包括不为自身有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新闻组织本身带来的压力所左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客观性看作:第一,一种目标或道德准则;第二,一种认识论;第三,一套实践或方法。我们还必须认识它的第四个层面——如第三章所述,它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的种种机构化了的体现。我们并不是说客观性本身是一种机构,而是说它是在特殊的机构框架中运行的,而且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而是参与了这种框架的组建。这种框架包括复杂的具备不同角色和部门的专业化新闻组织(市场营销和广告部、新闻编辑室)和具备适当技能和道德准则的专职人员。这些组织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权,在古典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家是对新闻自由的主要潜在威胁。这种假定的自主权因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得到强化,而广告收入来源和受众对商业媒体的支撑使它们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且不易屈服于来自国家的压力。(作为一个国营公司,CBC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性很强,但有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法律保证)

最后,客观性是有关新闻的公众话语中的一个活跃成分。它是受众对新闻期望的共识的一部分。因此,正如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提出的那样,它在公众对媒体的评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17</sup>通常,当受众批判个别记者或新闻报道存在偏见而不客观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强化客观性作为评价新闻的标准的特性。

作为一个观念集合体和一套操作实践,新闻客观性为构思、定义、安排和评审新闻文本、新闻实践和新闻机构提供了一个常规模式。这种模式的多样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显而易见。一项对意、德、英、美的记者调查发现,客观性对几乎所有的记者来说,都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职业道德,但不同国家的记者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有所不同。北美的英语记者强调媒体在一场政治纠纷中能公正地代表每一方的载体功能,而欧洲大陆记者强调透过竞争双方掩饰性话语的背后来揭示政治纷争的真相。<sup>18</sup>

客观性体制因此具有多重含义的多义性,在不同的媒体它有不同的说法,并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使其能够吸纳和包含不同的实践。而且,作为新闻业的主导体制的客观性的内聚力部分地来源于主流新闻写作里对不同体裁的区分。硬新闻记者通过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报道和平衡地报道有争议的观点获得新闻的客观性。特写记者可不必严格遵守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报道的原则——尽管业界谴责那些虚构人物或

从未见过的场景的做法。<sup>19</sup>这一行业注重让少量记者表达他们的价值观,发泄心中的郁闷,提供他们的诠释或挑起一场争议。报纸上的意见栏、电视上的观点纪录片、电台里的“脱口秀”、电视里明星专栏作家们唇枪舌战的谈话节目,如CBC的面对面(Face Off)和PBS的麦克洛夫林集团(McLaughlin Group),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尽管有这些体裁存在,媒体作为一个整体仍可以宣称客观,因为它提供平衡的各抒己见的机会,站在党派政治之上,且为大众利益讲话。不过,客观性体制还是创立了新闻体裁的等级制度,硬新闻占据头版或在每晚的电视新闻中占首位,而有感情色彩的特写、社论或来信不可能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中占据这样的优先地位。作为体裁歧视的一个例子,一些私营传播商成功地要求CRTC强迫CBC《新闻世界》去掉《这小时有22分钟》、《加拿大皇家空中幽默》节目。尽管这些受欢迎的节目讥讽公众人物和新闻事件,CRTC认为它们只是“娱乐性”的节目,因而超出了CBC《新闻世界》作为新闻性专业报道的特许节目范围。<sup>20</sup>

除上述之外,客观性说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新闻如何排挤、边缘化主观性内容,以及如何造成了新闻报道中的等级制度和盲点共存。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已对新闻与科学中的客观性作了深刻的批判。客观性掩盖了观察者的特定文化视角。从性别角度来看,客观性被认为“主要是男性的构建”。<sup>21</sup>它给予男性以特权,证明男性的观察更具备客观性。同样,深埋在表面客观的新闻中的解释,反映并强化了男权主义将女性视为被动角色的大叙事。而这种被动被认为来源于她们的生理、外表以及与男性的关系。

男权主义的概念深深包含于新闻话语中,这只需考虑一下硬新闻与软新闻的区别就很明显。从历史上讲,女性首先是以富有人情味的特写作者而非硬新闻或政治记者的身份进入北美主流新闻业的。有实证表明,富裕的男性白人继续是客观新闻的主要定义者,吉纳·柏利(Gina Bailey)指出:

故事和叙述都是围绕组织、团体来构建的。一般来讲男人都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家、外交家、企业经理、医生和律师,换句话说,只有极少数的杰出女性能够进入这类阶层。社会问题和大多数人生活、工作、结社和发掘生活意义的领域落入新闻媒介的后面区域,经常作为“人情趣味”成为女性主要出现的领域,当女性被头版头条报道,这经常是由于她们有些特别。……直到上班族妈妈打入新闻编辑部、关于虐待儿童的报道才开始出现;是一位女性记者首先把关于计划生育的报道推向报纸的头版“A

区”，这些都不是巧合。<sup>22</sup>

社会关于性别、阶级和种族的等级甚至在 CBC 中也是显而易见的。CBC 的新闻政策要求准确、完整、公平和全面必须“成为 CBC 信息节目的特点，并把它们作为最佳的客观和平衡的基石”。<sup>23</sup> 一项 CBC 国内电视新闻的调查研究发现 84% 的信息来源为男性，70% 具有精英职业，而 8% 的是少数民族。女性大多不成比例地出现在社会问题或软新闻当中。<sup>24</sup>

不过话语本身隐含主导倾向，它不是完全预先决定一切的。客观公正的意义和应用是经常斗争和协调的场所；客观公正制度之所以能持续下去，是因为它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提供了虽然不平等，但一定程度的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

## 众说纷纭：客观性作为协商新闻内容的一种资源

客观性不仅可以规范新闻制作，而且能起到规范新闻与其公众关系的作用。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一种通过它来商议争辩和衡量新闻内容与意义的共同语言。不管这一宣称多么具有欺骗性，试图影响媒体的内容或结构的利益团体，如果不是言不由衷地宣布接受新闻客观性的各种原则就不可能获得发言的机会。一些明确反对客观性原则的团体（例如那些公开斥责世俗的媒体破坏了天条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或是那些试图用媒体来宣传他们的政治变革观点的“左派”先驱者），会觉得很难获得公众对他们所做的媒体评论的信赖。

然而客观性及其各要素，诸如公正和平衡是一些模糊的概念，它们的意义和应用经常在相互竞争的社会利益集团中商议争辩。客观性体制的组成部分成了争夺意义和象征性权力的战场。那些寻求媒体表达机会或正面新闻报道的人，首先要宣布他们对新闻自由和客观性的一种坚持，然后通过能服务于他们自身目的的方式来定义这些概念。曾有一五角大楼官员谈到海湾战争的媒体战略时说，其目标是要达到“有利的客观性”。<sup>25</sup>

在参与这个任务过程中，利益团体能创造性地对客观性的多方特征进行阐述。组成客观性的各因素在特定新闻事件报道中是有磋商余地的。什么样的新闻行为是道德的？哪些新闻报道是公正平衡的，而不是带有偏见和歪曲事实的？谁是具有合法地在媒体公开发言的“负责任”的



新闻来源？在广播管理中，是什么构成了对社会议题的适当平衡？哪些事件对公众来说，是重要的且值得公正地去对待？

毫无疑问，受众在寻求这些有争议的问题的答案中是有一定的能动作用的。一些作者争论道：倾向（经常是无视客观性）是公众一种心理和认知上的状态，而不是对于新闻报道和现实世界关系的评估。注意到失败的米彻湖宪法协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控诉 CBC 的报道有失偏颇，一名叫兰迪·鲍斯威尔(Randy Boswell)的记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倾向在观者的心目中。”鲍斯威尔争辩道，倾向一贯被认为是一种以牺牲客观、公正、平衡的职业准则为代价的对事实故意的歪曲，“可以更确切地说，记者有偏见的报道经常以牺牲其他政治议程为代价而出现。由于真理的不可知性和公正、平衡像云一般模糊，对倾向的指控也逐渐消散在对某一主题的不同见解上。”<sup>26</sup>

这种观点适合于新闻记者和媒体主管们的口味。他们可以指着对某一报道的来自争论双方的有关偏见的指控说，这正好证明了他们不偏不倚适得其中。严格来说，这种辩护并不是完全合理的。相互对立的利益团体对新闻偏见的谴责不一定能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正如最近对加拿大各利益团体的一项调查所显示的，这种指责并不总是互相矛盾，且相对立的两方对偏见的指责均有道理。<sup>27</sup> 比如，右翼批评家对于媒介在社会和伦理问题，如堕胎这样的报道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指责与左翼批评家对媒体在经济和商业报道中有保守倾向的指责并不矛盾。右翼和左翼均指责媒体有偏见，并不意味着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和纯客观的。<sup>28</sup> 很可能一方比另一方更有理由。

尽管如此，利益团体对偏见的指控是有选择性的。客观性体制成了掩盖各种具体的媒介内容纷争的政治烟幕。不同利益集团常常利用平衡的概念重新定义游戏规则，移动球赛中的球门柱的位置，以便他们成为中间分子而其对手成为极端主义者。平衡和客观的辞藻以其大同主义、利他主义和高度的抽象性，成为追逐具体的、片面的、自我利益的工具。而且，因为这些观念是主流新闻媒体和国家管理部门长期培育起来的，那些能在媒介纷争中争夺表达权，有效地运用它们的人往往能占上风，无论他们的目的是多么自私和狭隘。正如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指出的那样：

“平衡”一词没有客观的含义，因为明显地这儿没有准确的像磅秤那样的参照尺度。在政治上，“平衡”是普遍的词汇，因为它能帮助那些运用这一术语的人赢得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它不是一个测量的术语，虽然它

的使用者似乎自欺欺人地认为它们是客观的。“平衡”一词在政治和法律上是一个有用的词汇，因为它以描写性而非争论性出现。<sup>29</sup>

无论“平衡”修辞多具有战略性和利己性，新闻媒体必须对具有敌意的偏见指控有所回应。新闻机构有许多既能处理这些指控又能紧紧吸引住受众和保持其信誉的机制和论坛。在没有被政府管制的印刷媒体，这些论坛包括读者来信、意见调查员以及加拿大许多省的新闻仲裁委员会。在被管制的广播电视业，CRTC 直到最近才具有了类似的处理观众不满的功能。每个新闻机构都有让人发表对偏见的指控的机会，有时，指控者甚至能得到满意的处理。然而它们都有许多局限性。

读者来信栏目也许是最普遍使用的论坛，通过它报刊读者可以对觉察到的特定报道中的不平衡发表看法。一般报纸都发表这些不满，因为他们能帮助报刊树立为读者提供一种开放和具代表性的论坛形象，有时这些信件能挑战辩论话语的主导性前提条件。而且，这些信件被视为报纸上最直接、最民主的组成部分。

读者来信很少能发起对主流新闻议程以外的事件的讨论。报纸编辑以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为由排斥这种企图。虽然它有对话的特征，但这是一方占主导地位的不平等对话。编辑有随意选择、拒绝、修改、删除、并置、添加标题和照片的权力，以便让信件作者有发言机会或让他们闭嘴。<sup>30</sup> 这种权力是私下的，在公众的视野外行使的，读者当然不会知道在选择和修改过程中什么东西被遗漏。另外，选择有与阶级、性别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相对应的倾向。埃里克森、巴拉克和陈的关于《环球邮报》的编辑的研究表明，作者的社会地位及机构从属关系在编辑选择来信时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在新闻栏目中，权威人士较普通市民更受偏爱。<sup>31</sup> 其结果是，作为对新闻内容进行协商的来信栏目，同样反映了在报纸其他栏目中存在的等级规则。

作为另一个商议内容的论坛，新闻仲裁委员会接受和裁决对具体新闻报道实例的不满。这些不满中的许多是对新闻偏见的指控。比如，在安大略仲裁委员会第一个八年间接受的个案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报道的诚实度与客观性的。<sup>32</sup>

通过裁决有关偏见的指控，新闻仲裁委员会已扩大并保护了客观性主导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有严重的局限性。他们的权限通常限制他们只处置对特殊报道实例的指控，而不是省略或一般化的偏见。在大多数省份，新闻仲裁委员会的会员身份是自愿的，并且他们大多数不处理对非会员新闻媒体的不满。赢一场案子最多是将仲裁委

员会的决定在被批评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一件许多潜在的抱怨者认为不值得努力去争取的东西。据彼得·戴斯巴拉兹(Peter Desbarats)认为,加拿大仲裁委员会有“相对成功的历史”,很显然,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并且促进了报纸和其读者间的沟通。但他也指出,“新闻仲裁委员会也曾被批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反应性的,没能充分推销宣传自己,没能发起研究和其他活动,以增强其自身在提高新闻标准上的作用”。<sup>33</sup>

一个更主要的局限是新闻仲裁委员会通常是报业本身的产物。他们的会员可以包括从业的记者和公众人员,但他们是由媒体成员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组织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决定了仲裁委员会的建立。历史表明,它们的形成就是为了躲避政府对付媒体所有权集中的法律威胁。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拿大第一批新闻仲裁委员会在基思·戴维(Keith Davey)的关于大众媒体的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的冲击下产生。紧接着,1980年汤姆·肯特(Tom Kent)领导的皇家报业委员会促成了第二批新闻仲裁委员会的产生。它们的成立同时也具有商业的动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目睹了与日俱增的对新闻可信度的挑战,以及报刊市场分化的趋势,这些都对依赖大众市场的日报造成了威胁。正如皇家报业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的:

正是具有宽广的广告宣传市场和反映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群的报纸,首先成立了新闻仲裁委员会。直到今天,加拿大建立的各种新闻仲裁委员会正是为了保存那种使综合报纸成功的社会共识。……这些报纸的配方是针对广告消费方式而设计的,其基本构成单位是传统家庭。<sup>34</sup>

这种分析同样适合于加拿大一些日报设置的意见调查员,如《多伦多星报》。这些意见调解员毫无疑问是正直的个体,然而他们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人们希望他们能向读者解释编辑许多决定,同时他们又要代表报纸的利益。当他们对报纸的批评过于认真时,他们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不满而被调职。

这就是曾名噪一时的《温尼伯自由报》的意见调查员的命运。1992年5月1日,巴里·穆林(Barry Mullin)在他自己的专栏里批评自己的报纸前一天对洛杉矶暴乱报道,他指出,美洲大陆的重要新闻事件被埋在早晨版的后页不起眼的地方,而头版不关痛痒地报道着诸如一对本地英雄和有关可以生物溶解的高尔夫球座的软性的、让人高兴的消息。两个月前,据说汤姆逊集团任命的出版商立即传令穆林与他及总编会面。

制定了损毁意见调查员可信性和独立性的条件,并据说事实上强迫穆林——这位有着八年工作经验的本地新闻编辑离开报社。由此带来的对新闻编辑部的负面影响,正如一位媒体批评家所说,是对《自由报》之名的嘲讽。<sup>35</sup>这种意义含糊的角色也许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闻意见调查员这一角色,至少在加拿大日报中明显走下坡路的趋势。<sup>36</sup>

在广播电视媒体方面,CRTC的角色乍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它不是行业的产物而是政府的产物,它是公众机构的一部分,用来保证广电业,包括平衡在内的一系列标准。因为如此,CRTC比新闻仲裁委员会拥有更多的审查和惩罚能力,包括吊销或不延长某广电商的经营执照。但是,CRTC在监督新闻内容时并没有有力地使用这些正式权力,近些年尤其如此。它很少在广播商的承诺中强加条件,取消或改变广播业者执照的条件,或者要求持照者通过特定的措施来满足平衡要求。相反,CRTC很大程度上依赖广播业者的好意和他们通过自己的编辑判断来达到平衡的基本许诺。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自律和放松管制的意识形态下,CRTC开始把其处理抱怨的功能转化为类似新闻仲裁委员会的行业实体。<sup>37</sup>

以上的协商客观和平衡的含义及内容的论坛,都是局限在客观性体制之内。它们的注意力仅限于处理对现有客观标准的偏离,并不会接受对现有客观标准所提出的根本性批评。甚至更确切地说,他们处理的是关于新闻媒体中具体内容的不满,而不是对媒体实践和媒体实践背后特定的结构安排的异议。安大略新闻仲裁委员会——是加拿大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家。但在其政策中清楚地陈述,它不会处理有关系统的媒体倾向性的抱怨。像其他新闻仲裁委员会一样,它仅调查那些对特殊事件的报道。大卫·沃特兹(David Waters),CBC电视台的执行制片人,也曾是目标更远的魁北克新闻仲裁委员会的创始成员,指出了这些机制未实现的许诺:

我们中的许多人想建立一个强有力且行之有效的新闻仲裁委员会,如今我们有了一个,虽然它可能仍是全球最好的一个,它还是离我们寻找的目标很远。我们所需要的新闻仲裁委员会不仅调查有损于新闻事业的个案,而且它应能够收集证据,并有力地反对当今新闻业中的系统性不足。它本应能这样做,但它缺少基金,除了在公共的叽喳议论中对有限的且不断的个别不足之处进行抨击外,不能做更多的。<sup>38</sup>

实际上,通过对明显偏离新闻业的客观标准的实例的批评,新闻仲裁

委员会隐性地使这些标准自然化,使它们成为辨别新闻业欠缺的基本出发点。

在处理个别争论和增加媒体对听众的责任感上,这些论坛也许是有用的,但它们没有从根本上增加公众接近媒体的机会,或者改变媒体报道中的不平等状态。权威政客对媒体偏见的攻击可成为新闻报道的标题。那些出自不那么权威的人物的,也许更有理的抱怨却没有这种影响。另外,因为精英团体有更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他们能通过发动大型的公关活动、幕后游说活动、对加拿大广播电视和电信委员会(CRTC)的干预或大规模的媒体调查,来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协商机制。在仲裁对于新闻平衡的争论时,似乎公正的CRTC也不能免受这种压力。正如研究人员彼得·库克(Peter G. Cook)和麦莱斯·鲁格斯(Myles A. Ruggles)所认为的,它对某一媒体偏见具体实例的不满的调查力度取决于那些牢骚者的政治权力。通过对CRTC处理不满的记录的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CRTC只有在当政府或有影响力的大势力集团受到攻击时才有积极的反应,这一证据显示出‘平衡’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因为只有当某一有影响力的机构受到威胁时,这一功能才会得到实现。‘平衡’实际上只限于平衡协调各精英集团的意见。”<sup>39</sup>在关于媒介内容的斗争中,“平衡”常被证明是一种重要的武器。

## 鸽子公园的恐慌:平衡中的不平衡

在温哥华闹市区的东边,有一个街区,富裕者称之为下等街区,而这座城市中许多贫民都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家,在那儿坐落着一个本地人都熟知的名叫鸽子公园的小广场。经济贫困但很多元,它也许是加拿大最有特色的广播电台之一的温哥华合作电台(Vancouver Co-op)最合适的坐落地点。作为加拿大两家合作式英语广播台之一,它的呼号为CFRO调频广播,有向广大的民众提供参与广播和回应的职责。<sup>40</sup>这个电台十分有限的资金由会员赞助。它的政策由选举出来的董事会制定,节目由自愿者制作,他们使用过时的,暂时代用的设备。从1975年开始,合作广播电台一直是凭着执著和热情来制作也许专业水平不高的节目。

这种由会员共有,自愿者操作的非商业化的性质,意味着这样的电台的节目制作与商业性电台有很大的不同。电台的政策公开宣扬它的宗旨,努力“从关注社会运动的角度报道问题和事件”。<sup>41</sup>这些社会运动包括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同性恋问题、环境问题、和平问题及其他。这些社会

运动在工人运动和左翼社会民主党比较有政治势力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较有影响,但进步的一方的观点在该省的商业传媒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表达。

合作广播电台信息报道的方式反映了它的宗旨：“为无声者提供声音”。因此,传统的平衡的固定程式——对一节目的某一事件的两方面的阐述几乎不被采纳,致力于倡导公众事务,节目的自愿者把一种“不平衡”作为他们的特色。这正如一位研究者指出的：

他们忠实于听众,不论听众群是支持劳工、支持巴勒斯坦,还是赞成同性恋,并且表达出他们所理解的听众的情感。在这个电台里没有人把提高同性恋权利看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电台成员来说,用一个反对同性恋的节目来平衡每一个同情同性恋的节目几乎是荒唐的。<sup>42</sup>

合作电台活跃分子认为,他们努力给那些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的团体提供讲话机会本身就是对整个媒体制度的一种平衡。这种关于平衡的特殊解释使得该电台与 CRTC 的每一个电台要达到观众和节目类型平衡的观点相抵触。那种紧张氛围在 1988 年合作电台执照延期听证会上变成公开的斗争。直接导火线是加拿大的犹太人组织加拿大犹太人议会(CJC)对合作广播电台每周的《巴勒斯坦之音》节目强烈不满。CJC 控诉电台使用公众拥有的空中电波广播措词激烈的倾向于阿拉伯人的观点,而把犹太人在中东问题上的观点抛在一边。<sup>43</sup>

在辩论中,合作电台重申它的观点:它们是在整个系统而非一个电台中寻求平衡,并说明它们的节目是对温哥华整个广播系统节目的一种平衡。合作电台代表告诉 CRTC,“我们很难相信,有关对社区广播的平衡要求的解释,要求我们制作专门节目来强化主流广播中已有充分表达的声音”。<sup>44</sup>

尽管 CRTC 正式承认社区广播的特色,但是管理者既不接受合作电台关于平衡的广义定义,也不同意社区广播相对于 CRTC 狭义平衡定义的特殊地位。虽然加拿大犹太人议会为了关闭《巴勒斯坦之音》的干涉目的没有达到,CRTC 对合作电台还是敲了警钟。<sup>45</sup>管理者把电台的执照期由通常的 5 年减为 34 个月。而且要求电台在 6 个月内交一份报告,阐述该电台今后如何来履行平衡的职责。CRTC 的决定不仅在规定“平衡”的基本立场上不平常,而且在显示具体达到这一目的的机制上也有些与众不同:电台需从不同视点来报道新闻,而且,若需要的话,使用它自己的资源制作或获取节目来达到平衡。<sup>46</sup>

CRTC 忽视社区电台的特殊机制，它的建议反映出商业媒体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对于有争议的事件，有工资收入的记者例行公事地引述各种不同观点。时事节目制片人、董事会成员，彼得·罗伊斯争论道：“要知道，如果我们遵从了这些建议，那么我们就不是合作电台了。”他指出自愿者们会发现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去采访他们的政敌并从他们的角度展示，是多么别扭、离奇。<sup>47</sup> 最终，这样一个规则会损害电台或使它变为一个更商业化的媒体。在这一电台工作的人员感到他们被 CRTC 误解了，而另一些人则视 CRTC 的行为为一种威胁。

按照 CRTC 的规则，合作电台修订了处理民怨的程序，发出更多关于接近电台的机会的公告，并且在其时事节目中提供更多的打进电话的时间，《巴勒斯坦之音》节目制作人员，设置了一个叫“平衡法规”的时段，在此时段中广播和引述那些直接地、坚决地反对任何程度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的人的观点。<sup>48</sup>

不足为奇地，这些改变并不能使 CRTC 满意，它反对电台的报告，包括其基于节目制作实践和为听众提供广播机会的原则基础上的自我辩解。CRTC 也不对合作电台台长和自愿者提出的问题作答，库克和鲁格斯问道：

电台成员和听众自愿发表不同意见的维度要由什么样的抽象平衡标准来衡量？什么意见构成“平衡”？什么事件需要实行平衡，什么样的时事不需要？电台何时知道它已经达到了平衡，符合了执照要求？CRTC 是否让合作广播效仿它自己接受的主流商业广播的平衡定义？如果没有志愿者提出相反意见，电台是不是要改变其内部的政策，并聘用职业记者来补充志愿者的节目（他们没有资金这样做）？如果不满者的意见简直是恶意辱骂，电台该怎么办？<sup>49</sup>

一些合作电台成员已对把平衡原则作为一个管理标准提出了批评。在他们对此争论的回顾性分析中，两位传播学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对 CRTC 来说，加拿大犹太人议会是一个相对强大的干涉者。库克和鲁格斯补充道：“CRTC 采取的强硬行为与早期的证据一致，面对一些力量较强大的权威机构的不满，CRTC 的反应最为热烈迅速。”<sup>50</sup> 考虑到“不平衡”总是在人们表示不满时出现在视野，是不是说对主流媒体抱怨少就说明其已达到了“平衡”？抑或是，更准确地说，意味着利益被侵害者、被排除的人群缺少表示不满的资源呢？难道 CRTC 没有注意到，之所以商业性电台以“平衡”姿态出现，就是出于商业利益，它们尽可能避免

有争论的节目吗？CRTC 是否注意到主流媒体新闻的意识形态成分，比如把辩论局限于精英观念之内，并不给基层的社会团体以直接发言的机会？为什么没有对广播的答复权利？现在为何没有对于占据广播时间的广告宣传进行“平衡”的机会？为什么 CRTC 对有机会让人说话的合作电台如此严格，而对受众没有任何接近权或答复权利的商业广播如此宽松？<sup>51</sup> 这两位批评者走得甚至更远，他们认为 CRTC 的平衡政策与生俱来偏爱商业性广播：

事实上，商业性媒体也只不过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它们的结构组成决定了它们的内容。问题是，无论占统治地位的大公司选择并表现出什么样的报道框架或体系，它们暗含的价值观就成为其他观点必须达到与之平衡的出发点，并通过同义反复的方式成为媒体的中间意见。在大多数电台、电视台中，模仿的趋势使狭隘的、有利可图的观点成为无所不在的、单一的观点，以至于与之相比较任何一点偏差都显得不平衡和有偏见。<sup>52</sup>

这是极好的评论，它提出了关于民主传播的含义的最基本问题。这两位研究者认为平衡的要求与其只重视公民的收听而非通过电波说话的权利，是“与媒介管理中的精英民主的概念相关的，在这一理念中，大多数公民被认为是政治的不合格参与者，他们的角色只不过是被动的旁观者”。<sup>53</sup>

手持管理的鞭子来对付政治和经济软弱的电台，很显然，CRTC 没有必要对上述观点反驳。在合作电台提出了进一步取悦 CRTC 的措施，递交了第二份报告，两者之间一系列信件交换后，这一争论开始被遗忘并平复下来。CFRO 和《巴勒斯坦之音》仍在广播，但该电台自己关于平衡的定义没有被 CRTC 接受，而且 CRTC 也没有阐明它自己对平衡的定义。

这一事件再次显示，客观性和平衡性在国家机关被当作管理目标时，可以用来挫败和威慑另类媒体及其实践，使之偏向于主流媒体。虽然平衡与客观性偶尔可以作为挑战媒体关于特定事件的含义的政治武器，它们也使主流的媒体制度自然化。如果商业广播的实践倾向于趋同，那么，偏离商业实践的内容或机构更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平衡的或有偏见的？尽管合作电台有理由因 CRTC 最终没有彻底追究它而松了一口气，但这还是使人容易想起，对特定新闻内容提出质疑相对容易，而要从体制之外挑战新闻客观性和平衡性的定义和实践是很难的。



## 平衡与宗教广播

商业新闻媒体大部分被认为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而另类的不以客观性为宗旨的媒体被视为宣传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以上认识正是美国在广播发展初期,以牺牲非营利电台为代价把执照颁发给商业广播的依据。

虽然 CRTC 以市场分割的消费者口味为基础颁发专业的调频广播和有线电视执照(如体育、摇滚乐)。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它显得相当谨慎,以不能保证平衡为由,拒绝给代表“特殊”利益的执照申请者颁发执照。平衡的要求是建立在广播频道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上,把广播资源看成是公共财产和一种公共的信托。这一观点的目的是保证有争议的或公众关心的事件中的主要观点都能得到表达,并阻止财富和特殊个体控制电波。

宗教组织持续的压力迫使 CRTC 在 1982 年就宗教节目举行了听证会。宗教广播的支持者提出了与合作电台相类似的尖锐的观点。它们反对商业广播和公营广播是代表普遍利益的观点,认为商业广播只是一种“特殊利益”团体,用一个名为“公正与自由基金委员会”的话说:

商业广播不是“中立的”、“平衡的”和“普遍的”广播,它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利润的追逐来选择节目……很少例外,私营广播追逐收视率,在电视上导致美国节目的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愚蠢的广告的强调和台与台之间的节目如出一辙。<sup>54</sup>

福音传道频道的支持者们走得更远,他们把商业广播的价值观描绘成典型的人本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像合作电台,他们争论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对广播系统普遍的偏见进行平衡。虽然合作电台没有成功地说服 CRTC 接受它们关于“平衡”的定义,CRTC 接受了宗教组织的论点,至少它给“远见电视”(Vision TV)电视网颁发了营业执照。

这一决定虽然重要,但它并未意味着向一种全新的媒体进入(access)体制转变。在这一新体制中,不同的组织可以拥有自己的、不依靠宣称客观的职业传播者的媒体渠道。类似许可证从未授予给已察觉媒体有系统的男权主义偏见的女权运动组织,没有授予给觉得媒体有倾向的工会组织,也没授予给认为媒体有消费主义倾向的环保主义者。CRTC 并没放弃其传统的关于平衡的观点,“远见电视”给不同的教派和观点提供机会,

而非受其中任何一个观点的控制。

虽然广播法案已于1991年再行修改审订,它仍坚持平衡的标准。由于这一原因,议会责任修订新法案的委员会否认有必要建立一些让不同团体有直接广播机会的频道,它忽视了“进入”(access)与“平衡”(balance)之间的真正差异:“进入”是团体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权利;而平衡是对诸多观点中的一个的挪用和经过中介的呈现。<sup>55</sup>如果加拿大广播系统在不远的将来最终有了致力于倡导明确的、单一的政治观点的频道,那也只能会是窄播技术、私有化、管制的放松和商业逻辑的附属物,而且会使迎合富裕阶层的狭小市场不成比例地受益。即使平衡、进入、公正等能使非主流团体有得益可能的普遍性概念被采用,也很可能会是日益增强的有关消费者选择的市场话语的一部分。

然而宗教广播这一案例显示客观性体制的话语术语不是绝对的,它们也不能自动决定某决策的结果。对于平衡的诠释和运用有协商的可能,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用这一词汇的社会团体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合作电台很有自我意识地代表被边缘化了的团体。与之相反,一个加拿大主要宗教组织的联盟更具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实力。

## 自由市场十字军与平衡的辞藻

离合作电台和鸽子公园仅几个街区,但从财富和地位角度有天壤之别的地方,隐约可见由似铁般冰凉的玻璃和水泥筑成的温哥华金融区的塔楼。一个宣称能让加拿大人了解“竞争的市场是应付社会变革的最佳机制”的、由私人财团资助的智囊团——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的办公大楼就坐落于此。<sup>56</sup>一群温哥华生意人被英属哥伦比亚新民主党政府的“左倾”政策所激怒,因此于1974年成立了这一组织。该机构对通过市场渠道解决公众所有政策问题的一贯推崇,几乎使它成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十字军。得益于四百多家大公司和知名右翼商人如彼得·康拉德·布莱克的资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组织每年有一百多万加元的财政基金,并拥有18名工作人员。

成立于1987年的全国媒体档案馆(NMA)是弗雷泽研究所的分支,它每年拥有200 000加元的基金。该馆让学者们使用其研究资料,与其说它是个资料馆,不如说它是一个积极地利用并公布媒介内容分析的研究单位。通过其每月通讯《关于平衡》,全国媒体档案馆声称要检测全国媒体在履行公共信息功能方面的忠实性,特别是它们对于公众事件报道

的平衡程度。事实上，通讯宣称它对媒体对公众事件的报道的“客观性、平衡和公正性”作“科学的评审”。<sup>57</sup>它于1988年对CBC全国新闻和《环球邮报》关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报道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对1987—1988年12个月中出现在CBC的《全民》(*The National*)、《期刊》(*The Journal*)上和《环球邮报》头版的有关这一协定的记者和受访者的意见作了分析，得出这两家媒体的报道都有强烈地反对这一协定的倾向性。NMA还宣称CBC尤其不平衡，因为CBC的新闻记者发表他们的意见时，总乐于反对而不是支持自由贸易。

媒体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于《关于平衡》上的研究，从许多角度进行了批评，包括NMA在内容分析上缺乏反思性，它自己对分析方法客观性的宣称，以及内容分类范畴的设立和对媒体文本内容归类中隐含的主观性的忽略等。同样，NMA的《关于平衡》在早期研究上也存在着含糊其辞和明显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同时也有过于简单化，甚至忽视语境和新闻制作过程的复杂性的趋势。<sup>58</sup>最为重要的是NMA对平衡这一概念的诠释及其政治化应用。

NMA关于平衡的假定以及把它作为评估媒体报道的标准的做法多少有点实证主义的意味，与传统的关于新闻偏见的内容分析方法有同样的实证主义意味和概念上的局限性。<sup>59</sup>特别是NMA似乎把媒体对其信息功能的忠实性与对公共议题持不同意见的争论双方的平衡报道混为一谈，并认为这些议题的起源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方法论上的假定认为，所有议题均有势均力敌的对抗性的两方面，“平衡”就是对双方的量上的平等对待。然而，在确认某一议题相关的两方面时，NMA常常依赖自身的绝对的假定而不去分析公共议题的起因及相关的视角。不仅如此，政治上或道德上的事情，并不是都有两方面，一些只有一面。另一些不止两面。关键要从谁的视角来看，媒体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方作平等对待。例如，若是新闻强调性袭击(sexual assault)的负面效应，那么很少有人期望媒体平衡地报道其有正面效应，这种平衡不会成为对公众话语的忠实再现。这同样适用于加拿大政治中一些共识性的问题，如关于公共医疗保险的原则。

当NMA寻求平衡以外的评估新闻报道的标准时，更多的随意性问题出现了。1989年6~7月的《关于平衡》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它把CBC关于HIV病毒传播方式的报道与相关数据作比较，认为CBC对HIV通过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传播的报道不够。如果NMA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并评估新闻媒体，那么这一发现有什么相关意

义呢？NMA 难道应该怂恿媒体迁就日益严重的对同性恋现象的恐慌吗？难道 CBC 只有把 85% 的关于艾滋病的新闻报道与同性恋传播方式联系在一起才算是达到了“平衡”和“忠实”？从公众健康目的出发，这种方式显然没什么好处，因为人数增长最快的受害者是年轻人和异性恋女性。

“平衡性”并不像 NMA 所宣称的那样，是可以客观地、科学地测量的准确概念。它是一个修辞性术语，它与受众对富有争议的政治参与者、立场和议题的合理性的判断紧密关联，其使用者打算借此赢得受众对他们的支持。NMA 自己对这一概念的政治运用可以从它与弗雷泽研究所的附属关系中得到证实。它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到卡尔加里大学的一位叫巴里·库柏的政治学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进行的宣称 CBC 电台有左翼倾向的偏见的研究。更直接的是，NMA 经常把其对平衡的调查研究的成果进行夸大的炒作，虽然没有明言，《关于平衡》的推理结构明显受到“政治态度理论”的一贯影响。这一理论把“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观点看作影响他们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因素”。<sup>60</sup>

报纸专栏作家安德鲁·科因(Andrew Coyne)本人就是一位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他对《关于平衡》的研究议程的描述算是说到点子上了：“虽然表面上它是公正的，但其意图是明确的——就是收集保守分子一直坚信的媒体是被左翼分子操纵的证据。”<sup>61</sup> 在这一点上，NMA 的研究与华盛顿特区的媒介与公共事务中心的研究相似。这一机构从事的研究有一定的分量，但它的研究是专门寻找有关媒体有左翼倾向的证据。

1989 年 6 月的《关于平衡》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调查议程的例子。回顾自身以前的研究成果，《关于平衡》写道，“新闻记者的意见遵从一种一贯的模式——反对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支持公众性的而不是由使用者资助的健康基金；支持劳工立场而不是支持资方”。（这一研究同样发现，在关于堕胎的新闻报道中，媒介支持反堕胎者。但 NMA 对这一意识形态上明显的矛盾没有作出评论。也就是说，媒介如果有一致的左翼倾向的话，就应该是支持堕胎的同情者，而不是支持保守的反堕胎者）

最近，在一篇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996 年 5 月大选的地方电视新闻研究报告中，NMA 报道说，右翼反对党自由党比其他包括执政社会民主党、新民主党要有更多的负面报道和总报道量。引述 1991 年大选的报道，当时执政的社会信用党有最多的负面报道并受到媒体最全面的关注，这份报告暗示了，记者“隐藏的政治效忠”（很可能偏向新民主党）是 1996 年自由党得到较多反面新闻报道的原因。<sup>62</sup>

NMA 能作出如此的解释是在有选择地、有意曲解自己的研究基础上得到的。它自己掌握的数据显示新民主党得到反面新闻报道的比例远远超过了自由党。NMA 以 1991 年的选举作比较的分析是有选择性的，就媒体新闻报道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关系来说，1986 年的地方选举与 1996 年的大选非常相似。在 1986 年，新当选的社会信用党领导人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在电视上，而新民主党的竞选活动总的来说没得到新闻界的积极报道。NMA 的研究同样忽略了 1996 年地方媒体对政府债务问题的集中关注。这一关注远远超过了民意测验中所显示的选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由于政府债务问题是新民主党的最弱项，<sup>63</sup> 新民主党可以提出理由证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至少怀有与对自由党差不多的敌意。

更有可能性的说法是，以下与记者的党派偏见无关的因素对报道的影响可能性最大：各党在民意调查中的地位、记者对竞选者和他们的竞选活动的 ability、开放度及新闻价值的看法、各党派对竞选策略和所需强调的议题的选择、各媒体挖掘内幕的较量，以及通过独特的主题或故事情节、简明而强烈迸发的形式在新闻报道中的主导倾向。

其他的 NMA 研究，如有关劳工的调查，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解释，尤其是在其他学术成果的参照下，当然，NMA 通常是忽视这些成果的，除非能为其所用。

尽管有概念上和方法上的限制和潜在的对弗雷泽研究所公开张扬的自由市场理论的依附地位，但 NMA 的研究在媒体与政界仍拥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广泛传送给加拿大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的通讯、它的非学术风格以及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手段的炒作，NMA 的结论被高度注意。比如，它的自由贸易新闻报道的研究已在 1988 年联邦大选中途发布，并且受到新闻界好评。NMA 和它的主管在媒体上作为权威享受越来越多的曝光的机会。其研究在 CBC 内部尤其有冲击力，常常被 CBC 有自主主义倾向的董事会成员作为偏见的证据。如马尔罗尼总理任命的董事约翰·克里斯波(John Crispo)就谴责 CBC 是左翼制作人的传声筒，且在海湾战争中扮演了“巴格达之声”的角色。在 1991 年 CRTC 的一个听证会上，克里斯波称 NMA 关于自由贸易的调查是“最权威的”，而其他专栏作家或组织，从《多伦多太阳报》的道格·费什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商会都同样毫无异议地接受并详细引述了 NMA 的调查报告。<sup>64</sup>

公平地说，NMA 的调查可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含蓄的政治干涉，它是一场不明说的给媒体施压以便使之成为给自己的发言人和观点提供

更多媒体机会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相对成功有以下的原因：第一，NMA的年财政预算是可以与合作电台的全体人员和节目制作的财政预算相比拟的，而且它能进入其母机构——弗雷泽研究所更为宽广的社会网络系统和公共事件。因此，NMA拥有致力于被奥斯卡·甘迪(Oscar Gandy)称为“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y)的资源，即对高成本、有新闻价值的、能潜在地为自我利益服务或自我促进的信息进行补贴性传播。<sup>65</sup>

第二，NMA对媒体尤其是CBC的评论与先前存在的右倾理解相一致。NMA有一群忠实的受众，他们相信其定论而不担心其方法多么有问题。

第三，NMA关于平衡的定义，与现存占统治地位的媒体规则相一致。

## 不平等的协商

在客观和平衡的辞令背后是一场有关参与媒体的机会和左右媒体影响的社会斗争，而在这之外，又是一场有关加拿大公众话语的前提条件本身的社会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正如马克·瑞波依(Marc Raboy)观察到的，抽象且从根本上被争论的客观性及其较狭窄的部分——平衡常常被具体化。它们被视为“存在之物”，就像那些抓得到、可挤压、能衡量评估的东西一样。<sup>66</sup>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团体让其关于平衡的界定被认可的不平等的能力，变得模糊不清。

## 争议中的认识论：新闻客观性哲学

记者也是苦思冥想的哲学家吗？这个问题可能会在新闻俱乐部里引起阵阵嘲笑，因为记者一般不把自己当成笛卡儿或康德的继承人。然而提出下列看法也不为过：客观新闻业的实施及其公开和隐蔽的主张都意味着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如真理的本质，人对客观现实认知的可能性等；记者实践着一种可行的——或许是不可行的——哲学。

这里我们想指出的是新闻实践及其批评都受哲学家们所称的认识论，即关于人类知识的理论，或隐或显的影响。认识论通常讨论的是真实、物质世界和宇宙的本质。也就是说，认识论可能隐含着一种本体论。它也对真实世界和我们对这个世界实际的或可能的认识之间的关系发表意见。总之，认识论说明或暗示真实世界、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及我们通过语言充分表达这种认识的能力之间相符合的程度。

在新闻界，对认识论的争议体现在关于客观性体制的问题上。确实，大多数新闻工作及许多新闻批评都非常依赖真理、知识、客观诸概念，这些概念源于19世纪的哲学传统，即人们所熟知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尽管这样，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哲学，攻击客观性的可能性或可取性。这一思想方法的最新表现是后现代主义，它已就媒体实践发表了诸多有争议性的著作。

但我们相信，客观主义新闻和后现代主义批评都没有提供恰当的描述和评价新闻实践的立足点。我们尝试提出第三种，我们认为有意义的观点——批判现实主义，它或许能提供保证可持续民主所需的新闻哲学基础。

某些批评家会反驳我们的新闻实践中具有哲学内容的论断。

他们会说新闻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或符号表达形式,其作用是提供对有关社会重大主题及人类感兴趣事件的一般了解,而不是其深刻的知识。<sup>1</sup>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它提醒我们不应负面地判断新闻工作,好像把它当作一种失败的社会科学。<sup>2</sup>新闻毕竟不像科学那样遵循同样的系统调查和证实的程序,也未试图理论化。我们仍然谈论科学知识(虽然有些人对科学发展的这种线性及经验性概念提出挑战)的“进步”和“积累”,但我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谈论新闻的“进步”。<sup>3</sup>当然新闻工作者并不是有意识地遵循一种充分发展的抽象的理论进行工作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客观性的实践可被当作一种“策略性的仪式”。新闻工作者可据此保护自己免受职业性的麻烦,诸如错过截止日期、读者的抱怨以及雇主的指责。这些考虑是实践性的,而不是哲学的。

尽管如此,新闻工作者及新闻组织仍然宣称新闻有真实价值。正如媒介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所说,客观新闻暗含着一项“不成文的契约”。它能够让新闻消费者相信“新闻是多么显而易见地可以被相信、被信任,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没有从字里行间体味的必要”。<sup>4</sup>有时,这种契约是明显的。爱德华·杰伊·爱泼斯坦(Edward Jay Epstein)描述了报道有争议事件的主要“辩证模式”：“记者在报道完发生的新闻后,将相对立的观点一并提出,然后在自己的综合结论里暗示真理存在于两种观点之间的某个地方。”<sup>5</sup>

有时,新闻记者组织报道了矛盾的陈述,而没有试图去评估这些陈述的真实性,即使在这样情况下,他们还是暗示地宣称他们至少已将相关的可能性都表达出来了。报纸的版面编排也显示着一种不公开的对真理的宣称。它仔细地把观点/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区别开,就暗示已经把渗透在新闻报道中的主观看法和评价过滤掉了。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工作语言、他们的业务争论、新闻机构的道德和实践手册都宣称忠诚于新闻,至少从原则上讲,有提供对这个世界的客观、真实描述的能力。基于这种原因,我们相信有正当理由把存在于当今有关新闻及客观性争论中的一些认识论及本体论的问题摊开来讨论。

## 客观性认识论：实证主义的遗产

梳理客观性体制的发展脉络,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当时它还背负着一些沉重的哲学包袱。当19世纪的商业日报极力推崇事实的神圣性,藉此反对党派报纸恶名昭彰的偏见时,它们不仅采用了激进的劳工报



纸的民主话语，而且也表达了被称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精神。

实证主义是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思想体系，它建立在学习科学方法、理性、进步的启蒙主义基础之上。实证主义的创立者，如 19 世纪的思想家孔德(Auguste Comte)，都深受其同时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各门分支学科——包括对社会的研究——都应该遵循自然科学(诸如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这方法包括仔细、客观的观察和通过感知记录事物。这样观察可以揭示自然世界及社会世界的规律、模式及定律。孔德相信这种方法可以产生牢固的、无可争辩的“正面”知识——明显区别于宗教信仰、迷信、偏见和其他不能被实证信念。这种有关社会和自然规律的实证知识提供了干预的依据，使得人类行为和社会机制可以像河流及矿物资源等非生命物一样被控制。

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独立于观察者的存在意识这一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是广义的哲学派别，即经验主义的一个极端，它是建立在世界本质是以感官观察的证据为基础的本体论观点之上的。<sup>6</sup>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观点来看，感官体验(sense experience)产生客观事实，即关于物质实在现实的可靠资料。不能被感知或观察到、进而被证实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葛雷硬(Grandgrind)先生，狄更斯笔下的那个只要事实的人物，是 19 世纪实证主义最精彩的漫画，它坚信事实的积累体现着知识获取的最终目的。

令实证主义及经验主义认识论为难的事物是观察者的地位，也就是研究世界的意识的本质。因为它可能遭到异议，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依靠的不仅仅是事实。相反，我们按照预先给定的计划或模式，不停地组织感官材料。如托马斯·麦克考伊(Thoms McCoy)所指出的：“经验主义不能说明意义的产生，一系列联想或事实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对主体在价值作用下建立相互关系和得出结论的过程作出解释。”<sup>7</sup>的确，对事实的认指，即对某一具有意义或值得注意现象的选择和定义取决于先前已决定的主次和前提。按照这一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理论都先于事实并且组成事实。知识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反映，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观察主体的一种积极构建。这种可能性向实证主义方法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确实，自 19 世纪实证主义产生以来就因这些原因受到各种攻击。作为回应，那些完全支持实证主义者坚信其自身所理解的“科学方法”的思想家们，修改了原先的观点，他们的修饰使早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趋于成熟。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他们最初的主要的对世界

客观、直接理解的宣称,承认了观察主体的能动作用。

虽然实证主义在哲学层面上受到严重挑战,但它已深深地植根于当代“常识”中且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日常思想和活动。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和大部分新闻工作者根本不在乎孔德及其继承者。然而,每当我们希望发现某一问题或议题中的“事实”时,我们会称颂于他们的影响。

如果我们看早期的客观新闻,我们看到的是有下列轮廓的一个知识的概念。世界按其本身状态存在着,独立于人类对它的认识。然而,通过某一特定观察技巧和数据资料搜集的应用,我们可以发现本来的面貌。我们进而可以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毫无曲解地把知识传送给别人。

从这个观点上看,新闻的道德责任就是准确、公正、平衡地反映真实世界。新闻工作者可以把事实与观点、价值判断区别开来。新闻记者作为独立的观察者能站在客观世界的事件之外,能够把事件的真相和含义通过运用诸如标准报道格式这样的职业报道技巧和中性的语言传达给读者。真理或知识依赖于观察者相对于研究对象的中立性。新闻媒体运用恰当时,是中立的、纯客观的,这就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因此,新闻有不偏不倚、清晰、中立地表达外部世界的潜能。客观的新闻媒体能浓缩日常生活中最有新闻价值、对读者来说是最合适、最有趣的事件。不偏不倚的媒体能赋予有争论的合法的政治观点以质量上和数量上的平衡报道。

在这个被广泛接受的新闻实践观点的背后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假想的真实考评。麦考伊(MeCoy)在谈到现代大众传媒时指出:“客观性显而易见是经验主义的一种当代形式。因而它易于受到对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评。”他把这个哲学遗产与客观新闻的一些“常见特点和假设”联系起来,这包括对中立的、明显的事实的被动记录;通过提供专家来源,将事实标准化地展示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将事实与价值观分离。<sup>8</sup>

坦率地说,虽然媒体能公正地报道世界本来面貌这一始终不渝的信念,听起来似乎十分天真,当受到有关偏见和新闻报道有选择性的指责时,新闻记者们常常会自我辩护地说,他们的报道是真实的。根据这一观点,批评家错误地指责了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有关电视新闻节目的最普遍的老生常谈式的看法就是“社会之镜”、“世界之窗”,虽然也承认镜子是“不确定的”。(就像1970年加拿大参议院就媒体所作报告的标题一样)<sup>9</sup>反映论的隐喻和客观性体制有关讲述真实的宣称有助于形成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感,而且它们能继续提供新闻记者通常辩论和保护他们的职业参照物,而这是以放弃质问新闻制作框架为代价的。<sup>10</sup>

在讽刺和怀疑日益加重的年代，宣称客观性的认识论继续支配新闻业也许是值得怀疑的。可以这样说，在俱乐部、会客厅、学术会议及记者会上，批评者会常常攻击新闻在一个特定的事例或从总体上没能取得客观性能，但这些批评者并不是要挑战客观性的认识论。相反，他们批评的还是对客观性的偏离，这些批评还隐性地赞同客观新闻毫不曲解地再现现实的可能性及可取性。批评者攻击的是个体的或集体的、偶然性或结构性阻碍实现客观性理想的因素。采纳女权主义认识论和传媒理论中的一个观点，我们将这些攻击称为“劣等客观性”的批评，劣等这个词是做得很糟的意思，以区别于对客观性本身（客观性如是）的批评。<sup>11</sup>

劣等客观性的批评指责新闻在实践中没有达到所宣称的提供有关世界全部真理的要求。这一批评常通过对偏见的指责，即新闻没有实现“客观性如是”表现出来。按此观点，新闻的问题在于客观性实践和道德并未真正占统治地位：个人观点及其他压力曲解了某一新闻报道，使它的真理价值成了问题。其中一种批评也可能是新闻编辑部里最常见的，集中在对某一特定的不足之处的批评：某编辑的一处判断错误，一位不称职的记者，一位有自私之企图媒体所有者的干涉。这种批评肯定了新闻客观的可能性、可取性和总的成就。某些缺点是被当作对一个基本可实现的理想的偏离而指出来的。<sup>12</sup>

这种新闻批评是多种多样的，但有共性成分。他们宣称忠诚于公正、平衡、准确的概念，他们大多承认客观性是可取的。他们相信准确地表现世界本来面目的可能性，要不然，为什么指责某一特定的带偏见的新闻报道呢？

然而，某些新闻工作者很可能感到我们过分渲染了他们职业的实证主义遗产。确实，20世纪的新闻已逐渐怀疑赤裸的事实。事实的积累并不一定产生准确、全面、有意义的对社会的报道。如果葛雷硬先生的“事实派”是对19世纪新闻业的一幅漫画的话，它在现在就更不适合了。迈克尔·舒德森追溯了新闻业对朴素实证主义的抛弃和它对战时宣传的怀疑，以及20世纪前几十年对公关业的怀疑。<sup>13</sup>虽然强调事实对19世纪党派报刊蓄意的教条主义及任意歪曲是一种有益的消毒剂，但是事实也是政治武器这一点也变得明显起来。它们可以被公司、政府、政治宣传机器有选择地放大，它们的上下文可以被割裂、重组，它们甚至可以被捏造。

对不受价值影响的事实的幻想破灭有助于解释性和专业性的新闻在主流新闻中的出现，其目的在于揭示过量事实背后更为重要的含意。这也使新闻不得不面对实证主义中经常令人苦恼的问题——观察者的身

份。一个经常不断地听到的观点是否认客观的可能性，这一争议在新闻记者中也是很普遍的。这一观点的根据是：人是主观的，人永远不可能完全中立。每个人必定是主观的；这样一来，没有人能完全、无偏见地、准确地报道这个世界，不论报道提供了怎样的事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视角，因此，任何绝对客观的宣称都是错误的。

颇具矛盾意味的是，承认主观的偏差性导致了客观性修辞的确立和更专业、更狭隘的客观性概念的确立。客观性被称为是“一个为连事实也不能被相信的世界所设计的方法”。<sup>14</sup> 这些方法之一是“有关公正”的实践。客观不可能，但我们能力求公正。据麦考伊的观点，“实践者假定真理不是唾手可得之物，伴随它的是偏见的陷阱和竞争的利益。然而人可以采用一种中和各种力量的方法，并在此过程中保护自己”。<sup>15</sup> 但是“公正”没有代替客观认识论，而且它引入了与这一认识论严重有悖的成分。新闻学教材、学术研究、新闻实践都指出，平衡和准确被认为是客观新闻的某个侧面，但两者有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一般公认的客观的反面——“倾向性”表现出来的。日常语言中大多数定义把新闻的倾向性看成是记者或新闻机构把主观的意见强加进了所谓的直接事实的报道中。比如埃莉诺·麦克林(Eleanor Maclean)提出：“一篇报道如未能明显区分作者的解释和被报道的事实，它便是一个有倾向性的、偏颇的报道。”<sup>16</sup> 媒体社会学家麦奎尔指出了“倾向性”的一些可能表现特征：明确的观点和利于某一观点的证据的堆砌；有目的地使用一些事实和评论而不点明有个人倾向；使用那些能够修饰事实报道又能传达含蓄且清楚的价值取向的语言；在本该直接的报道中省略对某一方有利的观点。<sup>17</sup>

这些解释似乎有足够的道理，但更仔细一点的研究表明，新闻倾向性这一概念有两个并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一个是在争议性观点间缺乏“平衡”；另一个是对“现实”的有目的的党派性的歪曲。一项对新闻教科书中有关新闻报道倾向性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的调查表明：在表述不平衡的时候，课本用的同义词往往是偏好、一面的、偏袒的等；而用得较多的反义词则是平等的、同样有力的、中立的、公正的等。<sup>18</sup> 在表述歪曲时，课本用的是诸如有偏差的、间接的、带有刻板成见等词语，与直接的、事实的、准确的和真实的等词汇相对。

为避免被指责为有倾向性，新闻业要求同时做到平衡和准确。然而这两个目的会产生矛盾。例如，在1974年加拿大联邦选举中，反对党领导人罗伯特·斯坦菲尔德(Robert Stanfield)公开露面的时间比在任总理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多。当时皮埃尔·特鲁多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他的策划者们决定低调处理这位活跃的总理:他曾因在某些问题上的轻率言词而广为人知,而且有一次他竟向一群投票者竖起中指。更重要的是,这一策略限制了记者以某些难题使他处于困境的机会。而且这一策略依赖电视新闻给他和他的对手同等的机会——电视新闻确实这么做了。<sup>19</sup>这样的新闻报道是“平衡”的——然而它也“歪曲”了这些策略和选举的实际活动。

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冲突(虽然是隐性的)仍存在于平衡和准确或不歪曲的目标之间。准确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实证主义的关于“直接事实”终极可知的肯定。只要记者控制个人倾向,这些事实是可明辨、可表达的。相反,记者通过平衡各个有竞争性的、不一致的观点来避免倾向性的观念导致了更具有相对性的认识论的出现。平衡这一概念,部分来源于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知识社会学,似乎假定不同的世界观都具有自己的(有限或部分的)正确性,但没有哪一个能宣称自己是最终的,最客观的真理。<sup>20</sup>

平衡问题引起了一些更让人烦恼的认识论问题。如果某一组织的片面观点限制了不同观点的正确性,人们熟知的相对主义的悖论就发挥作用了,那么,是什么能证实新闻机构自身的真理宣称呢?而且,平衡的实践暗示了观点的多样化近似真理的观点。情况真是这样吗?那么由主要竞争观点所共持的令人怀疑,但又未经检验的假想的可能性又如何呢?例如,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期间,一段时间的一致之后,美国政治的精英(反映在主流媒体上)“鹰派”和“鸽派”间就产生了一个主要争论,争论以战争的费用及其对美国的利益为中心。两派都持一些共同的假设(美国干涉越南是好的;他们的越南敌人是共产党,因而是罪恶的)和盲点(战争给越南带来的严重灾难或更基本的——美国干涉越南的法律和道德的权利问题)。以遵循平衡原则的方式,新闻媒体再现的不是抽象或绝对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政治领域中获得的统治地位的对社会现实的定义。

虽然许多记者承认实证主义所坚持的纯粹的事实这一点对他们的职业来说还不是充分的哲学基础,新闻媒体还没找到合适的替代物。更确切地说,20世纪以来的一些零碎的、实用的对简单的客观主义世界观的修改导致了认识论上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已根植于新闻报道中,古老的实证主义信念中的成分已草率地与对哲学相对主义的含蓄让步拼凑在了一起。尽管对个人主观性的认可和对事实的幻想破灭占据了新闻业,客观性制度还是没有被取代。结果产生了一个各种不相容的关于真理宣称

的假设的扰人混合物——一个非常缺乏一致性的混合物,这使得记者很容易地避开对他们日常实践前提的审视。

在实践中,这些认识论上的混乱并没有使新闻工作者烦恼。新闻机构毕竟并不把平衡当作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把它当作既吸引受众又处理政治权力的方法。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记者对展示“真理”的种种宣称。因此,暗含着平衡、客观的哲学前提还像原来一样,没被大多数记者考虑。但它们对媒体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值得提出些严肃的问题。而且,的确,近年来一些有深远影响的关于客观性的认识论基础的批评已经出现。我们将尽可能快速而谨慎地走过这些批评的哲学雷区。

## 因袭主义认识论

对新闻客观性认识论更为激进的挑战是被我们称为有关“客观性如是”的批评,它坚持客观新闻不可能实现它的理想,劣等客观批评痛惜一个未实现的承诺,“客观性如是”的批评却认为那个承诺本身是假的,它的批评者攻击客观新闻所依赖的认识论假想。

“客观性如是”的批评通常源于一种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相对立的哲学,泰瑞·劳弗(Terry Lovell)称之为“因袭主义”。<sup>21</sup>虽然因袭主义以许多变体和言语表现自己,我们还是可以冒昧地概括、总结其特征。实证主义宣称通过感官经验可以直接获得世界的知识,而因袭主义却认为主体总是被范畴、概念或准则的集合体与对世界的直接感知相隔离,这些范畴、概念或准则划分和过滤我们对世界的感知。虽然因袭主义并不一定否认某处有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但它坚持我们总是被包围在我们自己的思维范畴中。这一坚持表明,即使有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它实际上也是不可接近的。想获得直接的、未经传媒中介的客观知识的愿望注定要遭受挫折。因为了解世界的尝试发生在思维活动过程中,关于“现实世界”肯定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思维活动过程在现实和知识之间竖起了无法穿透的屏障。

新近一个著名的关于因袭主义思想的例子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写的科学方法批评,他向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提出正面挑战。自然科学实验方法预想会对自然界的事实有更准确、精练的理解,会促进知识不可阻挡的日益进步。<sup>22</sup>库恩提出,科学不是通过实验和观察的渐进过程而前进的。相反,他说自然世界的知识的变化只是通过

范式的转化实现的。所谓“范式”，它是指包括方法、概念、命题、理论和盲点的一个整体调查框架。一般来说，普通的科学实践——库恩称作“常规科学”——总是在已建立的范式之内吸收观察到的事实，忽视并排除不协调和非常规之处，将其当作无意义的偏差，例如，几个世纪以来，托勒密派的天文学家修正他们关于行星运动的有关计算以证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看法。只有当一个主要“范式”发生变化时——如伽利略天文学的出现或爱因斯坦物理学的产生促成了这种变化——有关这世界如何运行的新的观点才会产生。

这论断暗示：并非如实证主义所设想的事实修正理论，理论通常决定对有重大意义的事实的确认。按此观点，价值/事实分离就瓦解了。如此论断，不同范式或理论会导致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参考框架。每一个都有自己认为是真理的标准，这样的因袭主义争论趋向于一种哲学相对主义。不同的文化、时代、范式接受判断真理的不同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方法，也无法在不同推理中选择一种不受理论影响的中立的现实语言。<sup>23</sup>

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的是许多因袭主义理论家都给予语言的地位。因袭主义倾向于强调语言的力量。这里语言不仅包括话语，也包括所有的符号系统。人类通过符号系统赋予世界以意义，并以此帮助我们感知世界，依照他们的观点，语言不是直接地、中立地、透明地传输原有的内在意义或事件的真相，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构建世界。

这样的论断受到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的语言人类学的启发。根据这两位学者创立的“萨皮尔-沃夫假设”，语言充当社会实践的向导。不是简单地反映或标记外部世界，语言帮助我们建立现实感，世界并不是简单地显露在那儿，自己呈现出来以供我们描述。相反，通过如何谈论，我们组成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如果因纽特(Inuit)人有16个不同的表示“雪”的词汇，那么，对他们来讲就有16种不同的雪。在某种意义上讲现实是相对的，它根据我们谈论的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语言，不论是言语的，还是视觉的，都是新闻业的主要工具。近年来，由于受因袭主义认识论在不同方式和程度上的影响，不同的媒体批评家都指出，语言的价值携带性和前结构本质对新闻的客观性的宣称提出了挑战，用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的话讲，能够用来毫无偏见地记录纯粹事实、价值中立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因为价值观早已暗含于个体籍以观察与记录的概念和语言之中。<sup>24</sup>因此，像行凶抢劫、恐怖主义这样的附

属于新闻中的社会角色和事件的标签就含有评价和语境的意味。新闻工作者必须经常努力解决如何在新闻中标记人物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者”还是“自由斗士”?“罢工破坏者”还是“替代工人”?“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反伐木者”?还有那些在流产诊所外面的示威者是“维护生命”、“反对选择”还是“反对流产”?贝尔法斯特(Belfast)是在鄂尔斯特还是在北爱尔兰?参加海湾战争的加拿大士兵能被叫做“我们”的部队吗?这样的标记不仅是给那些事件定位或确认,他们还把事件放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因而,标记的使用很可能影响到具有引申和内涵意义的整个参照性的上下文。<sup>25</sup>

而且,语言的构建能力超越了某一特定的词和短语。它也包括这些词和短语是如何被组成报道或叙事的。新闻工作者承认,从数以百万计的素材和事件中进行有限的选择,意味着新闻不能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进行详尽和全面的报道。但新闻报道包括的要远比只是选择多,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事先就供选择的关于事件、素材和问题的目录。若新闻要对读者有意义,新闻工作就必须具有提供参考框架的主动过程。这种框架常常是隐性的,它是由“符号操纵者经常用来组织话语的持续的认知、解释、表现、选择、强调以及排斥组成的”。<sup>26</sup>

如果你想要清晰地讲述某一复杂的故事,从理论上讲,框架是不可避免的。像其他故事的讲述者那样,新闻工作者需要把有关受众的某些事看得理所当然。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他们有共同的文化概念——什么存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跟什么有关。<sup>27</sup> 故事讲述者需要有一个叙事将故事联结起来,以此来决定什么是有关的并值得注意的事实或事件,以便引起受众的兴趣。框架在电视新闻中特别活跃和明显,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其复杂的技术(需要一个故事把不同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协调起来)和流动的视觉(需要一个有趣的故事线索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框架在报纸新闻中或许更微妙,但隐含在头条新闻中的措辞、同一主题下新闻故事的编排、新闻角度及被强调的主题的选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价值和现实判断中的框架都很明显。

框架也传送所报道的事件本身所没有的意义,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新闻记者,通过将事件置于特定的合适的语境中,赋予它意义,因为故事的含义是远非内在的、不言自明的。加拿大银行报告记录着高额利润,这是如银行总裁所说的一种谨慎投资和完善管理的迹象呢?还是如银行批评者所说是公司贪婪、利率过高、政府漠视的表现呢?毫无疑问,客观新闻报道将会引用两方的观点,然而通过故事编排和其他方式,新闻报道能够



积极地突出某些解释,并能够排除其他的解释或者使其边缘化。框架技巧是一种暗示,可吸引而不是迫使读者接受根植于新闻报道中的“优先解读”。

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框架与客观新闻实践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是并行不悖的,新闻可积累性地建立并扩展某一框架而不放弃事实的准确、明显观点的引用、平衡的引语等体现客观性的形式标准。的确,这样的客观标记有助于掩盖或模糊主导框架。当与某一文化的大叙事紧密地结合时,框架会特别难以确认,因为它不像个别的看得出倾向的例子,它不会在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中以前景形式突出来。例如,女性政治家及其政治主张的报道既可客观在议会政治框架的范围内与对手的观点进行平衡,又可根植于男权主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有关政治的定义中,并在新闻报道中采取不同的叙述焦点和评价标准。<sup>28</sup>典型的叙述焦点一直集中在女性政治家的服饰、相貌和发型上。比如,媒体着迷于第一位女总理金·吉姆贝尔(Kim Gimpbell)的裸肩照片。最近的加拿大政治中,类似的媒体塑造框架包括被动的、说话软绵绵的“轻量级”奥德丽·麦克劳克林(Audrey McLaughlin)的形象。媒体报道认为她是因为她的温柔和女性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她对政治的不同见解和非凡职业成就,使她赢得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民主党的领导地位。和麦克劳克林相反的传媒形象是话语强硬、很冲、很直率、在政治游戏中按男性规则办事的联邦自由党副主席萨拉·考帕斯(Sheila Copps)。

媒体框架的分析带来的启示是有关现实判断和价值标准不可避免地要渗入对事件、语言和阐释上下文的选择中去。这样的渗入似乎威胁着获得客观性所宣称的能全面地、未经折射地捕捉世界、明显地将“事件”与“观点”、解释和评论分开的信条的可能性。<sup>29</sup>

几乎在框架的分析成为媒体分析批评重要部分的同时,另一个有所不同的但又是相关的思想方法对客观宣称提出了挑战。它集中于媒体如何参与制造他们所报道的世界。客观性暗示着媒体可以与他们所观察的事件分开。“我们没有制造新闻,我们仅仅是报道它”这是媒体对受众批评的一个标准反应。在媒体社会学中,有关媒体如何积极地参与构建社会现实是个普遍的主题。大卫·奥尔泰德(David Altheide)和P. R. 斯诺(P. R. Snow)甚至认为,现代美国社会是由“媒体逻辑”控制的。媒体是“其他机构,包括整个政治过程都必须迎合的主导力量。整个政治过程与媒体逻辑不可分地缠结在一起变成了媒体生产的延伸”。<sup>30</sup>

人们无须接受这种媒体决定论来承认新闻对社会和政治的干预作

用。其中一例便是广泛制造的“假性事件”，即事先就计划或受鼓动，以被报道和复制为主要意图的事件。<sup>31</sup>任何新闻发布及政治演讲和示威都是为媒介宣传而安排的，在媒体不存在的情况下不会发生。<sup>32</sup>除了有意制造假性事件外，新闻媒体可以影响其报道的社会或政治趋势。因此电视被认为有削弱对政党的依附和改变成功政党领导人的素质的功能。

这种观点似乎对客观认识论投下双重阴影。它们提出新闻是有组织偏见的机构的制造物，而不是客观性所宣称的那样——是对现实镜式反映。因为创作新闻的过程也是构建社会现实本身的过程，媒介不能被看作是局外的观察者。媒体主动地帮助建构现实，即使它仅仅使主要的社会机构和政治过程得以实现，例如，如果没有传媒扩大其影响，今天的竞选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令人怀疑的是社会构建主义者的批评是否必定破坏了客观性的可能性。自然，原则上它在新闻上的运用与在社会科学上的运用一样，也许宣称调查对象不受调查过程影响的可能性大一点（自然科学对调查对象不受调查过程影响的可能性的宣称更强一些，但这也不是没有争论的）。<sup>33</sup>然而这些宣称确实对媒体构成一个客观的第四权力的宣称提出了挑战。它暗示着新闻业有必要承认和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可避免地卷入所报道的社会过程中。

## ◆ 后现代主义和媒体：现实的海湾

近年来，与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后主们”——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有关的著者已把关于语言中介和构建现实的争论提高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后主们”的理论在谈论什么呢？我们无意就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标签下聚集的各种主题提供一个全面的报道，但我们在这里稍微梳理一下那些典型地被与这些术语有关的思想家抛弃的东西。

这些被抛弃的东西包括：理论家们认为的后启蒙理性的、总体的、压制的事物确定性和普遍价值观（正义、理性、进步、真理），笛卡儿哲学的连贯独立的认知主体，对认识论的确定性的寻求，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相对立的高雅文化的特殊地位，那些不能再有效地赋予人类社会意义的有关科学、政治、宗教的文化“大叙事”。取而代之，后现代主义者强调和赞扬差异、别致、边缘、分离、分裂、模仿、偶然和混乱。这一观点已很明显地被媒介、文化研究所接受，而且最近在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和其他领域表现出来。这里，我们再次冒过于简单化的风险，抽取一些关于语言威力

的观点,这些观点突出表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的攻击。

一个起点是被称为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它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于20世纪早期发展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被包括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内的法国结构主义者承袭,符号学极大地影响了大众文化和媒体,包括新闻的学术研究。它的基本观点源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概念和作为该系统结构关系产物的意义。这一观点抛弃了个体作者的意图和选择创造文本(如一篇新闻报道)的常规理解。因而,结构主义提出了解记者的有关背景和倾向性不能使我们对新闻有很好的理解。我们需要(正如我们在这试图做到的)分析作为社会构建的文本的 news 的代码和惯例。<sup>34</sup>

而且,如果符号的意义是符号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仅检验语言能指(词)和语言之外的参照物(词所指称的实际物)的联系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想要领会“黑色”的能指物产生的意义,我们需要知道它相对于和区别于其他的在颜色和种族话语之内的能指(白、灰、漆黑、东方人)。<sup>35</sup>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将其理解为指一黑色物体或人。照此观点,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命名先前存在的世界的一种工具。结构主义以一种令萨皮尔(Sapir)和沃夫(Whorf)都感到惊奇的程度推翻了参照物;相反,他们庆祝世界和文本的融合。

后结构主义(和它文学上的堂兄,解构主义)一方面都对结构主义的某些概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把另一些观点引向深入。结构主义聚焦于创建意义的符号系统中的不同,它明显地削弱了真实世界参照物的特殊地位,当然没有完全抛弃它。后结构主义将差异的强调扩展到无限,并将意义看作是能指物(词或意想)的一种潜在无边际的游戏“派生物”。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的能指中,意义现在沿着整个能指链条散布。意义不能轻易地被捕捉,永远无法在任何单个符号中充分地表现出来。<sup>36</sup>在解构主义中,法国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强调符号的不稳定性。他想说明结构主义在符号系统中所揭示的明显固定的对应词(如黑/白)在文本意义过程中相互破坏。语言和语言产生的意义要比我们传统认为的更难以捉摸。

通过认为语言过程是没有固定意义能指的无边游戏,后结构主义不仅对传统意义理论,而且对新闻或其他领域使用语言来表现语言之外的现实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现实本身依赖于语言或者用后现代喜欢的术语——“话语”,即在某特定的社会或机构背景下使用语言并产生意义的一种相对固定形式。实际上,在我们话语之外没有一个能独立接受对真

理宣称的评价的现实。这样“有一个客观、真实的对事物记述的概念是虚幻的”。<sup>37</sup>把这一观点推到其极限，语言之外再没有什么，我们得到的现实只不过是“话语的感觉和产品”的定义。<sup>38</sup>

一些后结构主义者简单地避开了认识论问题。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某些有关既定话语的真理或虚假问题悬置不予解决，而致力于对权力和知识的无边无际的互相作用，以及信念、知识、真理在某一特定社会管理区域——如司法系统、医学或者性——得以产生和施展的过程和机制的研究。简而言之，他感兴趣的是话语体制中的政治性。我们自己对新闻客观性的分析就部分地得益于这一方法。

其他人则直接挑战客观物本身和我们对它们的所言所思之间的区别，或同现实参照物并行。对简·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来讲，大量意象符号的繁殖同它们的意义(或现实参照物)的不断丧失并行。他认为，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年代，曾经直指现实，之后又通过广告和宣传将现实神秘化的符号现在完全取代了现实。我们进入了一个假象的世界，其中模型出现在原型之前，依照波德里亚看法，在所谓的超现实中，“领土不再先于地图，也不因地图而存留”。<sup>39</sup>因此，是地图先于领土，现实本身是无处不在的媒体形象组成的，区别实际与想象，真理与谎言，虚假和真实的认识逻辑基础消失了。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给有关媒体和报道的议题带来了新的视角。他们将深植于新闻制作中的，斯图亚特·艾伦(Stuart Allan)称之为“真实性意志”之下的许多问题推开来。他们强化了对已经存在于结构主义之中的关于语言、话语的构建性表明本质的确认。他们对知识理论中任何忽略语言的反身性的理论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sup>40</sup>他们清楚，真相和知识不因被观察者的中立和对多极的竞争观点保持平衡而得以确保。语言和媒体积极构建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他们也不可能仅仅透明地反映现实。价值不可避免地要侵入。媒体构建现实社会，而不可能以独立观察者身份站在外面。语言本身不能很确定地被用来表现一个话语之外的现实。这种评论从根本上挑战了客观认识论。<sup>41</sup>

的确，如果逻辑上一致，后现代相对主义定会回避或放弃新闻讲述真理的道德。真理宣称会被局限在某特定的范式、文化或历史时期内。即使有客观性，它也只能在“话语社区”的范围内，而不是超越它来运作。如果我们的确处于“后真理社会”，新闻记者应放弃追求客观性的借口，代之以一种具有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或赞赏主观性(正如新新闻记者所做

的)、游戏性和小说性的技巧方式写作,而且对以前边缘化了的和被排斥的声音和人群更开放。<sup>42</sup>后现代媒体学者可能建议我们放弃现代主义范式的分析新闻结构的努力,并不再以真实性、准确性和表现的充分性来评价新闻。相反,将新闻作为小说的一种形式,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同事告诉我们的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新闻作为一种叙述类型的特点、其吸引观众的结构、“表现方面、视觉性及话语视觉化”上。<sup>43</sup>

后现代主义关于新闻的观点很明显是富有争议性的。确实,由波德里亚所写的一系列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浓缩了后现代主义最成问题的方面,写于战时并发表在法国报刊《解放》上的文章着重于战争中媒体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战略地点是电视屏幕,从中我们每天都遭到轰炸”。<sup>44</sup>波德里亚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容易引起争议的甚至有些矛盾的主张,但他的基本观点是宣传的火力网和冲突双方的误导信息使得人们不可能知道在科威特和巴格达到底发生了什么。认识论上的确定性,甚至对究竟正在发生什么组成了一场战争的把握都被“现实海湾”吞没了。波德里亚承认许多人被杀、城市被炸,他认为这场通过电子媒介表达敌对冲突的虚拟性使得“这场战争的实际知识成为不可能”。<sup>45</sup>怀疑论的才智所能做到的便是对所有的消息,所有的图像,不管其来源地抛弃。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追求建立真理”。对此,波德里亚坚持说:“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毫无办法,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通过拒绝相信有关冲突的任何真相宣称以避免被愚弄。”<sup>46</sup>

波德里亚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了“战争的第一受害者是真相”这一观点,认为政府出于宣传目的的扣压或制造虚假消息。旧式现代主义者的声称只是简单暗示现有的任务是从虚假中找出真相,查出真正发生的事。他的论断更极端:根据这位后现代专家的观点,在新电子技术的武装下,不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各种话语的冲突已发展到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能区别真实性和虚假性。波德里亚认为,我们确实没有任何衡量标准,任何比较的基础,能够使甚至是最专业的评论者获得这样一个批评视角。

波德里亚的文章引起的激烈反应。这些文章尤其激起英国哲学家、后现代思想的长期反对者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有一本书之厚的反应,他抨击波德里亚的观点达到了知识界最不负责任的极点。当然,诺里斯说,战争的媒体报道充满了宣传和假信息。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同意波德里亚观点的充足理由,根据他的观点,真理和现实如今完全无法从各种大规模的模仿中分清(或者从机制化的虚假争论中分清)这就左右了思想和信念的传播。因为感知不时插入“官

方”话语中的各种盲点、差距、矛盾、明显的不合逻辑的推论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可能的。这样就赋予了构建一种更充分、更真实的关于事件的另类报道的控制力。<sup>47</sup>

诺里斯援引电视新闻镜头来佐证其观点。这一组新闻镜头在美国被审查删节，而在 BBC 电视上播出——它展示美国一巡航导弹摧毁一个伊拉克境内的自称是掩护平民的地下钢筋混凝土掩体。美国对此事件表现了某种不一致：美国的消息来源声称他们的攻击系统是准确的，不会伤害平民，而且因技术故障，他们不知道平民是否受伤。虽然这一组镜头被矛盾的解释所利用，诺里斯认为这种不一致和美国政府否认平民死亡的明显动机都为抵制五角大楼对平民死亡的否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诺里斯提到，波德里亚的“现实的海湾”不仅有哲学上的错误，而且在道德和政治上是危险的。如果说不可能区别“更真实”或“更虚假”的报道的话，实际上把话语的场地受置于有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一方。在海湾战争中，这就意味着放弃对悉心安排的联军媒体闪电战的挑战。对诺里斯来说，从强烈的反战立场去写，这一失职是应完全遭到唾弃的：波德里亚和其他拥护虚无主义相对论的后现代作者应当被指责为“没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sup>48</sup>

其他各种评论也在更广的范围内就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提出了异议。这些评论者说，后现代主义者严重地夸大了话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倾向于语言决定论，即过分估计意义生产实践相对于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的独立性。他们将世界消解到词语中，傲慢地将参照物、真实事物全盘取消，否定它们在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和期望值中的管制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尖刻地谴责“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过分言辞，即攻击意义，侵害真理，挫败道德和政治，毁灭意义”。<sup>49</sup>

此外，其他评论者提出，后现代对差异的特别强调极度夸大了有冲突的话语和范式之间共同的基础的缺乏。正如朱迪·李切伯格(Judy Lichtenberg)所认为的，虽然有不同的世界观，“我们甚至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有许多一致点，我们的世界观并非不受外界影响。其他人可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sup>50</sup>建构主义语言观将意义与参照物混为一谈，如银行高利润记录这件事可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各方面都至少会同意某些基本事实。通常争论的是合适的解释和事件的来龙去脉。

也许反对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最重要的论点是它本身明显的自我反驳的特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称之为“表现性矛盾”的趋向。

这说明后现代主义者很难在实践中实行他们的理论。<sup>51</sup>在现实政治世界中，他们发现呼唤真理的陈述是必要的，它处于利益集团混战和语言游戏之上。他们否认这个世界的有效知识的可能性，然而他们清楚地宣称其本质。他们拒绝任何在语言 and 实际之间可能的一致，然而自己却以一种希望被认真对待的方式使用语言。

大部分结构主义者称他们将真理作为“语言游戏中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占领概念，宣称霸权，使相冲突的话语行为失效。在这里，作为合理化的标准，真实是按某一宣称的战略性效果或可成立的宣称的组合可能性，而不是与语言之外的世界相一致来决定的”。<sup>52</sup>但这一立场并未逃避自相矛盾的问题：它仍意味着在文本和文本以外的现实，即在其政治效果之间进行有效的分析性关联的可能。

然而，这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价后现代主义者论述本身的启示性方法。诸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这样的评论家就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根本作用是削弱和瓦解了对意识形态霸权地位不断加深和日益全球化的市场关系逻辑的批判和抵制。<sup>53</sup>确实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后现代主义，总的说来，已鼓励文化“左派”在罗马燃烧时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其深奥的风格、使人着迷的复杂性及对语言地位的极大关注分散了文化思想界用于从事艰难而平凡的、为政治变化而进行组织活动的精力。其实践已把能量搬进了超理性和纯话语的王国。其结果是创立了一个政治思想真空，而这个真空现已充满着新右翼对受害者进行谩骂的简单化思想。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认识论、怀疑论削弱了道德和政治决定的基础。例如，如果对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目击证词和否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的历史在语言游戏中享有相似的地位的话，我们能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用他们的证词来警告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sup>54</sup>当这样的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常见的对诸如平等一类的普遍化启蒙原则彻底地抛弃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很难看到这诱人的、时髦的知识趋势如何能支持建设性社会变化的政治或培育有利于民主公民的新闻业。

## 走向第三种主张？批判现实主义

由 20 世纪后期因袭主义提出的对现实语言结构的过分强调是对 19 世纪把新闻报道看作是铁的事实的堆积的极端否定。两种观点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报道和媒体实践问题的方法。但是采取一种既避免实证主义对事实肤浅的确信又避免后现代主义处于绝

境的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是可能的。社会研究中许多关于认识论基础的研究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一两难困境，而且导致了不同替代性观点层出不穷。<sup>55</sup>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批评客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新闻观点的基础——来自于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

从哲学上说，现实主义是一个具有长久且根源系统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尽管被特指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学派是建立在该遗产基础之上的，但它是由诸如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和威廉姆·乌思怀特(William Outhwaite)等思想家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近的哲学观点。<sup>56</sup>从一开始，批判现实主义就专为有关社会变化和解放斗争运动提供哲学基础。作为知识问题的一个普遍的定向力，它已运用于与新闻密切相关的许多领域。如在特瑞·劳弗(Terry Lovell)的文学理论中，在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的关于艺术和新闻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中，以及在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的关于隐含在当代社会运动中的知识政治的讨论中。

因为批判现实主义已发展成为一个对实证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反驳——确实，作为一个批判性主张(观点)——对它的最好的描述是把它同其他思想流派进行比较。与传统主义不同，批判现实主义强烈地证实真实世界的存在，这世界独立于观察者及他/她的范畴和概念。确实，认为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本体论信念是任何知识生产意图的先决条件。而且，批判现实主义主张世界是可接近，可理解的。它并不是永远不透明，难以用语言和思维穿透的“自在之物”。相反，它能够被有意义地描述和解释。

和实证主义对立，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只能通过由社会构建的概念来进行。的确，如劳弗所说，批判现实主义接受因袭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大部分的批判，承认知识构成的社会性，并承认语言，甚至是描绘经验的语言，是蕴涵着理论的。然而，它反对因袭主义把现实简化为概念和话语的主张。知识生产的任务是用词语和思维对词语及思维以外的东西进行解释，而不是——再次引用劳弗的叙述——简单地产生“永无止境地内指其本身的典雅的、内部一致的结构”。<sup>57</sup>

批判现实主义坚持知识是主观和客观、概念和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劳弗所说：“没有理论支持，经验现实结构也许会是一种误导和背叛；另一方面如果理论不与经验联系，理论仅仅是幻想的载体。”<sup>58</sup>最近的传媒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在阐述与我们的主张紧密关联的认识论时说，“现实主义者把存在看作是感觉观察和



解释实践双向构建而成的。依此观点，现实是由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如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组成的。没有纯粹的理论，也没有纯粹的事实，双方都以被相互污染的形式呈现自己”。<sup>59</sup>

概念构成了我们的世界知识，但这个世界可挑战、中断、改变概念。我们不能像实证主义那样将知识归为事实，也不能像因袭主义那样归为概念。相反，在生产知识过程中，正如，莫斯考所言，就理论组织和构建事实是什么而言，理论超越事实；同时，就世界上的各种事件有“使人去证明某一特定的概念或改变它”的潜力而言，事实超越理论。<sup>60</sup>

最重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观点提出，把有关现实的理论看作是社会性的产物和全盘采纳相对主义观点是不一样的。虽然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性的产物，但某些社会性生产的知识要比其他的好。<sup>61</sup>我们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构建起来的，然而我们坚持区分“更真实”或“更虚假”的对现实的描绘是可能的。而区别的标准就在于描绘的连贯性和全面性。另外，阿斯怀特说，“甚至最大可能性的解释”也不是最终的；这里不存在“只有一个真正的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理论或解释和其他的一样好。这只不过是说能为某一叙述提供最终保证的真理性哲学概念并不存在”。<sup>62</sup>

什么使得一种理论优于另一种理论呢？对批判现实主义来讲，真实事物的合理叙述并非如实证主义者所言，是把事实或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堆积起来。相反，它在于挖掘假定事实掩盖下的东西，发现事实背后的原因、表面之下的基础结构——要比表象深得多的现实。正如劳弗所说，批判现实主义不是将“现实确认为所能经历的，而是一种包括不同层面的实体和过程的多层结构”。<sup>63</sup>知识就在于在不同层面之间建立联系和关系。世界是可知的，但不是一见便知。

劳弗从自然科学中引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根筷子插入水中时似乎是弯的，光学原理告诉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种情况。维因特提出了社会场所中类似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妇女常常作为展示之物出现。这一定位的原因存在于深层的，不一定观察得到的压迫机制中。这种定位背后所揭示的是家庭的、文化的和经济的从属地位的机制。<sup>64</sup>通过在深层结构和表层现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我们可以生产现实的知识，这使它的转化成为可能。

批判现实主义抛弃了因袭主义对现实存在或其可知性的怀疑论。它也与实证主义不同，对知识持有反省态度。承认知识是构建的，而不仅是对世界的反映，蕴含着一种责任，即要意识到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范畴的

暂时性和历史性本质。正如巴斯卡指出的那样“所有的概念都是社会性的产物，因此所有的知识都是暂时性的。没有存在于历史的时间之外的真理价值和理性标准”。<sup>65</sup>因为批判现实主义不像实证主义那样降低用来梳理我们经验概念的重要性，也不像因袭主义那样相信我们被完全包围在这些概念之中，所以它自身力求理解这些概念和范畴的本源，并对其修改和变化持开放态度。

对因袭主义者来讲，这样的尝试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因袭主义不能理解我们怎样能“环顾我们的世界观的边缘”。对实证主义来讲，这没有必要，因为正确的方法给予我们对现实的直接感知。但对批判现实主义来讲，理解只能通过对传递我们现实感知的概念的不断批评才能实现。按照诺姆斯·诺里斯(Norms Norris)观点，批判现实主义不仅需要“经验主义研究的假想理论进行不断的检验，而且要对这种实践的专业化程序和广泛的社会及政治可靠性进行批判性的评价”。<sup>66</sup>

批判现实主义把概念和理论的构建和重新构建当作一个社会过程。虽然个人会对知识的进展做出极大贡献，但他们仅仅作为安插在传统、网络、知识生产组织中的动因的角色而出现。正如维因特所言，批判现实主义把知识创作看作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形式。

像语言一样，知识不是人类物理的或自然的属性。根据批判现实主义，知识必定是人类的属性，由于他们的社会特征，他们的参与，在承袭的结构中和他人的关系……这意味着任何特定领域的知识的内容、分布和结构先于个人而存在。人出生在一个知识的遗产中。但是知识和它的组织是如何被重造或转化却依赖于个人的参与。不论个人是以何种方式，也不论他是主动的亦或是被动的。<sup>67</sup>

强调知识的社会结构与承认个人主观性强加于新闻的制作截然不同。我们看到编辑和记者极愿意承认后一点并采用形式化程序以防御报道受主观污染。但承认知识生产是个社会过程意味着载体需要对我们赖以理解世界的大规模、集体性结构进行不断的检验。这包括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概念和范畴的词典，我们委以调查和传播任务的组织机构。

批判现实主义为社会转化提供了一个成熟的哲学基础。它提出，世界知识——包括社会世界——是真正可能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但这种知识是赢得对社会组织机构进行根本性改变的重要因素。

它进一步指出，这种知识必须超越表面而掌握事物的内在结构和原因。因为批判现实主义承认知识生产是社会行为，概念和理论的产生限

于组织和机制的网络中，它也断言通过知识生产机制运作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有可以被改变并潜在提高的可能。

的确，像维因特这样的社会活动者通过证实知识释放性潜能和暂时性、社会性生产的特质，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一条保持启蒙的进步性激情，又不囿于实证者的科学主义傲慢的途径。审视诸如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绿色运动这样的社会活动实践，维因特提出它们的“知识政治”，既没有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认为科学理性能提供全息的社会地图的信念，又没有抛弃解放的激情。相反，她说这些运动的许多实践包含着这样一个信念：通过社会组织，人们扩展并且结合分散的知识获得的并非是“完整的图画”，而是一个对运转的社会机制更好的理解。<sup>68</sup>她说，这种实践与批判现实主义哲学家们所倡导的更抽象的关于怀疑、自我反省的调查相类似。

维因特也许没有将此观点细节化以便更具说服力，但我们从广义上同意她的思想方法，批判现实主义——一种仍在“发展”中的文化思想——还未能解决有关主观/客观互动的所有老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西方哲学史。同时坚持真理的可能性并要求对实现这一可能性的范畴进行不断的自我批评式的审视，意味着这一理论必定正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但在20世纪末，什么哲学见解没有摇摆？批判现实主义至少开始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与已确立的权力结构无意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客观主义知识论，又不同于许多后现代思想的虚无性的新的代替理论。这种理论为我们所主张的持续民主能提供潜在的哲学支持。

在世界是可知的、可解释的信念中，批判现实主义抛弃了对真理这一概念的极端怀疑主义，这一怀疑主义在后现代关于新闻和新闻业的诸多讨论中是很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确实证实了很多记者和外行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以下观点时感觉到的不安：报道仅仅是小说的另一种形式，或我们生活在“后真理”社会，在这社会里，对真实的各种宣称都仅仅是诸多互相竞争的权力集团的策略而已。在坚持解释世界的可能性时，这一理论也支撑了记者讲述真理的使命。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现实主义拒绝经常以客观性外表冒充的表面化报道。如果客观新闻业宣称响应的是实证主义的知识是事实积累的信念，批判现实主义则坚持这是个完全不充分的想法。相反，它宣称真理只有通过进一步挖掘、穿过表面寻求深层原因和结构才能产生，而这正是许多自称客观的报道所回避的。批判现实主义坚持了新闻客观性体制对当

代事件的怀疑性、调查性、批判性检验的冲动这一积极方面。与此同时，它又揭露了这一体制的消极的一面，即将调查精神牺牲于惯例、安全、标准和诸如平衡这样的表面化实践。

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客观性体制为记者放弃对他们用来组织关于世界的报道的范畴、概念、叙事结构、语言的反思提供了借口。实证主义的残余明显地表现在既定的实践仅仅反映世界这一假设上。如果我们改为接受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界所有知识都是构建物的观点，那么我们将领会到新闻是如何通过使用其他概念、范畴、叙述和语言以不同的方式被构建和产生的。虽然有关世界知识是创造的而不是赐予的这一观点并不是要给予所有知识同样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开辟了探索构建新闻知识的新途径，这些途径可能扩大、加深、甚至取代现行的做法。从客观性体制掩盖了新闻的各种过滤机制，而且使其他审视世界的方法非法化这一点上来讲，它的确是一种不可取的骗局。

也许最重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为社会机制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通过假定客观报道的方法保证新闻能独立于社会压力或“倾向性”之外，客观主义认识论没能看见、反而助长了特定的新闻生产机制的各种限制。虽然许多后现代评论已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机制如何形成知识生产，由于他们将权力和知识迭盖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连续的、普遍的语言产物，他们已不再创造政治批评、改革程序、解放事业。批判现实主义坚持知识构建是基本的社会性努力，受生产和分配结构的限制和推动，它帮助我们进一步透视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批评，让我们理解当前流行于新闻生产的概念、范畴是如何在特定机制安排下产生、形成并受其制约的。机制的改革或变革会使这些机制下产生的知识发生巨变——也许是往好的方面的巨变。

## 超越客观性和相对主义

在我们的新闻认识评论中，我们大致同意彼得·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阐述的观点。尽管他侧重于电视报道，仍得出了基本上可用于新闻话语的结论：

电视是构建性的，理解电视表现社会现实的构建性本质是极为重要的。由此而得出的相对主义是排除残留在新闻中的客观性概念的一剂良方，然而绝对相对主义不应是这个故事的终结。我们通过电视获得的社会知识并不是完全随意可得的，我们也不能没有判断电视表述的真实性

的标准。<sup>69</sup>

对民主价值而言,把新闻看作是另一类型的小说显然是一种灾难。新闻记者企图将个人判断排除或保留以便做出诚实的报道是一种好事。在媒体权力全球性和集团化集中的时代,确认和批评违反其自身职业标准的新闻显得更为重要。

但忽视这一点也是灾难性的,即在各种思潮中,特别是女权运动者和后现代者的评论,客观性观点被看作是有问题的。独立的姿态、中立观察的宣称不再站得住脚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有自己社会生产性的特点,没有任何知识是以公正、纯客观的方式产生的。客观性体制对权威性和最终真实性的宣称掩盖了其产品的不充分的分析和调查。

我们对客观主义的排斥并非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放弃了新闻讲述真理的目标,而是出于一种对更为复杂、丰富、可反复应用的、自我批评的职业观念的坚信。这样一个批判现实主义新闻,一方面确实保留了客观性积极的一面,证实了更好的研究、更多调查和分析的需要,以揭示掩藏在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重申了新闻在批判性地挖掘社会现实及不受欢迎的真相之后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用来产生和宣称真实消息的概念和范畴将经常受到洞察和质疑。

评论家和教育工作者应当再三地关注新闻修辞如何以另外一些可能的报道为代价,构建其权威性。就这部分而言,新闻业应该自我反省、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框架和主要叙述,并在其用法上更具实验性和多样性。最终,这样一个社会批评和自我意识的新闻业的产生取决于一种真正的独立与意识,即不再受社会机制和利益集团的控制,当然,这种影响新闻生产的控制力迄今为止并未被承认。

## 客观新闻与政治

从前,在那美好的过去,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一样受到社会尊崇。那是个黄金般的年月,那时的情形用阿尔伯塔省(Albeta)的保守党总理拉尔夫·克莱恩(Ralph Klein)的话表述即是:“加拿大人依靠报纸获得信息,却从政府那儿指望得到问题的解答。”<sup>1</sup>新闻只报道事实,而新闻报道对政治家和当权人物也极为尊重。这样,这些大人物可以与公众交流而不必担心新闻媒体的歪曲报道。

但是,那些美好的日子已经远离我们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批判性新闻报道逐渐兴起,新闻便有了一种广泛的左翼自由主义或反权威的倾向。新闻媒体成为政治过程中活跃的制造混乱的能手,散布着对当权官员的冷嘲热讽,并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保守的智囊团、商界以及大批政治家和新闻学者的不断宣传,上述叙事几乎很危险地要成为无可置疑的正统了。许多人认为大众媒体已被性和暴力所浸透,因而成为反社会行为的鼓动者,或者把它视作供左翼自由主义的记者们恶意攻击政府和商界的毫无头脑的、消极的传播工具。

据流行的叙事,有几个因素是这种破坏性、批评性的新闻报道的罪魁祸首。其一为电视——一种被视觉和娱乐驱动的媒体,它应对从“越战”失败(通过向美国公众展示超过他们忍耐限度的流血)到把政治争论降低到8秒钟声音短语的一切事情负责。通过预设的报道和可供拍照的扰乱性场景,或人们感兴趣的受害者如泣如诉的故事,电视——根据以上的叙事——成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寻求他们主张的宠物,使当局受窘,使执政政府的议程安排出轨。随着“小报型”电视节目和电视新闻混淆真实与偏见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报道的出现,电视正进一步腐蚀所残存的一点新闻的严肃性和责任感。

另一罪魁为“水门嫉妒症”，一种当新闻工作者以扳倒尼克松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为榜样受训时，逐渐被灌输的品德，即不遗余力地揭露高层政治的丑闻，毁掉政治家，以获得新闻奖，并获得进入最高规格的聚会的请帖。<sup>2</sup>人们说，这种专事毁谤的新闻媒体，使在职官员在美国难以立足；输入加拿大，就更不适用了，因为它篡夺了反对党的角色。

第三个祸首，是在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出现的一代职业新闻工作者，他们对于反对现存制度比报道它更感兴趣。这些专门打探丑闻的掏粪者和虚无主义者至少在某些方面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产品。

在此，叙事分为两个方面。一种不太政治化的观点认为新闻记者一般来说都对权威怀有敌意，这并非出于特别的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是一种攻击性文化的一部分和没有头脑的消极主义，根据这些观点，攻击性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形式，一种美国式娱乐的最受欢迎的形式。记者忙于攻击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不过是为了让人觉得其具有攻击性”。<sup>3</sup>毕竟，攻击性新闻很畅销。

一种颇具政治化的观点则假设新闻记者们具有一种系统的政治意识。有时这一看法竟会把编辑室视作有计划的共产主义者或“左派”自由主义者（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断言的左翼相似）进行渗透的场所。一种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理论中借鉴的具有较少阴谋性的观点，把新闻记者描述成是由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新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价值体系与以获得成功为价值取向的商界相左。这一“新阶级”在国家扩大其管制功能中有既得利益，不惜牺牲私人商业，并利用媒体来提升其反资本主义和反技术化的世界观。<sup>4</sup>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新闻记者，尤其是主流的全国性媒体和都市媒体的新闻记者，变得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远不如其他人保守。正因为如此，在新闻中才出现日益蔓延的“‘左派’自由主义和反对主义”的倾向性。

批评者们认为这些明显的偏向会对政治造成显著的不良后果，他们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挫伤了那些珍视自己隐私的良民竞选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而且鼓励领袖人物注重电视上的表演技巧而成为更好的表演者而不是管理者。他们把政治竞选变成了形象的比赛而非政论之争。他们侵蚀了政党的根基，通过把镜头聚焦于政党领袖而非国会或政党，从而把加拿大的会议政体美国化。总而言之，他们把政治转变成了无休止的操纵媒体之战。<sup>5</sup>

右翼批评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新闻媒体应

雇用更多的右翼记者和制片人,以修复新闻系统的平衡与客观性。一位批评者甚至提出:作为最后一招,应在各主要电视网安插政府官员来审查新闻报道,以确保其“公正和准确”。<sup>6</sup>也有人建议,记者应投入更多精力报道商界的事情,而只需花较少气力报道高层权力部门,以期这一导向能产生较为保守的新闻敏感性。

## 反驳右翼的攻击

应当确信,来自主流和保守组织对新闻媒体的恼怒是真实的,正如最近的一次调查加拿大利益集团对新闻媒体的看法所显示的那样。<sup>7</sup>记者们对自己的角色的看法常常与商界和政界领袖的期望不合,新闻公司商业利益常与商界其他类型公司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记者们也许比其他人更世俗,在道德观上更自由主义;他们对那些被视为对当权者阿谀奉承的同行大加嘲讽;而且他们常利用负面材料作新闻导语,或将政治事件简化、个人化、甚至淡化。

但是,作为对新闻生产的解释,保守派对左翼自由主义倾向和反对性新闻报道的攻击却是危险的,不仅有偏见,且产生误导。首先,批评者的政治动机很明显。这部分地说明对媒体有“左倾”自由主义和反商界倾向的指责,一直是大财团和右翼“意识形态动员”的主要话题。该动员意在平复20世纪60年代抗议运动对政治和文化的冲击,并恢复财团资本主义在美国的不受任何挑战的合法地位。<sup>8</sup>在美国,这种保守性动员由许多机构发起,包括极端的“媒介准确”(Accuracy in Media)。其总裁里德·欧文(Reed Irvine)毫无原则地容忍双重标准,以及名声好一些的“新闻和公共事务中心”(Center for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sup>9</sup>在加拿大,此接力棒由弗雷泽研究所和它的国家新闻档案馆拾起,也由商业团体通过连续的非正式的干预而得以维系。

保守的批评把攻击的矛头针对新闻记者个人,而避免涉及媒体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面对其他针对记者的职业刺激和组织压力的证据,保守派的攻击却建立在这样一条很值得怀疑的假设基础之上,即记者有长久性政治目的,有对新闻内容施加重要控制的企图,并借此控制力将自己政治价值观注入新闻。他们忽视了来自机构的或经济的压力所导致的新闻回避,因为受众认为该内容缺乏客观性,他们也忽视了对新闻内容管理控制的程度。<sup>10</sup>

保守批评家们提供了相当少的证据来证明,记者所谓的自由主义态



度直接导致了实际新闻报道中的系统的“左倾”自由主义倾向。<sup>11</sup>对“自由主义”的敏感在报道诸如堕胎或宗教广播事件中确实比较明显(范式性的宗教报道是关于只知要钱的电视传教士)。但这种倾向在涉及商业集团精英的核心利益的报道中,诸如减少财政赤字或私有权的合法性、市场的关系等,就不那么明显了。

此外,保守的批评还夸大了媒体对权威攻击的范围和程度。当媒体果真致力于“攻击性新闻报道”,其努力倾向的是消极性的而非批评性的,而这种消极性并不是由“左倾”自由主义导致的。更确切地说,它与任何前后一贯的能有助于受众了解政界的政治观点毫无牵连。客观与公正之必需意味着新闻记者无权过早地对某一事件表达是或否的判断或明晰地表态。<sup>12</sup>媒体对当局的批评报道与源于官方的日常新闻相比要少得多。批评的报道倾向于个人化,“针对个人瑕疵和失误而非针对长久的‘正常’的机构的安排”。而且,这种批评已经程式化了。每隔若干时间出现,“好像只是出于要表现出一种批评的味道,而不是对政府是否在提高公共福利的长期关注”。<sup>13</sup>最后,待事件达到一定结局,报道也回到正常情形——某内阁大臣或首相辞职,某政府被击败,而制度照常运行。批评媒体的报道也许会搞垮某些不按游戏规则行事的政治家个人,但很少对游戏规则本身提出疑问。水门事件导致了对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重新评价,却并没引起对美国体制的全面的重新评估。

保守派对批评的新闻报道的攻击,忽视了商界和政府施加给媒体的既微妙、普遍又直接、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或以为本该如此。他们狭隘地盯着新闻内容中“有倾向性”的某些特殊方面,却无视(甚至不加分析)新闻报道话语其实在很多重要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巩固了现行权力安排。譬如,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加拿大右翼的改革党领袖,就认为新闻媒体偏爱社会现状、现任官员以及从国会山的视角来看世界。保守分子严厉谴责媒体对政治和社会上的离经叛道者,如“罢工者、抗议组织或分裂出来的党派活动”的报道,认为这是媒体敌对主义的证明。<sup>14</sup>他们忽视了这些报道无论涉及范围多大,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兰斯·贝内特(Lance Bennett)所说,都不出乎此三种类型:违法行为、暴力或导致参与者名声扫地的不良行为的报道;用官方的反对意见平衡离经叛道者的观点的报道;关于某一很快从媒体中消失的组织的积极行动的报道,暗示该组织和其目标影响不大。<sup>15</sup>

保守者忽略了媒体对抗主义的选择性。20世纪90年代视为调查性的新闻报道更多地把谴责的矛头指向社会权力阶梯的底部而非上部。这

种新闻类型的典型表现是对难民走私、福利欺骗、假释犯的谋杀行为的揭露——这些是新闻中的常见主题，却是社会现实中的例外事件。当某个当权者受到苛评时，通常是因为其在实施旨在防止来自下层或圈外威胁的社会秩序时不够警惕。相对于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损失，以及与街道犯罪报道数量相比，白领和公司的罪行则没被大量地报道。<sup>16</sup>

自由主义认为，权力集中于政治机构的观念导致了对新闻看门狗角色的定义。这一想法，加上对损害商业集团利益会遭报复的恐惧——如吃官司或撤回广告——意味着新闻对抗主义更有可能被用于政府而非私人机构。<sup>17</sup>对抗新闻有时根据阶级党派和具体政策的不同，在实际操作中有双重标准，使有些政府更容易成为攻击对象。例如，当左翼的新民主党政府欲征收新闻界所谓的“财富税”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媒体对该党大加挞伐。但是当同一政府削减享受福利人员的名额时，媒体对此政策举双手欢呼并辅之以有关福利欺骗的报道。

保守派对电视新闻的斥责有一种纯技术决定主义的倾向。这样的批评常常想当然地视电视为主要传输琐屑事件或娱乐价值的媒体。他们忽视了在很大程度上这并不是电视本身的原因，而是如此强有力地铸造了这一媒介的商业逻辑影响的结果，这些论点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几乎不存在的公共广播模式和它的不同逻辑。在这类批评中隐含的也许还有精英主义对电视作为大众媒体的怀疑，以及一种公共事务最好从粗俗的公众视野里消失而只由精英圈单独操持的潜在信仰。

## 客观性的保守化后果

保守派有关新闻事业的批评在很多层面上站不住脚，但问题不仅仅是它的论点有误。在很多方面它完全颠倒了客观性体制的政治意义。新闻的客观性制度远没有激进或唱反调的内在特性，而是典型地（若不是自愿地）倾向于巩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霸权性的世界观和（或）掌权者的地位。

例如，新闻界也许会对政治家、政党、政府和其他权力机构表现出自主和批评的姿态，实际上，如果它不想失去受众信任的话，它几乎不这样做不行。然而，如果媒体对政治家和现存机构持完全对立的态度，他们会毁掉自己有效的新闻采集网的信誉，这一张网是牢固地建立在这些权威机构之上的。<sup>18</sup>为了进行他们的日常事务，记者们通常至少要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有条件的欢迎。事实上，得到雇用或者提升或派以重要

报道任务的记者往往是那些与这些机构关系处理得最好的记者。结果，他们不可能赞同对这些机构进行根本性的批评，或公开分析制度性的缺陷。相反地，报社对政治家所采取的对立的姿态只是程式化的、表面化的、个人化的。新闻集中于对违反主导价值观（如宪法民主、爱国主义、国家安全等）的个体的批评，这些价值观本身在他们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客观性制度要求记者们寻找并使用“恰当的来源”，依赖其所报道的“事实”的可靠性，这些报道应直截了当、无可争议地前后一致，以及对事实作没有价值观束缚的转述。虽然，正如我们在第五章已看到的，事实的含义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从一个较大的概念框架或话语的上下文中体现出来的。新闻部门大都乐意接受和传播那些事实——事实的有效陈述，而这些事实是由权威新闻来源制造和提供的，而且（或者）与社会界的共同理解一致。碰巧这些最“合适的”来源——有效、清晰、方便、明显的具有权威性——通常是权力机关的发言人或决策者。

新闻媒体还特别依赖官方组织对“事件”的定义。通过所谓的“官僚层级结构”，政府机关把复杂的事件转换成按程序界定的“实例”，它提供相关的评价标准、概念分类以及为媒体提供确定“事件”的划分机制。<sup>19</sup>

例如，犯罪就是按警察和司法机关所构架的一系列单个“实例”来报道的。整个经历以对一罪行的报道和（有时接着）逮捕开始，以审判定罪结束。罪犯在监狱的待遇，社会犯罪的方式，以及引起犯罪的社会赤贫，却依惯例不纳入报道，因为在负责侦查事件的组织机构看来，这些都属“非事件”，不在它们定义事件的雷达之内。因此，新闻话语也就采纳了有利于维持社会现状的法治新闻故事叙述，永远地聚焦于个人违法而非社会结构和机构问题。媒体对辛普森审判的报道集中于审判；对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加拿大的一个暴力性犯罪者）审判的报道，则把令人毛骨悚然的性犯罪的细节编织得活灵活现。一些重大事件，如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和警察的行为——这一具有广泛意义，而且可能会引起对一些主导机构、镇压机关的批评调查，却最多成为次要话题而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种“事件取向”因新闻报道中的“纪实报道实践”和包装信息的标准故事形式而得到强化。此二者都鼓励新闻机构去报道那些已被精心导演的适用于报道的事件——即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布尔斯特廷（Daniel Boorstin）所称的“假性事件”。<sup>20</sup>只有当表演尚有瑕疵或是表现出太过明显的自我服务意识，或是由从内心深处对构成新闻的意识形态基础怀有敌意的演员来表演时，媒体才可能强调事件是为获得曝光的机会而上演

的结果,有权力和能力制作有新闻价值的假性事件的机构在吸引媒体注意上占了优势。因此,报道个别事件(或真或假)比调查重大的、长期的、却难以见到的过程(如军备竞赛)就容易得多,且与新闻报道规则一致。对事件与热点议题(如全球性的公司迁移和环境恶化)之间结构上的联系的调查也因事件取向而受挫。

再者,报道格式使新闻部门更易接受定型的主题和情节。围绕这两点,叙述更容易组织。诸如戏剧性、及时性、针砭性、反映冲突和精英性等主要新闻价值,就喜好单个事件胜过长时段过程,喜好选举政治胜过议会政治外的选择,喜好可供拍摄的毁灭过程胜过实质意义上的重要性。

同样地,优雅得体和良好的品位的标准好像为使新闻部门关注重大政治事件而设计的,它们从意识形态上限制公共意识和辩论范围,且支持“社会主流、社会现状的价值观点。”<sup>21</sup>例如,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新闻中运用所谓的良好品位的主要结果,不过是减弱了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弱化了受害者的痛苦的报道。对国内重大问题如贫穷、无家可归的报道被弱化和软化处理,因担心对赤贫和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的太过直白的描写会使受众(而且,重要的是广告商)不安。

支撑所有这些保守化倾向的基础是客观新闻性体制的基本实践——将事实和见解分开。作为事件报道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新闻在某些方面隐含着对受众的定位和称呼。新闻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现实主义的叙事等历史性实践使这种定位成为可能。例如,客观性新闻促成了这样的观念的形成,即报纸读者或电视观众“超越”新闻报道中的争论,他们也许有可能受其影响,但不参与争论。<sup>22</sup>如此,新闻客观性制度起到了涵化“一种消极被动的受众概念。这种受众适合于只是每天吸收新一天的新闻以便忘掉昨天的新闻”。<sup>23</sup>受众被置于一种政治看客的地位,而非参与者。他们变成受政治家和特殊利益团体影响的一群人。这种定位与全球公民意识格格不入,而这种全球意识是积极主动地使人类超越当今世界所处的经济和生态的两难处境所必需的。

政治动员因新闻“平衡”和公正的辞藻及实践而遭进一步禁止。这些报道含蓄地贬低了强烈的政治参与的价值(也包括参与性的新闻价值)。如果记者真的在彼此冲突的观点间力求平衡,新闻消费者就难以做出理智的取舍,其结果,平衡只是提高了政治犬儒主义、怀疑主义和冷漠。其他批评者指出,对某一问题的争论“双方”(表面上地)平衡的陈述,会产生别的保守化后果:它有利于受众熟悉的、传统的观点,而不利于他们不太熟悉的观点;它常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一种赞成或是反对的格式;它容

许以精英阶层(如政府和反对党首领)的观点去界定争论的限度。

信奉客观性还掩饰了别的保守性新闻报道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新闻价值反映了人的普遍需要；新闻满足了超越文化的需要——好奇心，对愉快、刺激、娱乐和社会联系的渴求。可是新闻价值并非如此简单和透明。记者认为有新闻价值的往往是多种因素复杂的副产品，这些因素包括传媒技术与新闻来源、新闻组织及其受众之间的关系，这些受众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中经历他们的生活，获取他们的需要。衡量新闻价值的尺度深深地，即使是间接地，与权力关系相关联。

新闻的客观性宣称系统地掩盖了这些权力关系。如果受众被说服相信新闻是“客观的”，他们恐怕难以意识到是多方社会影响造就了他们眼前的新闻。在这些隐藏着的影响中，最显著的是市场在决定什么可算作新闻的威力。大众市场新闻要求其受众把自己当作消费者。这种要求在广告和专为广告商服务(如旅行、汽车、房地产等加拿大日报的固定栏目)而设计的假性文章中尤为明显。它还表现在深植于新闻报道中的假定之中——例如，认为有关劳资纠纷的最具新闻价值的方面是对消费商品和服务的冲击。新闻受众因此在一种双重意义上被称为消费者：作为在报纸上做广告的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和新闻本身的消费者。<sup>24</sup>

而且，新闻实现其意识形态作用，不是因为违背了客观性准则，恰恰是通过这些准则，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立者、公正的观察者和(或)代表民众向掌权者说话的角色。这种对新闻受众的定位是保守的，因为它不鼓励我们去选择有关我们自己的其他定位(作为工人、作为政治实体)，而正是这些定位能使我们积极参与政治。

确实，把媒体只视为商界和政府的工具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需要细致入微地理解媒体组织的机构性驱动机制。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与政治、商业精英的观点及主张有时矛盾，有时一致。但总得来讲，认为媒体有反建制倾向(anti-establishment biases)的观点，忽视了新闻客观性体制的保守性的含意。事实上，主流新闻业起到了使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内既存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的作用，尽管它声称是客观和独立的。

## 新闻客观性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报纸杂志发展到今天的财团媒体，自由民主的话语开始为加拿大英语区新闻事业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框架。民主的

话语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要框架,通过它,政治事件按自由民主来定义和诠释,这至少在主流新闻媒体和议会政党中如此。它提供了谈论和思考关于民众、社会和政治的主导模式,一种逐渐地不知不觉地变得理所当然的、明显的、不假思索而接受的模式。

在它的核心处,“古典自由主义”提倡通过市场来组织社会生活。这包括一系列相关的思想和主张。首先,是人权思想,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签订合同权,追求、获得和享受财富权。其次,自由主义者认为通过市场有竞争性地追逐自身利益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福祉。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物质生活,其凝聚力正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并适用于文化生活。例如,相信真理就是在“思想市场”中正确与错误判断的反复不断的交锋中产生的。最后,古典主义者拥护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政体,其形成是通过民主选举而定。据此观点,政府能够在实施市场规则、仲裁争端、打击国内犯罪分子和国外敌人以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充当中立的仲裁者。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阐述。例如,在加拿大,托利主义的一部分思想遗产使其比起美国多了一些对权威的遵从以及对个人利益的极度追求的限制,他们更愿意利用政府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由于政治气候的右倾加拿大自由主义的这些方面近二十年已有所改变。<sup>25</sup>

尽管存在这些地理上、历史上的差异,在道德上、认识上支撑着自由主义的中心观念就是“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一个同类、统一的主体,既拥有理性,也有等级顺序分明的、潜在的无限需求和偏好。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个人有天赋的权利,只要他不干涉别人的同等权利。并且个人能够自由的与他人在市场上建立契约关系,从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很多论者也注意到,自由主义这一具有理性、自主意识的个人观念与作为客观性体制哲学思维基础的实证主义的一致性。

与客观性体制一样,自由民主今天已成为受到围攻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受到来自左、右翼的挑战,在新闻界也有关于自由民主政体实际功能的广泛怀疑。例如,虽然有代议民主的原则,但“每个人都知道”所有的政客都是骗子。

然而,自由民主框架仍然是新闻选择事件和报道事件的主要传媒框架。它是选择、诠释和表现新闻故事的基础,它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影响着客观性程式在不同新闻报道中的适用程度。换句话说,客观性体制并非无根之萍,它在由自由民主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所构建起来的文化

版图内运转。客观性实践与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并不相悖。相反，这些实践的应用受新闻框架的影响。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帮助新闻记者下意识地、含蓄地将新闻故事分成三类，也就是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的异端、合法分歧，舆论一律的范围。<sup>26</sup>每一个范围都由不同的新闻标准控制，客观性传统与在新闻媒介意识形态版图正处于不同位置的事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些范围可被认为是一系列同心圆。

舆论一律领域位于中央，它包括被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认为是非矛盾性的事物。在这个领域内新闻工作者不会感到有必要表达相反的意见，或成为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如轮椅运动员里克·汉森(Rick Hansen)在1985—1987年间为脊髓研究环绕世界的筹款旅行，以及特里·福克斯(Terry Fox)为癌症治疗穿行加拿大的募捐活动，就适合于这一类新闻报道。它们与深植于加拿大自由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相一致：个人定能战胜逆境；加拿大政府是个关心社会的政府，一个把个人主义与关心不幸的人们相协调的政府。

多数标准的客观性策略在对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记者感到可以自由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事物，不再依靠权威人士的引语。故事的主角成为引起共鸣或个人兴趣的焦点。故事叙述允许修饰，并且不断提供制造新闻的人及受众的主观分析。不愿保持一种中立状态，新闻通过发表活动日期及路线图来鼓励潜在的受众参与事件。新闻故事不追求平衡分歧的意见。编辑以及作者明显假定个人拥有的理想与这些事件所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非政治性的。这些故事超越阶级、性别、年龄、种族的界限，因此，新闻不必对这类故事保持客观。这种一致的庆祝或许在1986年8月26日《环球日报》描述汉森的旅行的新闻导语中，能得到最好的阐明：“政治家说着赞扬之辞，公司的总裁们保证要捐钱，提琴师们演奏着音乐，有些人穿着海狸服跳着基格舞，气球正升上天空。”

在舆论一律的领域外便是合法分歧范围：这是一些政治竞选和议会辩论、社会上权威们所确认的议题的领域。这里，消息被假定为必须是事实的、独立的、直接的、“平衡的”。<sup>27</sup>目击新闻的报道、原文的转述、引语是新闻叙事的重要建筑材料。展现客观性，最典型的就是在报道议会政治新闻中采用“首先政府所言，然后反对党所言”的格式。<sup>28</sup>一个事件的两方或更多的方面被确认，而其中一方又采访不到的时候，新闻就习惯地加上“某一方未作评论”一句，这一暗示性修辞表明新闻机构至少已设法获得

“平衡”。

在合理分歧之外就是异端范围：这是被新闻记者和社会政治主流认为不值一谈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演员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真实的中立地位退后，根据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所说，新闻起着“揭露、谴责、排除违反以及挑战政治共识的任何言辞的作用，标明并保卫着可被接受的政治分歧的界限”。<sup>29</sup>这里新闻记者不再觉得有必要遵循客观性的传统；他们也不被主流社会要求如此行事。

例如，一个由英政府赞助的有关广播的报告明确指出，广播机构必须持有拥护议会民主的主张；但它们“不被期望对那些旨在通过暴力、非议会或非法手段来破坏议会民主的势力给予公平对待或保持中立”。<sup>30</sup>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异端的人物的故事不值得一听，所以就没必要去寻求他们的立场。在这种情形下，“未作评论”的说法就没必要了。同样的，客观性原则在报道国外政治时经常被停用，尤其是当某个国家的政体在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框架之外操作时。的确，一位资深的驻外记者证实，平衡原则在国际新闻中不那么重要。<sup>31</sup>

当然，不是所有事件都毫不含糊地落于这三个范围之内。而且，这些范围的界限，在政治上、意识上都是可争辩的，并且它们都是由那些具有很大能量的，能使自己对政治、社会现实情况的定义被采纳的社会势力来界定的。比如，保尔·沃森(Paul Watson)的“直接行动”环境保护主义，被叙述为“恐怖主义”(异端范围)或合法分歧范围的差别就很大。<sup>32</sup>

总之，自由民主的机制和市场规则被认为是舆论一律的价值观念。因此这些价值的反对者被列入异端的范围，通过这个程序，新闻趋向于把自由民主等同于资本主义并使其自然化，并且超越了历史，若有选择，所有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它。

在加拿大英语区新闻中，这一定势倾向于把政治等同于议会政治。两个世纪以来议会一直是新闻最重要的主题。的确，政治新闻实际上被定义为议会政治以及选举竞争。这种定义既和强调分歧、人格、精英、戏剧性的新闻价值一致，也和古典自由主义关于权力存在于与经济、家庭生活相分离的政府政治代表机构的主张相一致。

这种把权力、民主以及代议选举政治相等同的做法有重大的意识形态后果。能实施权力但不制造新闻的集团在人们的视野中自然消失。随之，权力本身的可视性也消失了。这群缺席者中最突出的是公司所有者及其管理者。<sup>33</sup>新闻是关于议会政治——不是关于社会过程或私人追逐经济利益的社会性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性体制通过掩盖经济如



何左右政治,有助于维持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把民主和选举政治混为一谈也暗示了,对抗性社会运动的非选举型政治不过是戏剧性的、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sup>34</sup>发生在大街上而不是议会空荡荡大厅里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反贫困组织或工会组织都倾向于被驱赶到合法分歧的范围,而被放逐到异端的范围。

有时,新闻价值和客观性新闻的操作使个别政客尴尬,甚至有助于推翻个别政治家,使某一商业公司感到窘迫,并导致对某些政府政策的敌视态度。然而(并很关键)就像客观性实践,新闻价值典型地臆断并夸大了围绕自由资本主义基本社会价值的假定的共识。新闻业偏向于维护某种类型的社会权力——科技专家、男权主义、私人资本,尽管它可以颠覆某些没能有效表达其对自由民主规范的坚守的强势个体。那些想公开对这一舆论一律提出挑战的社会活动分子,会发现自己被边缘化、被贬低——除非他们缓和自己的立场,放弃激进、系统的抨击并把自己的委屈牢骚包裹成在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内可以解决的小型改良。

## 把向右转自然化：客观性新闻和市场自由主义

新闻的客观真实不仅支持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而且为1980年以来发生的一次主要转折,也就是向市场自由主义的转折——提供了润滑剂。

在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大众运动包括劳工、妇女以及对大萧条危机的精英反映,促成了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改进。比如,政府的责任被扩大到代表整个社会实施改革,建立社会福利网以调节市场的失灵。不允许市场盲目运转,政府通过公有公营、法规管制、财政政策等方式主动干预经济。个人权益从原来的政治权益扩大到了经济、社会权益。

这个当代自由主义的版本为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提供主要的意识形态框架。它为那一段时期的客观性体制作了界定,客观性程序一方面允许新闻媒介对社会共识的激进挑战进行报道,同时又帮助中和和驯化这些挑战。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一个强大的极右版本试图推翻这些变化。这种右翼意识运动挑战了战后的自由民主共识,有效地把政治游戏的球门柱转向右侧。在加拿大,这种向右转有以下的标志:维护商界政治利益的智囊团,如弗雷泽研究所、院外活动集团组织及1978年的“国家事务的商业委员会”,1984年和1988年布莱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的选举胜利,以及1983年“真实的妇女”组织的创立,右翼的改革党的成立以及他们选举的胜利,使得“自由党成为保守党,保守党变得毫不相干”。<sup>35</sup>

右翼意识内有不同的类别,它们因种类不同而被冠以一些令人困惑的名字,如新自由派、新保守主义或新右翼等。<sup>36</sup>其核心是攻击福利政府以及社会福利组织的经济纲领,它提倡政府最小化、撤销管制、公共服务个人化、为私有经济提供更多的经济自由,它拥护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对工会、劳工合同中集体讨价还价、为弱势集团争取经济社会权益等进步社会运动怀有敌意。因为右翼运动的中心是对市场机制的信任,我们使用“市场自由主义”来描述它。

有些与右翼运动联系的情感,比如对给予妇女、少数民族更多公平的巨大敌视,已经超出了启蒙自由主义的框架。但大部分右翼反攻(counterattack)接受了许多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例如:相信自由市场,强调个人责任,相信政府只能充当市场关系的裁判,市场自由主义的真正攻击目标是当代自由主义中的进步成分,并不是自由主义本身。

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信条是以普通人的名义来推崇的。在它的主要倡导者如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拉尔夫·克莱因(Ralph Klein)、麦克·哈里斯(Mike Harris)和美国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言语里,它是以普通道理的“革命”和“民粹主义的反抗”的名义出现的,但在本质上它是富人的反叛——来自上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也反映了,在全球化及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中产阶级对经济、社会不安宁的广泛关注。它潜在的信息就是自由主义“左倾”得太多,民主给予官僚以及文化精英太多权力,政府在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牺牲中上阶级利益来保护贫弱者的利益上干涉太多。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的,“民众”的概念在这些保守主义革命里包含的只是高收入阶级——富足者。像金里奇这样的个人正发动一场没有明言的反对穷人的运动。<sup>37</sup>在某种意义上,市场自由主义已经取得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这种霸权既反映了精英利益,又有选择地反映了中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安感和失落感。

新闻媒介也是意识形态上右倾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性传统不仅不能为这次向右转提供独立和中立的报道,而且为右翼意识形态框架的自然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精英新闻媒介的拥有权以及管理权上也有重要变化。这包括20世纪80年代右翼新闻杂志的兴起,支持商界的《金融邮报》的发行,以及

政治上右倾、通俗的《多伦多太阳报》的扩张，加拿大最具影响的政治杂志《星期六之夜》在1987年转到康拉德·布莱克手上。1994年肯尼思·怀特(Kenneth Whyte)成了该杂志的主编。他是一个在右翼的《阿尔伯特塔报道》杂志磨炼出来的新保守分子。与威廉姆·索塞尔(William Thorsell)在1989年6月成为编辑后对《环球邮报》进行的有争议的改革相似，怀特也将《星期六晚报》变为“右派的传声筒”。<sup>38</sup>另外，记者琳达·麦奎(Linda McQuaig)指出，在埃瑞克·曼林的领导下，CTV的高档时事节目，“W5”由一档关注社会，充当“没有发言权的人民的声音”的节目，变为经济富足者的喉舌，并成为展览有权人所关注的事件的窗口。<sup>39</sup>甚至观点趋向于保守的《环球邮报》专栏作家杰弗瑞·辛普森(Jeffrey Simpson)也承认，“更多的评论员比以前更倾向右翼思维”。<sup>40</sup>

对媒介的所谓“左倾”自由主义偏见的保守主义攻击已经对新闻界产生了影响。在商界抱怨之后，CBC于1979年开始播出有关商业的《冒险》节目。1991年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alrone)在保守政客约翰·卡勒斯比公开斥责CBC“蓄意、持续且反复在几乎所有新闻和公共时事报道中有思想上的不诚实表现”后，把他任命为CBC董事会成员。<sup>41</sup>由于害怕被认为有左翼自由主义倾向，加上预算削减的不断威胁，20世纪80年代，CBC当局明显地淡化了调查性新闻及有观点的纪录片。<sup>42</sup>

媒介业主和经理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有助于解释为何媒介接受右翼经济议程。否认传媒业主的影响就“相当于假定如果整个媒体被工会、妇女组织或社会工作者控制，也肯定对媒介内容没有影响”。<sup>43</sup>

同时，新闻客观性体制本身在转向市场自由主义中发挥着作用，客观性的现行实践为那些具有最大的社会、政治资本来操纵媒介的组织开了方便之门，而这些力量目前与右翼的力量结盟，客观性和新闻媒介对政治、商业精英作为新闻来源的依靠，使得新闻接受了右翼的政治、经济议程。缩减税收、控制通货、减少赤字/债务是商界和金融界精英的政策主张。他们能够资助自己喜欢的政治候选人并补贴研究人员来制作图表和统计。他们有财力去竖起一个“赤字钟”(deficit clock)、组织会议、发表能取得媒介注意的演讲。更多地依靠社会安全网且更加担忧失业的社会底层的民众，因缺少有效的组织和较坚实的财力而难以引起注意。而且，批评媒介有反权威的偏见的保守派一定承认，媒介高高在上、愤世嫉俗的现代客观性的特征以及右翼关于政府膨胀的攻击，削弱了政府在财富和权力不断集中和私人化的年代，保护公众利益、公众服务、公众权力，简言之，就是公民权的能力。

客观性实践使得与这一向右转有关的价值观和政策主次上的变化看起来是普遍且不可避免的。市场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定位从原来处于异端的边缘转向合理分歧的范围,而且试图成为共识性的舆论。客观性的传统有助于使这种转变自然化。不像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的进步社会运动,其斗争是在大街上进行示威、集会、游行,目前的保守革命是一种非激烈但更有效的台后行为。例如,台后的游说或室内会议。它不必诉诸于那些会失去理智的激烈行为;相反,市场自由主义的经济概念被忠实地、“客观地”通过更加有权威的新闻媒介,以政治、商业、精英的讲演,对学院及右翼智囊团里的专家们的采访,保守的权威们的社论和无休止的言论的形式来传播和放大。新右翼不但没有被包容或被边缘化,而且能够制定新闻议程,移动公众争论的门柱,原来的右翼变成了中间派,原来的中间派变成左翼,原来的左翼变成了极端,没有任何发言的余地。

以上的成果在新闻媒介对待赤字/国债问题上有明显的表现。比较其他的问题,比如社会少数群体的公平权力,赤字问题是右翼分子经济议事议程的中心,因为它处于社会财富分配这一最关键的区域。正像许多评论家已经指出的那样,政府赤字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公众政治关注的焦点,然而那些商业精英们把这个问题抬高到一种新宗教的地位。米歇尔·温罗思(Michelle Weinroth)特别指出:

有关“账务”的语言,看似中性实则是权威的数字,已经淹没了国内纷繁嘈杂、意见不一的民族主义,取得了不受各种政治分歧限制的一致性。“赤字主义”已成了加拿大身份的同义语,与多年来争论不休乃至普通市民都认为无聊至极的民族主义话语截然不同。作为一种数字的修辞,这种思想已成为了一种“超民族主义”,被吹捧为是完全不同的、现代的且在争论之上的。这种超民族主义使财团利润成为光荣的象征,使全球化的竞争性成为新的道德。<sup>44</sup>

减少财政赤字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被新右翼分子广泛运用作为武器来推进他们削弱福利国家和削减社会服务的保守的政治和经济议程。<sup>45</sup>

根据这些商业精英们的提示,新闻媒介发动了一场“赤字战争”,并且用一种看似“客观”的方式来阐述各种通告,来运用当前最流行的打击赤字的文字武器。<sup>46</sup>例如,当格兰特·希尔(Grant Hill),一个改革党议员,在安大略宣布“债务和赤字正在扼杀社会福利,破坏医疗保健制度”时,这

在《温哥华太阳报》上成为新闻，没有任何限制，也无需加以平衡。<sup>47</sup>与此相似的是，当加拿大银行总裁发表演讲鼓励“继续同赤字和债务斗争”，且为投资者们创造“理想的环境”时，这又一次成了没有任何限制和无需加以平衡的新闻。<sup>48</sup>这些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成了麦奎(Linda McQuaig)所称的“人们头脑中没完没了的嘈杂声”。通过完全的重复，一个信息最终“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种枯燥的背景噪音，一种看不见却无法逃避的生活中的事实”。<sup>49</sup>

造成赤字/债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统计也多种多样，同样其解决的办法也不是单一的。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对赤字/债务有不同的政策取向和解决思路，但是这个复杂问题在新闻中的主要故事情节却很简单：加拿大负有巨额债务，该债务使加拿大处于财政危机的边缘，并且该债务也需要被当作国家的头等公共政策问题来对待。造成该债务的原因是福利国家、巨大的公共部门开支和超出国家财政手段之外过分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因此解决方法在于裁减公共部门和撤销社会福利项目。

通过简单的重复和拼凑，这种嫌贫爱富的新闻框架，压倒其他一切可能的框架而得到了提倡与强化。它已经成为描述现实的可以接受的版本，一种“客观的”新闻故事梗概。这种框架包括——商业和金融大腕们对所谓的“纯粹危机”的炒作（伴随着各种不同的杞忧者的警句：赤字大战、赤字战争、债务墙、处于悬崖边缘的加拿大、犹如癌症和病毒一样的赤字问题、恰如新西兰和“北方的墨西哥”、第三世界的名誉国家等），他们有时采用右翼智囊团荒唐的数学推算，有时追踪一些令公众感兴趣的故事，诸如一个小男孩如何捐出他的零花钱以减少国债之类。这种指赤字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和以削减社会服务计划为唯一的解决之道的新闻故事还编织了其他相关的题材：政府在管理社会计划上的无能、福利欺诈、失业保险的滥用、接受福利者的犯罪及中产阶级的抗税等，如麦奎所说：

我们被告知，债务问题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除了削减社会开支外别无选择。这种陈述被当作对我们所处的情景的客观的评价，并且常常在明显是中立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现在，想象如果一位媒体的评论员宣称“债务问题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除了增加富人的税收外别无选择”。这样的陈述会被明白无误、也是正确地视为一种观点的表述，而且不会被中立的新闻报道采纳。然而，这两种陈述都表达了观点——关于应该如何分配我们的社会资源的观点。很明显，第一种陈述所表达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经常被重复，以至于人们已很难看出其倾

确实，“我们已经付不起了”的论点以超越党派的形式出现。比方说，1996年5月21日的《环球邮报》就在社论中宣称“平衡预算的信念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但是，如果严格审视这种陈述，这种陈述本身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

同其他的一些意识形态化的论点一样，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反映赤字/债务和由此产生的大量削减社会开支的必要性的新闻框架，把特定集团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它炮制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我们”且粉饰了基本的阶级分歧；阶级分歧暗示了在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上的不同解决方案和不平等性。它所采用的高度物化和道德说教式的语言，有效地消除了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和政治选择的存在。让我们再次考察《环球邮报》1996年5月21日社论中的下述语句：“债务是社会福利计划的天敌，不断攀升的债务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计划将被削减以填充利息支付的无底洞。政府已经认识到不管他们征了多少税，花了多少钱，合乎伦理的领导会使收支平衡，以使社会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自然，去和一个只有索取而没有回报的“天敌”协商，是不可能的。事实上，麦奎回忆了作为《环球邮报》的一名记者，她是如何在某一天被叫到执行编辑的办公室听取关于她在报道税收政策时使用“富人”一词的抱怨。她被指示“不要让人听起来好像阶级斗争正在进行”。<sup>51</sup>

主导新闻框架也宣扬市场法则的至高无上，将其渗入政治和社会政策领域。它将政治民主转变为购物市场、公民转变为消费者。实际上，这一新闻框架促使读者放弃某些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闻报道忙于告诉人们巨额国债的危险和社会计划的难以为继的同时，那些充斥报刊的广告却在诱使那些购买新车和沙发的人们落入个人债务的泥沼。广告中说：“没有现金？没有关系！”

媒体对于赤字和债务及其解决方案的热切关注和有倾向的处理，创造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共识被制造出来了，关于赤字和债务的报道已经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果。就在几年前，赤字和债务问题还不是加拿大人关注的焦点。<sup>52</sup>但是现在，经过媒体几年的关注之后，商业精英们的观点终于成了“加拿大人”的观点。最终，1996年2月2日的《温哥华太阳报》能够将加拿大商会关于进一步减小赤字的呼吁和“普通加拿大人”观点，并列于“加拿大需要消除债务”的大字标题之下，并伴以安格斯·瑞德/萨斯姆新闻社(Angus Reid/Southam News)发布的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准备接受进一步减少赤字的措施”。

媒体对于赤字和债务的处理提供了如何在新闻报道中将右翼经济议程自然化的范例。与此同时,媒体将弗雷泽研究所作为新闻来源加以运用,也表明了市场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如何被主流化的。这个研究机构一直以反对战后进步自由民主派的舆论为己任,它的创立标志着新右翼在加拿大掀起意识形态反击的开始。多年来新闻媒体一直视弗雷泽研究所为极右,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今非昔比。该机构已从新闻舞台的边缘移至中央。正如一位政治学家所说:

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弗雷泽研究所的形象已从极右夸张的可笑例证,摇身一变成为在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理性、责任和权威的化身。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要提及该机构,而不再冠之以“右翼智囊团”的标签,右已成为一种规范,弗雷泽研究所现在已经和商会及豪威学会(C. D. Howe Institute)一样值得尊敬。<sup>53</sup>

的确,有关弗雷泽研究所及其研究成果的报道,经常出现在《温哥华太阳报》商务栏的头版。弗雷泽研究所的媒体噱头之一是它的“纳税自由日”年度报告。“纳税自由日”(译者注:一年中的某一天,之前人们的收入要交给政府,从这一天开始,人们所挣的钱归自己支配)因省份和年份不同而异,而对这一天的报道已成为家常便饭。“阿尔伯塔省憎恨捐税的人们今年提前一周庆贺纳税自由日”、“终于你能停止为征税者劳作了”、“直到星期一负荷重重,你今年的一切所得都用于纳税了”、“纳税自由日星期天开始”,这些大字标题醒目地出现在1995年6月16日的各主要报纸关于弗雷泽研究所的第18个年度“税务调查”报道中。<sup>54</sup>这些都与媒体对加拿大劳工大会一年一度的“公司赋税自由日”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客观地”报道弗雷泽研究所的观点和使它频频亮相的过程中,新闻报道不加分析地发布弗雷泽研究所值得怀疑的假设、范畴以及煽动性的语言;虚构出所谓的“普通加拿大人”和“平均收入达60 806加元的两人以上家庭”;将工作以“为政府工作”和“为家庭工作”虚假的二分法加以区别;把所有不同种类的税收都错误地混淆在一起,好像它们对不同的人都有相同的意义;而且运用煽情的词汇,政府“吃掉”家庭收入,人们为赋税而“劳役”。这个报告没有考虑那些在公共设施上使用得当的税收,实际上可能节约平均家庭支出。

詹姆斯·温特(James Winter)报告说,一项有关加拿大新闻社所撰写的经济报道的调查表明:在一年间,有140条经济报道引用了弗雷泽研究所的观点,而左翼的“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只在16条报道中被提

及。<sup>55</sup> 这些数据似乎表明了从长远的角度看,报道并没有做到媒体尽力追求的“平衡”。当然,新闻报道仍认真对待平衡的要求,虽然在实践中,这一技巧有许多方面,某一论点的相对重要性可依据情境而定。例如《温哥华太阳报》于1995年6月16日在有关弗雷泽研究所的“纳税自由日”的报道中指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劳工联合会主席批评自由日的可靠性,批评媒介只从表面价值来报道弗雷泽研究所的研究调查。”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绝好的平衡练习,即通过劳工反馈来平衡商业智囊团的观点。但是,这个陈述仅是略述而没有任何解释,工会领袖也没有任何机会继续详尽地描述自己的观点。在这则新闻中,以弗雷泽研究所经济学家迈克尔·科科高度肯定地评估了纳税自由日贡献的解释开头,以他关于这个数字如何每年被11个省府关注,多么地接近真理的言论而终结。总而言之,这两方面的言论,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真正的平衡。

平衡的取得还包含着用谁来平衡谁,以及一则新闻报道在对立面的观点中愿意深入多少的问题。例如,1995年10月,《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了另一则弗雷泽研究所关于国债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3.1万亿加元,或者说每个加拿大人平均105 000加元。要达到这个数字,需加上政府各个层面的债务和加拿大社会保险系统需要的款项:即医疗保险,老年保险,加拿大退休金计划和魁北克退休金老计划。研究所把这些公众项目政策当作“等待爆炸的公众政策定时炸弹”。按照惯例,报纸于1995年10月6日把这项调查放在商业/体育版区的头版头条,包括一个彩色的图表,以之用来表明债务的分布,和一个插入的条块,上面列有一系列的建议,“如何削减债务措施介绍,如何停止借款保证,同意公营公司的私人化,通过平衡预算和取消债务的立法,缩减政府花费”。跟图表不同的是,这些措施没有资料来源(因此被当作一般的常理来报道)。

该报道提及了该报告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很快就被罗宾·里查得森——报告的作者排除掉了。报道严格地根据新闻客观的必须程序,用一种老套的方式指出:“其他的经济学家不能够批评里查得森的方法,因为这个报告的数字附件不是公开的,而且在《温哥华太阳报》联系过的人中,没有任何人看到过这个研究。”换句话说,《温哥华太阳报》仿效了客观新闻报道的程序和做了必要的跑腿工作,但是,若是这个报道并不能让别人评论,为什么它偏偏在当时倾注了那么多的关注,为什么《温哥华太阳报》不就研究报告的出版做一个简短的报道,而把较长的报道等到能找到其他的评论以后再发?

《温哥华太阳报》确实也通过引用金融机构另外两个经济学家的话来



“平衡”这个研究，其中的一个同意了弗雷泽研究所的大部分观点，“但对研究所削减1/2花费的时间框架提出了疑问”；另外一个怀疑弗雷泽研究所的数字是否有水分。这算是对其右翼观点最关键的平衡了。

报纸“取得平衡”的另一个手段是在言论和信箱栏中涉及不同观点，一些专栏作家，比如《环球邮报》的瑞克·萨路丁(Rick Salutin)就撰文批评媒介爆炒赤字的做法。<sup>56</sup>《环球邮报》发表了平衡预算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社论后，报纸登了一封信，指出这也许是对的，但“削减赤字的整个程序却是被意识形态驱使的”。然而这些努力的频率、位置和明显带有个人主张的观点的形式，无论如何都不能平衡主流机构的声音和含蓄的新闻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框架的构建手段，包括加标题、调位置、加背景材料都会使不同的观点受到冲击。例如，1996年1月19日的《温哥华太阳报》群言版摘录了由“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CCPA)和“选择”这两个左翼组织联合发表有关财政赤字政府预算的报告。

文章选用的标题是：“解决我们的赤字问题，花钱！”但是文章本身包含了在实质上相当不同的观点。它认为失业、高利率、不公平的税收制度是导致“大量公债的真正原因”，它还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预算：“通过一个较轻松的货币政策、较低的利息率和较低的兑换率来刺激就业。”它认为这些措施可以削减政府债务利息的支付，在失业保险和补助上的花费，从而帮助“改进预算”。

这两个团体都打破传统观点，认为政府紧缩会恶化债务问题。一个更好的合适标题会是：“削减使债务更糟”或者“解决赤字问题，削减利息增加就业”。但是报纸选择的标题却用“花费”两个字眼覆盖了文章的内容，而这正好符合右翼激进经济思想对“左派”经济思想的偏见。与此形成对比，第二天，报纸对郭登·艾斯——（加拿大银行的行长）的一个演讲是以“加拿大银行行长让所有加拿大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方法”为标题进行报道的。<sup>57</sup>

报纸把弗雷泽研究所1995年10月一份未经温哥华地区的经济学家评论的、有关赤字的报告当作硬新闻，并把它发表在商业版的头版头条，它没有把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的公众政策研究当作一则消息——虽然根据《温哥华太阳报》，此文件在大范围的劳工、社会和社区组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中广为流传。然而，报纸只是选择性地摘录了一些，还配了一个令人误解的标题。顺便说一句，报纸在它的新闻报道中没有指明弗雷泽研究所作为商界赞助的智囊团的身份，却清楚地指出了加拿大“另类政策

中心”作为“建于渥太华的、工会资助的智囊团”和“选择”作为“社会公正组织的联盟”的身份，并配以引用标记，以显示《温哥华太阳报》在对待此类组织的身份问题上的公正立场。

但是，新闻媒介有意渲染右翼的经济议程而使左翼的声音边缘化，同时，他们也把极端右翼分子在有关社会事务中的所作所为边缘化。不过，这些都是不能危害资本的根本利益的（例子之一就是媒介对加拿大改革党在有关种族与同性恋问题上的极端右翼的观点持续关注）。在经济事务中，新闻媒介帮助控制那些可能威胁到资本根本利益的、极端社会保守主义者的言论（如美国的布坎南对自由贸易和大公司贪婪的批判以及基督教右翼对市场关系的一般性指责）。通过这些方法，新闻媒介维持了右翼关于它们有左翼自由倾向的攻击的可信度。

## 客观性的气氛

那些把当代新闻业视作天生的异见持有者和批评家的人们被愚弄了。新闻客观性体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提供了合法性的条件。它系统地制作着倾向于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和价值体系的有关现实世界的偏颇报道，另外又在受众面前掩盖自己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此基础上，新闻客观性体制使新闻赢得了难免包含在新闻中的“被喜欢的解读”。在当代北美社会，这些“被喜欢的解读”使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合法性和再生产成为可能。更详细一点说，在过去20年里，客观新闻性为右翼市场自由主义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新闻体制是十分保守的。

实际上，新闻媒介不仅仅成为市场自由竞争主义的传声筒，它在保证右翼意识形态霸权地位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客观的气氛，大众意识形态向右转将会缺乏可信度。在这里，我们的论点不是说新闻抛弃了客观性传统，而是关于客观性行动纲领是如何被重新定义和政治辩论的范围是如何被缩小的。那些规则仍然伴随左右，政治术语例如“左”和“右”仍在使用，试图平衡的措施也仍在起作用。然而，角色不同了，场地也不一样了。并且，不同词语也有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客观性体制在帮助转换政治形势的同时，自身也可能被这一转化带来的震动所毁灭。

## 危机中的体制：质疑自由 民主和客观新闻

虽然长期以来，客观性体制一直为诸多利益所支持，而今却面临危机。一种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客观报道的和平衡评论的语言，宣称为每个人说话的新闻，面临着来自思想、经济、社会和技术各个方面的威胁。

尽管对客观性的思想挑战并没有导致该体制的瓦解，但是它们却逐渐地削弱了新闻记者和受众对其可能性甚至可取性的信任。新闻报道的现存危机，还体现在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呈稳定下降趋势，1973年以来的民意调查显示，这一趋势是明显的。1988年还有55%被调查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信任电视新闻报道，仅仅5年以后，人数就下降到25%。<sup>1</sup>在加拿大，新闻报道的公众形象不像在美国那样糟。但是，1994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只有17%的加拿大人认为新闻工作者（20%的人认为电视记者）具有诚实的品质，他们仅排在律师、联邦政客和汽车推销员之前，而远远地排在药剂师、牧师、牙医、医生和大学教授之后。<sup>2</sup>

这种逐渐下降的地位，还明显地体现于好莱坞电影中对新闻记者的人物塑造上。电影的商业化不仅使电影影响着当前文化的主要模式，并且使电影成为流行态度的“晴雨表”。就在不久以前，电影中的新闻记者还是真理的追求者、腐败的揭露者，如《总统身边的人们》（“*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一片中，那两位揭露“水门事件”的勇敢无畏的新闻记者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斯坦（Bernstein）等。如今，大屏幕上的新闻记者们大都是白痴或草包，在追求事业成就或精神刺激时，他们常常曲解或无视伦理道德原则，沉湎于光影和危言耸听中，甚至于犯下谋杀的罪行（在《天生杀人狂》（*Nature Born Killer*）和《值得去死》（*To Die For*）这两部影片中）。<sup>3</sup>即便是在像《广播新闻》（*Broadcast News*）这样的浪

漫喜剧中,事业的成功取决于容貌,而不是才智或道德。

毫无疑问,新闻记者文化地位的下降与公众对他们的认识是有关联的。在公众眼中,他们在肮脏、阴谋和耸人听闻中坠落着。不幸的是,这些认识往往无法区别在职新闻记者和那些雇用他们的新闻机构的商业谋略。不过,那些精英的全国闻名的记者们自己也要为他们的职业名誉扫地负责。从他们不菲的演讲费用到他们与政治精英们的合流,华盛顿有名望的新闻记者们使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已成为他们所调查的当权派中的一员。<sup>4</sup>

无论多么令人不安,对新闻记者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存在于传媒制度中,事实上,更是整个自由民主制度中更为广泛的矛盾和挑战的征兆。

## 自由民主的危机

1990年,柏林墙被拆除以后,后马克思主义者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这样写道:“西方代议民主制国家,现在拥有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所没有的安全。”<sup>5</sup>就没有可靠的另类选择,以及内部严重到可以威胁到政治革命的斗争而言,这句话是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及其20世纪的主要外在形态,代议自由民主政治,经历了1917年俄国革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的侵略、随后的与苏联的“冷战”,以及60年代“新左翼”抗议者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洗礼,生存下来了。

的确,其他(多数显得很丑恶的)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攻击,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抬头了。在西欧和北美,从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和右翼煽动家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国民自卫队,种族主义在主流政治中已粉墨登场,不可以说的正被公开说出,这证明思想启蒙时期关于普遍平等权利和理性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并不是坚如磐石,不可动摇。法西斯主义远远不是暂时的,而可能是永远的诱惑。

这一威胁是真实的,并且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首先,要通过发展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充满人性的选择的国际性运动。但是,我们并不想夸大这些威胁,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宗教权威主义可能与当代经济和文化潮流很不和谐,并且其固有的不稳定性必将妨碍其未来发展。在一些事例中,如伊朗,神学统治甚至被证明是伪装政治“现代化”的工具。<sup>6</sup>与1917年或30年代不同,在90年代,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并不是生死存亡的威胁。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当代议民主政治正式地在全球传播开时,

人们感到比以前更加无能为力(无权力感)。<sup>7</sup>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病态感,甚至是危机感。但在关于什么构成了危机这一问题上,没有一致的意见。毕竟,把任何社会政治变化都定义为“危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sup>8</sup>这样定义,实质上也就是确定什么是正常的,令人向往的,什么又是蕴含威胁,并且亟须关注和补救行动的。有关危机的定义也依视角而定。对魁北克独立的支持者,1995年公决是一个机会,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则是一个危机。

但是,已故的美国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西(Christopher Lash)曾说,许多美国人“对未来远没有从前那么乐观了”。他们甚至询问民主政治是否有前途,“而他们有问这个问题的合理理由。”<sup>9</sup>这一说法极为正确。拉西指的是城市的败落,工作机会的消失、中产阶级的萎缩、贫穷人口的增长、犯罪率的上升、毒品交易的泛滥等问题。1992年,在BBC(英国广播电台)一个名为《遗产》(Legacy)的广播节目中,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和电影制片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更为广阔的画面:

在富有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断增长并加深的不安:因为污染,环境破坏,人类持续不断的勘探,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西方生活方式不论在道德上或实践上都无法持续下去的感觉。单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就足以确保(我们这颗)行星的持续健康吗?也许正是当它达到胜利顶点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文明达到了为了避免灾难,就必须向别人学习并转化自己的时候。<sup>10</sup>

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危机——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威胁,还有来自内部的,其操作中的逻辑体系的威胁。体系的合理性(物质的丰裕、个人的成就、负责任的政府)越来越与广大民众的生活现状不协调。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之间长期的紧张状态正不断地加深。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和历史上融为一体,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有不同的逻辑。民主政治的逻辑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自由主义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包括经常互相矛盾的人权/公民权和财产权),资本主义的主要逻辑是市场关系和资本积累。19世纪北美资本主义是自由的个体(男性)公民享有正式的、合法的平等权利,但是,在投票权上性别、种族和财产的限制,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还是极不民主的。

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通过长期的、全球性的、不完全的,有时是中断的历史融合,互相修改了彼此的逻辑。通过获得民主的投票选举权,

大部分人都能够磨平资本主义粗糙的边缘,迫使西欧、加拿大、美国的政府引入由税收支持的社会福利项目。虽然资本主义不仅生产了社会财富,而且产生了与创造利润和私有权的强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它也给公共改革确立了具体的政治界限。当选举出来的,被赋予民主权利的政府(不太经常地)挑战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时,其后果将是来自特权阶层的反民主的逆反抨击。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1973年在美国的纵容下,发生的一起推翻智利已当选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血腥军事政变。新的军事集团实行恐怖统治,到处都可以见到成千上万名智利人被捕、受折磨、被谋杀或被流放。各政治党派被取缔,新闻出版受到审查,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被限制。该军事政团原意是立志追求“自由企业”经济政策,但它花费了16年时间才恢复了已被破坏殆尽的民主外壳。<sup>11</sup>

在相对繁荣和社会舆论相对一致的时候,这些存在于民主资本主义内部的紧张状态一般被减到最低程度。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有两个活动使这些紧张状态再度萌发。首先,时间回溯到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市场自由主义的政治胜利进一步确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损害另类的社会和经济逻辑为代价的市场关系的主导地位。<sup>12</sup>其次,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重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失业和不安全感。

随着西方社会民主党派在选举和意识形态上的失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严重失败,与市场主义相区别的明显的、吸引人的另类选择不存在了——不是因为它们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市场自由主义的当前势力使它们难以想象、难以讨论,这种另类选择不存在是民主政治不健全的一部分。当代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鲍里斯·卡加尔利里特斯基(Boris Kagarlitsky)说:

没有选择必将导致各种代议民主政治的腐化。但是,在这一事例中,民主政治的危机,与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或70年代的拉丁美洲不同,没有导致民主机构的快速瓦解。相反,这些机构是缓慢腐化并死亡,它们不断地被经济决定,甚至政治过程本身所僭越。<sup>13</sup>

市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极有可能摧毁自由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力量性”,这个词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人类需求和生产的无限扩张、财富及消费品的无限攫取上的,市场自由主义是其意识形态润滑剂。然而,我

们的星球正面临着超消费的危机，地球资源和环境正在恶化。这一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技术的进步以及主流的发展模式。诚然，在体系内部的确存在相反的倾向，计算机革命和越来越多的以信息与观念的形式出现的商品，可以降低不可更新资源的紧张度。<sup>14</sup>但是，这些相反的倾向是否足以中和资本主义膨胀的动力，很值得怀疑。

就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后果而论，市场自由主义威胁民主政治的可持续性的第二层含义在于：文化和民主自治政治机构不断地自我重新塑造的能力，以及为增进人类的幸福发挥其潜能的能力。市场自由主义不仅鼓励了攫取的、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并且使贪婪和自私变得即使不是魅力十足，看起来也是正常、自然且有益的，因此，它逐渐地破坏了对同一团体的归属感、保持相互尊重所需的共同的文化和接受不符合个人喜好的民主政治决定的意愿。如果市场霸权逐渐损害了较传统的人类价值观念，如家庭观、团体观、伦理观，以及在经济利益外的相互义务，那么市场自由主义对此并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无足轻重。同时，市场自由主义对个人决定和契约在市场中是分配资源和决定社会优先权的唯一合法途径的强调，贬低了公共领域：消费者取代了公民。

市场自由主义对社会服务项目和肯定性行为的攻击在性别上不是中性的：妇女不相称地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在自由民主政治胜利后的许多年里，妇女由于没有选举权和完全平等的权利，而被迫远离政治。即使是有正式的、合法的平等权，无论是在选举出来的、作为公共领域化身的代表性机构的概念中，还是私生活领域内对个人权利的定义，都没有很好处理家庭的政治经济和对妇女劳动力的剥削。作为一种鼓励和奖赏有社会意义的活动的方式，市场具有极多的限制和偏见，人们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尤其是妇女在做家务、带孩子这样的工作上。这些工作是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因素，但是，这些工作获得的经济报酬却极低。的确，它们甚至没有在市场交易上有任何表达。

除了不断扩大的性别差异，市场自由经济政策——福利的持续减少，收入的向上重新分配，便利资本流动和积累的放松管制——促进了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它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分配上，而且体现在文化资本的分配上。阶级不平等造成政治和传播权利的差异，使自由民主的法律与政治上形式平等的政治原则逐渐变得空乏。毫无疑问，投票的正式权利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不断增长的政治（竞选）活动的有效电视转播费用和对竞选费用的不充分限制赋予有钱人不相称的议程设置权，它的重要性就降低了。获得有效的公民权的先决条件包括基本享有传播和物质资源

的权利。那些有钱、有时间、有技能的人,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财富,但是,在一个信息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时代,一个公共机构相对衰弱的时代,与他们相对的人,是新兴的“信息下层阶级”(Information Underclass)。<sup>15</sup>

当广泛的阶级不平等与种族、民族的划分大量重叠时,社会秩序就像放在火药箱上一样,一不小心就会点燃。当一名白人警察,在被拍摄到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后,仍被判无罪时,洛杉矶的几个区陷入了一场近似内战的搏斗中。当经济上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变得更为牢固时,一项研究发现,在加拿大,经济不平等和种族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联系。<sup>16</sup>最令人惊奇的是,在内部殖民主义和文化衰败的条件下,土著居民经受着远远超出国家平均比率的贫穷、失业、死亡、疾病、意外事故和监禁。

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府体制,还没有很好地对待国家的问题。与大多数其他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它假定国家是政治活动的载体,是人民意愿的化身,是公正、安全、平等这些普通价值观念的储存者和保证者。<sup>17</sup>然而,国家目前正在失去它们的功能和权威,变得无法保护或压制其公民。

国家政府权威下降的原因部分在于全球化的进程和跨国商业的兴起。长期以来,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严厉的货币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外部压力,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目前,在西方,国家主权也正在被国际金融机构和贸易组织所取代。欧盟至少还有国际民主机构(泛欧政党、选举和国会),但是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却没有如此被公众所认可的机制。的确,NAFTA一直都被称作是北美的一个“新经济宪法”——一个有效地把权利从选举出来的政府那儿分离到私人资本手中的机制。<sup>18</sup>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北美的市民文化正在被“精英们的叛乱”逐步摧毁:经济和政府领导人乘坐大型喷气式飞机漫游全球,通过全球计算机网络传送广泛的有虚拟价值的资源,而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社区的公民义务感正在被淡化。在美国,更甚于在加拿大,当市中心陷入第三世界的境地时,甚至连中产阶级者也越来越多地聚集在防卫森严的关门社区(gated communities),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医疗、安全和休闲服务设施。

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危机,进一步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市场自由主义者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以牺牲其他的诊断为代价,把对赤字的某一特定的解释和解决方案自然化,即把赤字看成是无效率的政府、浪费



了的社会开支的结果，而不是高实际利率、低税收、经济滑坡的结果。市场自由政策使中产阶级背负了较沉重的税，社会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减少，私有化成螺旋式上升。当政府刺激市民投资公共生活的能力逐渐下降时，它可以感觉到的合理性和它包容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在下降。很难相信，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现存危机与国家社会福利项目的破坏毫无关联：对许多人来说，促使国家存在的理由是越来越少了。

因此，市场自由主义极有可能激发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民族主义运动没有必要非得采取猛烈的人种净化的形式，例如，苏格兰和魁北克民族主义就是和平的、民主的和在社会观点上自由的。然而，它们对现存的自由民主政体的灵活性和容忍性提出了基本的挑战。国家的逐步衰败从成百万没有国家的人（难民、非法移民及“客座工人”）身上，可以进一步地看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都是没有任何身份的“非人”，他们没有公民权，因而他们受经济剥削或更糟的残害的危险性更大。

更为戏剧性的是，国家正在失去他们对合法暴力手段的垄断。军阀和私人武装力量不再是第三世界或是前苏联范围内才有的现象，在美国最近发生的几起右翼武装和恐怖活动的案件，也显示了这一迹象。我们可以亲见在美国的城市中有连警察也不敢涉足的禁区。在“冷战”后的武器廉价倾销的刺激下，猖獗的国际小型武器贸易为混乱的秩序增加了新的威胁。<sup>19</sup>的确，“国家”概念本来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发明物——直到20世纪这个概念适用于占全球面积3%的国家。<sup>20</sup>地理/文化在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越来越多的地方，匮乏、犯罪、人口过多、种族主义和疾病的压力已经危及到国家权威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这些启示性的因素表明，不仅仅是民主政治，包括人类社会的基本可统治性，都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使我们很轻易地陷于威权主义的诱惑中，得出民主实在是无法实现的结论，认为我们必须限制它，甚至于牺牲它来避免完全的混乱。即使是在自由民主制度自己的政治精英们内部，这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二战后，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竞争性的精英主义就认为，尽可能少的公共参与有利于稳定——即使它意味着实际上降低了从公共领域里的广泛、持久的参与中获得民主技巧的普遍教育的机会。<sup>21</sup>其实公民们被期望的不是广泛参与，而仅仅是每隔几年在政治领导人的候选队伍中做个选择。这些候选人不会受到来自顺从的公民的任何压力，他们被期望能够促成利益集团间，例如英语和法语的加拿大人之间的政治妥协。根据这一理论，在文化分裂的社会中，精英们的和解可以提高政治稳定性。通过定期选举、政党间的竞争，以及在资源和影响力上同其他

社会领域(如商业、劳工、宗教、传媒等)的精英们的竞争,政治精英被认为是足以担负起责任的。

即使假定那种令人舒服的安排不过是一个合法的神话,它看起来还是难以维系。其原因一部分在于一个无情地、有选择性地对政府的丑行和失误加以强调的传媒体系;另一部分在于政治和其他机构的精英们自身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些严重错误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到加拿大各省领导和联邦领导间看似没有尽头、通常也无任何结果的立宪谈判中可见一斑。作为回应,北美出现了一种比较令人鼓舞的倾向: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重新振奋代表性的民族政治。按作家纽曼(Peter C. Newman)的观点来看,加拿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从屈尊文化转变到一种蔑视文化,更加直接地要求能担负起责任的政府和更有效的参与途径,如全民公决。<sup>22</sup>

这样的政治异化能在政治系统中释放出一定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主要被民粹党右派所吸纳,其表现形式包括加拿大改革党的兴起,美国百万富翁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慷慨的总统竞选活动。但是,这一倾向是不幸的,因为右翼民粹主义会损害可持续的民主政治。它想使政府民主化,可是,除了保证监狱关满犯人和强化商业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的固有不平等性外,它没有任何的作用。右翼民粹主义在公开场合的声音是刺耳的、是自以为是的集权主义,甚至有种族主义和恐惧人类的倾向,但是他们在公民美德——容忍并乐意接纳不同观点和利益的表达上,保持缄默。

一直以来民粹主义者的反叛给先前自满的政治精英们敲响了一个极为必要的警钟。也许,它所表达的一定程度的异化,可以向更为进步和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它们无法有像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美国极右翼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所提供的传媒接近机会,但是左翼的民众活动当然也没有在北美消失。<sup>23</sup>例如,在加拿大英语区,由一个叫“加拿大人议会”(the Council of Canadians)的组织聚集了有60 000人在内的联盟,在保护社会项目,向大商业公司和财阀政治势力挑战的斗争中一马当先。

当民粹主义成为对政治不满的一种表现形成时,成百万的北美人退出了官方政治。在美国,投票者弃权已经成了一个国际笑话,在1988年和1966年的总统竞选中,不参与投票者达到了选民一半的人数。在这之后的国会选举中,投票者人数更少。投票率在加拿大要明显高一些。在那里有意义的政治选择(对竞选花费有限制并非偶然)稍微多一点。然而,大体上,边界两边的百万民众都在原则上抛弃了通过群体或政治手段

来改善人类生活的某种可能性。相反，他们要么寻求通过宗教自我拯救的个体香格里拉，要么苦心追逐个人物质财富，尽管这种财富梦的实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下是多么艰难与渺茫。参加工会和政党的人数说不定恰好与购买彩票和互助保险资金的人数存在着负面的对应关系。

总的来说，在加拿大和美国，公共生活正趋衰败。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被边缘化。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有限资源的紧张，全球资本主义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主张服从威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分离与脱钩，这不是不可以想象的。

在北美，在一个消费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的“常识革命”的文化中，人们也许会轻易地忘记：人民进步运动才是把19世纪不民主的自由主义变成20世纪自由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左翼”的文化和政治力量迫使精英们承认除他们之外的其余人的政治权利和物质利益。“左翼”目前的政治弱勢，使精英们能更轻易地以经济自由的名义——一种事实上只对少数人有利的自由，夺回民众已经争取到的社会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开明的资本家也开始发出了警告。例如，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1997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就承认，有着无法控制的不平等性和“适者生存”哲学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开放、民主社会的“头号敌人”。<sup>24</sup>

## 客观性体制的危机

无论其程度深浅，新闻报道与民主政治的危机是有关联的。制造出绝大多数新闻的跨国传媒企业集团远远不是超然的旁观者，而是全球资本主义正在运行的逻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话，传媒很可能会服务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建立在传媒和信息基础上的大公司，促进了像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作为全球化中心的跨国组织的先锋。位于领导地位的传媒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和老板，同其他的商业和政治领导人一样，在同样享有特权的和相对紧密的社会圈子中活动。保罗·德马雷(Paul Desmarais)，几十家报刊、广播公司和大型金融公司的老板，向我们显示了经济、政治和传播力量在加拿大的结合。他是现任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的女儿的公公，现任财政大臣保罗·马丁(Paul Martin Jr.)的前雇主，前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的现任雇主。<sup>25</sup>

一般来说，除了传媒所有者的政治利益外，新闻话语本身在构建或扩

大社会力量和知识这一意义上,具有天生的政治特性。虽然,新闻是非党派的,独立于政府的,主要由私人和以赢利为主导方向的公司经营,但是它却能确立议程,定义现实,是选举政治的一道风景。例如,商业传媒对消费主义的提倡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几亿美元的广告收入上,还非常微妙地表现在娱乐和信息内容所蕴涵的观点中。

即使当新闻达到其最高标准,如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诺尔顿·纳什(Knowlton Nash)或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斯坦(Bernstein)这样的圣像所包含的,它也无法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中的批判性自我省视提供任何空间。的确,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感到,客观性为媒体实践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正逐渐破坏着民主的公共生活。按两位著名的传媒学者的观点来看,像报道赛马和奇观一样来报道政治新闻,与客观准则有直接的联系:

传媒对政治活动中心的占领有非政治化的意义。这是因为,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传媒的合法性和在公众中的可信度是建立在它们非政治的地位和它们没有明显的政治、尤其是党派政治的动机,这一定位构成了它们注重人格和事件的流动而不是政策的基础。这一对政治过程的态度转换接着被传播给观众,使他们认为这是对政治的合适的视角。<sup>26</sup>

毫不奇怪,政治在公众的想象中已经有所贬低,它不再被看作是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或是建立规范和分摊费用与代价的集体过程,更不用说是在高层次上追求公共生活的卓越和公平了。相反,它被看成是纳税人被迫以牺牲他们极为珍视的个人消费为代价的制度化的丑闻和骗局工业。这一假定促使社会权利从选举出来的,至少是名义上负责任的政府手中,转移到不是选举出来的,只对少数重要股东负责的私人官僚机构手中。

另外,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及的联系:客观新闻报道和民主政治竞争式的经营模式之间的历史和结构上的联系。这些联系在美国传奇式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认为本质性问题应该由具有丰富知识的管理者来决定。在他看来,公众没有能力,也不愿亲自管理他们自己,只要专家们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政府政策可以给他们带来物质的丰裕,他们愿意接受由专家组成的政府的领导。在复杂的工业社会里,随着专家治理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直接的民主政治和广泛的公民品格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李普曼对公共舆论持极度怀疑的态

度，认为它易被感情左右、易被简单化、是刻板成见，因而与不为个人感情或利益所影响的科学调查正好相反。从这个相当消极的观点来看，新闻报道的功能不是去激化争论，而是传递有助于专家们做出最好决定的客观信息。<sup>27</sup>正如温哥华合作电台在与 CRTC 就有关平衡问题的争论中所提出的，客观性体制把新闻记者们造就成对公众说话，为公众说话、甚至于完全取代公众的“职业”传播者。

因此，一方面，我们有深刻的全球危机；另一方面，我们有唤醒公众意识、对宰制性机构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必要，以期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这样的一个改变显然包含了价值和选择的明晰化、基本假设的重新检验、对新的共识的积极探讨。简言之，这是一个社会传播的丰富进程，而这在对客观性体制抱残守缺、为极度商业利益所驱动的媒体系统中是极可能出现的。

如果客观新闻报道有助于使市场自由主义自然化，并在某些重要方面促成了公共生活的衰败，那么反过来，自由市场主义的全球化霸权，对新闻报道及它作为独立的公共领域的潜能，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新闻媒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最新策略正在侵蚀着客观性体制的基础。首先，不断扩大的阶级分化对过去曾经是客观性的主要支持者的中产市场的大众传媒，即公共广播、主流电视新闻和包罗万象的都市日报，提出了挑战。都市中产阶级和有熟练技术的工人阶级是都市日报的社会基础，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他们作为中间阶级，正在以相对的比例缩小。这个分化不仅体现在纯收入上，而且体现在文化取向和获得信息的途径上。拥有丰富信息的人将会大量获得象征性资源和资讯，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地干预政治、经济生活，或者是主导政治经济生活。但是，随着与政治相关的信息逐渐变得私有化和商业化，以及由税收支撑的政府信息也要实行有偿使用，正在出现的信息贫困阶层将越来越失去得到相关的政治信息的机会。<sup>28</sup>

这种阶级分化造成了北美新闻报道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分化——一种英国报刊体系长期所特有的分化。对于人口中富裕保守的那一部分人来说，如今在《华尔街日报》或者《环球邮报》这种类型的报纸中所体现的客观性仍会显得很重要：细节具体准确，但是观点却局限于相对狭小和保守的范围内。处于越来越具有保守和商业倾向的编辑部文化中的高质量新闻报道将继续寻找“真实”，但这一真实仅仅被定义和被接受于宫墙之内，而不是在外面的农民阶级中。<sup>29</sup>

没有调解器或胀鼓鼓的钱包的人，只好将就于以广告为基础的传统

新闻系统。在这里，放松管制、频道多元化和竞争压力没有催生真正的多元化，而是导致了一致中的竞争——一成不变的犯罪和灾难，危言耸听的信息娱乐化。这样的小报式新闻坚持客观性体制的一个特殊方面：无论虚假与否，它替普通老百姓说话，但是它专注于信息娱乐化、追星、丑闻，并有使问题极端化和通常在社会底层寻找替罪羊的倾向。这样的新闻很难为持久的民主政治创造一个公共话语的模式。如果这样说听起来太玩世不恭，那么请看看美国地方商业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问问自己谁正在被称呼，什么样的威胁在被确认，什么样的鼓动性信息（“使观众有所行动的”信息）正在被播出。<sup>30</sup>

如果阶级分化把公众分成客观新闻试图对他们说和为他们说这两部分，媒介本身的政治经济中的发展正进一步侵蚀业已建立的新闻传媒的影响。虽然 500 个频道的视听世界还没有实现，但是大量的专业有线频道出现时，电视网原有的观众也就分散了。年轻人和移动的郊区人口，并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与公共团体联系得那么紧密，他们正失去读报的习惯。作为娱乐、对话和信息的来源，个人电脑正在把观众从大众传媒那儿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即便是在那些媒体内，新闻也正丧失它曾经作为一个独立载体的权威和功能。摇滚电视节目（rock videos）和谈话形式的广播节目（talk radio）表现了客观新闻报道所不能表达的许多人的情感。政治家们对此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开始绕过主流新闻的高级把关人。比尔·克林顿在一个晚间电视“脱口秀”（talk show）中演奏萨克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古怪的政治家罗斯·佩罗特利用拉里·金（Larry King）的 CNN 电话参与节目作为他政治竞选的跳板，夜间笑话节目主持人杰伊·莱诺（Jay Leno）和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成为政治形象的仲裁者。

阶级分化和观众的分流，致使新闻媒体更难以采纳客观性的普遍声音。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 19 世纪新闻界的党派性小团体的狭隘偏见有所回归，同时配以 20 世纪适于电视播送的、互动的格式。美国广播媒体还没有完全屈服于反政治的消费主义。全部节目和频道都服务于单一主张的广播出现了。原则上这种解释和公开申明是值得提倡的，但是一个放松管制的商业传媒系统往往会提倡过激言辞，而非平和论理；维护有充足资金的团体的利益，而非其他的什么团体利益。美国广播中倡导性节目的右翼倾向不是偶然的。并且，受众分流及社会、政治的两极分化，带来了把公共领域分成若干小的、彼此敌对的组成部分的危机。

作为对商业广播的主要另类选择，在美国和加拿大，公共广播系统在

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困境，保守的媒体机构和政治家们攻击公共广播公司，因它们有他们所认为的“左翼”自由主义偏见。<sup>31</sup>加拿大联邦自由政府背弃了它答应提供 CBC(加拿大广播公司)资金的承诺，相反，削减了它的经费，面对着失去越来越多工作人员和节目的危机，CBC(像 PBC 一样)被迫寻求更多的商业收入途经，与之相伴的倾向性自然也不可避免。就客观性体制而言，这样的压力会造成好几种后果。它们弱化了广播系统中拥有最能规约平衡和客观性的部门的能力，一个有时在提供最高质量的“客观”新闻报道——深度、文明、多元化、思想性和相对独立性的部门。但是，政治和财政的不稳定性将导致公共广播报道人员在定义客观性上更保守，在公共事务节目安排中，他们常常避免触怒有权势的人，甚至像有人批评 PBS 那样，避免了公共事务的内容，追逐非竞争性的自然节目——鱼、皮毛、羽毛。

自由市场倡导者通过对商业广播公司放松管制，进一步削弱了客观性体制。在美国，里根政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废除了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平衡，作为客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已不再是强加于广播和电视执照上的特定附加要求。这种放松管制能使无线电波被粗俗的、简单的覆盖了从中间偏右到极右政治范围的拉什·林博和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所劫持。也许，在传媒中最让人吃惊的偏执狂要数鲍勃·格兰特(Bob Grant)，他曾是 ABC(美国广播公司)旗舰纽约电台的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不再害怕有现场反驳，格兰特煽动种族仇视的事件包括：与臭名昭著的新纳粹分子汤姆·梅茨格(Tom Metzger)的友好的闲谈，为白人至上组织“美国复兴运动”做广告，喋喋不休地散布诋毁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恶语。<sup>32</sup>在公众的压力下，ABC 新老板迪斯尼公司(Disney)在 1996 年解雇了格兰特。<sup>33</sup>大体上讲，随着经传媒调节的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琐碎化、戏剧化、被边缘化、商品化，实质性公共事务的理性的、审慎的方法被边缘化。

自由市场倡导者提倡放松管制，把它看成是从压制的政府中获得自由，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对新闻媒体成为独立公共论坛的能力构成的最大威胁——不加管制的媒体公司自身，以及它们合并、联合和吞并的狂潮。公共政策没有阻碍媒体的集中，反而给它们提供了便利。在以更多的竞争来代替管制的奥威尔式(Orwellian)伪装下，美国国会在 1995 至 1996 年通过的法规，实际上消除了对国内集中(national concentration)和跨媒体所有权的限制，从而进一步破坏了对公众负责的途径。<sup>34</sup>也许是美国电信史上对商业利润的最大让步，这一新立法对美国，因此也是对全球媒介

体制框架有深远影响。最有可能从中获益的主要媒体对这一立法提供了极少的新闻报道。<sup>35</sup>

其他相关的发展有可能进一步威胁新闻报道的多样化、质量和独立。新闻机构正面临着巨大经济压力。它们包括广告收入的竞争，一定费用的上涨（尤指新闻纸），资本在新的传媒技术合并、吞并上的战略性分配，以及新所有者的优先顺序：与以前的家族公司比，今天的企业集团的股东们更重视的是短期效益的高水准，而不是他们的传媒投资的长期新闻声誉。<sup>36</sup>

这些压力造成了多重后果。许多传统新闻媒体正以减少浪费为由，解雇工作人员，削减编辑室预算。以加拿大主要报纸公司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霍林格(Hollinger)为例，它除了在一两个有潜能的“旗舰”报纸适度地增加了报道工作人员外，该公司在其两个主要的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的日报里，急速大量地削减雇员。编辑部的缩减、被强化的对赢利的关注和更为保守的政治气氛，都导致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费用高且具冒险性的调查报道的逐渐减少。事实上，商业和机构的宣传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是新闻——它们由新兴的公共关系业制作，而有财力享受这些公共关系公司提供的形象管理服务的大多是政府和大公司。估计有40%~80%的新闻来源于公共关系(PR)的职业人士，在北美他们的人数比新闻工作者多165 000人到140 000人左右。<sup>37</sup>

此外，新闻机构中那堵曾经立于编辑决策和商业决策间的神圣的墙正在崩塌之中。从80年代以来，电视网新闻部门的特权，自治权和资源就开始呈下滑的趋势，在新闻界，大家都信奉“total newspapering”(总体办报)的管理哲学：一种“编辑、广告、发行、研究和促销功能围绕着市场经营进行协调”的方法。<sup>38</sup>道·安德伍德(Doug Underwood)认为，日报的编辑们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任何其他的公司实体的经理”，“把读者群看作是市场，把新闻看作是吸引那个市场的产品”。其后果之一就是信息娱乐潮泛滥——“对生动的奇闻逸事的崇拜”。<sup>39</sup>

总的来说，在新闻媒体政治经济中的这些最新趋势，降低了公众对新闻业的尊重。新闻报道的可信度也因新闻变得更为赤裸裸地受到少数传媒公司的市场和政治利益的影响而受损。为了保持他们在受众心目中的可信度，传媒公司常常试图掩饰他们的权势和自我利益，虽然像康拉德·布莱克一样武断和具干涉性的所有者的公众形象使这一姿态难以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96年省选期间，布莱克的合作伙伴大卫·瑞德勒(David Radler)对右翼的自由党的赞助，无疑造成了布莱克控制的霍林格



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日报对该党的恭顺。

然而，也许新闻媒体的巨头们现在是如此地有权势，如此地不畏惧大体是右翼的政府，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客观性作为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缺乏与之抗衡的公共政策、政治意愿或市场竞争，主流媒体会被诱惑而沉迷于太过明显的党派性或自我服务的传媒活动中——尤其是当与他们的直接公司利益相关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与曾经激进的英国工党之间的关系的奇怪事件。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的新闻公司，每年有大约8亿美元的收入，是“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帝国之一”。<sup>40</sup>它控制了超过1/3的英国报纸发行量(包括伦敦颇有声望的《泰晤士报》)和全英全部的卫星广播系统。长期以来，默多克就运用这种史无前例的权力扶植和毁掉英国的政治家们。他的报纸甚至采用英国报界公开的党派标准，予以1979—1990年间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热情洋溢的新闻报道，同时，对反对派的和平运动、工会、进步的社会活动和工党进行恶意报道。投票研究表明，默多克的小报《太阳报》(Sun)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票者，为梅杰(John Major)的保守党赢得了1992年那场势均力敌的大选。<sup>41</sup>不过，为了给政治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否决一项有关限制跨媒体所有权的议案，默多克转向反对梅杰，并开始向工党领袖布莱尔(Tony Blair)示好。1995年7月，默多克和布莱尔(几十年来最保守的工党领袖)在澳大利亚的岛屿胜地进行磋商后，布莱尔开始为默多克的报纸撰写一些有观点的文章。<sup>42</sup>工党采纳了对默多克友好的政策立场，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了政党和政府对传媒巨头的屈从，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情况。

当前，传媒商业主义的扩张必将对新闻文化产生影响。看来商业电视新闻报道将越来越根据娱乐价值、观众收视率、名人地位、表现性的演出来定义职业特性，而不是客观和调查。在不断涌现的在线“赛柏空间”新闻编辑室里，如MSNBC，微软和NBC的合作的产物，要评估这些变化仍为时过早。虽然这些表达渠道主要是由现存的主要新闻媒体的扩张带来的，它们似乎强调的是直接性和把信息重新包装成不同的形式。由此产生的新型记者，按资深调查记者史蒂夫·温博格(Steve Weinberg)的话说，就是那些“在不知道如何采写和解释信息的情境下，注重创造出吸引人的图表，扩充资料库”的人。<sup>43</sup>即便是日报的新闻记者们也发现难以坚守客观和独立的真理追求者的自我形象。新闻工作者们正开始不安地察觉，市场驱动和老板一直以来不断膨胀的商业利益冲击着他们的工作，蔑视或重新定义“职业”规范。

虽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因市场逻辑而产生了客观性体制,但是现在两者正在分离之中。19世纪开了客观性之先河的新闻报道,所面临的挑战是对付可靠性信息的短缺,以及纠正在“大众”经济和政治兴起的年代里过渡的党派性。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公众”对社区的依附感、对政治参与的承诺逐渐衰败的年代,对新闻报道(和民主政治)的挑战是信息过量、时间短缺,以及对信息的筛选和理解的不充分。

早期商业日报的市场动机是通过易获取(accessible)、不偏不倚(impartial)、却有重要政治意味的信息,来吸引最为庞大的终端市场人群或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富裕读者。一个世纪后,在利润驱使下的信息提供者,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逐渐放弃了公共生活的受众。

民主公共生活的病态和客观性体制的被动摇了的基础,急切提出了重新思考新闻的公共哲学的要求。第一步就是批评性地重新考虑一些常常与客观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传媒的自由主义理论。

## 消耗殆尽了的意识形态：传媒的自由主义理论依据

传统自由主义关于新闻界的恰当作用的概念,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新闻和民主政治的现存危机。例如,保护现有传媒体制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对新闻界脱离政府对新闻的检查或干涉的重要性的确认。这种新闻相对于政府的自由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或加拿大人权宪章中均有保证。

我们当然不赞成政府对新闻的权威控制。一个独立的、多元的传媒体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但是,作为规范性的指导方针,自由主义的新闻出版自由概念有几个主要局限性。

正如法律教授哈里·格拉斯毕克(Harry Glasbeek)在1982年《加拿大人权宪章》付诸实施后所预言的那样,法庭保守地解释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sup>44</sup>也就是说,法庭实际上把新闻出版自由看成是传媒所有者的财产权。宪章能被很好地用来保护传媒企业集团的所有者,使其不受旨在使新闻出版的控制或内容多元化的政府政策的影响。

加拿大和美国法庭没有对以下也许更加民主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定义表示类似的强烈赞同。这包括公民的知情权;新闻记者不受来自公司管理层的干涉而表达自己的权利;在媒体中为受攻击的个人或团体提供答复的权利;或是给那些目前自己的声音受到排斥的人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权利。传媒所有者——通常也包括新闻记者——为保守的新闻自由定

义而辩护。这个定义不涉及新闻界对公众的责任或商业逻辑和传媒公司本身对自由和多元化表达的限制。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一样，这个定义狭隘地强调政府是人类自由的主要威胁，并且没有为新闻记者们提供一个关于如何按照受到合法保护的独立性来行事的积极的公共哲学。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新闻界对政府滥用权力的监督功能，即所谓的“看门狗”角色。如果能得到最佳发挥，这一角色确实能为民主的目的而服务。这一“看门狗”的传统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加拿大新闻界最近有关几个事件的曝光就显示了这一作用：

◇克雷蒂安政府关于恢复巡洋舰导弹测试的决定。

◇当加拿大政府花费几百万开展反吸烟运动时，它与烟草公司又签订了每年几百万加元的合同的细节。

◇加拿大秘密电子侦察机构(Canada's secret electronic spy agency)、通信安全机构(CSE; the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计划开发鉴别个人声音的能力，因为它能巡视空中、收集“情报”。

◇CSE 前任分析家泄露，通信安全机构监视加拿大盟国和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出售给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加都”原子反应堆，出现了严重的结构上和潜在的灾难性误差。

◇加拿大外交部和加拿大国际发展局几百万加元的浪费和混乱管理。

◇加拿大向土耳其出售 GF-5 战斗机的秘密政府谈判内幕，这些战斗机有可能被用来对付库尔德平民。这一报道和对这一报道的反应使该项交易流产。<sup>45</sup>

尽管有像上述这些偶尔的报道，主流媒体的政治新闻报道更典型的是揭露丑闻，以及个别政客所卷入的利益纷争，而不是就诸如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由于自由主义理论对什么是公共领域、什么是私人领域的隐性划分，监督性新闻对权力极大的私营公司的有系统的批评性关注比对政府的关注更少。

监督性道德体系也忽视了传媒本身的巨大力量，也就是说没什么“看门狗”来对“看门狗”进行监督。正如正直的新闻记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在真正的大问题上，新闻界的行为看起来更像一只宠物狗而不是看门狗。<sup>46</sup>

根据 1995 年美国“被审查的新闻”(Project Censored)所述，美国新闻界没有充分报道或完全忽略报道的有：

◇对电信业的大规模的放宽管制；

◇美国政府每年对企业一千六百七十亿之多的各种补贴,这项开支的取消能使美国政府在不需削减社会福利项目的情况下,平衡其预算;

◇美国对童工法实施的不严格,造成成千上万名儿童在工作地受伤,甚至死亡;

◇一个几十亿美元的用于增进核弹头爆炸效力的项目;

◇每年在医疗诈骗上损失的钱已达一千亿美元,甚至更多;

◇在一家烟草公司对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Capital Cities/ABC)提出100亿美元的诽谤控告的同时,ABC取消了一部揭露烟草工业的纪录片;

◇美国化学工业反对禁止甲醇溴化物——一种有毒的可破坏臭氧层的农药;

◇美国医院每年由于差错或疏忽造成的病人的死亡人数高达180 000人。<sup>47</sup>

也许因为加拿大太小而无法承受这种规模的不完善,也许因为它的传媒系统和政治文化更为多元化,加拿大没有被充分报道的事件的名单与美国相比失色很多。然而,在加拿大也同样明显地存在着类似的传媒盲点,包括给有钱人逃税机会,加拿大与违背人权的政府(如印尼)之间友好的贸易援助关系,加拿大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与其作为和平维护者的自身形象相悖的国际军火贸易。<sup>48</sup>

虽然,监督性理念是一个有价值的理念——假如美国有更多的新闻记者追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或斯通(I. F. Stone)的足迹,假如加拿大有更多的像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第五阶层》(*The Fifth Estate*)这样的节目,也许权利之棒将会更公正、更负责任地被挥舞——但是监督性作用是很有局限的,无法为新闻报道提供任何可以包罗万象的公共哲学。如果得到最佳的发挥,它能质问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或引起人们对某项急需的改革的关注。但实际上,传媒机构经常有选择性地使用其监督功能,来为其对政府的一种普遍敌意的观点作装饰,或为了它们自己的商业或政治利益发动某些恶意性攻击,例如反对福利享受者或性侵犯者,因为比起违法的公司法人,批评这样的对象会更安全。<sup>49</sup>

即使是得到最佳发挥,监督性传统也不可能极大地改进公共辩论和民主决策的状况,它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把政府看成是对个人自由的最有可能的威胁这一过时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排除了政府可能服务于积极的公共目的的社会民主哲学,而且排除了对私营机构所拥有的巨大但

不对公众负责的权力的监督。并且，监督性传统是建立在公众有精力和政治意愿来进行改革这一信念基础上的。实际上，现在这一活力已远远没有一个世纪前“掏粪者”新闻鼎盛时代那么明显了。最后，监督性传统不太可能对自由民主政治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新审视，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违反自由民主政治标准的行为的道德性叙述，自由民主政治本身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看门狗”也许善于对入侵者吠叫，但它们没有分析它们护卫的是谁的房子以及它们是如何知道对谁吠叫的能力。

第三个陈旧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把新闻假设成信息自助餐。通过给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不同的观点和信息，从而使他们在政治市场中做出合理的、个体的选择，而且新闻这一功能使得代议政治成为可能。多元性的确是民主的传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然而，“信息自助餐”概念是建立在一个天真的隐性假设上的，即信息是中性的、非意识形态的、非政治的——简单地说，是客观的。但是，正如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提出：“信息只有在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话语中才具有意义，表现性的思想和系统是相互竞争的团体用以提高他们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宝库中的一部分，传媒信息作用从来不单纯是信息性的，它也是一种在利益竞争者矫饰的宣称间做出仲裁的方法。”<sup>50</sup>

无论它看起来是多么的中性，信息呈现事关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分配、特定利益和价值观的霸权地位。新闻报道不能隐藏在仅仅只提供信息这一宣称的掩体后面。它必须关注是谁得到了说话的机会，新闻报道是从什么样的视角来构架的。

新闻作为“信息自助餐”的观念，过分地强调了个体是分析的单位，忽视了在有集体组织的社会中帮助提高个体利益的现代政治结构，如政党、利益集团等。可以说，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对传媒应该如何处理与这些利益的关系，以及如何“增进它们的作用”没有任何说法。<sup>51</sup>

此外，“信息自助餐”概念要求公众在做出有意义的政治选择前，必须从新闻媒体中获猎广泛的、所有相关信息。这就强加给新闻界和公众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写道，如果我们期望新闻界来翻译“人类全部的公共生活，致使每个成年人在每个未决问题上达成一个看法”，那么，新闻界注定要失职，因为这一期望假设了“一种对乏味无趣的真相的求知欲望，而这一真相在我们自己体味的任何诚实分析中并未被发现”。<sup>52</sup>自助餐模式过分强调政治心理和公共话语的理性。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已向我们表明人类理性是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纵使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并非理性主义者的虚幻之物，它也

是有存在条件的,这一存在条件远远超出仅仅是对充分信息的获取,而且新闻报道也许在帮助创造或保持这些存在条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自助餐模式的过度理性主义,在给予印刷媒体中“严肃的”有关高层政治的“信息”的特权地位这点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少提及娱乐或视觉媒体,而这两者在通俗文化中对权力关系的表意起着即使经常不被认识到,却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低级信息”传媒会与现实生活经验产生共鸣,它们是政治和文化斗争的重要场所。

最后,虽然李普曼否定了消息灵通的公民的理想,但是信息自助餐概念至少在一种意义上与他的竞争性精英民主政治模式是十分一致的,思想和政治选择的这一概念,将公民降格为信息消费者的角色,他们的信息是由职业信息传播者提供,他们的政治选择是在不同政党中做出,这就排除了公民普遍的积极参与角色。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第四个理论依据是把新闻界看作历史的直接观察者,即“代表公众的见证人”角色。海湾战争后,在1991年渥太华有关媒体和国际冲突的会议上,CBC记者安·梅地纳对这一角色作了表述。<sup>53</sup>在海湾战争中,记者们被集中在官方许可的报道团中,远离战争地带,报道完全依赖于五角大楼发出的新闻稿。在这种情景之下,梅地纳表述了一个可敬的愿望。见证这个概念,在新闻圈的词汇中确实是有价值的,许多电视节目特别试图宣称这一传统是它们自己的——从CBC“新闻世界”专业频道的以《见证》(Witness)命名的节目到美国地方电视台的《目击新闻》(Eyewitness News),都体现了这一点。

然而,把这一概念作为新闻报道的全面公共哲学,也太过狭义,太成问题。许多新闻报道的任务(解释、分析、观点)不能被简化为见证和事件记录。正如客观性准则的批评家们指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谁决定什么是值得目击的?即使是最职业的、最客观的观察者是否能记录下事件的本质真相或意义?超越文化、阶级、性别的过滤器虽有可能,却并不容易。尽管对后现代主义时髦的狂热有些过度,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承认“本质真实或意义”这一概念已经被解构得体无完肤,无法再复原了。

有时,这种极力保持超脱的表面客观努力本身就是有欺骗性、有倾向、具有侵扰性的,要不然就是本身不能自圆其说。一位叫里塔·谢尔顿·德弗雷尔(Rita Shelton Deverell)的电视频道制片人给我们讲述了一位年轻的、白种男性新闻记者的故事。由于他太冲动、太我行我素地坚持客观的、超脱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他失去了一次对一个康复圈子(传统的土著医药的一部分)进行电视报道的机会;而另一位记者,通过其个

人的寻根活动,制作出一部一个很小的有关盎格鲁——印第安社团的很有感染力的纪录片。按丹佛里尔的观点,对新闻报道的主要挑战不是“客观、超越现实、似乎我们并没有卷入到现实中去”,而是准确地揭示和评估我们以及其他人的主观性,了解“我们”与“他们”在相互依存中彼此的位置。<sup>54</sup>

## ◆ 消费者至上的神话

在这个市场自由主义占强势的年代里,新闻界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即“消费者至上”观念。根据这一观点,当市场机制从法规限制中解放出来时,媒体就能最好地服务于社会,因为这样一来媒体的节目安排就能反映受众的口味和喜好。

但是,无论是作为对传媒目前表现的合理化解释,还是作为媒体改革的标准理想,把消费者至上理论作为民主传播模式存在严重缺陷。该模式假定受众具有左右其媒体消费的有意识的、合理安排的喜好。但是,媒体消费常常只是习惯和癖好的产物,是在传媒公司认为有利可图,便于提供的、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的选择。根据这一分析思路,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大众对电视的品味部分地来源于节目策划者和制片者本人,是对商业需求的回应。<sup>55</sup>

即使消费者真的有自己的相对自主的喜好,他们的权力也会因主要传媒工业的经济特征而极大地削减(见第3章)。加拿大商业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充斥了美国节目,但这不是因为观众喜爱美国节目,不喜欢具有相同制作水准的本土节目。相反,加拿大广播商们发现,引进在巨大的美国市场上已经收回了制作成本的美国节目,其费用要比制作相当的加拿大节目的费用低得多。同样,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暴力场面,并不是因为要满足观众嗜血成性的欲望,而是因为善恶相斗的动作片可以轻易地被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市场上,并且不会在翻译中过多地失去影片的原貌。<sup>56</sup>商业广播和电视中脱口秀(talk show)节目的增加,不是因为观众对搞笑的狂叫和对日常生活中令人捧腹的丑态的描述突然胃口大增,更不是因为广播工作的民主动机,而是因为经济现实:这些节目是用来填空时间的相对便宜的方法,而且又能吸引到相当多的观众。

在传统商业新闻传媒中,影响其内容的首要经济因素是广告。那些赞成把广告作为传媒经济基础的人士认为,商业主义降低了消费者对传媒费用的直接花费,而且保证了传媒迎合受众的口味,因为广告费与受众

数量是相互联系的。<sup>57</sup>他们还认为，广告保证了传媒在经济上独立于政府，并因此使新闻自由成为可能。虽然脱离政府压制的新闻自由（除非这种自由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如被告在公正的审判中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但没有被广泛地认识到的是，市场关系和政府一样，也能够轻易地压制民众的民主传播。

历史地看，制造可赢利的受众的体制性压力可以被理解为构成新闻检查的有力实现——如果我们采纳一种比政府压制新闻出版的自由概念更广泛、更实用于当代现实生活的新闻检查的定义的话，那么由加拿大新闻记者协会、西蒙弗雷泽大学等单位合作的加拿大新闻监测项目，则把新闻检查定义为对本应该在公共范围内的重要信息的删除或淡化处理，而这至少在部分上又可归因于权力资源的不平等，以及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或明或暗的恐惧、威胁或强加的处罚来实现的。<sup>58</sup>在这种意义上，传媒商业主义导致了新闻检查，因为它促使了在内容上去迎合广告商希望达到的消费者，尤其是富有的消费者。<sup>59</sup>在决定什么样的媒体可以在商业体系中继续生存时，这里的逻辑是一块钱，一张选票，而不是一个人，一张选票。

类似的倾向性也在信息和娱乐节目（我们习惯于把它们看成是媒体内容）作为“免费午餐”去诱使受众去看最重要的内容——广告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sup>60</sup>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商业媒体认为私人消费的快乐感比民主公民的价值——参与制定可为集体运用的规则的公共过程，要更有优先权。

很难看到以市场为导向的传媒体系如何能克服这些结构上的倾向性。虽然对特种市场的追求，受众的分流以及收费的专业广播频道的发展，会减轻因追求最大公约数而引起的趋同的压力，但是它们仍保持或强化了广告商和（或）富有的消费者的相对影响。台式出版（desk-top publishing）和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可以降低到达少量受众的费用，可是真正决定公共议程的媒体目前仍掌握在没有任何可预见的堪与之相匹敌的全球巨无霸手中。

经济上的倾向性，使传媒市场不再是对所有公民而言都可以平等地接触到，并能得到回应的民主讲坛。这种倾向性不是恶意或操纵的结果，而是理性的商业决定的副产品。同时，传媒所有者和公司，就像有商业利益和抱负一样，也会有政治利益和抱负。他们的政治利益有时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如当它们对政府施压，要求对信息有更大的获得权的立法时。但是，至少在全球化的 20 世纪 90 年代，传媒公司的政



治权力导致现实的新闻审查的可能性变大。

默多克显示权力的行动就是一个有倾向性的例子。1995年,当他麾下的福克斯(FOX)电视网的决策者最终认识到制片人/导演迈克尔·莫尔(Michael Moore)不仅仅只是一个看起来愚蠢的笑星,而是一个“左翼”的、同情工会的政治讽刺家的时候,福克斯电视网取消了一个由他制作的极有趣的杂志节目,尽管它的观众人数上升到1 500万人。很显然,在美国电视网上,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立锥之地的。<sup>61</sup>

基于这些原因,商业传媒不是简单地给人们他们想要的,它们只满足部分人的部分需求,当然这一需求在商业媒体看来也正是人们所想要的——传媒公司认为既经济又适合于提供的节目,这些节目大体上与消费主义的理念是相符的,是富有的消费者和/或大众消费者群(这些人在全面范围内进行选择的可能有限)加入受众群的回报。商业传媒首先要满足与商品的促销相符的需求。那种无利可图,或威胁我们的消费主义的文化的的需求,是不会被理睬的。在民主政治中,这些要求包括为公民提供公共话语的空间。在加拿大,市场逻辑和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之间的差距,早已被公认,而不仅仅是“左翼”分子的一孔之见。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是保守党政府创办了非商业性的公共广播,并把它看作是加拿大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国家实体存在的根本条件。

最后,即使商业传媒体系能够被办得能更多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它也不一定能创造出那种可以支持或维系多少有点不同、更加主张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逻辑的公共性、交互式对话。为了民主政治的运作,人们需要把自己看作是公民,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仅仅当作是购物场中追逐个人利益的消费者。

## 见微知著：客观性体制的替代？

有人认为，鉴于新的传媒技术本身所固有的民主化特征，我们无须为媒体的民主危机或是传媒力量的全球集中化过分担忧。在他们看来，电信传送系统的迅速发展，正改变着新闻业和其他社会实践。这一发展包括将大大增加可利用渠道的数量的卫星通信、光纤及数字广播，还有那些用于摄入、存储、合成、反馈、分析和编辑数据、文本、声音、图像方面的个人电脑和数字/集成电路设备的飞速演进。从前孤立的技术系统，像计算机、报纸、有线电视、电话广播等，现在逐渐融合成为一体。

继温哥华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之后，人们把这些新技术所产生的新型媒体体验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在这个概念空间里，人们的语言、人际关系、数据、财富和权力都是通过运用计算机中介通讯技术(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表现出来。<sup>1</sup>目前的热点是互联网，一种用CMC技术把“全球各地的人联结在一起，共同参与讨论的互联计算机网络。”<sup>2</sup>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角落是万维网网站(World Wide Web)。它可使数以万计的用户“公开”出版自己的多媒体文件。

经过二十多年的尝试，这些技术似乎已达到了一个无可逆转的地步，它将改变新闻的“制作、处理、传播和消费的方式”。<sup>3</sup>哈佛大学的一位知名专业人士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工作场所和家庭中的联网计算机将与现有的新闻媒体平等地竞争，成为工业国家中超过半数人的常规新闻来源”。<sup>4</sup>

### 赛博空间和其他新媒体：是民主救世主还是数字噩梦？

除了它无可怀疑的持续性和对人类文化深远的影响之外，信息革命的发展轨迹还未可知。即使是学识最渊博的专家及记者们

也得承认他们对此仍不能有确定的说法，更何况我们呢？在这次技术与传播的新浪潮中，有两种前景的竞争最为激烈：一种是对技术网络持乐观态度，它强调技术给人类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带来的潜在益处；还有一种批判性观点，虽然较悲观，但是可能更加实际，它强调目前缺乏的是一场有力的使通信民主化和技术完善化的运动。这两种观点都预见新闻的深远变革。

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依赖于对新兴技术，尤其是赛博空间的几种关键阐释。首先，互联网被有意地以非集中的方式构建，从而使美国政府的通讯网络在核攻击下能免于灾难。这种系统以互为独立的“结点”为基础，这些结点是独立的，同时又与其他结点和更大的不断扩大的“网站”相联结。<sup>5</sup>因此，互联网可看作是个基层系统。它可以抵抗集中化控制和审查制度。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允许用户发出、接收信息，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和对传播环境的控制。

持技术乐观主义观点的人在更广的范围内认为，新的传媒开发了创造力，摈弃了等级制度，再次激发了民主，并创造出新型的社会群体。当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把即时性、互动性及深度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时，过去的时间、空间、媒介和地点方面的限制似乎神奇般地消失了（这里的时间和地点被认为是抑制因素，而非给人类的存在提供意义、延续性和一定的必需局限的基本尺度）。这些人谈到了（多数对多数的要用网络模式）取代传统媒体的（少数对少数的）广播模式。<sup>6</sup>

技术乐观主义观点的最终图景是一个全球性电子公共领域：在其中，人人都拥有一套便利的通信设备，能够收发来自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体或组织的可视信息，文本信息或声音信息。加拿大传播幻想家（visionary）马歇尔·麦克卢汉几十年前的一个比喻非常适合用来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随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在麦克卢汉式的‘地球村’里制作并共享信息，他们自然会越来越少地依靠那些来自传统媒体的信息。”<sup>7</sup>这些传统媒体就包括位于客观性体制中心的报纸和广播媒体。

就新闻包装和表述而言，网络及万维网站意味着“新闻洞（newshole）”和“新闻广播”不再有界限。<sup>8</sup>面对一则新闻报道，读者可以只敲一下键，就不仅可以参考以前事例或类似事件，还可以查到报道的背景资料，也可根本置之不理。印刷、音频、视频可结合成一个多媒体文件，而这要比从传统媒体中获得的内容丰富得多。

乐观者称赞互联网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折，它改变了人们以往只是单向新闻的被动消费者的形象。<sup>9</sup>互联网用户可以使新闻适合自身的特定

需要,比如使用能自动定制检索的软件,还可以自己也成为记者、新闻传播者和目击者。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能够更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信息市场上更加活跃的参与者,尤其是在主流媒体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而只是作了表面报道的复杂的政策问题上。<sup>10</sup>互联网还增强了非政府组织干预政治危机的能力。1994年,墨西哥扎巴提斯塔党人就是使用互联网调节政府对奇亚巴斯叛乱所做出的反应。因此,公众对话范围扩大了,结束了职业新闻记者的垄断,使传统的等级制度发生了逆转。正如克里斯·法姆(Chris Lapham)指出的:“互联网不同于那种信息来自顶层的单对多模式,它的信息来源于底部,再迂回曲折向上传递。”<sup>11</sup>

技术乐观者相信,新媒体正在打破由少数(职业记者)向多数(被动的无名的公众)传递“客观”新闻的模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新媒体模糊了记者新闻来源和受众之间的界限的方式表示认同。据艾伦·休谟(Ellen Hume)关于新闻未来的一份报告,新闻制作可以更互动、更富有对话性,从而缩短记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态势,甚至从根本上抛开记者,使“新型新闻变成新闻来源与观众之间的一种无中介合作”。<sup>12</sup>新闻主体的观点不再会遇到压制和歪曲,新闻报道也不会再被定格在某个严格的框架内了。

在一篇一气呵成的网络散文中,一位年轻的在线记者表达了她希望与受众沟通的心愿:

让世界各地的人亲近地、直接地利用我的报道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知道阅读我的新闻的人对我所说的很在意,是使我在获取新闻时保持真诚的最好的保证,把文字、图像、信息,以前所未有的、从未想象过的形式捆绑在一起,全面得令人不可置信,把世界性、充满真情实意的资讯捧送到千千万万的民众手中。……也许网上有机的新闻联结能通过一种特别灵活、有力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一条传送纯新闻的路径。我们就可与甘愿为观众的人直接沟通。<sup>13</sup>

传统的新闻机构近年来一直通过 E-mail 测试观众的反馈。第一次尝试于 1994 年 6 月由一名美国高级记者着手进行。当时,正值《时代》总编因那张臭名昭著的辛普森封面照,而上网向公众作解释。<sup>14</sup>与此同时,负责《新闻周刊》“拉家常”和“新闻组”的编辑描述了他的希望,参与者们将发展成为“一支新型的报道队伍,制作出的新闻少一点编辑痕迹,而更像是读者之间的对话”。<sup>15</sup>

通过使读者成为更加积极的交流者，新技术为更加主观性的解释和体验开启了大门——以其支持者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个性化新闻的新纪元。例如：

1) 奇观，由 IBM 和西尔斯(Sears)发起的商业性网上服务节目，在它的新闻简报栏目中，它启用了遍布全国的非专业性的“通讯员”报道 1996 年美国大选。一位通讯员说，报道不同于由职业媒体制作的节目，因为报道中的个人观点均表露无遗。一位通讯员说，这种报道是“诚实的”，是“实实在在的想法”。<sup>16</sup>

2) 即将面世的“便携式新闻工作室”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成为记者的机会。一位单枪匹马采访在外的记者能够制作出报道的每一部分，从新闻通讯社中下载、剪辑背景材料和录像手段，到对新闻进行实地的数字编辑以及直接通过卫星将新闻传送到视频分布系统。<sup>17</sup>这种单兵作战集记者、摄影师、录音师及编辑于一体，节省了开支，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电视新闻所需的团队工作。

3) 轻便的摄像机能制作出个人化、平民化的基层报道，这在以前的电视新闻中是不可想象的。众所周知，洛杉矶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是被一部家庭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这突出显示了轻便摄像机超越专业记者的能力，令官方新闻来源大为尴尬。

不过，人们对于这些发展——比如模糊记者与读者间的界限、新闻更为互动的特性以及个性化新闻的繁荣——所持的怀疑态度也并非无的放矢。它们并不一定意味着新闻将弃客观性体制和民主模式于不顾，进入一种由多数向多数进行民主的同级传递的新时代，也不意味着新的模式将替换旧的客观性体制，并且为 21 世纪的民主性传播提供一个充分的场所。

虽然新型数码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拥有巨大潜能，能使新闻及民主交流获得新的生机，但把网络空间视为民主的救世者的观点是无视市场的历史性、经济性和权力现实的。技术有其独特的逻辑和能力，但是对于它们是如何发展，或是否被发展，却不存在任何必然。这种发展受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制约。正如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所言，1994 年以来，美国互联网已经以惊人的速度被商业化了。1996 年的电信法肯定了指导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是市场，而不是公共政策。<sup>18</sup>如果这一技术的反垄断的倾向性使传媒巨头追逐利润的野心无法实现的话，那么，互联网就有可能仅仅在传媒文化的边缘地带萎缩下去，用于互联网升级并使它进入更多家庭所需的巨大投资

将不会唾手可得。<sup>19</sup>但是,如果它确实有利可图,私有企业会出于利益动机购买并操作网上的新站点。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削弱赛柏空间制衡受传媒公司追求利润控制的传播系统的潜在能力。

这一幕曾经上演过。当收音机于20世纪20年代问世的时候,人们皆为其民主性和教育功能拍手称快,直到商业利益击败了一场推动非赢利公共广播发展的运动,并且把美国的空中电波转变为一条能够吸引听众,并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广告商的渠道。在加拿大,政府的有力措施使得一个公共传播机构能在被以广告为基础的电台吞没之前顺利诞生。<sup>20</sup>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它受到了财政、政治上的打击,与美国商业电台的肥皂剧和煽动性言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加拿大广播电台仍继续保持其令人尊重和面向各阶层的听众的声音。

可以肯定,作为网络——而不是广播——模式媒体,互联网较广播有更多的多样性及互动性。许多网上活跃分子正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由网络(Freenets)努力增强它的触及面,并使之服务于大众。但是,在以市场逻辑为驱动力的模式中,互联网的任何发展都将出自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资本领域,这种模式的逻辑就阻碍了公众与网络的接触和互动。起先,通过互联网产生利润的方法受到阻挠,因为互联网上的内容历来免费,而且网上冲浪(指用户由一个信息站跳到另一信息站)实在不很合适于做广告。然而事实证明,商业力量对于战胜这些通往赢利之路的障碍是相当得心应手的。

由于广告财富需要寻求大量(或者专注的)观众,新的适合这样的经济环境的内容已经发展起来了,“妇女之线”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节目面向女性网民,信息和来源都是免费提供的,但需列维—施特劳斯(Levis-Strauss)这类机构的赞助。<sup>21</sup>商业媒体网站,比如点播网络(PointCast)也在迅速发展。它在加拿大的版权由《环球邮报》所有。用户可自由进入一些主流新闻、天气、娱乐、体育以及最新股市行情站点,但是该免费信息必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情境中才能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照亮了屏幕的每个角落,而且你一离开这个网络,即被直接送到最后一个广告商的网站上。另一种策略把互联网技术傻瓜化,使其更容易为商业逻辑服务。索尼公司已采用了网络电视,它可以接受信息,却不具备或很少具备输送信息的功能。西戈公司(Seга)和任天堂公司(Nintendo)也积极地搭建他们的新游戏的网络平台。这种技术正把一个具有潜在解放性的媒体转变为一个一指一点的信息搜寻游戏。在这种商业逻辑之下,内容除了要为广告商吸引到所需的观众人数之外,还会有什么宗旨?当然,这一点还有

待商榷。(确实,在线广告还以惊人的速度侵袭万维网,仅1996年一季度至二季度就增长83%,1996年上半年收入达6400万美元<sup>22</sup>)。

在这个商业化环境中,社区新闻简讯、另类新闻组及其他类似节目也许可以在边缘地带存活下来,广播和网络空间中的专业节目和特种节目也会繁殖起来。尽管市场自由者把这种繁殖称为是多样化和选择性的天堂。这种多样性却为“内容提供者”的便利和有利可图的标准所限。多数用户都可能会被由资产雄厚的全球性媒体集团所提供的高成本制作、包装精美的多媒体娱乐节目所吸引。互动性将被减弱至在现有的菜单上的选择和网上购物。软件产业巨子微软公司已经新装备了它的微软网络(MSN),以便能提供“一个六个频道、有20个节目的为消费者送上最新资讯的电视式结构,而不是等他们自己去探索”。<sup>23</sup>因此,寡头式的网络供给商有能力限制用户接近其他电脑用户的机会,或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审查信息,商业性的生产系统早已这么做了。<sup>24</sup>

电子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是,政府通过网络进行新闻审查及监督。<sup>25</sup>但是威胁民主传播的更大可能是边缘化那些无利可图的或是直接威胁到媒体集团利益的信息。早在1994年,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一位能言但很有思想的网虫就承认:

近年来,网络转型的步伐日益加快,由政府出资、纳税人支持且相对不受限制的公众论坛转向了私人拥有、供给的媒体。这使当今许多笃信电子民主和全球性网络文化的人的许多幻想成为泡影。当电信网络有足够能力传送高保真声音、图像和文本的时候,网络的特性(以及控制网络的产业)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成为)一个集有线电视公司的管道、电话公司的资金,以及娱乐公司的内容于一体的混合物。<sup>26</sup>

简单地说,除非得到有力的公众政策的扶持,否则一个横向的可供参与的通讯模式是不会单单因新技术而产生的。尽管有了互联网的個人主义色彩的电子新边疆神话,新媒体和其他媒体一样,控制在屈指可数的巨型集团(大猩猩 Gorillas)手中,边缘还有一大群小而灵活的专门捕获少数特色观众的小游击队员(Guerrillas)。<sup>27</sup>这些大猩猩们,如时代华纳,正在使尽浑身解数抢占有利地形,结成前所未有的战略联盟。微软和NBC联手组建MSNBC就是一个例证,这个24小时新闻节目于1996年7月开始在互联网和有线电视上开播。

就供应方来说,新媒体及其内容会受到巨头们操纵,而接收端的构造却可能加深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乏者(即为穷人和富人的委婉语)之间的

差距。虽然越来越多的人的确比以前有更多的获得更多信息的机会，新媒体也使只能让有能力承受价格不菲的“凯迪拉克”式信息服务的机构和富有用户受益的特种市场成为可能。在一个由市场主宰的商业环境中，普通服务和计算机普及知识远远得不到保障，学校和图书馆——这类可以提高普及和增进智能的公共机构——正面临着财政削减。对60%~70%没有电脑的北美家庭来说，私人电脑仍是奢侈品。1996年，网络空间观众估计约为全北美人口的15%。<sup>28</sup> 制造商集中于个人电脑的高档市场。由个人电脑的不断升级而形成的人为过时达到了“天方夜谭”式、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由于没有公共资源来平衡市场逻辑，个人电脑只会变成一个进一步增加我们这个社会中经济和教育差距的工具。<sup>29</sup> 信息不平等使一切对电子民主的来临的庆贺显得为时过早。

尽管新媒体有能力将横向对话扩大到整个社会，但是这种能力会造成信息泛滥，重要的信息会湮灭于公司腔调、似是而非的信息广告、电子争论、特殊利益团体的口号以及其他真实性可疑的信息海洋之中。<sup>30</sup> 另一个可能性是公众话语分割化，其结果是，“多数人的消费选择只是增强了他们的个人偏见和陈腐观点，甚至更糟”。<sup>31</sup> 网络空间本身不能制造出一个新的、参与式的政治文化，正如麦克切斯尼所说：“一个有大众性、互动的新闻简讯榜确实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如果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谈论什么，那又有什么用呢？”<sup>32</sup> 这个判断可能稍稍苛刻了一点：互联网确实为被传统媒介忽视的消息灵通的活跃分子，也为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们创造了传播途径，而且在实际社区中的网络参与者的能力也越来越得以提高。

然而，就算这是可能的，即新闻业的全社会性的议程设置功能被横向的、大众参与的传播淹没，或是被正在分化中的看起来更多元、实际上有结构性倾向的传媒系统分割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况也未必是可取的。虽然客观性体制起到了保守的意识形态作用，但是它也拥有一个重要的民主内核。很难想象，没有独立的、具有分析性和调查性的关注公众利益、面向广大受众并拥有资深的专业研究人员和传播者的新闻业，民主的公众生活还能繁荣成长。可以肯定，在一个信息泛滥的年代，许多新闻消费者本身就会非常需要那些能够选择、编辑、验证、分清本末、综合并诠释的令人信赖的信息过滤者。受众所表达的这种需求，给传统新闻媒体的把关者们带来了在新的数字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希望。如《纽约时报》发行人所说：“未来信息数据堆的受害者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向导，领着他们在信息迷宫中前进。在未来岁月中，报纸只



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而不会失去一丝一毫。”<sup>33</sup>例如，《费城问讯报》的一位负责县级政治动向的记者，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关注网络上的一个专门报道地方政府信息与争辩的新闻简讯节目。最初他担心用户会因不用付费而从网上读到信息，因而对他的工作造成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得出结论：人们仍旧指望报纸能以不带任何偏见的方式选择和表达关键的信息。<sup>34</sup>《渥太华公民报》的传媒专栏作家希望，“电子报纸和互联网会使新闻业成为一项发展的产业，记者也成为一件抢手的商品”。<sup>35</sup>有些记者和观察者不仅与新技术握手言和，而且还积极地拥护它们，他们为一个新的“新闻业的真正黄金时代”的到来而欢呼雀跃。<sup>36</sup>

然而，考虑到商业用途对数字技术的取用，不仅对其互动的传播潜能，而且对独立的、关注大众利益的新闻业提出挑战，这种乐观情绪就有必要降温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电视网因竞争压力而转向“小报式电视”，而极有可能的是，融合了新媒体的商业巨头并不比它们更信奉独立新闻的传统精髓。信息高速公路中出现的商业驱动力会造成反对有争议的政治内容的结构性偏差。迪斯尼公司的总裁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说过，迪斯尼公司预计的增长是建立在全球性的绝大多数政府都不会觉得受到威胁的“非政治”产品上。<sup>37</sup>令人寒心的是，他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新闻机构之一ABC新闻的大老板。

小型摄像机在电视制作中的使用也值得一书。在商业网络中，录影新闻主要限于“美国最滑稽家庭录像”，或者是经过编导的像“警察”这类纪实性的警察抓坏蛋的法制性节目。与此相比，反而是公共电视通过使用手提摄像机为新的声音提供了机会。PBS已经播出了好几个来自大众的录影带纪录片，比如《旅程》这个节目讲述了6名有着不同民族背景的青少年开着大篷车走遍全国的艰难旅程。其间，他们遭遇了毒品、种族主义及死亡的侵扰，也碰到了许多别的青少年。<sup>38</sup>

在追求利润的环境中的数字化技术还会削弱记者寻求独立新闻的能力。计算机化长久以来是商业集团追逐利润的救星，但对工人来说，它却是个祸根。当它与体制性和经济性驱动力联系在一起时，它会产生一种高度非民主性影响。电脑化命令和控制系统的使用已经大大降低工业工作的技术含量，创造出了不断盘剥和监视劳工的“电子血汗工厂”。<sup>39</sup>

记者们无法抵御这种负面的技术经济逻辑。毋庸置疑，许多记者发现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而且正如N. H. 梅纳德所说，新技术可以增强“新闻记者采写大新闻和重要报道的能力”。<sup>40</sup>通过计算机，记者可以前所未有地接近信息资源，也可制作出以前不能做到的趋

势性报道或形势分析。早在1986年,一则由计算机辅助制作的有关公众场所种族偏见的特写就为《达拉斯晨报》赢得了普利策奖。<sup>41</sup>不过,与此同时,许多记者怀疑,管理部门在“授权”这样堂而皇之的字眼下,运用高新技术以削减开支、减少工人数量、增加工作强度,导致出现大批颇为成功的“布隆伯格商业新闻社”(Bloomberg Business News)这样的电子血汗工厂。在这个庞大的计算机化金融信息通讯社中,年轻的新闻工作者长时间劳作,持续躬耕于计算机终端之上,吃着公司提供的工作快餐,计算着数据,输入“真实时间”的新闻,他们腕缠绷带以缓解反复劳作的压力综合征。<sup>42</sup>

当今技术革新浪潮中的经济性刺激在于“信息的二次权力及派生性权利,即将之再包装、编辑、以制成新的东西”,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对旧信息的重新组织,使之再循环,而不是寻找和制造新信息。<sup>43</sup>最为典型的是,记者可能会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工作于一个组织环境中,该环境侧重对利己信源的信息的高效再制作,他们无法运用技术制造出具有获得普利策奖质量的有创见的报道。

更重要的,数字通信革命还动摇了公共事务新闻的财政基础。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即便是出现了广播媒体,报纸仍是传媒体系中最主要的新闻信息来源。但是,新媒体中的新节目有可能会使报纸中利润最丰厚的一些栏目被分离出去(比如分类广告,房产广告和商品信息)。这些栏目目前补贴着报刊中的公共事务新闻。用旧金山另类新闻学院院长的话说:“在这个报纸总体构架中删掉一些利润丰厚或颇受欢迎的栏目,那些支付面向广大受众的严肃新闻的费用就被剥离走了。了解新媒体世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这种分化的情况是多么容易发生。”<sup>44</sup>记者们似乎也对他们在新信息时代中的前程忐忑不安。1996年的一次有关媒体与民主的会议上,一个前沿的专家小组就这次大会的主题——“记者的新角色:信息时代的生存与繁荣模式”提出了警告。<sup>45</sup>美国最负盛名的报业分析家南希·希克斯·梅纳德(Nancy Hicks Maynard)担心,新形势中的新闻业面临着失去影响公众讨论的力量的危险。她说:“我们将不再成功地在‘我们在哪里’与‘我们何去何从’之间的鸿沟中导航。”因为,独立公众事务新闻所需之市场基础的存在本身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在缺乏公共政策对市场逻辑的修正的情况下,她所言非虚。

总之,电子民主的技术乐观主义观点是建立在对技术不加任何批评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技术原本是受军事动机的驱使,但是现在已被商业利益所左右。就这些技术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们的结构、目的及发展从未

得到过民主而充分的讨论。不论技术是如何不经意地造成噩梦般的后果——人们被隔绝和边缘化，自主休闲时间的侵蚀，社会内部知沟的加大——他们同技术乐观主义者所预示的结果一样至少也有发生的可能性。<sup>46</sup>新技术有使传媒力量非集中化和多元化的可能，但它们对商业逻辑的降服似乎预示出又成问题的结果。阶级两极分化、受众群分散化以及市场逻辑的其他方面，会导致向大众传播的公共事务新闻的衰退或使其转化为别的形式。更民主的大众传播形式似乎不可能从一个盲目运行的技术和市场力量中脱颖而出。保持互联网的民主化潜能需要恰当的公共政策，而这也是值得大家为之奋斗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兼顾其他媒体民主化的种种方法。令人振奋的是，一场特殊的改革运动正在主流媒体自身内出现。

## 内部革新：公共新闻及其局限性

在过去，客观性体制把各种向它的权威地位提出挑战的因素或融合或孤立，但要抵挡这个最新的挑战者也许要困难一些。20世纪90年代，美国数以百计的新闻编辑室尝试了一种称为“公共新闻”的新方法。作为对新闻大众哲学进行反思的严肃力量，公共新闻证明了在新闻机构内部存在某种带来活力和具备更新能力的力量。这一点值得赞扬，但它也有着严重的盲点和局限性。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的“宗师”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和《维奇塔鹰》的编辑梅里特(Merritt)。如他们的文章所示，公共新闻的概念肇始于对新闻与民主处于危机中的共识。<sup>47</sup>报纸的发行、公众对媒体及其他公共机构的信任、公众参与政治体系以及任何能真正称得上是“公众”的实体的存在本身都日渐式微。然而，罗森和梅里特把矛头指向了记者愈演愈烈的道德败坏，大众对政治的犬儒主义态度以及公众所关注的事情与官方政治辩论之间的疏离。

罗森等认为，公共生活的衰退是新闻和其他更广泛的文化力量共同造成的。新闻报道中充斥了政治丑闻，政治问题的极端化表现，入眼皆是赛马式的政治选择、重要人物、内幕者和专家，它的假反叛性风格(有别于健康的质疑风格)——所有这些都损害了普通选民的利益，他们的声音、关注的问题都被取代了。<sup>48</sup>犬儒主义和异化由此而生。

即使更严格地恪守现行客观性实践，这些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那些做法，比如使双方平衡，专注于人物而非政策以保持非党派偏见的外貌，

本身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虽没使用此类说法,罗森和梅里特在分析公共传播的危机过程中却间接批评了客观性体制。

在他们看来,新闻界能够也应当帮助去解决这些危机,这不仅因为新闻界是造成危机的首要原因,也因为公众的存在是新闻作为一项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而存在的前提。由此,记者们需要重新定义他们的作用和责任,以促进一个理性的、具批判性的公众的成长。记者应当力图去发现公众关心的问题,然后进行追踪,为它们的讨论及其根本解决提供途径。这就意味着,记者应不再把公众当成是政治的被动观望者,或是一个信息的市场。相反地,记者应确保大众对他们所在社区的政策和价值观讨论的意识,如有必要,还应发起讨论。记者不仅要唤起公众对热点的关心,还要通过帮助辨别社会问题根本原因,明确其影响并分析其中的“核心价值”。<sup>49</sup>最为理想的是,这种协商式讨论要以“公众判断”而告终,问题的解决应建立在广泛参与、明达辩论以及尽可能地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sup>50</sup>

简言之,公共新闻记者应当积极帮助活跃公众生活,以此增强新闻与它所面向的社区之间的联系。

在实际工作中,公共新闻记者应当做什么呢?这并无单一模式可循。公共新闻与其说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它激发了大量的独创性。在有些情况下,新闻媒体为公众参与到规定的政治议程的活动中创造出了许多途径(从报纸的反馈栏目到大众论坛、焦点小组、社区圆桌会议、模仿议会或陪审团等),而且他们还对此类公开讨论的结果加以报道。报纸还尝试让读者来帮助决定报纸要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在提出社会关注问题的过程中,使读者成为更活跃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观望者。当公众政策的特别变化被看成是反映出社区舆论的时候,报纸还会在新闻版上——不只是社论中,为其助威。公共新闻还可涉及媒体间的合作(通常是指报纸与广播电视),共同制作某一报道。在报道政治问题时,公共新闻不强调政党竞选策略的竞争主题和民意调查,它不再依靠传统的专家及知名人士信息来源,而是包容更多的公民声音。

公共新闻主要是一种美国而非加拿大现象,它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千千万万的公众与政治新闻、选举大战的明显隔阂。<sup>51</sup>而在加拿大,公众生活危机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加拿大媒体与观众间相处得也不轻松。尽管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拒绝了美国公共新闻所采用的大众性参与的激进方法,加拿大记者们也尝试着增进与受众的联系。一件值得注意、让人警醒的事是1992年夏洛特宪法修改案的失败。在这一事件上,公众反对的呼声大大压过了由经济实权派、三个联邦政党以及全国性媒体内部达成的

共识。作为回应，CBC 新闻开始电视报道“市政厅”会议这一形式。在这些模仿市政厅会议的电视讨论会上，被选择的“普通市民”应邀讨论当务之急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卡尔加里和艾德蒙顿市的两家通常是对手的新闻机构联合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周的名为《阿尔伯塔见闻》的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结合了民意测验与公众论坛，共制成了几个小时的广播与电视节目，以及报纸长文，主要反映了拉尔夫·克雷恩(Ralph Klein)政府削减经费对阿尔伯塔社会造成的影响。<sup>52</sup>

在许多重要方面，公共新闻向客观性制度提出了质疑。它要求新闻放弃超脱的姿态，积极地使公共政治恢复生机——“通过理性的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讨论来达到自治”。<sup>53</sup>使公众生活运作起来，而不单是提供一个平衡的“客观”信息流，就成为新闻的首要合法性(任务)。公共新闻反对成为“世界的镜子”的模式，关注的是新闻作为一个叙事形式的不可避免的价值特性和它的政治作用。公共新闻要求记者对自己的工作及设想，如报道是如何构架的，观众是如何被定位的，应当使用什么样的主要叙述方式等作更多的自我反思。

同时，公共新闻既不是对 19 世纪党派新闻的回归，也不是当今另类媒体倡导性新闻的回归。公共新闻并不要求新闻工作者停止对事实的准确性和来源的可靠性的检验，或是要他们放弃对特别党派或政策所采取的中立态度。公共新闻在报道社区未达成一致的“合法争议”中保持了客观性道德标准。但它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主张新闻的能动作用。首先，对于是否存在积极的大众参与和讨论，或社区是否正视遇到的问题这样的议题，记者不应假装保持中立。对自己的职业至关重要的某些基本价值，如言论自由，记者从不声称要保持中立。公众新闻可以看成是这一价值的延伸。

其次，一旦公众达成共识以后，公共新闻就可以积极倡导对某一问题的政策性解决方案。对它的大多数批判者和一部分支持者来说，这是公共新闻的一个棘手区域。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共识？如何防范传媒有意创造某种表面共识以追逐自己的议程？

公共新闻运动与世俗的救世运动有一些共同特点。它在新闻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部分原因是公共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对客观性体制提出了挑战。公共新闻在读者范围相对固定并比较单一的中小城市的报纸中有着强劲势头，这并非偶然。它最强有力的反对者来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新闻日报》的记者，这也并非偶然。这些报纸的视域比一个地方性社团更广阔，它们的合法性和声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客观性体制。

一些客观性体制的支持者视公共新闻为向活跃分子新闻不受欢迎的转变,认为“它扩大了记者的职能,传统记者只是报道者,而不是参与;而公共新闻记者所持的是一个为建设更美好社会而贡献力量,不仅仅只是举起镜子照映世界的角色”。这是“认为客观性不存在的逻辑性的自然延伸”,当新闻媒体报道它们自己积极倡导的事件时,潜在的利益冲突就充斥其间。<sup>54</sup>媒体成为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和记录者,这使它的可信度受到威胁。用前白宫新闻秘书马尔文·卡伯的话说:“当记者们真的去组织变革,然后对其加以报道之时,我对超脱、客观、执著等传统新闻品质就不抱以信心了……美国新闻的点睛之处就在于其一贯独立于官方权威,这样,才能做出批判性分析。”<sup>55</sup>

如果卡伯对美国新闻“点睛之处”之说无误,它真正地独立于官方的程度又如何呢?——也许,无论是新闻还是代议民主都不会处于危机之中了。再者,就连最客观的媒体也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塑造者,即使只是放大了掌权人士的声音,或为了寻找他们的过失而淹没了他们的声音。对公共新闻的这一批评,是建立在传统新闻的一种消极的、照镜式、不可行的概念基础之上的。

对公共新闻的另一更有说服力的批评来自传统的对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倡导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担心,公共新闻的张扬行为会导致已日渐减少的用于硬新闻采集和调查性新闻的人员和其他资源的进一步被减少。还有人把公共新闻看成是用来促进发行的、以市场为目的的骗人把戏,它为自我吹嘘、粉饰太平开启了方便之门。在这种观点看来,公共新闻过高估计了社区共识的可取性,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不仅提供给人们他们想听的,还要让他们听到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即便这些会引起他们的不快。一位评论家说:“二十几年前,南部的一些敢于直言的新闻编辑们痛斥吉姆·可劳,维护民权,却遇到他们所在那个社区的敌视。”“直言反对种族主义是一种崇高而危险的策略,然而这些编辑所写的进步性文章最终有助于社会变革。如果他们调查研究后再确定新闻议程,他们肯定会发现人们要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这些刺耳的东西。”<sup>56</sup>

这样的批评可能有点不留余地。对不同的人来说,公共新闻含义也不尽相同。罗森和梅里特提醒他们的追随者存在这样一个陷阱。即便如此,粉饰太平的罪名有时确实不为过。奈特一里德报系支持自家报纸进行公共新闻的实践,毫无疑问是因为它认为这是阻止不断下滑的发行量的可行方法,也因为市场研究显示那些关心周围社区的人更愿意读地区性报纸。这种公司性自利行为使公共新闻在现存媒体中有更大可行性,

但这也造成其中实现性紧张态势和局限性。积极处理富有争议的问题的公共生活目标与提高发行量的商业性目标，也许是不相容的。

公共新闻的另一个潜在陷阱，是它可能会通过有控制的大众性参与来掩盖媒体自身的政治议程，并使之合法化。一些保守人士认为：“阿尔伯特塔见闻”系列报道过于集中反映财政紧缩的负面影响。与之相对的，在1996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选举中，《温哥华太阳报》就读者对问题的观点做了一次简短调查，这在理论上帮助报纸组织关于不同问题的特写的稿件。在实践中，这次调查在其开场白中突出了政府各项计划的财政费用这一报道框架。该报道随后集中报道了政府赤字，而这一关注大大超出了更有代表性的民意测验所提供的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sup>57</sup>也就是说，报纸对这一公共新闻的策划是有主题先行嫌疑的。

最重要也最能说明问题的批评来自客观性体制之外的批评，有一类批评者认为公共新闻过高估计了社区共识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因为它忽视了不同利益与立场之间的冲突程度。也许这不是巧合，最为有力的公共新闻实践都是围绕着那些有广泛共识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说，地区性犯罪、青少年暴力或儿童贫困是糟糕的事情，就业和社区经济发展是可取的。而要在一些富有争议的问题（如在医院做流产、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上要取得共识并非易事。而且一种表面的共识并不一定可取，如果这意味着使不公平现象合理化或有碍深入讨论的话。

更严肃地讲，公共新闻低估了民主与新闻危机的广度。美国公共新闻倡导者批评了政治新闻的异化作用，但忽略了对减少民主性参与机会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批评。他们对传媒产业中的垄断化、集中化和解雇等问题保持缄默。罗森相当傲慢地排除了“公司文化”和公共文化是否能共存的问题。他高估了新闻工作室和记者们独立于传媒公司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集体自治力，过于随意地排除了新闻媒体结构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例如，以公众的声音取代精英消息来源，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但是公共新闻没有考虑到官僚机构追求效率的强制性作用，它会使新闻机构很难朝此方向努力。奈特—里德报系（Knight-Ridder）和另一家大型报系甘乃特（Gannett）在领头实施公共新闻之时，它们在底特律卷入了一场恶性的劳资纷争，在它们获取高额利润和购置大宗传媒财产的同时，要求其新闻工作者作出让步。不论公共新闻对这些公司到底意味着什么，它都不意味着能民主化新闻工作室或促使公司在报纸内容质量上花更多的钱。<sup>58</sup>

公共新闻可以在补充甚至取代客观性体制的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但

是,由于它的盲点,它太有可能也成为一种使新闻传媒合理化的意识形态。在商业性的新闻生产条件下,它可能提供某种形式的参与性公众对话,甚至改变新闻的议程,但只有在它不断地为公司吸引住能保持商业赢利的受众数目,且不致招来操纵权力的精英人士的愤怒的情况下,才有实现这些的可能性。

尽管有其局限性,公共新闻仍警示了一个关键问题,新闻的公共哲学应是什么?没人会认为新闻媒体应当为自身利益服务或是应对政治议程深藏不露。相反,公共新闻正确地认清了新闻媒体无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秩序这一点。民主与新闻两者都有存在的先决条件,而且新闻应当强化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公众、言论自由等的存在),而不是对此保持中立态度。但公共新闻是否为维护民主和一个民主所需的独立公共事务新闻系统的最恰当方式,这一点有待进一步商榷。

## ◆ 另类媒体：在边缘发出呜呜之声

生存于边缘的能够取代客观性体制的选择也许来自主流媒体外部,在所谓的“另类媒体”中,另类新闻的存在明显地质疑了主流媒体所作的面向任何人、代表任何人的宣称。另类新闻记者有时会对主流媒体的客观性作相当直截了当的批评。虽然许多另类期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和“反文化”时期瞬间崛起。它们的先驱是19世纪那些宣传政治异见和劳工激进主义的报刊。<sup>59</sup>20世纪初期的掏粪民粹主义新闻,尤其是以美国的以调查性新闻著称的《琼斯母亲》(*Mother Jones*)杂志为代表,成为另类媒体的另一个来源。

另类媒体的种类界限很模糊。有大量的新闻制作实践、表述风格、社论团体和传媒类型——古板的月刊、娱乐性城市周刊,为无家可归者办的街头海报、社区广播和有电视频道、互联网上的新闻组等等——都曾被称为“另类媒体”。他们在获取资金方式(基金会赞助、征订收入、娱乐、分类广告收入)、商业化程度、政治倾向清晰度以及所面对的读者这几个方面也都不相同。

它们有极强的多元性。即使是在另类周刊性小报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代沟,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一些已站住脚的另类周刊现已在美洲大陆上呈燎原之势,从西部温哥华的《乔治亚直观》、维多利亚的《星期一杂志》、《旧金山湾守卫者》、《L. A. 周刊》到东部纽约的《乡村之声》、多伦多的《现在》和蒙特利尔的《镜报》。凭着娱乐广告方面的收入基础,这



些年岁已长的周刊以稳健、严肃的社论及长篇特写为主要内容，它们承袭了调查性新闻的左倾理想主义，同时有措辞激烈的特点。这些迎合婴儿潮一代的周刊，日益面临来自新兴的迎合更年轻一代的小报的竞争压力，后者包括温哥华的《终点城市》、达拉斯的《遭遇者》或是西雅图的《陌生人》。这些报纸以颓废空虚为风格。它们遗弃了主流媒体的客观性，也摒弃了迎合婴儿潮一代的周刊的道德家式的调查性新闻。它们不仅蔑视国家政党与主流报纸的选举政治，也不屑于旧式另类新闻的能与市政府一争高低的进步民粹主义。相反，他们青睐于身份政治(identify politics)和性别政治、音乐与艺术报道、社会与文化评论、咄咄逼人的幽默与讽刺等这些常常以非客观性的第一人称所写的文章。<sup>60</sup>

很明显，另类媒体的范畴是个疑难问题，这一剩余范畴的界定来自它是主流商业媒体之外的选择。而这个定义消极的负面定义就不幸地意味着“另类”就是被限定在永久的边缘状态。而且，在运用这个概念进行分析之前，它的定义还要进一步压缩，它是否包括了所有主流媒体之外的自愿性和非赢利性媒体，还是包括了那些迎合被主流商业化媒体所忽视的特殊市场的专业化商业媒体(如戏迷杂志)？如果仅仅是因为它们把自己弄得与主流媒体截然不同，那么要不要包括白人种族主义的电脑新闻简讯或其他有明显种族主义倾向的媒体？

除了其内部种类多样性，另类新闻与主流媒体之间的界限亦不甚清晰。当烟草与啤酒公司为推销与它们的主要商标产品相区别的“另类”产品时，“另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报纸也如法炮制。为了保证广告收入不受政治激进分子发起的周刊的影响，《多伦多星报》大张旗鼓地办起了自己的《娱乐周刊》，这张报纸如果没有它的竞争性的咬人性的话，起码模仿起了它们的吠叫。同样出于市场原因，美国的密尔沃基市、圣荷西的由主流媒体公司拥有的报纸也开始创办另类周刊。<sup>61</sup>

由于加拿大政府对文化生产的更多卷入，这种界限更为模糊。尽管CBC受到政治压力的限制，并且部分地依赖于商业收入，但是CBC不同于商业性电台和电视台，而且由联邦政府投资的国家电影公司(National Film Board)所制作的影片在另类电影节上大放光彩。

婴儿潮一代受众的年龄与财富的增长，及其自身的成功都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另类报刊幸存者的身份危机。正如《另类报刊读者文摘》(Utne Reader)一名资深编辑提出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另类报纸吗？”杰·沃加斯帕(Jay Walljasper)认为，另类报刊在80年代里根—布什时期兴盛繁荣。当时，主流媒体对政治问题噤若寒蝉，未能对“伊朗门”的秘

密武器交易进行曝光，也未及时揭露存储及贷款危机。同时，新兴的婴儿潮一代人(baby-boomer)的市场，对时髦的商品及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的追求，使得另类城市周刊在全国各地大量滋长。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只是为有关艺术与生活方式的报道吹来一股时髦风”，但另外一些也成为当地社会的进步意见与调查性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sup>62</sup>

面对不断减少的受众与收入，主流出版物在90年代开始反击。他们模仿另类报纸。挖掘它们的人才，借用它的风格及话题，比如更多地关注“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同性恋、青年人、流行文化和环境问题”。<sup>63</sup>一些商业日报尝试减少来自官方政要和名人的消息来源，而接纳大街上的居民之声。他们尝试更加类似“特写”风格的写作——即使这与客观性报道完全背道而驰。<sup>64</sup>

对另类/主流媒体的区别应当看成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二者尖锐的对立。也许根本不存在“纯”另类媒体。但是另类媒体在不同程度上有明显特点——所有制、资金来源、内部组织、政治倾向、与观众关系、新闻哲学，这些都使他们与占主导地位的商业媒体区别开来。这些特点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提供了民主传播的范例，并对客观性体制的条件、理想目标及实践提出了质疑。<sup>65</sup>

无论主流媒体的记者是如何年轻气盛，如何颓废不堪，他们都不会对社会秩序的有关效率、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的基本设想提出挑战。正如沃加斯帕说道：

当他们写到有关污染、青少年反叛、贫困、教育、犯罪、政治、都市事务，甚至于他所喜爱的一间店铺关门的问题时候，他们往往停止探究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因为答案常是直指大公司对权力滥用及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而这是大多数媒体禁忌的两个话题。<sup>66</sup>

一些分析家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另类媒体，“作为持不同政见的媒体，另类媒体能提供主流辩论之外的其他激进意见”。它具有进步倾向，而进步性从广义上又可被定义为公平地分配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政治、文化项目。<sup>67</sup>另类媒体非但不标售客观性，它们反而公开声称反对或怀疑主流的、制度化政治，也就是说，它们提倡社会变革，或至少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性评价。它们总是代表那些认为自己的观点在现存的本地或全国性传媒中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群体。<sup>68</sup>另外在这里，提倡强化而非反对对现行政治文化中压迫性方面的媒体不在另类媒体之列。我们排除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出版物，它们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主流文化现实的

延伸,即使其对暴力的嗜好使之显得与众不同”。<sup>69</sup>我们也排除了主张加深自由市场的不平等的刊物(像加拿大的《下一个城市》,一份右翼的美国唐纳基金会慷慨赞助的,明显要说服婴儿潮一代、环境保护主义者转向支持市场自由主义政治议程的精美杂志)或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刊物(比如新闻杂志《B. C. 报道》)尽管它们把自己看成是与商业报纸不同的“另类”。

此外,与主流媒体的等级分工相比,另类媒体曾在不同程度上尝试以合作、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管理,并在制作节目和编辑事务中贯穿这种精神。温哥华合作电台由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自愿的节目制作者以及会员提供资金的方式,均体现了上述原则。合作电台的作法与连锁公司、集团或国家所有的媒体组织中那些只注重赢利、收入主要来源于广告或国家补助的媒体形成强烈的对比。

另类媒体对新闻的定义,也对主流中何人或何事具有新闻价值的定义提出了质疑。例如,另类媒体挖掘了许多常被主流媒体冷落的人——社会运动活跃分子,少数民族裔和受政府、公司政策影响的平民百姓。他们不太垂青那些凭借臆想的客观性专长或代表性身份而在主流媒体中享受特权的人——官员、政客、专家。此外,有鉴于常规新闻通常由那些威胁或破坏现行价值观和机构的事件组成,另类媒体更倾向于这些价值观和机构本身对平民百姓的安康和权利产生的潜在威胁。这种做法似乎不够专业或有倾向性——尤其对那些没有注意到主流媒体自身“客观性”倾向的人来说。

许多另类媒体认为自己增进了媒体与受众以及受众之间的横向交流,这与传统新闻媒体垂直式上下交流模式全然不同。<sup>70</sup>在这个授权于受众的工程中,传媒文本的接收者和制作者之间的差别没有它在商业媒体的职业化模式里那么严格。受众被认为是共同斗争的参与者,而不是其注意力必须被吸引并被出售的商品。尽管有些另类媒体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但它们注重变革社会的政治运动,并从那些社团中吸取观点且吸纳活动分子加入到他们的制作行列中。有些则实验过参与性新闻,表达社区中志愿记者(volunteer reporters)的观点,与“客观性”职业作风模式形成对比。

另类媒体通常对平衡和客观的标准明确表示怀疑。在他们的谈吐方式、表达风格上,另类媒体经常遵循新闻的倡导或主观性模式。如沃加斯帕所言,与主流媒体的客观报道不同——“积累冷酷的事实然后以超然的方式播发,不给情感和个人经验任何空余位置”,另类媒体记者“以摒弃客观性的束缚,讲述真实的故事为荣”。

他们提供细节和背景材料——某人家中的内部摆设如何或走过一个特定的街区的体验——这些东西所揭示的常常是与新闻源在访问中所讲的一样多。他们自由地抒发见解和感觉，而不是躲闪于字里行间。他们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不用四处找他们可以引述的新闻源……说出者们自己真正想说的话。<sup>71</sup>

如此定义的另一类媒体，对主流媒体和其客观性体制构成了长期的挑战。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效力面临着严重的限制。在商业化媒体系统的内部，另类媒体几乎必然地遭到边缘化。在尝试扩大受众群的问题上，他们遇到了结构性阻力。他们的受众在人口特征上达不到足以吸引广告商的地步，编辑的内容对广告信息的消费主义是非补充性，甚至可以说是对抗性的。不仅是广告商还有期刊销售商都歧视无高制作标准和没有大众吸引力的杂志。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另类期刊无力支付作者采写有突破性的报道的费用。当然，一些美国期刊，如《琼斯母亲》、《进步》(*The Progressive*)、《国家》(*The Nation*)已经可以制作出能激发人们兴趣、重要并经过仔细研究的新闻。加拿大也有些生存了几十年的优秀另类期刊，诸如《加拿大论坛》(*Canadian Forum*)、《这本杂志》(*This Magazine*)以及《加拿大视野》(*Canadian Dimension*)。但由于市场狭小，资金少，加拿大期刊要不断制作出具启发性、及时的、能影响政治议程的调查性新闻并非易事。加拿大的“另类”作者更愿意把他们最好的东西以书籍的形式由小型独立出版社出版。这些小出版社在一个被多个媒体集团控制的大陆化市场中艰难地争取进入被寡头控制着的发行渠道，并在经济上挣扎着生存下去。<sup>72</sup>

当然我们不会简单地把另类媒体理想化，把它们描绘成戴白头巾的与勇士歌利亚较量的大卫王(《圣经》记载，古以色列国王大卫童年杀死勇士歌利亚)。他们很容易成为其自身作为永久的唱反调的思维定式和风格的牺牲品，并吸引到那些在重新制造着自己边缘化的、愤怒的、失意的人们的注意。他们会过分地宣传化，或因成为某个特别目标的辩护人而变得乖僻。部分地出于他们的民主化雄心，他们易于导致派别争斗，形成内部纠纷。而且，在为无发言权的人提供直接的途径和制作出吸引更广大观众的优秀新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令人为难的权衡问题。温哥华的《盟友》报就显示了这种方法的艰难境地。该报通过提供制作专页和专版的方式，为倡导性团体提供政治传播工具。但是因为这种方法，使得该报纸的内容缺乏质量控制，被认为是不可信的新闻媒体。另类报刊有时也会受惑，不再那么具有反抗性，那么与众不同，而是倾向于赢利，更追逐高

档市场。它们也有可能吸引到那些把另类报纸只当成进入“真正”新闻业生涯踏脚石的人的兴趣。

但是，另类媒体的重要性不能以它目前的规模而论，它们证明了自己能够对主流媒体的风格和内容施加影响。至少，它们为游弋于客观性制度之外做新闻提供了活生生的模式。实际上，即使这不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另类媒体仍要被看成是参与了双重民主化过程：在它们为主流媒体冷落的人们提供传播途径的范围内，另类媒体通过使传媒系统多元化，也在增强着传媒系统的民主化；与此同时，它们又是通过媒体来推进民主化的一部分。<sup>73</sup>在最佳状态下，另类媒体可以推进追求更广阔民主目标的批判性社会运动，比如使权威机构更有责任感，促进更公平地再分配财富和权力或赋予从前被冷落、被剥削的社会群体以权力。

在它们的政治传播战略中，社会运动不只单单依赖独立的另类媒体。相反，另类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并不明确。是作为运动的传声筒、倡导者、中性的观察者、甚至是监督者和批评者？还是不管在规模上如何微不足道——电话联络册、新闻通讯、直接信件、互联网和网址，社会运动离开自己的传播渠道就无法生存。

与此同时，很少有社会运动对能在其形成机构的巩固和自我维持、最终的成功或瓦解各个阶段产生巨大影响的主流媒体置之不理。<sup>74</sup>因此，社会运动确实试图影响主流媒体议程及其报道的框架。通过它们的客观性实践、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以及它们自身内部的缝隙，主流媒体确实也为社会运动提出的新问题或对现有的争论的界定提出挑战提供了机会。<sup>75</sup>在近现代史上的不同时期，民权、和平、生态、堕胎权、性别平等权等社会运动从主流新闻报道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绿色和平组织就是部分地通过熟练地制造媒介事件而把自己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虽然它的策略现在已有反作用了。尽管这样，主流传媒在总体上起的是保守化的作用，或是使激进运动非合法化或边缘化，或是引发他们构建官僚式的结构和采取更中庸的立场和战术。<sup>76</sup>

面对主流媒体这种系统的保守性，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对它们结构上、侧重点上和利益上的更直接的挑战的种种迹象，就显得十分令人鼓舞。

## 解放性的另类选择：正在形成的运动？

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新闻监测和媒体政策倡导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些活动虽然各自分散，互不相同，但是当它们被注入了多元、平

等、参与及包容等民主性标准时，它们就汇集成了媒体的民主化运动。尽管媒体民主化还不是一场成熟的运动，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它就显示了融合为一项连贯性工程的令人振奋的迹象了。

这样一项工程的原动力在当代社会中有好几个来源。自20世纪60年代起，相对于职业政治商客和通过媒体倡导单一政治目的的倡导群体，政党作为政治传播和动员的工具的功能就衰退了。电视作为政治新闻来源的优势，逐渐把政治竞选演变为领导者之间电视形象的竞争。接踵而至的政治辩论的庸俗化，以及因不能承受政治销售和电视广告巨额费用的政党和候选人的退出，都产生了一股反对在媒体推动下政治生活商业化的反作用力。

媒体民主化的其他原动力，来自那些社会活跃分子在看到媒体是如何系统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性变革，以及媒体如何带来不可取的社会或文化的强制性改变时而产生的失落感。长期以来，对大众媒体在社会习俗、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的关注，不断在当前的争论中表现出来。加拿大关注娱乐业暴力问题组(CCAVE, Canadians Concerned About Violence in Entertainment)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这个由罗斯·戴森(Rose Dyson)在多伦多建立起来的组织，很注重反映在商业驱动下出现的电视暴力对儿童社会化的冲击效果。

另一种动机是来自那些对独立的新闻业的生存有最直接物质利害关系的人，其中包括为保护自己的工作不受商业逻辑直接侵扰的记者们。对记者和其他新闻工作者而言，他们的职业自治权和收入都处于所有权集中化、经济理性化以及强调“总体办报”威胁之下，所谓总体办报就是为了销售新闻信息的需要而把发行、销售和内容都统一在一起。<sup>77</sup>作为历史事实，除魁北克以外的北美传媒工会一直不愿冒险介入编辑控制、媒体所有权或有关传媒的政治政策问题，而是把关注点局限在短期的工资待遇等问题上。但是越来越多的传媒人士得出了结论，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就意味着建立新的联盟以及采用范围更广的民主性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和多样性。

总体制约着进步媒体运动的这些明确来源的，就是所谓的“信息社会”的发展演变。在这个所谓的“信息社会”中，许多劳动者以制作并传播数据与图像为生，它的文化空间里充斥着媒介传播的符号，所以传媒机构和它们的表达变成政治纷争的中心点，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

可以肯定，除了传媒工作者和他们的工会之外，传媒的改革运动常常是第二位的关注点，它的产生往往是受社会运动欲通过媒体达成其他一

些主要目标的促动。多伦多的“媒体观察”就是一个例子。它监测传媒业中的女性形象，是以性别平等为主要目的的女权运动的产物。考虑到民主性的概念有多种含义并且在传媒中存在根本对立的利益，我们很难想象一场关注媒体民主化的抽象的运动。弗雷泽研究所和温哥华合作电台均对主流媒体提出批评，但在意识形态上，它们截然不同。要求“扩大辩论”但又从原则上拒绝多元化，媒体监测组织 FAIR (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Reporting) 的妇女部协调人阐明，是媒体报道造成的具体社会和政治后果，而不是什么关于传媒的抽象原则，提供了传媒改革运动的驱动力。

FAIR 并不对阻止播放我们不赞同的观点的行为感兴趣，我们努力的目标是包容更多观点，一个更加多元的媒体确实很好。不过，那根本不在点子上。轻视公众利益和少数人的观点是危险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后的新闻报道就表明我们对主流媒体中存在的种族主义、恐同症 (homophobia, 译者注：对同性恋的憎恶与恐惧) 和性别歧视所付出的代价……新闻中的“恐同症”的代价是无知——无知和仇恨会葬送我们的性命。<sup>78</sup>

我们不应夸大媒体民主化运动的强度、统一性或执著性。它的次要或衍生性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弱点。倡导性团体会发现要证实把稀有资源耗费在一个似乎太困难、太宽泛或与他们首要利益不太直接关联的目的上的做法的正确性，这一点很困难。许多团体满足于在现有媒体系统中为自己争一席之地。他们为任何一条能使他们的事业受到潜在资助者和成员关注的报道欣喜不已。<sup>79</sup>但是，如此众多的进步性原则和事业在商业化传媒系统中被轻视或被贬低的现实状况，确实也为强有力的共同战线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数以百计的媒体民主化运动与遍布北美各地的另类媒体相补充、重叠。它们包括下列主要类型：

“文化干扰”是媒体改革运动中的赶时髦派。请想象以下的场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人昂首阔步地走在温哥华的街道上，把硬币塞进《温哥华太阳报》报箱内，打开后不是取出一叠报纸，而是把几百份报纸捆扎进被称作《温哥华树桩》的四页盗版版本中。《温哥华树桩》以“政府与一家主要林业公司合并”的通栏大字标题，讽刺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业实践，以及《温哥华太阳报》在环境问题上的可以说倾向于工业的报道。欢迎来到“媒体游击”世界，在这里，传媒目标是低强度的文字符号战争，

即运用讽刺性模仿手段进行直截了当的媒体批评,以颠倒主流媒体的消息报道。

温哥华的《广告炸弹》(*Adbusters*)杂志也异曲同工地制作了电视反广告(counterads)和精美的讽刺作品,意在突出消费主义和社会弊病(如酗酒,厌食和环境退化)之间的联系。在其他地方,诸如阿特法拉斯、游击女郎、旧金山户外广告牌解放阵线这样的组织,也以非法地“编辑”户外广告牌的方法发挥着他们的创造力。

传媒哄骗(media hoaxing)是文化干扰的另一个变体。乔伊·斯卡格斯(Joey Skaggs)为了吸引媒体注意而导演假事件或把自己伪装成一名专家,然后公开暴露这个骗局,以显示电视新闻因其短时记忆、追踪琐事以及不进行独立调查的缺点而被操纵的程度。斯卡格斯还曾发过一封假信,假称是从一家搜集美国狗来制成食品的韩国公司发来的。他利用媒体报道所导致的公众愤怒的行为来揭示媒体愿意接受种族歧视性陈规的程度(即对朝鲜人吃狗肉所抱的种族偏见)。

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文化干扰的政治意图是因后现代主义追求游戏反叛的倾向而产生的。但是,文化干扰发挥得好,能改变受众对自然化了的主流媒体的实践和假设的本性的认识,而且它也能突出强调一些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性的前景。

媒体监测和分析为媒体民主化提供了更理性、更严肃的方法。专业性自我批评的独立杂志,比如加拿大记者协会的《传媒》(*Media*),CBC广播的《现时播报》(*And Now the Details*)、《莱森新闻评论》(*the Ryerson Review of Journalism*)或是久负盛誉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均属此类。有时候,对新闻业产业结构和指导哲学的根本性批评会出现在这类专业性论坛中,不过更主要的是,这类杂志充当了界定主流新闻范式中什么才是能被人接受的因素的晴雨表。

那些与新闻的职业准则不甚相关的各种学术机构也承担常规性媒体监测工作,主要是通过新闻通讯的形式向征订者和媒体组织分发内容分析材料。这种工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它可以从独特的政治观点的角度分析审视关于不同问题的新闻报道,比如现在已不存在的期刊《我们时代的谎言》。它是专门批评《纽约时报》新闻报道的“左派”批评杂志。另外,它还可以像纽约大学的战争、和平与新闻媒体中心一样,就单独一个问题的有关报道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审视。

劳动强度大,传播费用大的特点使得这种工作耗资巨大。所以这个领域中由财团赞助的保守的智囊团占据统治地位,是不足为奇的。这方



面的例子如弗雷泽研究所或瑞德·尔温 1971 年创立的华盛顿特区“传媒准确”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反对瑞德·尔温所认为的全国媒体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是进步反对派也应运而生，知名的有美国媒体监测机构 FAIR，它出版了名为《号外！》的月刊。其他的还包括“纸老虎电视”（Paper Tiger Television），它把社会人士所做的媒体评论加以制作，并在有线电视中播放；1976 年由卡尔·杰森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的被审查的项目（Project Censored），是传播那些被主要媒体忽视掉的重要新闻；在加拿大，相应机构现在正对新闻议程设置中的系统性盲点加以研究。

教师和伦理学家们站在了媒体扫盲或媒体教育运动的前沿地带。这场运动旨在通过公立学校以及成人教育来提高对媒体中的价值观、惯例和影响力的批判性意识。在某些地区，如安大略省，传媒教育已成为公立学校的一门课程。

许多团体都对媒体策略问题的倡导进行了专门研究。在加拿大，“加拿大公共广播之友”倡导公共广播的原则，并且游说政府，希望它不要持续削减 CBC 的预算。在“左倾”的新民主党内，作者赫舍尔·哈丁（Herschel Hardin）建立了一个文化与传播特别核心小组，力图使媒体集中和商业化成为新民主党的纲领的中心议题。而美国的传媒教育中心、妇女新闻自由机构以及许多其他进步性团体承担了对传媒审查制度、商业化电视暴力、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公众利益、传媒中女性及少数民族的描写以及其他问题的研究、教育、政策发展的任务。

所有这些主动性行为都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它们本身还不足以对传媒系统做出挑战。而这样一个宏大的政治工程需要的是有广泛基础的运动，类似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平等运动。它要求首先将媒体民主化放在自己议事日程的中心点，然后通过与其他当前传媒系统损害的群众性运动的联盟，力图去影响全国性政治辩论的尺度。

幸运的是，1996 年初发生的两件特别事件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这场运动也许真有出现的可能。

1996 年 2 月底，650 名独立媒体和另类媒体的记者、制作人、活跃分子和分析家聚会旧金山，参加第一届媒体与民主大会。大会由另类新闻学会主办，32 家来自北美的各家另类出版机构和“左派”政治组织共同承办。大会主要讨论了反抗保守的商业媒体的“右翼摧毁力量”的紧迫性。正如另类新闻学会主席所言，这次大会意在“开始建立一个协作性的媒体基础结构以强化公众利益新闻，反对由于媒体权力集中造成的社会分化以及对民主性准则的侵蚀。”<sup>80</sup>除了交流经验和进一步发展联盟之外，会

议有意识地开始着手这样的工作，即要使“独立媒体和另类媒体界拥有比其各部分简单相加所具有的更为强大的势力”。<sup>81</sup>

美国 32 个州以及加拿大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参与使得这次大会规模空前，甚至吸引了全国性主要日报的注意力——它们当然可以预料地把这次大会看成是“‘左派’知名人士荟萃，为他们自身的毫无相关的地位哀鸣”，并且“钻入了自相残杀的垂垂老矣的‘左派’另类媒体的牛角尖中”。<sup>82</sup>有些比较玩世不恭的另类媒体记者也有同感。《波士顿凤凰报》鄙夷地说：“虽然有少量青年人到场，但这次大会却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或更早时期的一些屡受挫折的老记者们的聚会。”它因此得出结论，“这次会议没有侧重提出解决办法，而是在哀叹和抱怨右派的势力的强势影响以及‘左派’的孤立无助”。<sup>83</sup>

我们自己对这次大会的个人印象有所不同。尽管大会中不乏老前辈的悲观情绪，但这次会议对增加联系网络，发起实际的协作性计划以及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寻求共同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令人振奋的集体探讨，研讨会将另类新闻周刊的编辑、网络记者和青年媒体的各利益团体汇集在一起。在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上，专题小组和全体讨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比如私人传媒如何表现阶级、种族和性别，公共新闻和电子出版能有助于救新闻于垂死之中吗？独立的传媒声音如何能得到资助？

会议还签署了《信息权利法案》，它强调多元性原则、信息提供者的责任、优良的传媒文化、对公认的重要信息的获知、基础的和媒体的扫盲、不带歧视的意见表达权、隐私以及知识产权的公平使用。议案中关键性的承诺要算是公平“接受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信息的权力，包括那些由独立的本地的及非商业性的媒体制作与传播组织提供的信息，这是一个健康的民主所必需的，也是必须受到公众政策保护的”。<sup>84</sup>

两周后，文化环境运动在圣路斯召开了成立大会，有 260 多名媒体活跃分子、学者和十多个有关机构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1991 年由享誉国际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创立的文化环境运动(CEM)(Cultural Environment Movement)和民主与媒体大会(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有着共同的目标，格伯纳本人还是后者的既定发言人，不过二者的侧重点和成员组成稍有不同。民主与媒体大会植根于北美独立新闻和另类媒体工作者的世界之中。CEM 的支持者大都是来自学术界、政策制定者以及宗教、环境和儿童权利组织。它的目的是超越新闻领域，涉及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娱乐文化。它的注意力倾向于研究、教育和政策实施，它面向国际(它的支持者和 150 个从属的组织遍布六大洲

63个国家)。

在圣路易斯,CEM的15个工作小组推荐了一项有关多个问题的行动计划。根据CEM的网站的统计,这包括媒体垄断、独立媒体制作、媒体教育、增强健康、宗教、技术与生态、劳动、文化多元性及完整性、儿童与家庭、老龄、性别、种族与民族问题、传媒暴力、非商业性另类报道和媒体改革与倡导等一系列问题。代表们还通过了一个组织性机构,讨论并签署了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以其与私营新闻媒体关于传播议题的构架及自由市场政治的不同而为人瞩目。一份《观众独立宣言》为CEM的存在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人们需要改变一个“破坏了人性和人类潜能,一个因宣扬强权、恐怖和暴力而破坏了儿童的责任感、信任感以及社区感”的文化环境。我们文化的神话和故事不再由家庭、学校或教堂讲述,相反,它们是“一个大量制作并销售的复杂市场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受制于“一小群要出售某些东西的全球传媒集团”。宣言斥责了媒体所有权的集中、传媒内容的雷同、未经公众将无线电波私人化,以及通过广告这一“没有代表性的纳税制度”供养的“一个无形的、不经选举、不负责任的私营文化部”,该“文化部”背地里制定决策以影响公共政策。这种私有权力的集中造成的后果包括残忍化的媒体暴力,强化不健康的生活实践,使女性及少数民族被边缘化,全球文化的雷同化,加大了资讯富有者与资讯贫乏者之间的距离,通过对民主性程序的扭曲而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根本问题,诸如“生态自杀”的趋向、经济不平等的增加、国家基础机构、教育和艺术的“静悄悄的崩溃”。所有这些都看不到用来帮助减轻市场审查制度束缚的宪法或立法性的保护。文件总结道:因此,我们宣布从这个不受民主制约的体系中独立出来。我们的CEM提供了解放性的另类选择——一个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立的公民之声,它努力为我们及我们的后辈创立一个自由、公平、多元且负责任的文化环境。

仿佛是显示其国际性方针,CEM以准则的形式通过了《人民传播宪章》(*The People's Communication Chapter*)的草案。该草案由第三世界网络(The Third World Network,马来西亚的)、通讯与人权中心(The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阿姆斯特丹的)以及世界社区广播电台协会(The World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Radio Broadcasters)联合发起。《宪章》在许多方面都与民主与媒体大会的《权利信息法案》相重叠,比如:支持加强媒体的责任感、进入媒体、媒体扫盲、隐私、尊重及不歧视、多元性以及独立媒体等方面。但是《宪章》的范围较《法案》更广、更有国际性,它对媒体改革所提的建议也更激进,它肯定了人们保护他们的文化正直

性的权利以及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表达的权利。

它呼吁能保护记者的国际性法律,呼吁人们纠正媒体错误信息的权利,呼吁大众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呼吁赛柏空间中的普遍接近和自由表达,呼吁有益于儿童的传媒制品,呼吁对审判的公正报道。

《人民宪章》以类似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信息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的话语,号召媒体积极“反对煽动仇恨、偏见、暴力和战争”的行为,并避免美化暴力,避免采用有侮人格的陈规。也许是预感到有提倡审查制度之嫌的谴责,《宪章》没有将该条款直接针对媒体,相反,它以人们有权要求媒体采取这种行为作为开场白。在为充满商业气息的文化与传媒体系提出的另一种真正激进含意的建议时,《宪章》则不那么含糊了:“媒体应当避免,如有必要,还得揭露伪装为新闻和娱乐的商品宣传,避免制造那些浪费的、不必要的、有害的或对生态有破坏性的需求、制品及活动。”《宪章》承诺要谋求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机制来宣传、实现并监督这些准则。

CEM 的顾问团及有关组织中也有加拿大人的参与。到 1996 年,一个类似的非党派媒体改革运动正在加拿大形成。加拿大人委员会(The Council of Canadians)是加拿大英语区最大的进步性保护伞组织,它在反对霍林格接手萨斯姆报业集团后报纸所有权极端集中化的斗争中发挥了先导作用。有了来自记者个人、学会、民权自由主义者和(重要的)媒体工会的支持,这个共同阵线有能力为争取媒体多元化打一场持久的、基础广泛的战斗,这个项目可借鉴英国名为“报业和广播自由战役”(CPBF, The Campaign for Press and Broadcasting Freedom)的经验。1979 年,为了帮助劳动党发展媒体政策,形成了 CPBF,自此后,CPBF 扩大了它的活动和联盟,并可以说成为了欧洲同类运动中最先进的一个。

以 CEM 和民主与媒体大会为代表的媒体民主化活动,形成了一种新型进步性政治,从扩大发言权、话题、经验和视角的意义上说,这种政治侧重于媒体系统的民主化,侧重于反对传媒集团商业主义的整体逻辑。用 CEM 建立者的话说,“CEM 呼吁把为平等、公正及民主性承诺的实现而努力的斗争从传统领域转移到文化领域中来”。<sup>85</sup>

在关键方面,媒体民主化运动也对客观性体制提出了挑战。它很清楚地反对客观性体制的假设:主流新闻实践和新闻系统的制度性安排,造成了对世界无任何价值观或客观的描述。至于这个运动是否因客观性思想不存在(认识论上)或不可取(规范上)而丢弃它,这一点还不很明朗。认识论中未解决的和也许部分地未被认识到的分歧,还存在于这个运动

内部。首先，在身份政治和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中，倾向于相对主义的趋势是最明显的。这个观点认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真理衡量标准和感知，而且脱离产生它的利益和立场的抽象真理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的观点（见第5章）。

其次，许多活跃分子提出了建立在现实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媒体批评。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新闻媒体双重标准的分析，清楚地暗示了被商业媒体歪曲了的但客观上可知的社会和政治世界的存在。<sup>86</sup>这一主张在格伯纳关于文化指示标志（电视构筑世界图景的方法，以及有关的情感反应）的著作中亦有所暗示。现实主义认识论的另一个范例在另类新闻学会行政主任提出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他批评了“那些歪曲公众对现实的感性认识”的“小报意识”，他号召“追求真理的新闻”来“满足充满生气、活跃及明达的公民主体的需求”。<sup>87</sup>

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在是否把客观性作为一个标准的典范这一点上同样存有矛盾。一些活跃分子，尤其是社区和参与性媒体中的活跃分子，将之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予以抵制，认为它保护职业特权，合法地否定了公众直接进入媒体。不过要求强化维护公众利益的独立新闻，反对信息娱乐化和传媒集团审查制度的呼声却非常普遍。尽管活跃分子们揭穿商业媒体声称“客观”的谎话，他们自己也不愿丢弃客观性的辞令，不愿提倡公开的赤裸裸的党派偏见或主观性。相反，正如一位来自 FAIR 的活跃分子所说，FAIR 并不是要求媒体有任何偏袒——他只要求“好的报道”或“更好的报道”。<sup>88</sup>

在许多方面，客观性、独立性和公众利益继续成为媒体批评甚至是来自左翼的批评的用词。<sup>89</sup>但是，较之于被 20 世纪商业传媒规则化了的体制，这一对客观性的接受和特定用法与 19 世纪劳工新闻的进步和普遍化的理想主义有着更多的共同点。

## 可持续民主中的公共传播

就算我们处在危机关头,这也不是为改革制作详细蓝图的时候。在公共传播系统里,科技、经济、政治变革会很快使得任何这样的蓝图迅速过时。相反,我们应该开始重新考虑新闻业的概念性范畴以及规范性的允诺,即使最终只是再次肯定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从考察公共新闻运动入手,寻找思想线索。虽然它存在局限性,却极有用地提出了关于新闻业的公共哲学在民主中的实质和角色。

从公共新闻运动可得出重要的两点以及对客观性的其他批评。第一,新闻业不可避免地是有选择性的,受个人以及制作组织主观色彩的影响,它无法与选择和价值分开。甚至新闻业最客观的形式也有系统化的结果和对商业主义、自由民主以及其他东西的忠诚。新闻业不能选择不要原则,它只能选择它的原则是否被公开承认。我们认为,北美新闻业的主要问题就是它自我宣传的客观性原则并不是它在实践中为之服务的实际主子。

第二,没有人造的机构能够想当然地被再生产,任何机制都有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如果被抛弃,就必然导致这些机制的灭亡或转化为别的什么。因为新闻业和民主是互相联系的,又因为双方都是脆弱的,新闻记者和保护双方的活动或领域上有合法的利益。对于使民主的公共领域重新恢复活力持中立立场,要么是自拆台脚的,要么是虚伪的。毕竟,新闻工作者不会佯装对言论出版自由这样的价值观念漠不关心,因为这些正是他们职业的前提。当政府的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及其他言论自由的潜在威胁受到高度重视时,对这些价值的承诺即使是在(客观?)新闻选择过程中也是极为明显的。

这些同样明晰的价值承诺能合法地、能被适当地延伸为对民主自治的要求。我们建议新闻业作为一种为可持续性民主提供公共传播的事业来被评判。

## 公共传播？可持续性民主？

公共传播的想法将新闻业定位于更广泛的媒介系统的一部分。它所唤起的不仅仅是“报道”这一消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社会对话”的更为积极的角色。也引起促进关于共同关心的事情的社区对话的更积极的角色。我们目前的媒介和政治系统已显出其帮助制造民事对话或民主公众群体，以及提供公平参与关于基本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合理对话的能力极其有限，甚至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市场驱动的媒介系统不可能克服自身偏见，偏好富有的消费者、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表面无政治性但时而会具社会腐蚀性的娱乐。像在加拿大这样高度区域化、文化经济上受殖民（很受南部邻邦经济束缚）的国家，其商业化的媒介系统甚至不可能支撑与其国家政治体制相对应的公共话语讲坛。市场自由主义人士很满足于让公共传播就像现在这样，由媒介巨头控制的经济气候里的最大利润逻辑左右着。

从某种意义上说，培育可持续性民主的想法与对增长的限制和管理的环保主义概念相关，这一限制和管理对生态幸存至关重要，因为生态的幸存是适宜人类生存的社会秩序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目前的媒介系统有意识地提倡过度浪费性的消费，主要是出于广告收入的利益，尽管我们不能指望媒介发展得能去提倡环境保护主义，但起码要争取在消费主义与生态意识之间取得平衡或中立。

另一方面，可持续性也指民主制度能够超时支撑、复制。民主没有历史性保证。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事件宣布它灭亡的可能性真实存在。民主的再生产涉及不可避免的模棱两可性。某种政策需要预先被排斥在外，即使他们由大多数选票决定下来，但是一个民族民主选举的独裁统治或由大多数选票确定的对邻国发动攻击性侵略战争难道就是合法的吗？这方面有很多引起麻烦的历史实例，如法国19世纪50年代路易斯·拿破仑的公民投票独裁政府，以及20世纪30年代纳粹选举获胜。

种族仇恨和种族灭绝的提倡代表了同样的尴尬。如果民主允许使用自由破坏人权的基础，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以媒体煽动的仇恨在前南斯拉夫血腥内战中的先导作用突出了这一尴尬。<sup>1</sup>那场战争开始之前，政治理论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解释为什么对民主负责的立法机构也许需要下令“逮捕并惩罚以在拥挤的戏院叫喊失火而取乐的个人”，或崇拜“枪杆子的神圣权力”的团体。据基恩所言，“公开的、忍让的公民社会

会倒退成为战场。在这里,由于像新闻自由这样的民权自由的存在,狮子能够咆哮,狐狸能自由地猎取小鸡。在极端情况下,争吵着的公民社会甚至能将自己扼杀”。<sup>2</sup>

似是而非的是,多数人有时必须同意将永远的限制性放在未来多数人的决定上,避免民主秩序走向过分的民主是成文宪法和对法律的司法评论的主要目的。

然而民主的可持续性不仅是通过正式文件、程序,例如法律和选举,来保持秩序、合法性的问题,而且它要依存于民主主体的主观性发展,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的微观世界中培养自己的能力及民主观念。<sup>3</sup>公共新闻业、另类媒体、媒体民主运动都提醒我们新闻业能潜在地帮助培养民主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由媒介通过话语方式培育的,它是构成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商业媒介倾向于将受众定位为消费者,不仅对环境可持续性,也对民主化公民主体的可持续性有负面的效果。正如彼得·德尔金(Peter Dahlgren)所说:

我们符号环境以消费主义赎救(consumerist redemption)的形象包围地球,同时,大量的人口被排除参与,另外许多其他团体及个人在挑战、拒绝这种满足的形象。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力量的一个主要的负面性特色就是它反对集体身份或行为,所有的解决方式都是个人化的。这样,消费者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的。在福利国家面临危机、市场力量被政治化地提升为社会关系之思想基础的话境中,它们之间的不相容和分歧日趋明显。在很大程度上,任何公民身份上的胜利必须以牺牲消费者的身份作为代价。<sup>4</sup>

如果德尔金是正确的,如果新闻的目的是民主的公共领域,正如公共新闻讨论的那样,那么新闻业的结构重组以将新闻业从受众作为消费者的定位中解放出来为目标是正确的。

这样的建议有高度的政治性和争议性,正如什么样的文化和体制性条件应被视为民主的前提条件这个大问题的概念。民主本身,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是极有争论性的概念。任何新闻的公共原则会包括(至少隐含)特定的民主模式。

正如,我们也看到的,客观性体制以其职业新闻工作者面向或代表广大公众说话的姿态,看上去更适合竞争性精英民主的模式。在这里,民众的政治参与主要被限制到选举上。但随着民主这一特定版本面临合法性危机,其他更彻底的模式正在追求把民主原则不仅运用在正式的政治系统



上,而且运用于公民社会中。这些可供选择的模式批评竞争性精英主义所依据的正是诸如参与性、平等性、代表性、有效性、可选性这些民主原则。<sup>5</sup>

参与式民主呼吁民众参与社区或工作场所对其有影响的决策的决定权。它暗指“民主参与”的传媒模式,以便让建立在地理上、利益上的社团有像温哥华合作电台和其他社区性媒介系统所提供的横向传播的机会。<sup>6</sup>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把经济资源的近乎公平的分配,不只是个人的法律上的权力,视作是有效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而且它呼吁在经济领域里推行像政治领域里的一样的民主决定权。它暗指一种有意识地为传播平等而作代理的媒介系统。在这种模式里,媒介会以抵消由市场关系和公关文化导致的政治、传播资源方面的不平等为目标的方式重新构建。

代表性的多元文化是指不同范围的社会性利益,不仅仅是那些能够用得起职业形象设计者的人的利益,他们在媒介、政治系统内发言的能力。多元性并不一定是好民主,给种族主义暴徒提供进入媒介的机会可能多少会增加媒体的多元性,但不一定有助于支持民主的价值观念,不过用代表性的多元化的一般原则去均匀商业化媒介系统的趋同化倾向,以及在被边缘化的团体或附属社会集团,甚至像妇女、工人这样的大多数人的团体的斗争中,把多元化原则具体化还是十分重要的。

有效性指的是对我们有参与公共推理并通过公共政策达到有用结果的集体能力的信念。我们要考虑目前的媒介是否培养了这样一种相对于政治生活的主体感,或是它们促进了愤世嫉俗、不予理解与退缩妥协。

有意义的选择性指的是超越消费文化提供的虚假选择(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向公民社会以及政治生活内的根本性选择的有效性和明晰性转移。在政治系统里它意味着提供参与机会、批评性监测并提供更广范围的政治选择。在选举过程中的巨额花费使得选民的挑选狭窄化的美国,这点尤为重要。在亿万金元的支持下,像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这样的出版商和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这样的商人就能够跻身于政治/媒介领域。而没有相当的财富,像消费者利益保护者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这样的候选人却处在政治荒漠里——尽管他们的纲领也许值得公众倾听。加拿大的政治系统包含的多元性较多一些,但它在为小政党提供可靠而又不过分的接近媒体的机会方面有待改进。<sup>7</sup>

选择性也意味着向褊狭的自由主义对公/私的区别进行挑战,以期将对整个社会有渐进影响的“私人”选择提高为公共问题。例如在工作场所里引进技术;以不断发展和不可持续性地依靠汽车为前提的城市发展模

式；在没有工作、工作过度的不断极端化的社会里工资与工作的分配；让妇女不成比例地承担没有薪水或薪水很少的工作的性别划分。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些或其他力量在新闻媒介内很少成为公共话题。

参与性、公平性、代表性的多元化、有效性、选择性这些价值观念是可持续、彻底的民主文化的衡量尺度，它们与市场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的私有化、个人化的消费者选择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它们并不总是受到传统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依据以及新闻客观性这一不死之神的支持。

## 客观与否？

如果新闻业的确是维护可持续性民主的公众传播的一种形式，是不是指新闻业应该放弃讲述与公众相关的真相的道德标准呢？是不是新闻业应该把客观性丢入历史的垃圾箱，只有拥有长期的对立面——公开的党派之争或不加限制的主观性呢？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很少有人愿意让新闻业受隐藏的、不适当的动机引导，发布虚假的消息，窒息相关的声音，或只是为了保护特权或偏见压抑重要的信息。客观性体制的某些特色明显值得保留或重被注入活力。毕竟，客观性最早的版本，即在19世纪劳工报中，作了民主化信息的解放性许诺。要以一种导向进步的方式讲述有关世界的故事。客观性并不宣称自己没有价值观念，在它产生的时代，事实与价值观念、消息与意见的区别并不明显。那是一个新闻业的政治承诺不一定更深刻但更公开化的时代。

当然，我们不可能只是返回到19世纪民主话语的天真的普遍主义之中。20世纪悲哀地告诫我们理性如何能愚弄我们，乌托邦式的抽象化如何能与噩梦式的集权主义政治交织在一起，甚至是明显的单纯式或赞美式普遍化范畴为何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中介及排他性的工具。（这使人想到那些以“人人平等”为口号来强烈反对保护土著居民权益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公民团体）<sup>8</sup>真理、进步、公共利益这些启蒙式的概念一直存有争议，这也很成问题。但可以被看作是启蒙运动“对自身的反思”的后现代批评中包含了一种健康的警告：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新闻上，不应有单一的普遍被运用的政体。<sup>9</sup>多元主义、试验性、公开性应是当今的秩序。

然而，我们需要使启蒙运动的解放性的民主话语精神和劳工报刊的客观性版本恢复生机。平等、解放这些启蒙观念继续鼓舞着进步的政治、

社会改革方案——进步性在这里并不是在一个先锋指引下，使我们进入了有了蓝图的乌托邦之意，而是永未完成的、为更加平等的财富、权利分配而工作的事业。<sup>10</sup>这种取向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年代，在这个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地局限了（如果还没有完全抛开）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时代，更是当务之急。市场逻辑必须从属于民主标准，如果我们还想保持自由主义中最好的部分——不仅是正式的、合法的个人权利，而且是人格的尊严与全面发展，以及民主的最好部分——不仅是代议性政府、间断性选举，而且是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范围内有意义的公民参与和民主程序。

尽管一个世纪以前的掏粪者可能会让我们想到北美新闻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进步性冲动，我们当然不是主张社会的中心媒介应该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属品。这样的合并既降低了新闻业的可信度，也存在着把一种单元模式强加于一个多元社会的潜在危险。前苏联的威权主义梦魇，正是国家和一个政党以实现自己定义的某种历史使命的名义压制传媒的多元性和自主性的结果。对全球而言，独立的新闻业继续受到政治权威压制的程度不亚于不受限制的商业主义的威胁。而当两种力量联合起来时所产生的新闻体制可以说确实十分可怕。<sup>11</sup>民主传播系统应包容由某些团体和机构直接控制的，对其各自的成员说话的媒介。<sup>12</sup>但总体来说，必须有与政府、政党、运动之间保持相对的独立的新闻业。

此时此地——北美 20 世纪末，在独立新闻业与“进步的”政治立场之间有着利益上的巧合，即向由市场自由主义产生的不平等以及强制性驱动提出挑战。这种巧合是由目前的市场力量如何削弱了作为独立公共领域的新闻业的机构基础而导致的。新闻媒体的集团拥有和它们追求利润的新策略正在侵蚀着新闻编辑部门相对于市场营销部门的相对自主权。<sup>13</sup>新技术不仅带来了横向互动传播的不确定前景，也肢解了有大众倾向的公共事务新闻业的经济基础。同时，随着新闻采编经费的削减和公共关系工业在规模、手段的复杂性方面的发展，主流新闻空间中的独立调查式新闻的前景越来越暗淡。

新闻界有权关心它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对传媒业中的商业主义力量的盛行——也必定意味着对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内市场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至少这反过来意味着新闻职业文化核心的一种留存、它的机构支持、一种比个人消费要广阔的公共利益和目标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赞同，或是向作为客观性体制特征的精英主义和缺乏反思意识的专业主义的回归。正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所言：“很清楚，现代主义高峰期的专业主义，已经不再可取了，它需要在重要方面被

重新思考。”哈林指出：“新闻工作者大可不必再将自己看作，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但不活跃的公众的代表或替身，而是转向一种公共对话的辅助者和传播者的角色。”<sup>14</sup>他所说的这些话与公共新闻运动相呼应。

然而，由公共利益中讲述真理这一道德引导的职业团体，仍然发挥着重要且无法推卸的民主功能。这个团体的任务包括筛选、呈现、阐述与民主公民角色有关的信息。在新闻制作的世界里，客观性标准不能被看作是必然不相关的、保守的、欺骗的或具有操纵性，而被抛弃。新闻工作者保留或将个人判断置之一边，努力去制作诚实的报道的尝试是一件好事。受众/公民有机会接触争议性问题的不同解释和观点的确是合适的。

客观性标准在关于新闻的公共话语上有积极的意义。在新闻媒介权力全球集中的情况下，辨认和批评新闻报道背离新闻业自身最佳职业标准的具体事例及总体模式比以往显得更加重要。康拉德·布莱克的报纸真的是像他喜欢自吹的那样独立于他自身的政治野心吗？《环球邮报》权威客观的名声名副其实吗？抑或它是典型地放大了商业街上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的世界观？正如我们所坚持的，也正如德尔金提醒我们的，我们能够一方面进行这种讨论，一方面避免盲目地赞同客观性的实践和认识论基础：

我们能谈论新闻业信息性的、事实的标准尺度，而不需要同时全盘肯定有关传播的理性的信息模式。有些记叙就是比其他的更有效或更有实际意义，信息仍可根据其重要性、相关性、全面性、准确性等标准来评价，而不需要赞同主流新闻业关于客观性、公正性的概念及作为其根源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sup>15</sup>

虽然客观性体制为民主化传播提供了有用的切入点与资源，但与它相关的认识论、实践、制度需要被重新思考，并且在某些方面要被取代。

比如说，我们不应该把客观性理念等同于以这一概念的名义、被合法化的具体新闻实践。例如，会导致放大官方对现实的定义，或相反，使没有思考的愤世嫉俗等同于批判性的独立性。用一种较严谨的客观性标准来对现有的客观性实践进行批评是有可能的，这些标准包括严谨的观察、更好的研究，以及对以前不为人所了解、影响新闻生产的利益和臆断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觉察。

换句话说，正如在科学或学术领域里所理解的那样，用一种更完善的客观性理想来批判新闻客观性目前的实践是可能的。这种批判适用于暴露新闻上的肤浅和完全的不准确，以及新闻是如何与权力结合的。同时，

谴责新闻未能满足社会科学的严谨和观察的标准，也有无的放矢的一面。毕竟，新闻业更适合于让人熟悉当前的事件，而不是提供社会世界的知识。而且，我们不应该忘记女权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批评是如何向客观性概念本身挑战的。<sup>16</sup>所有的批评家都有自己的观点，没有知识能完全在不受利益动机影响和价值观的质疑条件下产生。

这种考虑为另一种对客观新闻的批评打开了大门，它的问题不在于没有达到充分的客观，而是它非法地隐藏自身的文本性。超脱的姿态、中性观察的宣称已不再站得住脚。批评家、教育家应该反复注意到，新闻的修辞是如何以牺牲其他可能的叙述为代价构建它自己作为真实的叙述权威的。新闻也应该从它自己的角度更加注重自我反省，更要意识到它自身的框架和大叙事，以及在使用时更注重这些框架和大叙事的多元性。这一建议并不意味着拥抱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呼吁公开的、多元的、批判现实的立场。

客观性体制将新闻定义为一种认知、理性的现象，这个定义使文字优越于口语，中产阶级优越于工人阶级，高层政治优越于日常生活，信息优越于故事。这种等级划分，加上它们在文化上、社会上的排他性，意味着对通俗或小报新闻的仓促排斥，而正是这种新闻，当它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时，能唤起私人的情感和意义，并将它们与公共事务相联系。客观性在如何使个体情绪融合于政治与理性方面没能提供具体的策略，而这正是它当前危机的原因之一。那种既能讲述故事，又不失去与公众利益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的通俗新闻，能起到重要的民主性角色。在商业化媒介系统之内，小报新闻的问题不在于它们对人情味和情感的依赖，而是它寻找替罪羊，强化现有偏见的趋势，这种特色与其本身以最迅速的方式来赢得最大可能的受众的商业驱动相关。《多伦多太阳报》的由商业驱动的、专制的、粗声大气的民粹主义倾向性与 CBC 广播电台的彼得·格佐夫斯基早晨谈话节目里充满人情味的、面向公众的谈话有着天壤之别。

## 怎么办？

在访谈中，我们经常被问，我们的研究对新闻应该怎么办，有什么暗示？这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尤其考虑到任何详细蓝图都有很快过时的极大可能性。我们更不愿意倡导“客观性如是”(objectivity-as-usual)被另一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模式取代。我们需要适应不同目标和人群的不同的新闻业，并且我们既没有欲望，也没有理由向在一个我们自

己不属于的、要求严格的行业里耕耘的劳动者们发号施令。我们对于提出问题 and 想法以便引起集体讨论更感兴趣。

媒体改革的问题,经常很快地被简化为是围绕个人新闻工作者的行为及某特定情况的职业道德问题。当一名广播记者就利益冲突问题递交了一份抱怨一省之长的正式文件时,他是否跨越了政治与新闻的分界线?记者要不要被迫在某些法庭案件中揭示他们的信息源?某一特定的报道中是否是在个人隐私与公众知情权中找到了平衡?像这些问题在日常新闻世界中是重要的,但它们经常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了构成日常世界轮廓的更广阔的哲学、结构性利益、制度背景等方面的问题。<sup>17</sup>

不过,我们深信,在新闻与民主处于同一十字路上时,还是可以指出一些改革突破口的方向的。首先重要的是,不能机械地从新闻媒介结构来直接得出关于新闻功能的结论。不管它们的内在趋势如何,商业新闻组织是允许一定的异见与变革存在的矛盾性压力之所在。<sup>18</sup>公共新闻运动表明,在现有的新闻体制内进行一些有其局限性的新闻改良和实验是有可能的。

例如,媒介能使自我反省机制化(如果这在字眼上不自相矛盾的话)。新闻记者和他们的受众需要分析新闻话语的基本倾向性和影响,以便阐明和讨论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框架和大叙事,以及考虑受众如何被定位和称呼。我们需要更多的来自客观性范式以外的新闻评论,更加公开地承认新闻业的内在价值和利益。这种自我反省有助于展开新闻业是否应该为另类的价值和利益服务的讨论。

如公共新闻运动建议的,媒介能够用引导公民交谈、实质性的政治辩论和参与,来取代传统的但多少有点欺骗性的超然姿态。这种引导的角色意味着用阐明选择、价值观、意见的方式取代愤世嫉俗、赛马(horse-race mode)模式的政治新闻。它也意味着给予人类主体更突出的积极的可能性。我们在这儿指的不是“快乐消息”、正面报道和个人的成功故事,这些已经很多了,我们所指的是那些有合理的新闻价值,但没被充分报道的有关人们如何共同协作来改变现状的新闻。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1995—1996年全球核裁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sup>19</sup>另一个例子就是,从印度到法国,再到墨西哥,到安大略的对由资本驱动的全球化的抗议和争取另外出路的运动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可持续性民主的新闻业将致力于减弱市场社会的结构不平等在公众领域里对民主参与的影响。它有意识寻求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那些并不一定有自己的公关公司或智囊团的重要的声音,那些向传统智慧挑战

的立场,或那些出现在各个熟门熟路的“新闻口”之外的重要事件。

例如,民主国家的公众权威在下降之时,新闻业传统上采取的针对政府的(没有充分发挥的)监督角色应该被延伸到事关民主共存的其他潜在问题上。环境恶化问题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如果媒介用于报道此问题的资源有用于报道党派政治或名人谋杀审判那么多,或许它在公众议程中的地位会更高些。新闻业对于自由言论、经济繁荣的倾向应被扩展到包括生态生存和对政治纷争的和平解决。面对一颗越来越不堪重负的星球,媒体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促进必须被放弃,甚至被逆转过来。

另一个潜在的监督区域涉及相对未被监察,没有什么责任机制的多边国际机构,这些机构挥舞着强大的政治经济权力棒。它们包括跨国公司和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政治金融机构。评价关于这些私人、半政府组织的新闻的人们,可能不仅要看涉及的数量,而且要看这些新闻的目标或受众。正如迈克尔·舒德森所言:

大公司的总裁,可能常常比政府官员更能影响公民日常生活的,他们总是在一般性的消息上很少露面。他们的名字会在商业版面上出现,但在这里他们被报道的方式极为不同。头版上,新闻记者写作时,预想着读者会问:作为这个社区、国家、世界的公民,我应该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商业版上,新闻记者假定读者会问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想保护和增进我的金融利益的投资者,我应该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sup>20</sup>

民主新闻当然包括面对公民的商业新闻——在整个北美,有少数研究和倡议团体正在这么做,但在主流新闻里这类新闻实在太少。

同19世纪精英党派报纸被替代的范式转型相类似,新闻实践和精神上的根本性变革不可能在没有来自外部或基层的强烈而持续的压力下取得。正如迈克尔·克洛所说:“一个世纪以前,是公众压力创造了‘客观’新闻的妥协。只有同样的能量能改变新闻业的当前形式。”<sup>21</sup>我们承认,大多数这些改革不可能在当前系统内发生。它们可能需要新闻业的新机构形式,通过公共政策来减少媒介系统内商业逻辑的统治地位和公司权力。

有别于私人公司和政治控制的另类选择确实存在,包括限制寡头媒介大公司进一步的兼并,采取规则框架去保护新闻的自主权免受广告、发行、所有者的政治利益影响,重新注入活力的公共广播系统,包括经常被忽视的省级教育网以及CBC,能帮助平衡商业新闻媒介的盲点。这种振

兴不仅是逆转资金削减,而且是对公共广播的新使命及与受众的新关系进行探索的问题。公共广播部分可由收取广告税来支持。因为广告促进浪费性的消费和媒体内容的雷同化。这种税收从民主观点上来讲是极为合理的。公共政策也需要确保提高非商业、非政府社团以及另类媒体有进入由寡头控制的发行系统的机会。

确实,这些改革将遭到会失去最多的精英们的巨大抵制。媒介所有者以歇斯底里的愤怒来欢迎加拿大1980—1981年皇家报业委员会关于报业改革的相当中庸的改革建议。而且,尽管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媒体改革本身不能带来对经济安全和政治权力的分享。媒介民主化只能由其他的社会、政治改革,包括我们如何组织日常生活,来引发且维持。民主化和自身反省的新闻业需要受众的支持,需要这些受众坚持他们的参与公众生活的权力和需求。

由于这些原因,媒介民主化作为更广阔的(互相制约和构建的)社会转型方案才更有意义。本地区的层面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一些职业协会和工会已经达到了用有偿工作时间来讨论与工作 and 职业相关的问题的目的。如果扩展成广泛的以工作场所为地点的、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成人教育和讨论,这一社会实践会导致更广泛的参与性文化。只有在受众改变其对新闻的取向,追求获得有用信息而不是娱乐性的壮观场面时,媒介也许才会发生根本改变。反过来,当受众为了富有意义地参与其结果必须为他们所承认的决策时,他们也会要求新的新闻形式的出现。<sup>22</sup>

具体改革的建议并不比全面的民主化过程更重要。这种规模的变化更能从边缘,至少开始是从绝望感中产生。自己经济安全逐渐不能保证的新闻记者与劳工、另类新闻、非政府组织、批评性社会运动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体现在唤醒公众性文化上,在把媒体结构的问题放在政治议程上,在支持制衡不受阻止的市场逻辑对传播系统的消极影响的公共政策上,更重要的是在发展新的、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媒体机构基础上。民主化媒体的斗争不可能是抽象的理想发动的,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认识到的,一个吹嘘客观性(尽管多么空洞)的商业媒介系统已经把以下对生命质量是绝对必要的价值观念置于威胁之中:生态可持续性、财富与权利的公正分配、对国家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协商。

媒介民主化工程涉及许多重大利益——它不仅涉及公共生活的质量和平等,而且在某些方面涉及所谓的人的全面发展。有关这一工程的悖论,正如文化环境运动创始人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所言,它是“不可能的”,然而,它必须被实施。





## 注释

### 绪言

1. Peter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1995), p. 7.
2. Canada,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Hull, Que.: 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81), p. 34.
3. C. 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Toronto: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65).
4. 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e also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h. 5.
6. These criteria are loosely adapted from Denis McQuail, "Mass Media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wards a Framework of Norms for Media Performance,"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ed., ed.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London: Arnold, 1996), pp. 66-80. For a fuller treatment, see Denis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7. The literature along these lines is voluminous. For recent Canadian examples of each kind of critique, see Barry Cooper, *Sins of Omission: Shaping the News at CBC TV*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 and James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How Corporations Control the New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6).
8. Ben H.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 4th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pp. 3-4; Mark Crispin Miller, "Demonopolize Them!" *Extra!* (November/December 1995), p. 9; see also "The National Entertainment State," *The Nation*, vol. 262, no. 22 (June 3, 1996), pp. 23-26, for a chart summarizing the holdings of the four corporate conglomerates.
9. Robert W. McChesney, "The Global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48, no. 3 (July-August 1996), p. 2.
10. See *ibid.*
11. Herbert Schiller, "On That Chart," *The Nation*, June 3, 1996, p. 16.
12. See Foucault's essay "Truth/Power,"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54 - 55.

13. Scott Lash,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4 - 5;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83 - 87. Lash had in turn adapted this notion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sts of the "Regulation School" and their concept of "regime of accumulation" On that, see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pp. 121 - 124.

14. To Foucault and Lash, we should add a more recent usage that is remarkably similar to ours: Mark Pedelty's concept of "disciplinary apparatuses", a hybrid notion that blends Foucault's concept of discipline with the French structural Marxist Louis Althusser's notion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Pedelty means to combine, as do we, Foucault's concept of power as productive and enabling, not simply repressive, with the Marxian concern with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hierarchical regim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See Mark Pedelty, *War Stories: The Culture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5 - 6.

15. Robert A. Hackett, "An Exaggerated Death: Prefatory Comments on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in *Deadlines and Diversity: Journalism Ethics in a Changing World*, ed. Valerie Alia, Brian Brennan, and Barry Hoffmaster (Halifax: Fernwood Publishing, 1996), pp. 40 - 45.

16. Loren Lind, "The Death of Objectivity,"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3, 1990, p. C3.

17. Shari Graydon, "Freedom of Speech Lessons from Russia," *The Vancouver Sun*, June 19, 1996, p. A11.

18. Quoted by Doug Smith, "Offensive Lines", *Canadian Dimension*, vol. 30, no. 4 (July/August 1996), p. 48.

19. Robert Hackett, "Decline of a Paradigm? Bias and Objectivity in News Media Stud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 1, no. 3 (September 1984), pp. 229 - 259.

20. Yuezhi Zhao,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forthcoming).

21. Armande Saint-Jean, "The Evolution of Journalistic Ethics in Quebec," in *Deadlines and Diversity*, ed. Alia, Brennan, and Hoffmaster, pp. 21 - 29.

22. Our thanks to Nick Dyer-Witheford for some of these formulations.

## 第一章

1. See Peter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2nd ed. (Toronto: Harcourt Brace Canada, 1996), p. 7, for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ase.

2. "The dark ages of partisan journalism" phrase is from Frank Luther Mott, *The New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67.

3. Norman Penner, *The Canadian Left: A Critical Analysis* (Scarborough,

Ont.: Prentice-Hall Canada, 1977), pp. 8, 15.

4. Although they may have ideological elements such as populism in comm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 movemen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current party of that name led by Preston Manning. Organizationally at least, the current federal Liberals have greater claim to descending from the Victorian-era Reformers.

5. Penner, *Canadian Left*, p. 17.

6. Douglas Fetherling, *The Rise of the Canadian Newspaper*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nada, 1990), p. 79.

7. The federal Conservatives, for example, were spending \$100 000 per year in the 1860s to buy favourable newspaper treatment. See Fetherling, *Rise of the Canadian Newspaper*, p. 79.

8. Fetherling, *Rise of the Canadian Newspaper*, p. 78. Fetherling (pp. 100 - 101) notes import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anadian partisan press. For example, while papers in Central Canada were generally polarized along Liberal/Conservative party lines, papers in the three Prairie provinces were generally less beholden to political parties because of the newness of the cities and towns there and the relative weakness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British notion of the press baron, the proprietor who was a politician or statesman *ex officio*, took particular hold in British Columbia.

9. J. M. S. Careless, "Mid-Victorian Liberalism in Central Canadian Newspapers, 1850 - 1867,"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3 (1950) pp. 226 - 227.

10. Before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ist ideas began to make inroads in labour circles. Socialism replaced the democratic assumption of a one-class society with the idea of two social classes in conflict and posed the need to achieve a classless society through a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11. Ed Finn, "Foreword," in Ron Verzuh, *Radical Rag: The Pioneer Labour Press in Canada* (Ottawa: Steel Rail, 1988), p. vii.

12. A statement in the Knights of Labor organ *The Palladium of Labor* (Dec. 15, 1883), published in Hamilton, Ont., illustrates how notions of natural rights were being extended to criticize the economic as well as political systems—but in terms that fell well short of the Marxist position that class exploitation was inherent to capitalism:

We are thorough believers in Democracy—for without a free expression of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enactment of laws but little advance can be made. But... mere Democracy—if carried no further—will never in itself redress social injustice or remedy the evils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bad enough, it abounds in abuses. But they are not the worst or most flagrant abuses or those that press most hardly on people. It is wrongs which flow from the deprivation of natural opportunities—from the crushing, paralysing effect of unchecked competition—from the power which capital has obtained to

dictate the terms upon which the toilers shall continue to exist—from the huge monopolies which count men but as machines, and ignore all consideration of justice in their insensate greed for grain—it is this class of abuses rather than those purely political in their nature which cry aloud for speedy redress.

13. Da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 30.

14. Ibid.

15.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8, quoted i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31.

16. Verzuh, *Radical Rag*, p. 30.

17. Ibid., pp. 52–53.

18. *Wage-Worker*, March 8, 1883, in Verzuh, *Radical Rag*, p. 50.

19. Iorworth J.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Folkestone, Eng.: Wm. Dawson & Son, 1979), p. 315.

20. Quoted in Verzuh, *Radical Rag*, p. 30.

21. Quoted in ibid., pp. 70–71; emphasis added.

22. Quoted i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45; emphasis added.

23. Michael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p. 5.

24. Verzuh, *Radical Rag*, pp. 41, 87–88.

25. Ron Verzuh, “The Labour Press,” *content*, May/June 1985, p. 12.

26. William Lyon Mackenzie’s *Colonial Advocate*, founded in 1824 in Ontario, was in all likelihood the first Canadian popular newspaper that came close to resembling, in its combination of radical commentary and “sensational” news stories, both the British Sunday papers and the U. S. penny press. But the *Colonial Advocate* was different from both. It was a political paper that fought for a cause, rather than a commercial paper whose main purpose was profit. Mackenzie was a political leader rather than a business entrepreneur—by contrast with many of the publishers of U. S. penny dailies and British Sunday papers. The *Colonial Advocate* ceased publication in 1837 with the defeat of the rebellion he led. Other papers that attempted to imitate the U. S. penny paper before the 1870s only survived either “by becoming the purveyors of news and views, ads and entertainment for the bourgeois family” or by succumbing to “the excitement of party warfare”. See Paul Rutherford, *A Victorian Authority: The Daily Press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 51.

27. Rutherford, *Victorian Authority*, p. 51.

28. James Curran, “The Press as an Agency of Social Control: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ed. George Boyce, James Curran, and Pauline Wingate (London: Constable, 1978), p. 55.

29. Ibid. , pp. 54 - 55.
30.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p. 74 - 75.
31. Verzuh, *Radical Rag*, p. 68.
32. Ibid. , p. 58.
33. Quoted in ibid. , p. 79.
34. Roger Bird, "Sketchy Portrait," *content*, May/June 1989, pp. 35 - 37, esp. p. 36; also Verzuh, *Radical Rag*, p. 79.
35. Verzuh, *Radical Rag*, p. 68.
36.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46.
37. Rutherford, *Victorian Authority*, p. 51.
38. Verzuh, *Radical Rag*, p. 67.
39. Rutherford, quoted in Verzuh, *Radical Rag*, p. 68.
40. Quoted in Rutherford, *Victorian Authority*, p. 51.
41. Independent journalism did not take hold at once. The partisan press lasted long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popular commercial da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Michael McGerr argues in *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lthough the penny press emerged in the 1830s and signalled the possibility of successful independent journalism, independent journalism did not come into full force until the 1870s and 1880s. In Canada, different types of newspapers—the partisan press, the labour press, the sectarian press of different ethnic or religious groups, and the independent commercial press—co-existed until well in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 period sometimes called the golden age of Canadian print journalism.
42.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75.
43. Rutherford, *Victorian Authority*, pp. 71 - 72; see also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22 - 26.
44. McGerr,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pp. 107 - 137.
45.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87; see also p. 6.
46. Brian Beaven, "Journalism,"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Edmonton: Hurtig, 1985), p. 923.
47. McGerr,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p. 118.
48. For a detailed case study of the democratic storyline in action, see Satu Repo,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the Discourse on Democracy, and the Birth of the Popular Press"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6, pp. 129 - 148.
49. Rutherford, *Victorian Authority*, pp. 161, 162.
50.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22.
51. *The New York Herald*, May 6, 1835, quoted i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87; see also p. 181.
52. For an account of these developments in the British context, see Anthony

Smith, "The Long Road to Objectivity and Back Again: The Kinds of Truth We Get in Journalism," in *Newspaper History*, ed. Boyce, Curran, and Wingate, pp. 153 - 171.

53. Beaven, "Journalism," p. 923.

54. Virginia Berridge, "Popular Sunday Papers and Mid-Victorian Society," in *Newspaper History*, ed. Boyce, Curran, and Wingate, p. 259.

55.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197.

## 第二章

### The Evolution of Objectivity

1.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71 - 77.

2. For our usage of the unconventional term "facticity" to connote the status of factuality as an occupational ideology, linguistic purists can blame Gaye Tuchman,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8), pp. 82ff.

3. Julius Chambers, *News Hunting on Three Continents*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y, 1921), p. 7; quoted in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77.

4. Lincoln Steffens, *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1), p. 179; quoted in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77.

5. Mitchell Stephens, *A History of News: From the Drum to the Satellit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p. 253.

6. Krishan Kumar, "Holding the Middle Ground: The BBC, the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al Broadcast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 James Curran, Michael Gurevitch, and Janet Woollacott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p. 236, 238.

7. The following summary of McArthur's concept of objectivity is summarized from Robert Albota, "Dan McArthur's Concept of Objectivity for the CBC News Service", in *Beyond the Printed Word: The Evolution of Canada's Broadcast News Heritage*, ed. Richard Lohead (Kingston, Ont.: Quarry Press, 1991), pp. 223 - 230.

8. Frank W. Peers, *The Politics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 1920-1952*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p. 345.

9. Albota, "Dan McArthur's Concept," p. 225.

10. Ibid.

11. Ibid., p. 226.

12. Don Macdonald, in *Beyond the Printed Word*, ed. Lohead, p. 234.

13. Romeo Leblanc, quoted in David Taras, *The Newsmakers: The Media's Influence on Canadian Politics* (Scarborough, Ont.: Nelson Canada, 1990), p. 53.

14. George Bain, *Gotcha! How the Media Distort the News* (Toronto: Key Porter Books, 1994), pp. vii - viii.

15. Taras, *Newsmakers*, pp. 53 - 54.

16.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122ff.

17. Quoted in *ibid.* , p. 153.
18. *Ibid.* , p. 138; see also Stephens, *History of News*, pp. 260 - 261.
19. For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see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ch. 4.
20. *Ibid.* , p. 122. For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see Herbert J.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0), p. 185. For “strategic rituals,” see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1972), pp. 660 - 679.
21.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and 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2nd ed. (White Plains, N. Y. : Longman, 1988), p. 120.
22. Quoted i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195.
23. Of course, in important respects all reporting is unavoidably interpretive. Here we adopt the more restricted and conventional meaning of “interpretive reporting”.
24. Cf.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148 - 149.
25. Curtis D. MacDougall, *Interpretive Report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 17.
26.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Hutchins Commission), *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27.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150.
28. Albota, “Dan McArthur's Concept of Objectivity” pp. 229 - 230.
29. David Levy, comment made at a symposium on broadcasting new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Oct. 20 - 22, 1988, published in *Beyond the Printed Word*, ed. Lohead, p. 233.
30. Andrew M. Osler, *News: The Evolution of Journalism in Canada* (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1993), p. 174.
31. Quoted in Yuezhi Zhao, “Objectivity and Commercial News”,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 1989.
32. Both quotations are from Mott, *News in America*, pp. 79, 80; emphasis added in the Cooper quote.
33. Albota, “Dan McArthur's Concept of Objectivity,” p. 230.
34. Gene Gilmore and Robert Boot, “Ethics for Newsmen”, in *Ethics and the Press: Readings in Mass Media Morality*, ed. John C. Merrill and Ralph D. Barney (New York: Hastings House, 1975), p. 28.
35. Canada,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p. 218; emphasis added.
36. Bernard Roshco, *Newsmaking*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3.
37. Richard V. Ericson, Patricia M. Baranek, and Janet B. L. Chan, *Visualizing Deviance: A Study of News Organiz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p. 261.

38.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192.

39. Harvey Molotch and Marilyn Lester, "Accidental News: The Great Oil Spil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 (1975), pp. 235 - 260; cited in Tuchman, *Making News*, p. 83.

40. Mark Hertsgaard,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see, for example, pp. 62 - 71, 145, 334.

41. The phrase is from Ron Verzuh, *Underground Times: Canada's Flower-Child Revolutionaries* (Toronto: Deneau, 1989), p. xii. The book is a useful guide to Canada's alternative press of the 1960s.

42. For Canadian examples of this kind of critique, see Anthony Westell, "The Press: Adversary or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in *Parliament, Policy and Representation*, ed. H. D. Clarke, C. Campbell, F. Q. Quo, and A. Goddard (Toronto: Methuen, 1980), pp. 25 - 34; Taras, *Newsmakers*, pp. 53 - 65; and Bain, *Gotcha!*, pp. 6 - 7.

43. Taras, *Newsmakers*, pp. 95 - 112.

44. Paul H. Weaver, "Is Television News Biased?" *The Public Interest*, 26 (Winter 1972), p. 68.

45. Chris Dornan, "Logical Positivism under the Electronic Gun: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in Television New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anadian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 1981.

46. Richard Gruneau and Robert A. Hackett, "The Production of T. V. News," in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 John Downing, Ali Mohammadi, and Annabelle Sreberny-Mohammadi (Newbury Park, N. J.,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p. 281 - 295.

47. Taras, *Newsmakers*, pp. 59, 60.

48. Arthur Siegel, *Politics and the Media in Canada*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1983), pp. 207 - 233, analyses the contrast between French-language and English-language coverage of the October Crisis.

49. Taras, *Newsmakers*, pp. 54 - 55.

50. Bain, *Gotcha!*, p. 60.

51. Ibid.

52.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187 - 188.

53. J. Herbert Altschull, *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Longman, 1990), p. 317.

54. Taras, *Newsmakers*, p. 57.

55. David Hayes, *Power and Influence: The Globe and Mail and the News Revolution* (Toronto: Key Porter Books, 1992), p. 176.

56.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 191.

57. Private correspondence to the authors.



58. A project that researches blind spots in Canada's news agenda found an article by Neil Brooks and Linda McQuaig on tax breaks for the wealthy to be the secondmost underreported story of 1993. See *Project Censored Canada 1994 Yearbook* (Burnaby, B. C. : PCC,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1994). Black's comment, made in an interview on CBC Radio's *Morningside*, was reported by James Winter and Amir Hassanpour, "Building Babel," *The Canadian Forum*, January/February 1994, p. 10.

59. Altschull, *From Milton to McLuhan*, p. 317.

60. *Ibid.*, p. 318.

61. *Ibid.*

62.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18 7 - 8.

63. Jack Newfield, "Is There a 'New'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vol. 10, no. 2 (July/August 1972), p. 45.

64.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 193.

65. Journalist Douglass Cater, for example, criticized the "captive press" and the "strait-jacketed reporter" who passed McCarthy's lies and accusations as hard news of public record and without commenting on whether or not his charges were true. See Douglass Cater, "The Captive Press" *The Reporter*, 2 (June 6, 1950), p. 18. To be sure, as media sociologist Michael Schudson suggested (interview with Robert Hackett, February 1992), journalists may be overemphasizing the failure of a specific newsgathering method rather than offering more profound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asons for the U. S. media's complicity in Cold War McCarthyist hysteria.

66. See, for example, Robert Entman, *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s: Media a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7; Leon V. Sigal, "Sources Make the News," in *Reading the News*, ed. Robert Karl Manoff and Michael Schud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 30.

67. William A. Dorman and Mansour Farhang, *The U. S. Press and Ir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Journalism of Defer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15.

68. Andrew MacFarlane and Robert Martin, quoted by Vernon Epp, "Professional Values Win", *content*, July/August 1986, p. 9.

69. *The Toronto Star*, for instance, requires its reporters to sign a contract prohibiting them from engaging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endorsing any political candidates or cause. The paper argues that journalists are obliged to "ensure that our reputations as objective fact-finders are not compromised by an open display of political or partisan views on public issues". See Epp, "Professional Values Win", pp. 9 - 10.

70. For example, in the 1960s CBC-TV newscaster Stanley Burke was fired for openly espousing the Biafran cause in Nigeria's civil war; see Ericson, Baranek, and Chan, *Visualizing Deviance*, p. 105. Similarly, when his union took a stand against

the 1988 U. S.-Canada free trade deal, Dale Goldhawk (now with CTV National News) had to choose between his position as a union officer and his bread and butter as a CBC Radio host; see Knowlton Nash, *Prime Time at Ten: Behind-the-Camera Battles of Canadian TV Journalis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1987), pp. 23 - 24.

71. E. Barbara Phillips, "Approaches to Objectivity: Journalistic versu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in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d. Paul M. Hirsch, Peter V. Miller, and F. Gerald Kline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77), pp. 63 - 77.

72. Rilla Dean Mills, "Newspaper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Ethical Decis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thens, Ohio, 1982; cited in Robert J. Griffin, D. Molen, C. Schoenfeld, and J. Scotton, *Interpreting Public Issues*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7.

73. Robert Miraldi, *Muckraking and Objectivity: Journalism's Colliding Tradition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p. 14.

74. Griffin et al., *Interpreting Public Issues*, p. 88, excerpt the code.

75. Ericson, Baranek, and Chang, *Visualizing Deviance*, p. 104.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Negotiating Control: A Study of News Sourc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9).

76. Graham Knight, "News and Ide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8, no. 4 (September 1982), p. 23.

77. Walter Lippmann, "The American Press," in *The Yale Review*, vol. 30 (1930-1931), p. 440 - 441.

78. John Pauly, "Rupert Murdoch and the Demonolog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in *Media, Myths and Narratives: Television and the Press*, ed. James Carey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88).

79. On cynicism in journalism, for instance, see Walter Stewart, "The Only Side of the Street", in *The Journalists*, ed. Robert Fulford et al., vol. 2, Research Studies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Ottawa: 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81), p. 81.

80. See Pauly, "Rupert Murdoch," for an analysis of the U. S. journalism establishment's reaction against Murdoch's "invasion" of the U. S. media market.

81. See, for example, Walter Stewart, "Fulfilling a Prophecy" *content*, March/April, 1989, pp. 21 - 22; Murray Goldblatt, "Integrating Business and News", and other articles in the same issue of *content*; and Lorne Slotnick, "Purging the *Globe and Mail*", *Canadian Dimension* (June 1989), p. 47.

82. Hayes, *Power and Influence*, p. 181.

83. Stewart, "Fulfilling a Prophecy", p. 21.

84.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 136.

85. *Ibid.*, p. 137.

86. Joseph N. Gelmon, *The Gazette Style* (Montreal: The Gazette, 1991), pp. vi - vii.

87.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p. 136, 141.

88. Walter Truett Anderson, *Realit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90).

89. For the media sociologist, see Herbert J.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 184; for the reviewer, see Lind, "Death of Objectivity."

90. Walter Stewart, "No, Virginia, There Is No Lou Grant," in *Canadian Newspapers; The Inside Story*, ed. Walter Stewart (Edmonton: Hurtig, 1980), p. 15; Knowlton Nash, "This Imperfect Necessity," *content* (January/February 1988), p. 10; Canada,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p. 24.

91.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 140.

92. Bennett, *News*, pp. 118 - 120.

### 第三章

1.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 62.

2. *Ibid.*, pp. 45 - 46.

3. As no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e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is international; the worldwide market is dominated by a handful of global, vertically integrated multimedia companies—Disney, Time Warner, Viacom, Tele-Communications Inc. (TCI), and Rupert Murdoch's News Corp. See McChesney, "Global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p. 2. Even within Canada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breathtaking speed of media mergers. Winter's *Democracy's Oxygen* (1996) contains the most recently published summary of press ownership in Canada, but some of its data were already outdated by the time it reached readers.

4. For some of these points, see Peter J. S. Dunnett, *The World Newspaper Industry* (London: Croom Helm, 1988), esp. pp. 42 - 51, 188 - 200.

5. Fetherling, *Rise of Canadian Newspapers*, p. 112, 102; see also Tim Creery, "Newspapers," *Canadian Encyclopedia* (1985), vol. 2, p. 1255.

6. See, for example, Rohan Samarajiva, "The Canadian Newspaper Industry and the Kent Commission: 'Rationalization' and Respons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12 (Fall 1983), pp. 125 - 134.

7. Paul Audley, *Canada's Cultural Industries* (Toronto: James Lorimer, 1983), p. 36.

8.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pp. 21 - 41.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Hollinger newspaper empire does include some "quality" right-wing flagship papers, notably London's *Daily Telegraph*.

9. Frederick J. Fletcher, *The Newspaper and Public Affairs*, vol. 7, Research Studies for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Ottawa: 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81), pp. 6 - 7.

10. Bagdikian, *Media Monopoly*, p. 132.

11.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860, quoted in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87.

12. Dallas W. Smythe,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 J. : Ablex, 1981), pp. 37 - 38.

13. James Curran and Jean Seaton,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5), p. 41.

14. Bagdikian, *Media Monopoly*, pp. 129 - 130.

15. Lysiane Gagnon, "Journalism and Ideologies in Quebec", in *Journalists*, ed. Fulford, p. 25.

16. Canada,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p. 15.

17. Stephens, *History of News*, p. 259.

18. See Fred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p. 60; and James Carey,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Monograph*, no. 13 (1969), pp. 23 - 38. Another U. S. media scholar, Donald L. Shaw,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quantitatively the role of the wire service i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objectivity concept in news. He sampled Wisconsin daily papers during the 1852—1910 period and found a decline in partisan reporting as the use of the telegraph became more common. However, Shaw failed to establish a convincing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line of news bias and the use of wire services. See Donald Shaw, "News Bias and the Telegraph: A Study of Historical Change", *Journalism Quarterly*, 44 (Spring 1967), pp. 3 - 12.

19. Schiller, *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p. 4.

20. Ibid.

21. Margaret Morse, "The Television News Personality and Credi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News in Transition" in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 ed. Tonia Modleski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7.

22. John Meisel, "The Decline of Party in Canada", in *Party Politics in Canada*, 4th ed., ed. Hugh G. Thorburn (Scarborough, Ont. : Prentice-Hall, 1979), pp. 125 - 126.

23. Jay G. Blumler and Michael Gurevitch,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ed. M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and Janet Woollacott (London: Methuen, 1982), p. 248.

24. Peers, *Politics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 p. 12.

25. Robert W. McChesney, "The Battle for the U. S. Airwaves, 1928—1935",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0, no. 4 (Autumn 1990), p. 34.

26. Anthony Podesta, "The Necessity of the Fairness Doctrine Given the Religious Right Televangelist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vol. 28, no. 3 (Summer

1984), pp. 271 - 272.

27. Edward Jay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 64.

28.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of balance in Canadian broadcasting regulation, see Peter G. Cook and Myles A. Ruggles, "Balance and Freedom of Speech: Challenge for Canadian Broadcasting",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1 (Winter 1992), pp. 37 - 60.

29. David Ellis, *Evolution of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System: Objectives and Realities, 1928-1968* (Hull, Que.: Canada,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1979), p. 83.

30. Walter I. Romanow and Walter C. Soderlund, *Media Canada: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Toronto: Copp Clark Pitman, 1992), pp. 147, 335.

31. *Ibid.*, p. 55.

32. Robert E. Babe, *Canadian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Structure, Performance and Regulation* (Ottawa: Economic Council of Canada, 1979), pp. 229 - 230.

33. Kimberly A. Neuendorf, "The Public Trust versus the Almighty Dollar", in *Religious Television: Controversies and Conclusions*, ed. Robert Abelman and Stuart M. Hoover (Norwood, N. J.: Ablex, 1990), pp. 71 - 84.

34. Peers, *Politics of Canadian Broadcasting*, pp. 44 - 48.

35. Canada, Broadcasting Act of 1991, quoted in *Media Canada*, ed. Romanow and Soderlund, p. 337.

36.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ournalistic Policy* (Ottawa: CBC, 1982), p. 7.

37. Peter Stursberg, *Mister Broadcasting: The Ernie Bushnell Story* (Toronto: Peter Martin Associates, 1971), p. 169.

38. Blumler and Gurevitch, "Political Effects", p. 248.

39. For a summary of laws affect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Canada prior to the Charter, see Walter Tarnopolsky,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Newspapers and the Law*, ed. Walter Tarnopolsky, C. Wright, G-A. Beaudoin, and E. Cody-Rice, vol. 3, Research Studies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Ottawa: Minister of Supply and Services Canada, 1981), pp. 1 - 48.

40. Daniel C. Hallin,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8 - 70.

41. Tuchman, *Making News*.

42. Mark Fishman, *Manufacturing the News* (London an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p. 92.

43. 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 1983), p. 131.

44. Creery, "Newspapers", p. 1254.

45. "Personal Ads Have NOW in Court", *Marketing*, vol. 95, no. 38 (Sept. 17, 1990), p. 6; Stan Sutter, "Crown Withdraws Charges", *Marketing*, vol. 95, no. 43 (Oct. 20, 1990), p. 11.

46. Canadian Dimension staff, "War Declared on Quebec", *Canadian Dimension* (December 1970), p. 9; Dan Daniels, *Quebec/Canada and the October Crisi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73); Denis Smith, "October Crisis", in *Canadian Encyclopedia* (1985), vol. 2, p. 1311.

47. H. J. Glasbeek, "Comment: Entrenchment of Freedom of Speech for the Press Fetter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eople", in *The Media, The Courts and the Charter*, ed. Philip Anisman and Allen M. Linden (Toronto: Carswell, 1986), pp. 100 - 103.

48. Myles A. Ruggles, "CFRO Balance Workshop: Discussion Pap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88, p. 3.

49. Historically, objectivity has not carried the same weight in the journalism of Quebec's "distinct society", although, as no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difference may be dissolving.

#### 第四章

1. Anderson, *Reality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2. On the CBC and free trade, see Hackett, "Exaggerated Death"; on "defence of objectivity", see articles by Doug Herrington and Chris Szuskiewicz, "Podium: In Defence of Objectivity", *content*, September/October 1991, pp. 20 - 21; Gilles Gauthier, "In Defence of a Supposedly Outdated Notion: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8, no. 4 (Autumn 1993), pp. 497 - 506; and 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ce of Objectivity Revisited",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ed., ed. Curran and Gurevitch pp. 225 - 242.

3. Wolfgang Donsbach and Bettina Klett, "Subjective Objectivity: How Journalists in Four Countries Define a Key Term of Their Profession", *Gazette*, vol. 51, no. 1(1993), pp. 53 - 83.

4.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 197.

5. This breakdown draws upon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p. 196 - 204; summarized in McQuail, "Mass Media in the Public Interest", pp. 74 - 75; and Jorgen Westerstahl, "Objective News Repor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0, no. 3 (July 1983), pp. 403 - 424.

6. McQuail, "Mass Media in the Public Interest", p. 70.

7. *Ibid.*, p. 74.

8. Indeed, one interpretation of insurgent terrorism sees it as an extreme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at results partly from "the effective denial of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through normal channels". See Alex P. Schmid and Janny de Graaf,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Insurgent Terrorism and the Western News Media*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2). The quote above is from Denis McQuail's Foreword to *Violence as Communication*, p. iii.

9.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p. 202 - 203.

10. Peter Golding and Philip Elliott, *Making the News* (London: Longman, 1979), p. 207.

11. Ericson, Baranek, and Chan, *Visualizing Deviance*, p. 105.

12. Frances Bula, "No News Here: The Feature Genre, Newspapers' 'Other' Storytelling Form" unpublished M. A. thesi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1996, p. 105.

13. Bennett, *News*, p. 120.

14. Ericson, Baranek, and Chan, *Negotiating Control*, p. 15.

15. Bennett, *News*, p. 120.

16. Bula, "No News Here", p. 106.

17.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 183.

18. Donsbach and Klett, "Subjective Objectivity", pp. 66, 78.

19. Bula, "No News Here", pp. 106 - 107.

20. Robert Fulford, "CRTC's Lack of Respect Indicates Grim Future for CBC",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19, 1997.

21. Gina Bailey, "Body Politics and Missing Themes of Women in American News", *Media Development*, 1 (1995), p. 31.

22. Bailey, "Body Politics", p. 32; see also Kay Mills, *A Place in the N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John Hartley, *Understanding New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pp. 23, 80 - 81, 146 - 147.

23.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ournalistic Policy* (Ottawa: CBC, 1982), pp. 6 - 7.

24. Mark Lowes et al., *Project Censored Canada 1996 Yearbook: Blindspots in the News Agenda?* (Burnaby, B. C.: Project Censored Canada, 1996), pp. 65 - 66;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Angela Austman. See also Colleen Fuller, "Our Pale Male Media", *Canadian Forum*, vol. 71, no. 809 (May 1992), pp. 5 - 7.

25. Interview with Robert Hackett, October 1991.

26. Randy Boswell, "Duel over CBC 'Bias'" *content*, May/June 1991, p. 11. A more recent example dismisses content analysis as a "strange science" by which left-wing and right-wing critics offer spurious proof of their own offsetting preconceptions of the news. See Doug Saunders, "Manufacturing Media Bias", *The Globe and Mail*, March 22, 1997, p. D2.

27. Michael Karlberg and Robert A. Hackett, "Cancelling Each Other Out? Interest Group Perceptions of the News Medi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1, no. 4 (1996), pp. 461 - 472.

28. The term "bias calls" is used in Richard Pinet, "Bias and the Bias Call", unpublished M. A. thesi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 1987, esp. ch. 5.

29. Murray Edelman, *Political Language: Words That Succeed and Policies That Fail*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p. 152.

30. Robert A. Hackett, *News and Dissent: The P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Peace in Canada* (Norwood, N. J. : Ablex, 1991), ch. 10.

31. Ericson, Baranek, and Chan, *Negotiating Control*, pp. 346 - 349.

32. Canada,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p. 149. On the record of press councils, see also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ch. 7.

33.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p. 194, 196, 197.

34. Dominique Clift, "Press Councils and Ombudsman", in *The Journalists*, ed. Fulford et. al. , p. 139.

35. Stan Persky, "Free Is Just Another Word", *The Vancouver Sun*, May 16, 1992, p. D2; Chris Cobb, "Ombudsman Fired for L. A. Riot Column", *The Vancouver Sun*, May 6, 1992, p. A4.

36. The facts of the *Winnipeg Free Press* case are in dispute. See Don Sellar,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The Toronto Star*, Feb. 24, 1996; and "Press Ombudsmen: Are They Fair, Accurate Reporters?" a letter to the editor from Maurice H. Switzer, ExPublisher, *Winnipeg Free Press*, *The Toronto Star*, March 2, 1996, p. B2.

37. Created in 1987, the Canadian Broadcast Standards Council (CBSC) offers voluntary membership to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Public broadcasters, such as the CBC, and specialty networks are not included.) Funded by but autonomous from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CAB), the Council administers a CRTC-instigated but industry-designed code on violence in programming. Viewer complaints about violence, balance, or other matters are usually addressed and resolved by individual broadcasters; those not resolved are passed on to one of the Council's five regional councils, each comprising three members of the industry and three public representatives (often lawyers or civil servants). The regional council bases its decisions on standards drafted by the CAB, and if found in violation the licensee must broadcast the decision on air. If it fails to do so the broadcasters can be expelled from the Council, with probable negative repercussions at the licensee's next CRTC licence renewal hearing.

See Steve McLaren, "Broadcasters Set up Own 'Press Council'", *content*, July/August, 1989, pp. 14 - 15; Greg Quill, "Power Rangers: The Watchdog behind the Fuss," *The Toronto Star*, Nov. 3, 1994, p. E6; Michael McHugh, "Advertisers Back Violence Code", *Financial Post*, Nov. 4, 1993, p. 16.

38. David Waters, "The U. S. Press of Quebec", *content*, January/February 1986, pp. 2 - 6, esp. p. 3.

39. Cook and Ruggles, "Balance and Freedom of Speech", p. 42.

40. *Ibid.*, p. 47.



41. "Behind the Mike", policy statement, Vancouver Co-op Radio.
42. Philip Savage, "Doing Community Radio" 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1989, p. 143.
43.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CRTC), *Decision CRTC, 88 - 694 : Vancouver Co-operative Radio,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873250500*, Ottawa, Sept. 29, 1988.
44. Ibid. See also Peter Royce, "CRTC Forces Co-op Radio into a Balancing Act", *New Directions*, January/February 1989, pp. 33 - 35.
45. The chair of the CJC's community relations committee, Michael Eltermen, defined the case as "not about free speech", but "about balanced reporting". But the CJC did not accept an invitation from CFRO to produce its own program to balance *Voice of Palestine*. The CJC's publications indirectly indicate that the actual agenda behind the balance rhetoric was the program's cancellation. See "Jews Question 'Balance' on Local Radio Program" *The Vancouver Sun*, Feb. 25, 1988.
46. CRTC, *Public Notice CRTC 1988 - 1961 : Balance in Programming in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ttawa, Sept. 29, 1988, p. 11.
47. Interview with Peter Royce by Yuezhi Zhao, July 18, 1989.
48. Vancouver Co-op Radio, "Response to Decision CRTC 88 - 649", Vancouver, 1988.
49. Cook and Ruggles, "Balance and Freedom of Speech", p. 49.
50. Ibid., p. 52.
51. Ibid., p. 53.
52. Ibid.
53. Ibid., p. 55.
54. Quoted in *ibid.*, p. 43.
55. Canada,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Proceedings*, Issue no. 36, sec. 4. 2. 5., Ottawa, May 4, 1987, p. 38.
56. The following critique of the NMA and *On Balance* largely derives from Robert Hackett, William O. Gilsdorf, and Philip Savage, "News Balance Rhetoric: The Fraser Institute's Political Appropriation of Content Analysi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1 (Winter 1992), pp. 15 - 36.
57. *On Balance*, October 1988.
58. Hackett, Gilsdorf, and Savage, "News Balance Rhetoric".
59. For a critique of such research, see Hackett, "Decline of a Paradigm?" pp. 229 - 259.
60. William C. Adams, "Network News Research in Perspective: A Bibliographic Essay", in *Television Network News: Issues in Content Research*, ed. W. C. Adams and F. Schreiberman (Washington, D. C. : Washingt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 18.

61. Andrew Coyne, *Financial Post*, Aug. 9, 1989, p. 11.
62. *On Balance*, vol. 9, no. 7 (July 1996).
63. Bob Hackett, "The B. C. Media's Election Priorities", *The Vancouver Sun*, May 30, 1996, p. A17.
64. Hackett, Gilsdorf, and Savage, "News Balance Rhetoric", pp. 18, 34.
65. On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subsidies as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news agenda, see Oscar Gandy, *Beyond Agenda-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 J.: Ablex, 1982).
66. Marc Raboy, "Balance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1 (Winter 1992), p. 117.

## 第五章

1. See Ross Eaman, *The Media Society: Basic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Toronto: Butterworths, 1987), ch. 2; G. Stuart Adam, "The Journalistic Imagination", in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the Law*, ed. G. Stuart Adam (Scarborough, Ont.: Prentice-Hall of Canada, 1976), pp. 3 - 22; and, for the classic statement of the acquaintance with/knowledge of distinction in journalism, Robert E. Park,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March 1950), pp. 669 - 686.
2. D. C. Anderson and W. W. Sharrock, "Biasing the News: Technical Issues in 'Media Studies'" *Sociology*, vol. 13 (1979), pp. 367 - 385.
3. Eamon, *Media Society*, ch. 2.
4.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 187.
5.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 67.
6. Some accounts classify "positivism" as a type of "empiricism"; others subsume "empiricism" within "positivism". While we remain agnostic on this question, our discussio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erry Lovell, *Pictures of Reality: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Pleasur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p. 10.
7. Thomas McCoy, *Voices of Difference: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resskill, N. J.: Hampton Press, 1993), p. 21.
8. McCoy, *Voices of Difference*, p. 73.
9. Canada, Special Senate Committee on Mass Media, *The Uncertain Mirror: Report*, vol. 1 (Ottawa: Information Canada, 1970).
10. For example, defending his network from charges of biased reporting of the failed Meech Lake constitutional accord, CBC's Ottawa bureau chief Elly Alboim, in *content*, May/June 1991, countered that "media can only reflect the reality that Canadians are accepting and dealing with". He added that he had "no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change" and had "never allowed personal opinion to interfere with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Even when issues of profound cultural bias are raised, the conventional standards of professional disinterest (the separation of observer from

observed), objectivity, and straight factuality are often the preferred defences. The adequacy of these standards for conveying understanding of an event with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was brought into question by the 1990 standoff at Oka, pitting Mohawks against Quebec police and the federal army. Yet in their postmortems on the news coverage, journalists tended to reinforce rather than challenge the objective narrative form that “demands a clear separation between story-teller and subject,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cause depicted”. In response to charges of bias, journalists challenged critics to identify (merely) factual errors in the news, according to writer Randy Boswell, and “Scrambled to protect their professional credibility at the expense of more meaningful appraisals of native coverage”. See Randy Boswell, “Oka: Crisis in Journalism”, *content*, January/February 1991, pp. 116 - 117.

11.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cited in Suzanne Strutt and Lynne Hissey, “Feminisms and Balanc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1 (Winter 1992), pp. 61 - 74.

12. One example is the controversy over Canadian media coverage of the 1988 “free trade” election campaign. *The Toronto Star*, one of the few dailies to take an editorial position against free trade, was denounced by politicians and pundits for allowing its own editorial philosophy to override the objective presentation of news. Presumably such critics saw the rest of the media coverage as the balanced and objective norm against which the *Star's* reportage could be trashed. As we have noted, journalists find the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such claims in the language of objectivity.

This view of “bad objectivity” is often shared by those who make more farreaching critiques of media structures, addressing the institutional or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s on journalism. For exampl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1980 Kent Commission, while taking for granted the private ownership and advertising basis of newspapers, was critical of the ownership of newspapers by conglomerates. This critique was framed in terms of threats to the objectivity of newspapers as “the medium of record providing, by disinterested sel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significant to the lives of Canadians in as comprehensive, balanced, fair, and understandable a way as is humanly possible. The adequate performance of that task is essential to the free 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ment. . . . We cannot allow it to be tainted or subverted by commercial, any more than by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Canada, *Royal Commission on Newspapers*, p. 234.

13. Schudson, *Discovering the News*, pp. 134 - 144.

14. *Ibid.*, p. 122.

15. McCoy, *Voices of Difference*, p. 72.

16. Eleanor MacLean, *Between the Line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1), p. 56.

17. Denis McQuail, *The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ntent: Study for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 (London: HMSO, 1977), p. 107.
18. H. D. Doll and B. E. Bradley, "A Study of the Objectivity of Television News Reporting of the 1972 Presidential Campaign",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vol. 25 (1974), pp. 254 - 263.
19. William O. Gilsdorf, "Getting the Message Across: Media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Campaigns",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anada*, ed. Liora Salter (Toronto: Butterworths, 1981), p. 64.
20. Hackett, "Decline of a Paradigm?" p. 233.
21. Lovell, *Pictures of Reality*, pp. 14 - 17.
22.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23. Harvey Siegel, "Relativism," in *A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ed. Jonathan Dancy and Ernest Sosa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428 - 430.
24. David Morley, "Industrial Conflict and the Mass Media,"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4 (1976), pp. 246 - 247.
25. Stuart Hall, C. Critcher, T. Jefferson, J. Clarke, and B. Roberts,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 19.
26.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7. There is now a substantial literature analysing the use of frames in the news. In addition to Gitlin, see also Tuchman, *Making News*, for early examples. R. Hackett and Y. Zhao, "Challenging a Master Narrative: Peace Protest and Opinion/Editorial Discourse in the U. S. Press during the Gulf War," *Discourse and Society*, vol. 5, no. 4 (October 1994), pp. 509 - 541, combines discourse and frame analysis.
27. This simple and useful formulation is adapted from George Gerbner and Nancy Signorielli, "The World of Television News", in *Television Network News: Issues in Content Research*, ed. William Adams and Fay Schreiber (Washington, D. C.: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78), p. 192.
28. For an excellent analysis of these different focuse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see Gertrude J. Robinson and Armande Saint-Jean, "From Flora to Kim: Thirty Years of Representation of Canadian Women Politicians", in *Seeing Ourselves: Media Power and Policy in Canada*, ed. Helen Holmes and David Taras, 2nd ed. (Toronto: Harcourt and Brace, 1996), pp. 23 - 36.
29. Golding and Elliott, *Making the News*, p. 207; McQuail, *Media Performance*, p. 197.
30. David L. Altheide and R. P.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79), pp. 10, 12, 15, 146.

31. Daniel J. Boorstin,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80), p. 11.

32. A complex example derives from the work of Stuart Hall and his colleagues. They saw an interaction between (a) reports of “mugging” in the British press; (b)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this apparently new crime by police, judiciary, and public; (c) the upsurge of “mugging” incidents in police crime statistics; and (d) the emergence of a “moral panic” over the issue in British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the media were an active participant, not a neutral and detached observer. See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From a different direction, Harvey Molotch and Marilyn Lester,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9 (1974), p. 105, also attack the notion that “the media stand as reporter-reflector-indicators of an objective reality ‘out there’, consisting of knowably ‘important’ events of the world”. They radically problematize the concept of “event”. What counts as an “event” is socially determined: events are what we are accustomed to pay attention to. An event, in their definition, is an occurrence (any cognized happening) that is used creatively for time-demarcating purposes. Occurrences become events according to their usefulness to an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trying to order experience. Different people or institutions may have different, even conflicting, “event needs” and hence will attempt to order or define reality in different ways. In such a case, an “issue” has arisen. Howev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accidents or scandals (which are leaked by non-official informers), most press stories are “routine events” that are promoted by political and bureaucratic powerholders: their event needs are complementary with those of journalists.

33. Hartley, *Understanding News*, p. 12.

34. For the clearest available application of a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news, see Hartley, *Understanding News*.

35. See entries for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etc., in Tim O’Sullivan, John Hartley, Danny Saunders, Martin Montgomery, and John Fiske,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4), for a very clear introductory elaboration of some of these concepts.

36.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 128.

37. Judith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ed.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1), p. 217.

38. O’Sullivan et al., *Key Concepts*, p. 259.

39.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1983), p. 2.

40. Stuart Allan, “News, Truth and Postmodernity: Unravelling the Will to

Facticity”, in *Theorizing Culture: An Interdisciplinary Critique after Postmodernism*, ed. Barbara Adam and Stuart Allan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5), pp. 129 - 144; Neville Wakefield, *Postmodernism: The Twilight of the Real* (London: Pluto Press, 1990), p. 36.

41. For a broader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posts” to media studies, see Yuezhi Zhao, “The ‘End of Ideology’ Aga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Era of Postmodern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Winter 1992, pp. 70 - 85.

42. John Hartley, “News in a Post-Truth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Sydney, Australia, July 1994.

43. An off-the-record comm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CA), Sydney, Australia, July 1994; Hartley, “News in a Post-Truth Society.”

44. Jean Baudrillard,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 This book contains the Liberation articles.

45. Ibid.

46. Ibid., pp. 66 - 67.

47. Christopher Norris, *Uncritical Theory: Postmodernism, Intellectuals and the Gulf War*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2), p. 59.

48. Norris, *Uncritical Theory*, pp. 59 - 60.

49. Perry Anderson,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 11.

50. Lichtenberg, “In Defense of Objectivity”, p. 221.

51.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22(1981), pp. 3 - 14.

52. Linda Alcoff, “Continental Epistemology”, in *A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ed. Jonathan Dancy and Edward Sosa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79 - 80.

53. Harvey,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54. For an excellent polemic against the political roots and implications of postmodernism, see Terry Eagleton, “Where Do Postmodernists Come From?”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1995, pp. 59 - 70.

55. For an interesting discussion of this point, see Wolfgang Iser, Theodor R. Schatzki, John Paul Jones III, “Contexts of Objectivity”, in *Objectivity and Its Others*, ed. Wolfgang Iser, Theodor R. Schatzki, and John Paul Jones III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5), pp. 1 - 17.

56. See Roy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1989); and William Outhwaite,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87).

57. Lovell, *Pictures of Reality*, p. 17.

58. Ibid., p. 22.

59. 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96), p. 2.
60. Ibid.
61.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pp. 23 - 24.
62. Outhwaite,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pp. 33 - 34.
63. Lovell, *Pictures of Reality*, p. 22.
64. Hilary Wainwright, *Arguments for a New Left: Answering the Free Market Right* (Oxford: Blackwell, 1994), p. 104.
65. Bhaskar, *Reclaiming Reality*, pp. 23 - 24.
66. Christopher Norris, *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arvester, 1990), p. 102.
67. Wainwright, *Arguments for a New Left*, p. 107.
68. Ibid., pp. 107 - 108.
69.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pp. 148 - 149.

## 第六章

1. Ralph Klein, "On the Media (2): How to Make Governments, and Newspapers, Relevant Again", *The Globe and Mail*, May 8, 1995.
2. Westell, "The Press", pp. 25 - 34; Rick Ouston, "Watergate It Wasn't", *Equity*, December 1995.
3. Adam Gopnik, "Read All about It",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2, 1994, p. 92.
4. S. R. Lichter, S. Rothman, and L. S. Lichter, *The Media Elite* (Bethesda, Md.: Adler and Adler, 1986); Edith Efron, "The Media and the Omniscient Class", in *Business and the Media*, ed. Craig E. Aronoff (Santa Monica, Cal.: Goodyear, 1979), pp. 3 - 32; Irving Kristol, "Business and the 'New Clas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9, 1975, p. 8. Our discussion here draws from Hackett, *News and Dissent*, pp. 53 - 54.
5. Taras, *Newsmakers*, pp. 233 - 238.
6. Walter Schneir and Miriam Schneir, "The Right's Attack on the Press", *The Nation*, March 30, 1985, p. 361, citing James L. Tyson, *Target America: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st Propaganda on U. S. Media*.
7. Karlberg and Hackett, "Cancelling Each Other Out?"
8. Peter Dreier, "Capitalists vs. the Media: An Analysis of an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among Business Leader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4 (1982), pp. 111 - 132.
9. Alan Wolfe, "The Real Aim Is Ideological", *The Nation*, September 13, 1986, pp. 215 - 219.
10.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p. 45;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provides numerous examples of management control of news.

11. Herbert J. Gans, "Are U. S. Journalists Dangerously Liberal?"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85, pp. 29 - 33.
12. Gopnik, "Read All about It", p. 92.
13. Bennett, *News*, pp. 53 - 54.
14. *Ibid.*, p. 52.
15. *Ibid.*, pp. 52 - 53.
16. Katherine Manson, Robert Hackett, Jim Winter, Donald Gutstein, and Richard Gruneau, eds., *Blindspots in the News? Project Censored Canada 1995 Yearbook* (Burnaby, B. C. : PCC,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1995).
17. Rick Ouston, "Watergate It Wasn't", pp. 34 - 38.
18. Bennett, *News*, p. 124; Tuchman, *Making News*, p. 87.
19. Fishman, *Manufacturing the News*, ch. 2, 3.
20. Boorstin, *The Image*.
21. Bennett, *News*, pp. 127 - 128.
22. Skirrow, "Education and Television", pp. 30 - 31; Ian Connell, "Television New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p. 139 - 156.
23. Revolutionary Left Movement (MIR), "On Journalism and Objectivity", in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vol. 1,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ed.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79), p. 131.
24. For instance, the content of commercial media disproportionately massages th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sensibilities of affluent consumers, because these are the people advertisers are most keen to reach. Such class bias helps explain, for instance, why upper-middle-income "tax revolts" get much more media play than the hardship of the genuinely poor. In major media, such bias may also be reinforced by the social milieu of journalists themselves. When the Vancouver press crusaded against (and helped reverse) a 1993 attempt by B. C. 's NDP government to increase property taxes on the tiny minority of houses worth over \$ 400 000, a study by journalism students revealed that many of *The Vancouver Sun's* top managers and columnists themselves owned such homes. Anne Roberts, "All the News We Can Manage", *New Directions*, October 1993, p. 30.
25. On the willingness to use the stat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e Gad Horowitz, "Conservat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in Canada: An Interpretation", in *The Canadian Political Process*, ed. Orest Kruhlak, Richard Schultz, and Sidney Pobihushchy (Toronto: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of Canada, 1970), pp. 47 - 74.
26. Hallin, "Uncensored War", pp. 116 - 117.
27. *Ibid.*, p. 116.



28. Hartley, *Understanding News*, p. 51.
29. *Ibid.*, p. 117.
3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Broadcasting* (Annan Report), London, 1977, quoted in Hartley, *Understanding News*, p. 51.
31. Interview with Yuezhi Zhao, Aug. 21, 1992.
32. Watson, a participant in the Greenpeace anti-whaling and anti-sealing campaigns of the 1970s, later became head of the 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See Stephen Dale, *McLuhan's Children: The Greenpeace Message and the Media*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6), pp. 88, 148 - 149.
33. Golding and Elliott, *Making the News*, p. 210.
34. Philip Schlesinger, *Putting 'Reality' Together: BBC News* (London: Constable, 1978), p. 168.
35. Clive Thompson, "Whyte", *This Magazine*, vol. 29, no. 1 (July 1995), p. 22.
36. For example, while neoliberal free marketeers, as represented by the Fraser Institute, take the free-market ideology as religion, the social conservatism of the Christian right, as represented by Pat Buchana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bidding for the U. S.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caused great uneasiness in the U. S. political mainstream, attacks corporate greed and such free-market doctrines as free trade.
3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Alison Smith, *The Lead*, CBC Newsworld, Jan. 23, 1996.
38. Thompson, "Whyte", p. 21.
39. Linda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Death by Deficit and Other Canadian Myths* (Toronto: Viking, 1995), pp. 16 - 17.
40. *The Globe and Mail*, April 1996, quoted in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p. 71.
41. Philip Savage, Bill Gilsdorf, and Robert Hackett,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7, no. 1 (Winter 1992), pp. 7 - 8.
42. Lorraine Griffin, "Strictly by the Book", *Ryerson Review of Journalism*, Spring 1989, pp. 43 - 46.
43.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p. 12; see also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ch. 4.
44. Michelle Weinroth, "The Drama of the Deficit", *Canadian Forum*, October 1995, p. 9.
45. Galbraith, interview with Alison Smith.
46. See, for example, *The Vancouver Sun*, Feb. 1, 1995, p. A1. The topic "deficit battle" is accorded the same discursive status on the front page with such topics as "television", "internet", and "Kelowna".
47. "Health-Care Cuts Vital, Reform Agrees", *The Vancouver Sun*, Feb. 8,

1995, p. A7.

48. "Lower Interest 'Hinges on Cuts'", *The Vancouver Sun*, Jan. 20, 1996.

49.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p. 13. For example, on the front page of its business section, *The Vancouver Sun*, Jan. 17, 1995, faithfully reported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chairman of the Bank of Montreal in an annual meeting. On the same day the same message was delivered by yet another member of the elite, this time by Auditor General Denis Desautels in a speech to the Canadian Club. The *Sun* first paraphrased his argument and then used a direct quote in the typical narrative style of objective journalism: "People disagree on where cuts should be made and how quickly, he said, but there is now a national consensus that the deficit must be lowered and the economy placed on firmer ground. 'That consensu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was not there just three years ago.'" Yet again, on the same day, in the front page of the business section, a headline announced: "Don't raise taxes, business tells feds."

50.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pp. 10 - 11.

51. Cited in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p. 102.

52. McQuaig, *Shooting the Hippo*, pp. 35 - 36.

53. Marjorie Cohen, "Neo-Cons on Campus: How the Fraser Institute Captured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Students While the Left Stood by and Did Nothing", *This Magazine*, July 1995, p. 30.

54. *The Vancouver Sun*, which shares the same home base as the Fraser Institute, ran more than a short news story on this day. Instead, this eighteenth annual routine was the top story of the *Sun's* front page of its Business/Sports section. Its headline "Survey Deters Deficit, Economist Says" ran nearly across the entire page. A self-congratulatory statement by institute director Michael Walker, the authoritative economist mentioned in the headline, was extracted outside the main text and highlighted, as if it were a quote from the gospel: "It is very promising that provincial elections are now being fought and won on commitments to reduce the tax burden." Just as Cohen notes, the prefix "right-wing" is nowhere to be seen before references to either the institute itself or its director. In one case, the prefix "Vancouver-based" is used. In another case, the institute is referred to as "the freemarket institute".

55. Winter, *Democracy's Oxygen*, p. 81.

56. See, for example, Rick Salutin, "Church of the Deficit Holy Rollers", *The Globe and Mail*, Oct. 1, 1993, p. C1.

57. *The Vancouver Sun*, Jan. 20, 1996, p. A19.

## 第七章

1. Chris Cobb, "How Bad a Shape Is Journalism In? Pretty Bad?" *Media*, Fall 1995.

2. Alex Strachan, "When It Comes to Reporting, Real News Doesn't Always Rate", *The Vancouver Sun*, April 20, 1996, p. H4; citing the October 1994 *Gallup Poll Monthly*.

3. Christopher Hanson, "Where Have All the Heroes Gon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1996, pp. 45-48, Hanson notes that in the Hollywood movie *Just Cause* the hero's occupation was changed from journalist (in the original novel) to law professor, now presumably the icon of integrity. As academics, blushing with pride we are not. As universities become extensions of corporate R&D while academics obliviously and endlessly debate "academic freedom"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we too will have our turn in the doghouse.

4. James Fallows, "Why Americans Hate the Media",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1996, pp. 45-64.

5. Paul Q. Hirst,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Its Limits* (Oxford: Polity Press, 1990), p. 1.

6. Gwyn Dyer, *Ideas*, CBC Radio, May 1995.

7. Robert W. McChesney, "The Internet and U. S.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i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6, no. 1 (Winter 1996).

8. Marc Raboy and Bernard Dagenais, eds., *Media, Crisis and Democracy: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sruption of Social Order* (Newbury Park,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 3.

9. Christopher Lasch,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 3.

10. Michael Wood, *Legacy: A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London: Network Books[BBC Books], 1992), pp. 207, 209.

11. For a brief description and bibliography, see David R. Kohut, "The Overthrow of Salvador Allende's Leftist Government in Chile", in *Read More About It: An Encyclopedia of Information Sources on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vol. 3 (Ann Arbor, Mich.: The Pierian Press, 1989), pp. 21-25.

12. By "market liberalism", we mean the ideology of individual choice, deregul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as the overriding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We owe our use of this term, which avoids the more confusing labels of "neoliberalism" and "neoconservatism" to John Kean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x-xi and passim.

13. Boris Kagarlitsky, "The Agony of Neo-Liberalism or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48, no. 2 (June 1996), p. 38.

14. We are indebted to John Keane for this point; interview with Hackett, November 1995.

15. Peter Calamai, "The Emerging Information Underclass", *Media*, vol. 1, no. 1 (April 1994).

16. John Porter, *The Vertical Mosaic: An Analysis of Social Class and Power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17. R. B. J. Walker, "Culture, Discourse, Insecurity", in *Towards a Just World Peace*, ed. S. H. Mendlovitz and R. B. J. Walker (London: Butterworths), pp. 171 - 190.

18. Richard Gwyn, "NAFTA: A Charter for Marketplace Rules", *The Vancouver Sun*, Nov. 22, 1993; Frances Russell, "Is Free Trade Really a New Economic Constitution?" *Winnipeg Free Press*, Nov. 27, 1993.

19. Carl Jensen and Project Censored, *Censored: The News that Didn't Make the News—and Why: The 1996 Project Censored Yearbook*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6), pp. 92 - 95.

20. Robert D.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1994, pp. 44 - 76.

21. We take the term "competitive elitism" from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22. Peter C. Newman, *The Canadian Revolution, 1985—1995: From Deference to Defiance* (Toronto: Viking, 1995).

23. Consider the case of Jim Hightower, a former politician and progressive populist from Texas. Notwithstanding his decent ratings and entertainingly humorous and humane persona, Hightower was fired from his ABC radio program after remarking, in the wake of the Disney takeover of ABC, that now his boss really was Mickey Mouse. (Hightower told his story in a keynote speech to the Congress on Media &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Feb. 29-March 4, 1996.) Rush Limbaugh can pontificate with much greater impunity, presumably because his vitriol is directed against those with the least rather than the mo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24. David Osborne, "Currency Overlord Proclaims Dangers of Capitalism", *The Vancouver Sun*, Jan. 17, 1997, p. D1.

25. Winter and Hassanpour, "Building Babel", pp. 10 - 17.

26. Jay G. Blumler and Michael Gurevitch,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15.

27. Lasch, *Revolt of the Elites*, pp. 167 - 171. Lippmann's faith in social science, objective informati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based on a system of analysis and record" is evident in his essays on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See Clinton Rossiter and James Lare, eds., *The Essential Lippmann: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3), pp. 398 - 417.

28. Calamai, "Emerging Information Underclass".

29. This metaphor was used in "Why America Hates the Press", a documentary broadcast on *Frontline*, PBS, Oct. 22, 1996.

30. The quote is from James B. Lemert, *Criticizing the Media: Empirical Approaches* (Newbury Park, Cal.: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 48.

31. We have already discussed the Fraser Institute's critiques of the CBC. On the

conservative critique of PBS, see William Hoynes, *Public Television for Sale: Media, the Mark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Boulder, Col.,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esp. pp. 6 - 11.

32. Jack Newfield, "Bob Grant Poisons the Airwaves Again", *New York Post*, March 8, 1996.

33. We should certainly not infer any liberal political motives from this firing, given Disney's axing of Jim Hightower. See note 23 above.

34. Fo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is legislation, see Neil Hickey, "Revolution in Cyberia",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uly/August 1995, pp. 40 - 47.

35. Jensen and Project Censored, *Censored*, pp. 50 - 53.

36. On these trend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ee Daniel C. Hallin,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ed., ed. Curran and Gurevitch; James D. Squires, "Plundering the Newsroom", *Washington Journalism Review*, December 1992, pp. 18 - 24; Doug Underwood, *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 How the Marketers and Managers Are Reshaping Today's Me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37. Bruce Livesey, "PR Wars: How the PR Industry Flacks for Big Business", *Canadian Dimension*, November-December 1996, p. 10. See also Joyce Nelson, *Sultans of Sleaze: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Media*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89).

38. Underwood, *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 p. 16.

39. Ibid., pp. 15, 95.

40. Sasha Abramsky, "Citizen Murdoch: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Extra!*,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 16 - 17.

41. "Wot Won It?" *The Economist*, Nov. 4, 1995, p. 58.

42. Abramsky, "Citizen Murdoch".

43. Steve Weinberg, "The New Media: Can 'Content Providers' Be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6, p. 38.

44. Glasbeek, "Comment", pp. 100 - 118.

45. These stories were unearthed in recent years by a specialized investigative reporter for CTV National News. Andrew Mitrovica, from correspondence to Project Censored Canada, April 1996.

46. See, for example, Mark Hertsgaard, *On Bended Knee: 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 (New York: Schocken, 1989); Lewis H. Lapham, "Trained Seals and Sitting Ducks", in *The Media and the Gulf War*, ed. Hedrick Smith (Washington, D. C.: Seven Locks Press, 1992), pp. 256 - 263.

47. Jensen and Project Censored, *Censored*, pp. 50 - 113.

48. Manson et al., *Blindspots in the News?*

49. Aaron Freeman and Craig Forcece, "Get Tough on Corporate Crime", *The Toronto Star*, Nov. 17, 1994; Doug Fischer, "Investigator Fears Fraud Cases

Ignored,"*Calgary Herald*, July 9, 1994; Manson et al., *Blindspots in the News?*, pp. 30 - 31.

50. James Curran,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in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nd ed., ed. Curran and Gurevitch, p. 101.

51. Ibid.

52.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1922]), p. 228.

53. The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by the now dissolved Canad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54. Rita Shelton Deverell, "On Subjectivity: What You Can See Depends on Where You Stand and How 'Short' You Are", in *Deadlines and Diversity*, ed. Alia, Brennan, and Hoffmaster, pp. 60 - 62.

55. Raymond Williams, *Communic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6 [1962]), pp. 108 - 109.

56. George Gerbner, Michael Morgan, Nancy Signorielli, *Television Violence Profile No. 16: The Turning Point: From Research to Action*, January 1994.

57. The concluding paragraphs of this chapter derive from Robert Hackett, Richard Pinet, and Myles Ruggles, "News for Whom? Hegemony and Monopoly versus Democracy in Canadian Media", in *Seeing Ourselves*, ed. Holmes and Taras, p. 265.

58. Manson et al., *Blindspots in the News?*, p. 15.

59. See, for example, James Curran,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ed. Curran, Gurevitch, and Woollacott, pp. 195 - 230.

60. Smythe, *Dependency Road*, pp. 37 - 38.

61. Guerrilla Media, "Network Execs Got the Joke, but the Punchline Was Cancellation", *Pacific Current*, February/March 1996, pp. 34 - 35.

## 第八章

1.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4), p. 5.

2. On the Internet, see Rheingold, *Virtual Community*, p. 5.

3.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 261.

4. W. Russell Neuman, quoted in Katherine Fulton, "A Tour of Our Uncertain Futur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1996, p. 20.

5. Our discussion of recent developments regarding the Internet draws in part from Michael Jones, "The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of Cyberspace: Internet Advertising and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unpublished pape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1996.

6. Rheingold, *Virtual Community*, p. 244.

7. Chris Lapham,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spaper of the Future",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agazine*, July 1, 1995, p. 7.
8. Fulton, "Tour of Our Uncertain Future", p. 22.
9. Lapham, "Evolution of the Newspaper".
10. Fulton, "Tour of Our Uncertain Future", p. 21.
11. Lapham, "Evolution of the Newspaper".
12. Ellen Hume, "Tabloids, Talk Radio, and the Future of News", quoted in Frank Houston, "The Virtual Trail",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96, p. 27.
13. Anne Bilodeau, "Into the Net: A Reporter's Transformatio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agazine*, vol. 1, no. 3 (July 1, 1994), p. 8.
14. Jennifer Wolff, "Opening Up Onlin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4, p. 62.
15. Todd Oppenheimer, "Virtual Reality Check",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rch/April 1996, p. 29.
16. Houston, "Virtual Trail", pp. 26 - 27.
17. Stephen D. Isaacs, "Have Newsroom, Will Travel",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5, p. 51.
18. McChesney, "Internet and U. S.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p. 104.
19. Ibid., p. 105.
20. Ibid., pp. 101 - 102.
21. J. Hodges in *Advertising Age*, October 1996, cited in Jones,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of Cyberspace".
22. D. Williamson in *Advertising Age*, September 1996, cited in Jones,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of Cyberspace".
2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31, 1996, p. B4, cited in Jones, "Commercial Colonization of Cyberspace".
24. Rheingold, *Virtual Community*, pp. 277 - 278.
25. For a user-friendly summary of this "panoptic" potential of the Internet, see Rheingold, *Virtual Community*, pp. 289 - 297.
26. Rheingold, *Virtual Community*, pp. 273 - 275.
27. Nancy Hicks Maynard, "Where Is Page One in Cyberspace?" *The Deeper News*, vol. 6, no. 2 (Emeryville, Cal.: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June 1996), p. 6.
28. Chris Cobb, "Jobs.Jobs. Jobs. Gone. Gone. Gone", *Media*, vol. 3, no. 1 (Spring 1996).
29. Nicholas Baran, "Computers and Capitalism: A Tragic Misuse of Technology", *Monthly Review*, vol. 47, no. 4 (September 1995), pp. 40 - 46.
30. Diane C. Mermigas, "Can Legitimate News Coverage Survive Convergence and Commercialism in the New Media Age?" in *News in the Next Century: Dollars and Demographics: The Evolving Market for News* (Washington, D. C.: Radio and

Television News Directors Foundation, 1996), p. 36.

31. Cass R. Sunstein, "The First Amendment in Cyberspace", in *News in the Next Century*, p. 69.

32. McChesney, "Internet and U. S.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p. 114.

33. 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 excerpted by Joan Konner, "It's the Content, Stupi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4, p. 4.

34. Jere Downs, "A Window at the County Seat",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1995, p. 64.

35. Cobb, "Jobs~ Jobs. Jobs", p. 6.

36. Stephen D. Isaacs, "The Golden Age, Mayb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4, p. 64.

37. K. Auletta, "Awesome", *The New Yorker*, May 14, 1995, cited in McChesney, "Internet and U. S.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p. 115.

38. Pat Aufderheide, "Vernacular Video",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95, p. 46.

39. See P. Atwell,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Value Conflicts and Social Choices* (Boston: Academic Press, 1991); and Harry Braverman,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Milton Keynes, Eng.: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0. Maynard, "Where Is Page One?" p. 15.

41. Desbarats, *Guide to Canadian News Media*, pp. 247 - 248.

42. Joe Holley, "What's a Bloomberg?"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June 1995, pp. 46 - 50. The bad rhymes are ours.

43. Maynard, "Where Is Page One?" p. 6.

44. Fulton, "Tour of Our Uncertain Future", p. 21.

45. This panel at the 1996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in San Francisco,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Journalism, was attended by Robert Hackett. Moderated by Katherine Fulton, the panel included consultant Nancy Hicks Maynard, Newspaper Guild president Linda Foley, *The Nation* publisher Victor Navasky, and KQED-FM news director Raul Ramirez. See also Richard Byrne's report on the panel, at <http://www.alternet.org/an/congress/newrole.html>.

46. McChesney, "Internet and U. S. Communication Policy-Making," pp. 114 - 117.

47. See, for example, Davis Merritt Jr., "Public Journalism: What It Means, How It Works" and Jay Rosen, "Public Journalism: First Principles", in *Public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Dayton, Ohio: The Kettering Foundation, 1994); Davis Merritt Jr., *Public Journalism and Public Life: Why Telling the News Is Not Enough*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1995); Jay Rosen, "Making Journalism More Public", *Communication*, vol. 12 (1991), pp. 267 - 284.

Our discussion here owes a good deal to James Compton, "Communic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Journalism", unpublished M. 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 C. , 1996.

48. Other scholars not connected with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offer complementary analyses. For Jay Blumler and Michael Gurevitch, the “crisis of communication for citizenship” has five components:

-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media portrayals of politics, as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are favoured over policies due precisely to the media's investment in its perceived non-partisanship;

- an exces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at generates cynicism;

- a lac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at serves the citizen role;

- the exclusion of voters from having “any say or significant stak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 the media's adoption of the role of surrogate opposition, overemphasizing criticism and exposure.

Se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 pp. 203 - 221.

49. Merritt, “Public Journalism: What It Means”, cited in Compton, “Communicative politics”, p. 19.

50. The term “public judgement” was popularized by Daniel Yankelovich, *Coming to Public Judgment: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a Complex World*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1. Some observers see a precursor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the “social animation” experiments of Canada's National Film Boar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Peter Desbarat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52. *And Now the Details* , CBC Radio, May 19, 1996.

53. Compton, “Communicative Politics”, p. 46.

54. Nick Russell, “Public Journalism: An Old Game with' a New Name?” *Media* , March 1995, pp. 16 - 17.

55. Quoted in Alicia C. Shepard, “The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 September 1994, pp. 33 - 34.

56. John Bare, quoted in Shepard,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 p. 34.

57. Hackett, “B. C. Media's Election Priorities”.

58. Compton, “Communicative Politics”.

59. Verzuh, *Underground Times* , pp. 11 - 15.

60. Jeff Gremillion, “Showdown at Generation Gap: Here Come the Young Guns of the Alternative Pres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 July/August 1995, pp. 34 - 38.

61. Jay Walljasper, “Do We Still Need the Alternative Press?” in *Media and Democracy* , ed. Hazen and Smith, p. 143.

62. *Ibid.* , p. 142.

63. *Ibid.* , p. 144.

64. Bula, *No News Here* .

65. John Nerone suggests that a model of the alternative media would serve a

useful normative purpose. It would help to highlight “things that should be avoided and, consequently, things that should be goals”. See John Nerone, ed., *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 p. 149.

66. Walljasper, “Do We Still Need the Alternative Press?” p. 144.

67. John Downing,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 Boston Tea Party”, in *Questioning the Media*, ed. Downing, Mohammadi, and Sreberny-Mohammadi, p. 181.

68. O’Sulhvan et al.,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p. 10.

69. Downing, “Alternative Media” p, 191.

70. Ibid., p. 182.

71. Walljasper, “Do We Still Need the Alternative Press?” p. 143.

72. For some good recent Canadian books of this type, see Mark Lowes et al., *Project Censored Canada 1996 Yearbook*, Appendix A.

73. Janet Wasko, “Introduction: Go Tell It to the Spartans”, in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d. Janet Wasko and Vincent Mosco (Toronto: Garamond Press, 1992), p. 7.

74. R. B. Kielbowicz and C. Scherer,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vol. 9 (1986), pp. 71 - 96.

75. See Hackett, *News and Dissent*, esp. pp. 20 - 23, 169 - 181.

76. Hackett, *News and Dissent*. On Greenpeace and the media, see Dale, *McLuhan’s Children*.

77. Hallin,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p. 246; Underwood, *When MBAs Rule the Newsroom*, p. 16.

78. Laura Flanders,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Media and Democracy*, ed. Hazen and Smith, p. 73; emphasis added.

79. Don Hazen, “Seeking Vision: Ten Steps toward Fighting Media Monopoly”, in *Media and Democracy*, ed. Hazen and Smith, p. 162.

80. Don Hazen, “World of Infotainment”, *The San Francisco Bay Guardian*, Feb. 21, 1996.

81. Z Staff, “Media and Democracy Congress”, *Z Magazine*, April 1996, reprinted in *Report from the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Alternative Journalism, 1996).

82. Holman W. Jenkins, Jr., “All These Progressives, and Nary an Id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2, 1996, p. A19, reprinted in *Report from the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Frank Rich, “Mixed Media Messag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96, reprinted in *Report from the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83. Dan Kennedy, “Don’t Quote Me: Fine Whine”, *The Boston Phoenix*, March 8, 1996, reprinted in *Report from the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84. “Information Bill of Rights” in *Report from the Media & Democracy Congress*.

85. George Gerbner, “Cultural Wars and the Liberating Alternative”, in *Media and Democracy*, ed. Hazen and Smith, p. 91.

86. See, for instance, 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87. Hazen, “World of Infotainment”.

88. Flanders,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 73.

89. Interestingly, in a survey of about one hundred U.S. media-watching organizations, the most explicit rejection of objectivity comes from *Spotlight*, an antisemitic far-right organ that backed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ex-Nazi activist David Duke. In its own words:

You can trust *The Spotlight* to give you “the other side of the news” — to report on events which are vital to your welfare but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hushed up or distorted by the controlled press. So don’t expect us to be “objective” or “unbiased.” We are biased toward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onsumers, taxpayers and voters; the hardworking, misled, exploited and brain-washed American producer... who pays the bills for the super rich and the very poor. We make no attempt to give you “both sides”. We’ll leave the Establishment side to your daily newspaper, TV and radio. See John S. Detweiler, “Media Watcher Directory”, paper presented to AEJMC conference, Montreal, August 1992.

## 结论

1. See Mark Thompson, *Forging War: The Media in Serbia, Croatia and Bosnia Hercegovina* (London: Article 19, May 1994).

2. Keane, *Media and Democracy*, pp. 149 – 150.

3.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4. *Ibid.*, p. 148; emphasis added.

5. We owe some of these ideas to Kathy Cross and Gina Bailey.

6. The term “democratic-participant” is Denis McQuail’s,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pp. 131 – 132.

7. Robert A. Hackett with James Mackintosh, David Robinson, and Arlene Shwetz, “Smaller Voices: Minor Parties, Campaign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s Media”, in *Reporting the Campaign: Election Coverage in Canada*, ed. Frederick J. Fletcher, vol. 22, Research Studies for Royal Commission on Electoral Reform and Party Financing (Toronto and Oxford: Dundurn Press, 1991), pp. 189 – 271.

8. Rudy Platiel, “Vast Changes Sought to Aid Natives”, *The Globe and Mail*, Nov. 22, 1996, p. A8.

9. The quote is from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p. 73.

10. We adapt this definition from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11. Zhao, *Media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2. James Curran calls for such “civic media” as one of five components of a more democratic media system. See his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Revisited”.
13. For a similar analysis of what he calls the period of “high modernism” in U. S. journalism, see Hallin,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pp. 243 – 262.
14. Hallin, “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p. 259.
15.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p. 149.
16. See, for example, Natter, Schatzki, and Jones III, eds., *Objectivity and Its Other*.
17. However, for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 of structural reforms from a perspective similar to ours, see Curran,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Revisited”; and Douglas Kellner, *Television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Boulder, Col., San 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0), ch. 5. Kellner focuses on public access television.
18. Hackett, *News and Dissent*, ch. 12.
19. Douglas Roche, “Canada and Nuclear Abolition: Finishing the Job”, *The Plough-shares Monitor*, September 1996, pp. 9 – 14.
20.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4.
21. Michael Clow with Susan Machum, *Stifling Debate: Canadian Newspapers and Nuclear Power* (Halifax: Fernwood Publishing, 1993), p. 98.
22. Herbert J.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p. 290.

## 深刻理解“新闻客观性”

“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理论中极其重要而又基础的命题之一，多少年来为国内外新闻学者所瞩目，它的发展与演变无形中影响与构建着我们的观念。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却始终未见得有多么深刻，我们常常囿于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定式，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也逡巡在“新闻是否客观”、“新闻能否客观”等狭窄的命题之中。加拿大学者哈克特(R. Hackett)与中国学者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一书(以下简称《维系民主》)，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因而有必要谈谈这本书。

1998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郭镇之在当年发表的论文《“客观新闻学”》中9次引证该书的观点。我们也在当年得到作者送的英文原版书，随即将书中“不死的上帝”(现在看，应该翻译为“不死之神”，因为原文god没有大写)这个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比喻用到了教学上。该书带有明显的批判学派色彩，可以说是一本以新闻客观性为切入点，深刻剖析北美传媒境况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书中所使用的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言，无疑使翻译过程变得十分艰苦，两位出色的译者在翻译了两遍之后才得以定稿。经过译者长时间的研读与润色，该书的中译本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

现在的译作距原作付梓已7年有余，如同中文版序言所说，“书中某些具体细节已成为历史”，但其“所揭示的新闻客观性的多面性、复杂性与矛盾性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明显了”。经过了时间的磨砺，书中的观点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这也正是我们有必要重温此书的原因。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久远的命题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对事实进行准确的报道，禁止在报道中直接、公开地采取带有撰稿人主

观倾向的立场。<sup>①</sup>对新闻客观性的论述可以追溯到1702年英国出版的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The Daily Courant*),其创办者马利特(E. Mallet)曾说:“报纸的义务在于将事实叙述出来,结论应由读者来做。”<sup>②</sup>然而,这家报纸不久变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家政党的机关日报,客观的办报宗旨不复存在。显然,在政党报刊时期的高涨期,保持一家报纸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很困难的。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的一种普遍理念,发生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即19世纪中叶新闻业从政党报刊时期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最近一个半世纪,新闻报道在体裁、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也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其中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的攻击最多。但西方的新闻专业标准——客观性、平衡性,在媒介组织中却始终是显而易见的。<sup>③</sup>丹尼斯(E. E. Dennis)和梅里尔(J. C. Merrill)谈到美国时写道:“如果说美国的新闻实践中有一条最重要的信条的话,那就是客观性的原则。”<sup>④</sup>

《维系民主》以此为出发点,从对欧美现代新闻史的理性梳理开篇。该书第一章清晰地论述了新闻客观性的起源,指出:“只有通过考察19世纪新闻出版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商业报纸、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客观性理念。”(2页)在作者看来,新闻客观性的起源与劳工报刊、通俗商业报纸的兴起紧密挂钩。通俗商业报纸预示了现代新闻客观性体制的形成——报纸必须独立于党派争斗之外;劳工报刊则“采纳了启蒙时代民主话语以及它的普遍化语言,这一普遍化的观点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新闻客观性的原初形式”。(8页)

该书第二章在论述新闻客观性如何发端之后,继续详细地论述新闻客观性理念的演变。譬如,摄影和照相制版技术的发明增强了以未经润饰的事实作为正确判断的认识基础的意识,导致一种朴素现实主义的事实观;法西斯政权则让人们懂得,表面的现实主义很有可能被利用而沦为宣传工具,但这又同时导致新闻客观性对主观性的一定程度的吸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journalism)等新的新闻报道形式;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以及美国“水门事件”对美国大众心态的影响,“批判性新闻”(critical journalism)又粉墨登场了;后来还有诸

① 郭镇之:《“客观新闻学”》,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② 陶涵主编:《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8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89。

③ Nick Steven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 Pearson, 1999, p. 96.

④ [美]埃弗利特·E.丹尼斯等:《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王纬等译,100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如“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名流新闻”(celebrity journalism)、“倡导性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新新闻”(new journalism)等<sup>①</sup>各种号称“比传统的新闻客观性更客观”的新闻报道形式轮番上阵。

该书谈到，企图改变或修正北美新闻业缺陷的运动搞了几十年，五花八门，但任何一种运动都没有罢黜客观性体制的权威地位。(32页)那些强调主观性的新闻，最终不会在主流新闻范围内占有任何地位。(33页)也就是说，演变归演变，怀疑归怀疑，挑战归挑战，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或追求，始终是人们评判新闻工作的原则——这是《维系民主》首先要证明的一条结论。该书也因此而宣称新闻客观性是“不死之神”(a god that won't die)，并把“不死之神”欣然作为第四章的章题。(60页)这种情形正如郭镇之教授所总结的：“新闻报道的实践方法虽然发展了，但是，新的报道方式并未改变西方新闻学总的客观性格局。”<sup>②</sup>

那么，新闻客观性何以一直成为北美传媒中的“不死之神”呢？该书第三章对此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一，客观性可以较好地解决媒介与社会，特别是媒介与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遵守这些客观性准则，新闻媒体就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并保证了接近官方信息源而不必牺牲政治独立和中立的公众形象。”(56页)第二，商业逻辑催生了新闻客观性，<sup>③</sup>“拥有经济头脑的报业老板意识到一份报纸应该面面俱到，仅有偏执的政治内容是不够的”，因为“为了获得大量潜在的读者群，新闻得被认为是公正的才行”。(47页)第三，客观性是新闻从业人员抵御批评和“逃脱责任”的一种“策略仪式”，通过这种“策略仪式”，“记者可以确立所陈述的事实真假值，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和因诽谤而吃官司这样的危险，还可以使他们不必为报道中暗含的价值观或后果负责任”。(23页)

在陈述了新闻客观性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论证了为什么新闻客观性能够继续保持其“不死之神”的地位之后，该书第四章转而从正面论述新闻客观性的范畴。如同恩格斯所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

<sup>①</sup> 这几个新闻学名词，翻译不大一致。本文采用的是《维系民主》的翻译方法。其中 advocacy journalism 有时被翻译为鼓吹式新闻或提倡式新闻；critical journalism 有时则被翻译为挑剔性新闻。

<sup>②</sup> 郭镇之：《“客观新闻学”》，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sup>③</sup> 当然，市场逻辑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需要辩证来看。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因市场逻辑而产生了客观性体制，但是现在两者正在分离之中。可参见该书第146页。

的价值。”<sup>①</sup>《维系民主》并没有围绕定义做文章,该书超越了对定义的追求与纠缠,对新闻客观性的范畴作出了系统而多角度的归纳,这是该书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从新闻道德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种规范化的理想、一套新闻采写编的工作标尺。这些目标包括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以及记者的超然与中立态度。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套对知识和现实世界的假定。这些假定是:事实与价值之间、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互隔离是可能的,“反映世界”或“全真地捕获世界”也是有可能的。第三,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出发,新闻客观性是一套采写新闻的实践和“统一的技术标准”。<sup>②</sup>第四,新闻客观性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以种种机构化了的形式体现出来。新闻客观性是在特殊的机构框架中运行的,并且不是简单被动地反映,而是参与了这种框架的组建。第五,新闻客观性是有关新闻的公众话语中的一个活跃部分,是受众对新闻期望的共识的一部分。(60~65页)

新闻客观性在《维系民主》中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概念,而是一套完整而周延的“体制”。这种“体制”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法国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对于话语“体制”的研究,事实上,《维系民主》一书的作者也承认,他们对于新闻客观性的分析部分地得益于福柯的方法。(96页)在他们眼中,新闻客观性既是宏观理论,又是微观实践;既是渗透到新闻体制、新闻理论、新闻伦理到新闻采写编排各个领域的一种职业精神,又是一种文化形式和一套高度程式化了的操作性很强的程序。<sup>③</sup>

上述五个角度是互相依存、难以分割的。前两个角度的共同点在于,把新闻真实视为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之一。真实是客观性首当其冲的要素,而“真实地反映世界”也是有可能实现的。第三与第四个角度的共同点则在于,把新闻客观性看作一种形式、结构,包括新闻采编的形式、新闻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sup>②</sup> 这些技术标准包括:使用引号标示出特点概念;对观点追根溯源;以恰当的顺序和格式构建信息;表达出双方或所有主要方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遵循通行的有关体面和良好品位的标准。这些标准使新闻客观性成为一种有着独特技术准则及实践规则的“文化形式”。可参见该书第24页。

<sup>③</sup> 譬如,丹尼斯曾引用编辑罗纳德·比尔(R. Buel)的思想框架来说明这种程序是如何操作的:1. 资料分配,为什么值得报道;2. 资料收集,什么时候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3. 资料评估,什么重要到可被放入新闻中;4. 资料写作,使用什么词语和形象;5. 资料编辑,什么新闻应该有一个大标题并出现在头版上。可参见丹尼斯等,《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09页。



机构的结构(譬如广告部门与编辑部门不得混岗等)。第五个角度则表明,两位作者并没有忘记受众一方,新闻客观性往往成为受众在批判记者或新闻报道存在偏见时所采用的标准,这种标准兼有客观性理念与客观性形式的意味。因而,倘若允许我们用一句比较简洁的话来概括《维系民主》对新闻客观性的解释,那便是:客观性是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换句话说,作为形式的客观报道与作为客观性理念之一的真实性要求,是新闻客观性问题的两个大的方面。<sup>①</sup>

我们以往探讨新闻客观性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在新闻客观性的理念与形式之间各执一端。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执哪一端,虽然从一方面看都有些道理,但毕竟失于片面。譬如,客观性的形式很有可能为有意操纵新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有权势的新闻来源者提供操纵通途,使记者们无法公开揭露这种操纵,反而致使真实性原则被肆意践踏。记者的脑力劳动被异化了。(34页)但是,与此相反,一味追求客观性的理念,忽略客观性的形式,更成问题。正如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的那样:“惟有依赖于这形式,才有那种愉悦。”<sup>②</sup>我们也可以说:唯有依赖于这形式,才有那种客观性。丹尼斯(E. E. Dennis)曾明确指出:“客观性仅仅是一种表述信息的方式方法。……如果记者遵循系统决策的程序,不偏不倚并非他们现在力所不及。”<sup>③</sup>

就目前我国新闻业现状而言,客观性的形式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譬如,编辑部门与广告、发行或经营部门混岗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这就说明我们国家新闻机构的形式还不够健全。形式上如果有漏洞,即使再强调“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sup>④</sup>问题还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如,作为新闻职业规范之一的“更正与答辩”,多数报纸没有为其设置栏目。没有“更正”,怎么谈得上“不固执己见”?没有“答辩”,怎么谈得上“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公平的应答机会”?由是观之,比起我们以往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维系民主》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理解恐怕要科学些、全面些,因而也更有说服力。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维系民主》的后半部分在更深入的层面(哲

① 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载《新闻记者》,1999(9)。

②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175页,人民出版社,2002。

③ 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11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④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通过,1994、1997年有两次修订。

学、政治学、经济学)对新闻客观性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展开了鞭辟入里的论述,这是该书更为精彩而发人深省的部分。作者指出,客观性自身带有典型的保守主义倾向,“新闻部门大都乐意接受和传播那些事实——事实的有效陈说,而这些事实是由权威新闻来源制造和提供的,而且与社会各界的共同理解一致”(112页)。何况,新闻业再如何客观,它也必然要臣服于商业主义、自由民主或其他什么东西,新闻业是不能选择不要原则的,它只能选择它的原则是否被公开承认。(186页)也就是说,纯粹的客观只能在形式上做到,不存在内在的“纯客观”。

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界耳熟能详的范畴和概念,“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一度被列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第五条(不知为什么,1997年第二次修订时把这条修订掉了,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在人们普遍认可之时,这个范畴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与讨论,而这种讨论确立新闻职业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哈克特与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道路。该书把新闻客观性作为体制性问题来研究,它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希望通过对该体制的基本要素的确定,能对历史性的比较分析与新闻传媒系统民主化的政治策略大有裨益。”(《序言》18页)我们也认为,该书独到的见解及大量的事例,成功地阐释了一种系统的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它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对我国新闻理论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陈力丹 王亦高

原载于《新闻大学》2006年第1期

## 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

1980年代初在国内上新闻理论课，当时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认为，西方新闻媒体被垄断资本所控制，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西方记者自我标榜的新闻客观性是虚伪的、有欺骗性的。我们对这样的简单化说教有逆反心理，虽然不敢逃课和公开挑战老师，但是没有心悦诚服的感觉。

那时，在整个思想界，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主流的“新启蒙”大潮已潜流暗涌；在新闻学界，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sup>①</sup>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替代有民族、阶级和其他社会性的传播主体。<sup>②</sup>同时，由于国门对西方刚刚启开，国家的新闻管理制度还没有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得出“真正的”西方新闻是什么样的结论。

1986年，当我跨出国门去西方留学时，箱里装着中译本的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经典《报刊的四种理论》。我想，自己英文不好，如果教授要我读这本书的英文原著，起码我可以读中文版。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国民身份又不得不使我对国际传播的不平等问题有所关注。于是，我又带上了作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中文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与“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而我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

<sup>①</sup> 对“信息”和“信息理论”的分析，见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sup>②</sup> 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兼论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传播与社会学刊》第一卷，2007（2），23～50页。

主义的西方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概念的审视。到了加拿大后，我潜心研究的第一个题目便是西方新闻客观性。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避姓“社”姓“资”，我们免谈阶级意识，我们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终结了，剩下的是“市民社会”，是（西方）“普世价值”的实现的的问题。当然，隐含“民族解放”叙事的“第三世界”概念也不复存在，剩下的是代表世界文明主流的“国际社会”和个别“流氓国家”。在日益强大并急于“崛起”的中国，虽然我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记忆使我们没人明言要效法当年的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国策，但是，朝野上下真心希望通过办奥运会融入“国际社会”，展示一个不再是“第三世界”的强大中国的风貌。

然而，在奥运前夕，“国际社会”中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媒体，不仅拿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问题大做文章，而且挑战我们在国际竞争游戏中好不容易赢来的举办奥运会的资格与权利。我们觉得好像被作为“普世价值”之一的“新闻客观性”欺骗了。而我这个原先有“第三世界国民”身份的新闻学生成了身在西方的“华裔传播学教授”，我的立锥于“西方”和“学术专家”地位的言论在我自己无法左右的“西方新闻客观性的虚伪暴露无遗”的国内新闻标题下成新闻。

有网民质问：“媒体是人做出来的，人是有立场的，你不懂？”我身边的一位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则比较客气，说：“虽然标题好像文革语言，内容很好。”我深知，“文革语言”是一个我们对其所指不再须做历史分析和理性检讨的贬义政治与学术标签，而我们当年所逆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也确有阶级决定论和工具论的偏颇。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新闻客观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我们好像是否应该“在泼洗脚水的时候不要把婴儿泼出去”？西方新闻客观性没有我们逆反时想得那么真实，也没有以上新闻标题所展示的那么虚伪。

新闻当然是人做出来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新闻是由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有专业资格的人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的特定新闻体制中的特定新闻机构里做出来的。新闻还是由在特定的民族国家中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人解读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西方，新闻客观性也不是超历史和超媒体的“普世价值”。且不说新闻客观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本身的多面性、复杂性和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具体

性,更不论不同西方国家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即使在美国,历史上有党派新闻,今天有以促进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为己任的倡导性新闻。事实上,像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样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崛起的“主流”媒体一开始就抛弃了“客观性”标榜,而以毫不掩饰的倾向性在日益分群众化的电视新闻市场中取胜。我们之所以今天对“西方人”在新闻客观性问题上有着深深的失望感,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昨天矫枉过正地把前天的一些话中的合理内核也统统摒弃掉了。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新闻理论与新闻制度的深层反思。

### (一) 新闻客观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暴乱报道不存在客观,一边倒地站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边,不但没有做到起码的平衡,而且连基本的事实细节也不尊重。其实,这并不奇怪。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受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的。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宣称过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在对内和对外报道中,西方主流媒体对客观性的运用也有双重标准。在写作《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时,我曾采访过加拿大广播公司一驻京记者,他明言,他们在对外新闻上,对平衡等客观性的要求比对内报道宽松。

正如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同事、美国比较媒体制度学者丹·汉林(Daniel C. Hallin)所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价值是我们可以把美国新闻在政治上分成三类的试金石。<sup>①</sup>这三类新闻分别是共识类、合法争议类以及异端类。《维系民主》中的研究表明,客观性(如要仔细地引用来源以及平衡双方发言人的观点)只对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适用。但是在报道那些假定被整个社会认同的价值的事件或者社会行为者时(共识类),记者拥有较大的主观性,可以从同情的角度来设置场景,可以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述,可以沉湎于赞同性的话语修饰。同样,对被认位于是西方主流价值以外的“异端类”报道对象,客观性原则也不适用。这类报道对象包括西方社会内部挑战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也包括被西方主

<sup>①</sup> Daniel C. Hallin, *The Uncensored Wa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导政治经济利益和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外国政权和社会力量。关键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这三类报道的边界的区分是有争议而且是有政治性的，它往往是由那些拥有最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掌控着界定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话语权的社会势力确立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框架内，统治阶级，往往是主导阶级联盟，通过包括媒体、学校、教会等“市民社会”场域在内的社会组织机体将其核心价值社会化，转化为全社会的“常识”。这正是葛兰西所论的霸权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领导权的建立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妥协、矛盾、和抗争，包括危机与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动用。在媒体领域，这首先意味着通过新闻媒体的教育体系、法规体系、所有权与经济运行机制，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和记者的“社会化”机制、新闻的生产程序与职业规范等来“定义现实”的“编码”过程。当然，这也包括特定的社会成员、也即新闻媒体的“受众”对媒体内容的“解码”过程。我们有必要把西方新闻客观性问题放在这个过程的全部中来理解。

如《维系民主？》所论，新闻客观性的起源有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历史背景。从哲学上，客观性与启蒙理性有关普遍真理的可能性和幼稚实证主义在不同时期和在不同层面上有关联。在英、美和加拿大新闻史上，新闻客观性的最先版本是19世纪劳工新闻中对“超党派”的普遍利益的追求。面对日益保守和抛弃了启蒙民主话语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服务于狭隘的垄断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新兴的劳工新闻要求国家和新闻业代表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客观性要求新闻和政治反映普遍利益，因为这种利益被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中权威的保守主义和精英党派报刊系统所践踏。劳工新闻的这一基于启蒙理性的客观性宣称最终被19世纪晚期的“便士新闻”和市场化报刊所驯化，挪用、取代和程式化。

总之，客观性兴起过程也是西方由私人资本所掌控的商业化新闻媒体在替代狭隘的资产阶级党派新闻的过程中把激进的、并已开始培育工人阶级意识的劳工新闻边缘化，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主流价值和统治意识形态转化为不需对其“客观”、“中立”与“平衡”的“社会共识”的过程。而西方新闻客观性这一政治本质又与市场化媒体所依附的广告商寻求受众最大化的商业动机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与经济动因互为表里，皮毛相依。客观性成了西方资本垄断媒体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道德原则。同时，作为

已经取得了霸权地位的新闻原则，它也成了“受众”们按霍尔的三种解读定位来接受、协商和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新闻体制的手段或中介。<sup>①</sup>

## （二）客观性的实践层面和新闻社会学纬度

作为一套道德理念和报道规范，客观性是通过记者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在美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客观性不但复杂且涉及面广，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新闻所调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产物。如《维系民主？》所述，它有以下不同部分：第一，客观性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规范性理念，它是新闻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反过来，这些目标又可以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隐含着记者在报道时持有的立场、采取的方法以及故事本身的特点。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性是新闻业的最重要的理念：记者应该说真话。第二，记者应该采取一种超然、公正和独立的态度，避免受到党派偏见、个人偏向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三，在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时，客观报道在提供各方观点时应该公正、不偏不倚而又平衡。这些理念暗含着一种认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开是有可能的。同时，客观性也包含一整套新闻采访与报道的“统一的技术标准”。这一标准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且在不同媒体间会有所不同。第四，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和操作方法是在一个由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组成的制度框架内孕育的。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新闻工作者是有特定技能、信奉伦理道德的专业人士，享有新闻自由，也即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性（在古典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中，国家控制是对新闻自由的主要威胁）。

与简单的工具论不同，这里我要强调，新闻记者是客观性这一知识/权力体系的重要利益主体。虽然记者从来就不是与医生和律师一样的自由职业人，而是在劳资关系下雇用于媒体的“知识劳工”，但是，对客观性的标榜和有选择的实践成了他们确立自己在政治上独立于党派和其他社会利益、在经济上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利益的专业地位，使其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定位于像其他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医生、律师和学者）一样的独立于社会的其他阶级利益之上的“中产阶级”。同时，正如美国社会建构论者格尔·塔克曼（Gaye Tuchman）所论，客观性也是新

<sup>①</sup>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Meenah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1), pp. 166-176.

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例如错过截稿时间，诽谤诉讼、新闻源和上级的责备等职业风险的一套“策略性仪式”。<sup>①</sup>

不过，客观性对西方记者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了维护客观报道的表象，记者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卢卡奇就曾论及，新闻客观性是资产阶级社会里记者的劳动被“异化”的表现。<sup>②</sup>最重要的是，客观性在为记者争取相对于政府和资本的独立性提供了依据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不仅掩盖了他们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新闻与权力的关系，而且最终也掩盖了西方新闻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间的关系。

### （三）新闻客观性在国际垄断媒体资本时代的式微与挣扎

客观性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峰期是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新闻业。事实上，对“表面客观性”（或“伪客观性”）的遵守往往使媒体被动成为官方声音的传声筒。麦卡锡主义时期，麦卡锡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就是被美国新闻界以“客观新闻”的形式放大和流传，成为主流话语的。而这正也证明了“客观性”实践与反共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冲突，而且互为彰显。事实上，如《维系民主？》第六章所分析的，正是新闻客观性为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 1980 年代以来的普遍“向右转”提供了烟幕。当然，如我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及，在美国主流新闻体制内部，对客观性理论与实践的修正与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19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以来，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确（如里根时代废除了作为客观性核心要求的广播电视“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在市场垄断加剧的条件下，在媒体受众市场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在反恐的语境下，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观众的法宝。

到了本世纪初，美国国家和媒体掌控者对媒体报道的影响在加强，加

<sup>①</sup> Gaye Tuchman,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1972), pp. 660-679.

<sup>②</sup> Goe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8),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The Merlin Press, 1971).



上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化，使美国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4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调查性报道，揭露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操纵出现在媒体上的藐视客观独立，实则与美国各大军火商有密切利益关系的“军事评论专家”，从而把一场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卖给美国民众。同时，西方媒体中一些基于新闻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新闻价值，如注重突发事件、冲突、猎奇与耸人听闻等，又在特定的条件下，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效果。新闻客观性的危机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危机相辅相成，构成了《维系民主？》中所论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双重危机”，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书名中对西方新闻能否承载“维系民主”重任的疑问。

然而，复杂多面的新闻客观性依旧是西方新闻中的“不死之神”。在我们深感它在报道西藏问题中的虚伪，甚至在反恐旗帜下通过传播“官方真理”欺骗美国民众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上文提到《纽约时报》的长篇调查性报道那样的新闻维系了新闻客观性的真实性？

#### （四）新闻客观性、文化共识和对西藏的报道

在日常的报道中，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势力作为新闻源对媒体的影响，政府日趋高超的操纵新闻的手段，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和对客观性等职业规范的主动和灵活使用，已经取代了政府的新闻审查。这使西方媒体能占领拥有新闻自由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不仅在“国际社会”中更有合法性和可信度，也使其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功效更为隐蔽。而西方国内议会政治框架内的“合法争议”领域的存在，也使客观性不仅能服务于统治精英内部的讨价还价，而且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干预新闻报道和影响社会话语内容的有限的机会。

在2008年奥运前夕对西藏“3·14事件”的报道中，西方媒体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新闻价值观恰好与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政治势力希望孤立与分化中国、从而建立世界霸权的策略相辅相成，从而它们的倾向性和客观性的相对性和虚伪性暴露无遗。一些西方媒体的支持“藏独”的煽动性报道使人想起了在美国报业的“黄色新闻”时代，报业大王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为了挑起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在古巴的战争而发给记者的电报指令：你提供照片，我提供战争。如果西方一些右翼势力真的希望分裂中国，那么，这些相对独立于西方政府的媒体，这次几乎充当了这种企图的舆论先驱和我们曾经熟知的列宁的党报原则所规定的“集体鼓动者”。在我所在的温哥华，《温哥华太阳报》的一位专栏作家一

篇有关北京奥运的文章的结语就是“西藏队,加油”(Go Team Tibet)。

然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和西方一些势力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在中国看到一个听命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权的问题。这里还有更深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令一些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他们希望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独特的西藏文化能在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希望在那里找到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早已失去的东西。所以,西藏越在整个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她离一些西方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就越来越远。而不平衡的自上而下、从外部到本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又使阶级、民族和宗教间的矛盾盘根错节。

正如温哥华的华裔媒体人丁果在与我的一次媒体对话中所言,达赖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并不单是一个政治角色,更多的是“心灵导师”的角色,而且这种认知已深入到民意的基层中,形成西方媒体深层的预定“共识”。虽然达赖在政治上保守,与西方右翼政客为友<sup>①</sup>,但是,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达赖不仅代表自由主义人权“共识”,而且是世界级的精神文化领袖。这样,他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正是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对藏独势力和达赖的报道没有“客观”的必要的深层媒体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西方媒体事实。这一方面显示出达赖及其支持者在西方媒体中的经营的成功,一方面也向中国媒体如何在西藏问题的报道中在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仅仅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新闻道德层面上对西方进行回应是不够的。虽然简单的中西方二元对立能强化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但是,这掩盖了、也无助于解决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触及世界每个角落,包括位于世界屋脊西藏的今天,人类文明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其实,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环保、主流社会与少数族裔的多元共存是全球性的问题,在美国、在欧洲、在中东、在拉美,在世界每个地方都存在,是东西方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对西藏的报道,跟对中国其他问题的报道一样,有必要探索和寻求全球视角。仅仅捍卫中国的主权,仅仅挑战西方新闻客观性的虚伪和西方话语霸权,是不够的。在全民族讨论“中国崛起”的道

<sup>①</sup> 如1999年,他为智利独裁者 Augusto Pinochet 向英国政府求过情,使后者免于被引渡到西班牙面对反人类的审判。见 William Engdahl, "Why Washington Plays 'Tibet Roulette' with China," 5 April 2008.

<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print/Why%20Washington%20Plays%20Tibet%20Roulette%20with%20China.pap.pdf>

路的关键历史时刻，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了现代性问题和“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全局性反思机遇，也为我们在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挑战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霸权中寻求全球正义提供了契机。

### （五）展开我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想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网络的兴起不仅成就了跨国垄断资本媒体内容的全球化，而且成就了美国媒体制度和自由主义媒体理念的全球霸权。本文开篇所叙的我们在“新启蒙”过程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逆反和《报刊的四种理论》在这一现有的批判的武器已失去其说服力的语境下以“供批判用”的名义的出版、从而或多或少正面影响一代学人的理论框架的过程何尝不是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一部分。<sup>①</sup>然而，就像我当时的“第三世界国民”的自我身份定位使我直觉地带上中文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去西方留学一样，我们的“非西方”身份使我们无法接受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为我们预定的“共识”。在霍尔所分析的三种解读定位中，我们许多人做了一次在总体上接受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上的“主导性代码原”（dominant code）的前提下，对其某一具体新闻报道表达异议并就其进行商榷的“活跃受众”。更具体地说，我们是用西方客观性原则的普遍性来“协商”特定的西方新闻内容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媒体报道西藏事件之所以不顾事实和客观性要求，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不开放媒体采访。当然，如果中国在新闻报道领域能够更加开放，就能够占据国际舆论的道德制高点。让世界直面中国，是打破西方媒体对中国妖魔化报道的重要途径。<sup>②</sup>但是，如果接受本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不开放对西藏的新闻采访，就不是西方媒体在报道中违背客观性基本要求的充分理由。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对国际问题报道，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报道中有明显的

<sup>①</sup> 虽然这本书是以供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用的名义作为内部非正式出版物出版的，但是，当时我们自己现有的可作为其批判的武器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已失去其权威性和说服力，而我们又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批判理论这些新的思想资源可以利用。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一方面引入了美国极其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新闻理论”，一方面引入了“科学”与“客观”的美国实证传播学。我们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不但没能在理性和学术思想的层面上检讨这其中的矛盾与不可调和性，从而激活我们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传播学的学术想象，反而变成了学术权力之争。

<sup>②</sup> 《环球华报》编辑部：《西藏暴动报道事件的思考》，载《环球华报》，2008-04-04，[http://www.gcpnews.com/articles/2008-04-04/C1063\\_21787.html](http://www.gcpnews.com/articles/2008-04-04/C1063_21787.html)。

双重标准。<sup>①</sup> 一个国家会不会被西方媒体妖魔化和污名化,与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性质有关,而这里最关键的是这个国家的主导力量是不是维护西方(主要是以美国国家为核心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在该国的利益。这不是为新闻审查辩护。

这不免要涉及对西方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另一重要原则——新闻自由——的理解。在把西方新闻客观性当作官方新闻理论的对立加以理想化的时候,我们也把西方的新闻自由抽象化和去历史化了。我们崇拜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向往它所体现的自由主义境界,甚至暗暗希望它成为“普世”法律。当然,我们更景仰美国国父们的伟大、英明和民主精神。但是,我们缺少对新闻自由、尤其是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规定的负面自由的法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认识。

事实上,在美国,新闻传播学者对第一宪法修正案的历史研究和当代批判从来没有中断过。例如,一方面,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时的另一同事、自由主义传播学者麦克·舒德森的历史研究证明,第一宪法修正案原本规制的是国会和州议会的分权问题,而不是国家要不要和有没有管媒体的权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第一宪法修正案的本质是联邦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正因为是这样,“国会”是这句话的主语。<sup>②</sup> 另一方面,批判学者如麦切斯尼在其颇有影响的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和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中强调,对第一宪法修正案一直有不同于自由主义(libertarian)的法理解读和法院判决案例。最重要的是,它并没有为新闻自由成为垄断资本不受国家出于公民民主自治的要求对媒体进行规制的挡箭牌提供合法化的武器。民主,不是私人媒体拥有者对媒体作为社会传播机构的私人控制和不受国家政策干预的自由,才是第一宪法修正案体现的最根本的原则。用麦切斯尼的话说:“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没有用第一宪法修正案来为一个由公司运作的、以牟利为目标的、以商业化为驱动的媒体制度授权。”<sup>③</sup>这不是否定各种社会力量为自己的新闻

<sup>①</sup> 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研究是 Edward S. Herman and N.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Pantheon, 2002); 对本研究的修正,见 Colin Sparks, “Extending and Refining the Propaganda Model”, *Westminster 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Vol. 4;2 (2007), pp. 68-84.

<sup>②</sup> Michael Schudson,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8), p. 73.

<sup>③</sup> Robert A. McChesney,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Future of Med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7), p. 118. Robert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自由而抗争的历史正义性，而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自由的主体问题，也即“谁的自由”和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的话语权的分配——平等的问题。

在西方批判学者反思西方新闻体制和基本原则，希望按照民主和参与的精神“重造媒体”并领导和参与各种方兴未艾的以媒体民主化为目标的“媒体改革”运动的时候，<sup>①</sup>国内的许多学者一边忙于建构以“美国主流”为基本参照的新闻传播学，一边把西方垄断资本媒体的新闻理念当普世理念在中国不加批判、不分社会制度地弘扬，而媒体商业化的压力和“做大做强”的产业取向又在客观上引导学者和学生们强化唯西方垄断资本媒体马首是瞻的倾向。

今天，我们在西方新闻客观性的框架下做了一次“活跃的受众”；明天，我们是照旧做着“客观专业”的新闻传播学术，并希望就此与“西方主流”接轨，还是像《中国法学何处去？》作者邓在来就中国法学发展的道路呼吁的那样，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象？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批判传播学术专著，我们如何使这一学术资源与构建新的、立足于中国同时也超越帝国主义的和符合全球正义的华语新闻传播学术？

赵月枝

2008年10月于温哥华

原载于《新闻大学》2008年第二期（此处有删改）

---

<sup>①</sup> Robert A. Hackett, William K. Carroll,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6); Robert A. McChesney,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Robert A.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